吕思勉◎著

白话中国史

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

通古通今
通天下
知兴知衰
知未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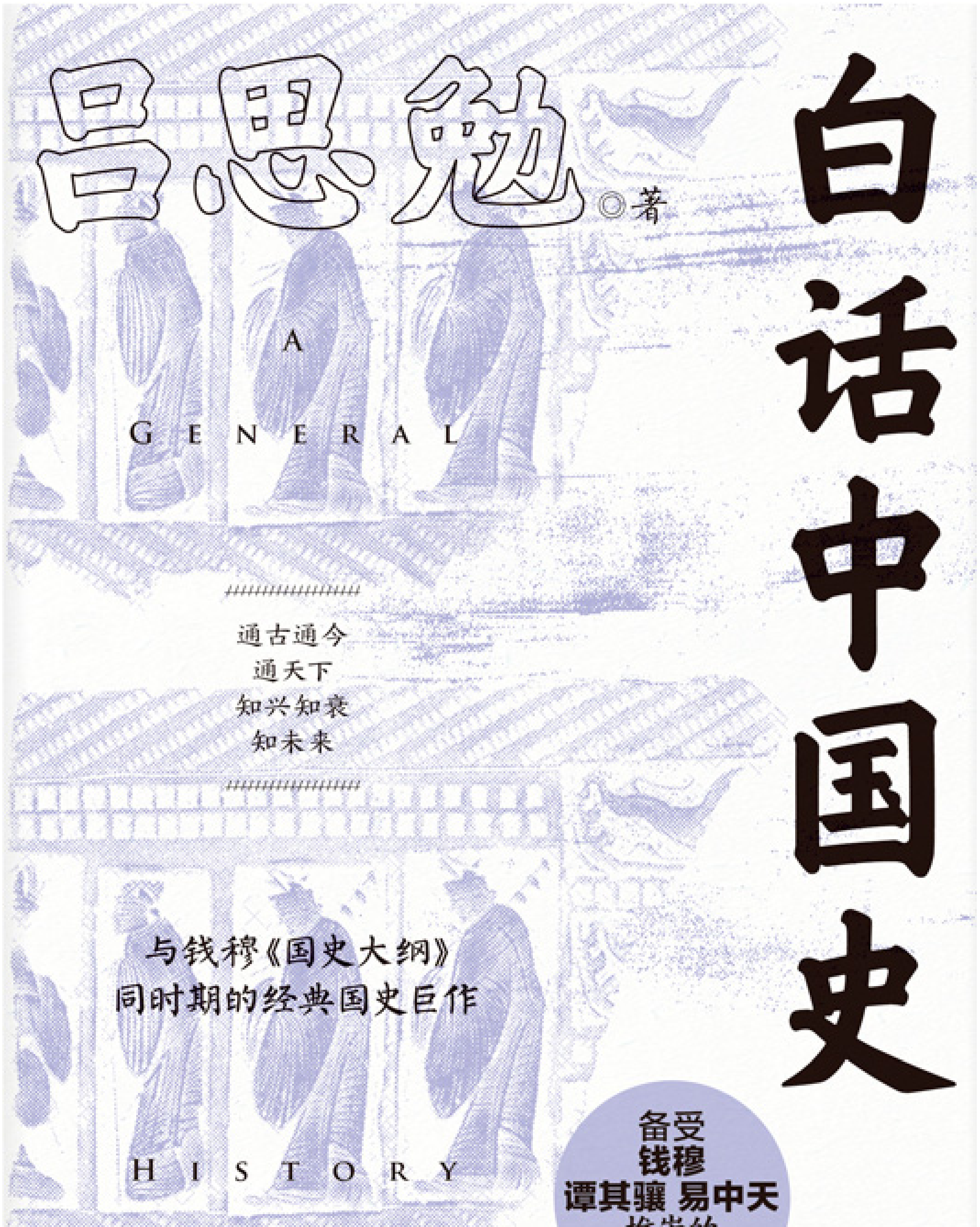
与钱穆《国史大纲》
同时期的经典国史巨作

备受
钱穆
谭其骧 易中天
推崇的
国史巨作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VISIT…

LANZAROTE Caliente.com



吕思勉◎著
白话中国史
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
通古通今
通天下
知兴知衰
知未来
与钱穆《国史大纲》
同时期的经典国史巨作
备受
钱穆
谭其骧 易中天
推崇的
国史巨作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版权信息COPYRIGHT

书名：白话中国史

作者：吕思勉

出版社：贵州人民出版社·联合读创

出版时间：2023年4月

ISBN：9787221176158

字数：201千字

编者的话

吕思勉先生1884年生于江苏常州，字诚之。5岁开始读书，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开始阅读史书，16岁便自学古史典籍。1905年起，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、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校任教。

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知名的史学家，知识渊博，学术造诣深厚。在通史、断代史和专门史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开启用白话文撰写新式中国通史的先河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先生一生著作宏富，潜心治学，不求闻达，史德与史识兼备。与陈垣、陈寅恪、钱穆并称为“史学四大家”。

基于对历史、对吕思勉先生的尊重，为了最大限度地呈现原作的风貌，编者只对其中的个别错讹进行了改正，规范了个别字词的写法，以便读者阅读、理解。

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原作中的一些观点在如今看来有不足之处，请读者理性、辩证看待。

@SHAREBOOKS4YOU

感谢Telegram 频道 @sharebooks4you制作，欢迎大家扫码订阅

第一编

上古史

第一章

太古之传说

历史，是要有了文字，才会有的。没有文字以前，就只得凭向来的传说，加以幼稚的思想，把他附会联贯起来了。然而传说虽然幼稚，其中总也包含着些思想和事实。中国古代，较确实的传说，是和火的发现同时的。所谓三皇，第一个是燧人氏，便是发明取火的法子的。第二个是伏羲氏，他制造网罟，教人民打猎、捕鱼。第三个是神农氏，就要教人民种田了。

传说的价值

地球的有人类，已经几十万年了；人类的有历史，却不过几千年。因为历史，是要有了文字，才会有的。没有文字以前，就只得凭向来的传说，加以幼稚的思想，把他附会联贯起来了。然而传说虽然幼稚，其中总也包含着些思想和事实。现在科学发达了，历史不完备的地方，可以借别种科学来补足。如地球如何生成？生成之后，有何变化？可以借助于地文学和地质学。地球上什么时代有生物？又什么时代才有人类？有了人类之后，又是如何进化的？可以借助于古生物学和人类学。如此，历史的年代，就渐渐的延长了。根据着这种眼光来看古代的传说，我们就愈觉得有味。

历史年代

历史之有年代，犹地理之有经纬线也。必有经纬线，然后知其地在何处；必有年月日，然后知其事在何时。举一事而不知其时，即全不能知其事之关系矣。然历史年代，有难言者。今设地球之有人类，为五十万年，而列国史实，早者不越五千年，有确实年代者，又不及其半，是则事之有时可记者，不及二百分之一也。况于开化晚者，所记

年代，尚不及此；又况蒙昧民族，有迄今不知纪年之法者邪？以历法推古年代，本最可信，然昔人从事于此者，其术多未甚精；古历法亦多疏舛；史籍记载，又有讹误；故其所推，卒不尽可据也。先史之世，无年可纪，史家乃以时代代纪年。年代愈古，则材料愈乏，而其所分时代愈长。看似粗略，然愈古则演进愈迟，变异亦愈少，据其器物，固亦可想见其大略也。（《先秦史》，开明书店1941年版，第32、39页）

进化的三时期

人是会使用工具的，研究人类学的人，就把他所用的工具，来分别他进化的时代。最初所使用的，大抵是天然的石块，虽然略加改造，离天然的形状，总还是很近的。这个唤做“始石器时代”。后来进步了，便会把天然的石块，改造成自己所要用的样子，唤做“旧石器时代”。再后，并能造的很精致了；这个唤做“新石器时代”。石器时代所用的锤、刀、镰等物，看似粗劣，却帮助人类做成了许多东西；而且在对动物的斗争上，很是有利。用火，也是人类的最大发明。有了火，人就可以得光明，得温暖；也可以做防卫和攻击的手段。而其关系尤大的，则是易于将东西改造，譬如天然露出的金属，给人类取得的，就可以把他打成器具。就是和土混杂的，亦可借火的力量，把土烧掉了取出来。如此，就渐渐的先进于用铜，后进于用铁了。人类进化的步骤，大略如此。

社会演进的等级

社会的演进，可以从多方面观察，而用种种标准，以分别其演进的等级。但是人类最急切的问题是求食；而其所以能高出于其他动物，则因其能使用器械。所以用人类取得食物的方法，和其所使用的器械的不同，来分别他演进的等级，是最切要的。用取得食物的方法来分别，可以分为：（一）搜采，（二）渔猎，（三）农业、牧畜时代。以其所使用的器械为标准，则可分为：（一）石器，（二）铜器，（三）铁器时代。大约渔猎时代，还只能使用石器；到农牧时代，渐

能使用铜器和铁器了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，第34页）

三皇的传说

中国古代，较确实的传说，是和火的发现同时的。古代传说，开天辟地的叫做盘古。（此系秦汉间的传说，见任昉《述异记》及徐整《三五历纪》，系据《绎史》卷一《开辟原始》篇转引）其次有所谓三皇（三皇五帝异说甚多，本书三皇之说，系据《尚书大传》；五帝之说，系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。欲知其详，可参看拙撰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一编第二章，商务印书馆本），三皇第一个是燧人氏，便是发明取火的法子的。第二个是伏羲氏，他制造网罟，教人民打猎、捕鱼。第三个是神农氏，就要教人民种田了。

传说的君王可代表进化中的一个阶段

古代的传说，总把社会自然的事情，归功于一两个人，尤其是酋长身上。但是古代的君主，都以德为号。（这是服虔之说）所以所谓某某氏、某某氏，亦可说是并无其人（至少虽有其人，而不关重要），而其名称，只是代表进化中的一个阶段。神话姑不必论。古代传说的君主，较有事迹可征的，是巢、燧、羲、农。巢是有巢氏，教民构木为巢的。燧是燧人氏，教民钻木取火的。羲是伏羲氏。伏羲，亦作庖牺。从前的人，说他是畜牧时代的酋长，这实在是望文生义。伏羲的正当解释，见于《尚书大传》中［《尚书大传》，是西汉初年伏生所撰。伏生名胜（汉人言生，如今人言先生），还是秦朝的博士，是汉朝传《尚书》的第一个经师，所以其说较古而可信］，是“下伏而化之”之义。至其事业，则《易经·系辞传》，说他“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”。其仍在渔猎时代可想。至于神农二字，则古人本多当农业或农学的意义用，神农氏为农业时代的君主，那就不言可知了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第35—36页）

第二章

中华民族之建国

汉族在太古时代，似乎分为两支：一支在河南的，是燧人、伏羲、神农，从渔猎进化到农耕。一支在河北的，则以畜牧为业，这就是黄帝之族。当神农氏的末年，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，就是所谓阪泉、涿鹿之战。其结果，黄帝之族得利，从此以后做共主的，就都是黄帝的子孙。虽然古代的天子，未必有多大权力，然而共主的统绪，相承不断，我国建国，就此放下基础了。

搜集、渔猎、畜牧、农耕四时代

人所以维持其生命的，最紧要的便是食，而取得食物的方法，亦随时代而不同。最初只是到处游行，遇见可吃的东西，就取来吃，这个唤做搜集时代。进步些，能和动物斗争，则入于渔猎时代。一定的地面上，可供渔猎的动物，是有限的，有时候还不能渔猎；所以在这时代的人，常常挨着饥饿。于是在草原之地的，进化而为畜牧；在山林川泽之地的，就进化而为农耕。

农耕即孔子所言的大同时代

《礼运》所载孔子论大同之言，业已人人耳熟能详：“老有所终；壮有所用；幼有所长；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”更简而言之，便是“养生送死无憾”六个字。老子说：“郅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老死不相往来，用现在人的眼光看起来，固然不是美事。然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却是不易得的。这颇可与孔子论大同之语，互相发明了。从游牧再进到耕农，则人类的生活，益形宽裕；而其性质，亦因之大变。这实缘其所操事业之平和，而其生活程

度，亦远高于旧时之故。孔、老所想望的境界，大抵即在此时。（《中国社会变迁史》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下册，第154、157、160页）

国家的起源

国家不是最初就有的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才建立起来的。搜集时代，不必说了。就渔猎时代，文明程度，也嫌太低；而且因受食物的制限，所团结的人，亦觉得太少。游牧时代，团结的人固然多了；文明程度，也固然较高了；毕竟是逐水草而居，和一定土地的关系不密切。农耕社会，则又内部太觉平和，分不出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来（古代的农业公产部落，内部的关系，是很平和的。孔子所谓大同，大概就指的这个时代。可参看拙撰《大同释义》，见《文化建设杂志》第一卷第九、第十两期），所以往往不能形成国家。国家最普通的起源，是畜牧和农耕两种部落的结合。原来畜牧民族，性喜侵略，往往把农耕民族征服。而农耕民族，安土重迁，宁愿纳贡表示服从，而不愿意逃走。游牧民族，就始而征收其贡品；继并迁居其部落之内，代操其治理之权，形成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，国家就于此成立了。这是政治学家的成说，返观我国的古史，似乎也是符合的。

由大同入小康

大概农业社会，衣食饶足；其人所从事的事业，又极和平，所以其性质最为善良。对外多能“讲信修睦”，内部更其不分彼此。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，大约就是指此等部落而言。假定有两个部落，互相争斗，一胜一败，败者的财产，就要为胜者所有，连人也做了他们的奴隶了。如此，便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来。即使没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，一部落中，治者的权力，也会日渐扩大，至于与被治者分离。古代的国家，大概是如此造成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一册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版，第20、21页）

部落互相接触，兵争渐起，发生征服与被征服之关系。而各部落之内部，执掌政权及富有财产者，权力渐显，地位亦渐高。社会则渐降而入小康之世矣。（《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，第8页）

中华民族的起源

地球上的人类，其初该是同出一源的。因为环境的不同，影响到容貌上，而分为许多种族；又因文化的不同，而分为许多民族。中国大陆，在古代是有许多民族，杂居其间的。而在黄河流域的华族（中华民族的起源地，说者各有不同，但以从中亚细亚迁来逐渐到黄河流域之说，比较近是。自从民国十年以来，北平西南的周口店，发见一种猿人遗骨，称为北京人，又名中国猿人，推算年代，当在五十万年至百万年左右。似乎中华民族的祖先，就发源于中国本土。或者极古时候已由中亚迁来了），就是后来称为汉族的，文明程度最高。汉族在太古时代，似乎分为两支：一支在河南的，是燧人、伏羲、神农，从渔猎进化到农耕。（普通以伏羲为游牧时代的酋长，乃因“羲”又作“牺”，“伏”又作“庖”，因而生出“驯伏牺牲”“取牺牲以充庖厨”等曲说。这是不对的。伏羲二字，乃“下伏而化之”之义，见《尚书大传》）一支在河北的，则以畜牧为业，这就是黄帝之族。［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：“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，以师（人众）兵（军械、师兵、犹言武装的徒众）为营卫。”所以知其为游牧民族］当神农氏的末年，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，就是所谓阪泉、涿鹿之战。（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：神农氏这时候衰弱了，诸侯互相攻击，神农氏不能征讨，诸侯之中，蚩尤氏最为暴虐。黄帝和蚩尤战于涿鹿，把他擒杀。又和炎帝战于阪泉，三战然后得胜。诸侯乃共尊黄帝为天子）其结果，黄帝之族得利，从此以后做共主的，就都是黄帝的子孙。虽然古代的天子，未必有多大权力，然而共主的统绪，相承不断，我国建国，就此放下基础了。

炎、黄之际为世运一大变

《战国策·赵策》曰："宓牺、神农，教而不诛，黄帝、尧、舜，诛而不怒。"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》曰："今足下以汤、武为不义，然则足下所谓义者，何世之君也？则答之以神农。"若是乎，自古相传，咸以炎、黄之际，为世运之一大变也。案《战国·秦策》：苏秦言神农伐补遂，《吕览·用民》谓夙沙之民，自攻其君而归神农。《说苑·政理篇》同。则神农之时，亦已有征诛之事。盖神农氏传世甚久，故其初年与末年，事势迥不相同也。然此等争战，尚不甚剧，至炎、黄之际，而其变益亟。（《先秦史》，第57页）

第三章

唐虞夏商之政教

黄帝还以游牧为业，到唐尧时候，就已经改事农耕了。尧、舜的禅让，禹的治水，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。禹之子启，即天子位，而唐虞时代的“官天下”（禅让制度），就一变为“家天下”（世袭制度）。夏、商两代，可考见的事情，还不很多。论其大略，则古书多说“夏尚忠，商尚质”。可见其时的风俗，很为朴实；而生活程度，也还不高。夏代约四百年，为商所灭；商代约六百多年，为周所灭。商代君主多兄终弟及，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。

唐虞时代的情形

立国是要有两种力量的：一种是文化，一种是武力。古代炎、黄二族，论文化，似乎炎族较优；论武力，似乎黄族较强。两族合并之后，中华民族，就可以发扬其光辉了。炎、黄二族，大约本来是很接近的，所以同化很为容易。黄帝还以游牧为业，到唐尧时候，就已经改事农耕了。何以见得呢？因为《书经》第一篇《尧典》，是记载尧时候的事情的。其中载尧命羲、和四子，分驻四方，推步日、月、星辰，制成历法，以教导农民。可见其时对农业，已经很重视了。所以这时代的政教也很有可观。

尧舜的禅让

尧、舜的禅让，禹的治水，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。据《书经》上说：尧在位七十年，因年老，倦于政事，要想传位给当时管理四方诸侯的官，唤做四岳的，四岳不敢承允。这时候，虞舜尚在民间，因其有德行，众人共举他。尧乃举舜，试之以政事。后来就使他摄政，传以天子之位。尧死后，舜让避尧的儿子。诸侯都归向舜，

舜才即天子位。后来用同样的手续，传位于夏禹，禹即位之后，也是预定将王位传给益的。而禹之子启贤，天下都归心他，启遂即天子位，而唐虞时代的“官天下”—禅让制度，就一变为“家天下”—世袭制度。

尧舜禅让之说

尧舜禅让之说，予昔极疑之，尝因《史通》作《广疑古》之篇。由今思之，昔时所疑，盖无甚得当者。唯果谓尧、舜、禹之禅继，皆雍容揖让，一出于公天下之心，则又不然。《韩子》所引史记之文，即其明证。古代史事，其详本不可得闻。诸子百家，各以意说。儒家称美之，以明天下为公之义；法家诋斥之，以彰奸劫弑臣之危。用意不同，失真则一。昔人偏信儒家之说，以为上世圣人绝迹后世，其说固非；今必一反之视为新莽、司马宣王之伦，亦为未当。史事愈近愈相类，与其以秦汉后事拟尧舜，自不如以先秦时事拟尧舜也。自周以前，能让国者，有伯夷、叔齐、吴泰伯、鲁隐公、宋宣公、曹公子喜时、吴季札、邾娄叔术、楚公子启之伦。既非若儒家之所云，亦非若法家之所斥。史事之真，固可据此窥测矣。然儒家所说，虽非史事之真，而禅继之义，则有可得而言者。《书》说之传者，今唯《大传》，而亦阙佚已甚。欧阳、夏侯三家，胥无可考。自当以《孟子》为最完。今观其说，则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之议，然后设难以明之。曰孰与之？曰天与之。天与之者，谆谆然命之乎？曰：否。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故舜禹之王，必以朝觐讼狱之归，启之继世亦然也。所谓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也。故曰：“唐、虞禅，夏后、殷、周继，其义一也。”（《禅让说平议》，原刊《古史辨》七，开明书店1941年版，第268、269—270页）

禹的治水

当尧的时候，天下有洪水之患。舜摄政，举禹，叫他去治水。禹乃先巡行各处，看定了地势，然后用疏浚之法，导小水使入大水，大水使

入海。当时独流入海的，是江、淮、河、济四条水，谓之“四渎”，为诸水之宗。

治水的三阶段

朱子说：禹的治水，只有《书经·皋陶谟》即今本《益稷》中，“予决九川，距四海，浚畎浍距川”几句话最可信。川是自然的河流，畎浍则人力所开的水道，海乃湮晦之义，距离较远，而其地的情形，为我们所不知之处，则谓之海，所以夷、蛮、戎、狄，谓之四海。九是多数的意思。“决九川，距四海，浚畎浍距川”，只是把人力所成的沟渠引到大河里，又把大河通到境外罢了。治水最早的法子，该是堤防，这原是最易见到的，然久之就觉得其不妥，不顺着自然力的方向去利用他，而要与之相争，这总是不行的，于是就从堤防进步到疏浚。古书上说鲧治水的失败，禹治水的成功，就是代表这一个观念的，未必是当时的事实。然而疏浚的工程太大，人力实不能胜，奈何？于是有（明）潘季驯束水攻沙之法。束水攻沙者，河行到平地，流势宽缓，将未显出堆积作用来时，我们则窄其道而束之，使其再显出冲刷作用和搬运作用，于是从上流挟带而来的泥沙都被搬走，不至堆积下来了，不和自然力争斗，亦不见他退缩，而即利用他的力量，来达到我们的目的，这确是治水最高的方法了。治水的三阶段，恰代表了人类对付自然的三种态度。（《治水的三阶段》，原刊上海《正言报·学林副刊》 1945年第 2期）

唐虞的政教

当禹治水的时候，益、稷两人，都是他的辅佐。益把山泽之地，放火焚烧，禽兽都逃匿了。弃乃教民稼穑，契做司徒的官，又继之以教化。契封于商，便是商朝的祖宗；弃封于邰，便是周朝的祖宗。（商，今陕西商县。邰，今陕西武功县）

夏商的兴亡

夏启即王位之后，传子太康。因淫佚，为有穷国君羿所篡。后来羿又为其臣寒浞所杀。并灭夏朝的王相。相的儿子少康，才灭浞，号称中兴。尧、舜、禹三代，本来都是建都在太原的。少康复国之后，则似乎建都在河南，所以到夏桀时，其都城却在阳城了（今河南登封县）。夏代共传十七主，约四百年，而为商所灭。商汤灭夏后，建都在河南的偃师。其地称为殷，所以又称殷朝。后来屡次迁都，亦都在黄河两岸，共传三十一世，约六百四十多年，至纣，为周武王所灭。

桀、纣恶政多附会

夏曾佑《古代史》曰："中国言暴君，必数桀纣，犹之言圣君，必数尧、舜、汤、武也。今案各书引桀、纣事多同，可知其必多附会。"案谓言桀、纣之恶者多附会，是也。然谓附会之由，由于兴者极言前王之恶，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。古本无信史，古人又不知求实，凡事皆以意言之，正如希腊荷马之《史诗》，宋、元以来之平话耳。或侈陈而过其实，或臆说而失其真，皆意中事。然附会之辞，虽或失实，亦必有由，不能全无根据也。就桀、纣言之，则纣之世近，而事之传者较详，桀之世远，而事之传者较略，故以纣之恶附诸桀者必多，以桀之恶附诸纣者必少。（《先秦史》，第127—128页）

夏商的政教

夏、商两代，可考见的事情，还不很多。论其大略，则古书多说"夏尚忠，商尚质"。可见其时的风俗，很为朴实；而生活程度，也还不高。又孔子说："禹尽力于沟洫。"可见其时，对于农田水利，颇为讲究。然而夏朝的税法唤作"贡"，是取几年收获的平均数，以定每年应纳的税额，丰年不能多，凶年不能少。这个却远不如商朝的"助"法了。助法是把田分为公、私。只借人民的气力，助耕公田，而不再税其私田的，这个就是所谓井田之制。从前论税法的人，都说他最好。又商汤死后，他的孙子太甲在位，因其不守成法，宰相伊尹曾把他放逐在桐的地方三年。太甲悔过，才把他迎接回来。而据孔子说：则商代新君即位，三年之内，是不管事的，百官都听命于宰相。可见商代

相权颇重；又商代的君主，多是兄终弟及的，亦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。

第四章

上古之文化与社会

人类最初的团结，是靠着血统的。论血统，也是以女子为主。中国的姓，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；到牧畜时代，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。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，姓也改而代表男系。文化渐次进步，住居相近的人，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，这就是所谓部落。一部落之中，语言、风俗、信仰等，自然都相同。此等文化相同的人，就成为一个民族。民族以文化为标准，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。所以《春秋》之义：诸侯用夷礼，就当他是夷狄；用中国之礼，就当他是中国。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，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。

食的进化

中国的进化，大约自三皇以来。其初所吃的东西，是草木之实，鸟兽之肉（见《礼记·礼运》）；和水中的蚌蛤等类（见 《韩非子·五蠹 》）。后来进化了，渐渐的知道吃各种植物，这个唤作“疏食”。［疏食二字古有两义： （一） 其初因菜类较谷类为粗疏，所以对于谷食，而称谷以外的植物为疏食； （二） 后来亦称粗的谷类为疏食，更后乃以疏食专指粗的谷类，而别造蔬字，以为菜食之名。此处的疏食二字，是依第一义指谷以外的植物的，谷以外的植物，后世的人，不用为主食品，古人则不然。《管子·八观篇》说：“万家以下，则就山泽；万家以上，则去山泽。”可见当时，靠疏食还能养活许多人口］ 从疏食再进一步，就会谷食了，古书上说神农尝百草，因而发明了医学，这正是疏食时代的事。

衣的进化

衣服：最初所着的，是鸟兽的羽皮；或者把植物的叶子编起来，着在身上；这个唤作皮服和卉服（皮服、卉服的名词都见《书经·禹贡》）。后来发明了利用植物的纤维，才会用麻。相传黄帝的元妃嫘祖，是发明养蚕的（见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引《淮南蚕经》）。从此以后，又会用丝做衣料了。裁制的方法：最初只是用一块皮，遮蔽下体的前面，这个就是所谓韨。连后面也遮蔽起来，就是所谓裳了。着在上身的唤。衣。有一种，把衣裳连在一块的，唤作“深衣”。有裤管的：短的唤作裈，长的唤作袴。除童子外，没有以短衣和袴为外服的。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等，朝服、祭服，都是衣裳分开的，平时则着深衣；庶人则径以深衣为礼服。深衣是用白布做成的，不染色。（古代服，是讲布的精粗的，不讲颜色，平民穿的衣裳，都是本色，所以称平民为白衣；就是贵族，在平时着的，也是白衣）戴在头上的，最尊重的唤作冕，次之是弁，通常所戴的是冠。这冠和带，是古人看得最重要的，所以中国人总自称为冠带之国。庶人亦用一块巾裹着头发。脚上穿的唤作袜，袜以外又有履。冬天是皮的，夏天是葛的。又有绑腿，唤作“行縢”，亦唤做“邪幅”。

住的进化

居住，最初有两种：一种住在树上，唤作巢居；一种在地上掘一个窟窿，人住在里头，唤作穴居。进步些，能在地面做起一个土堆来，像现在的坟一般，则唤作“复”（见《诗经·绵》疏）。从巢居进化到会把树木砍伐下来，照自己的意思，搭成架子；从穴居进化到会版筑（先在两面立了木版，墙要筑到多少厚，木版的距离就是多少宽，把土填在版中间，然后筑坚它），在这架子的四面，筑起墙来；上面盖着茅或瓦，就成功所谓宫室了。宫室的发明，据《易经·系辞传》上说，是在黄帝、尧、舜的时候。这时候，还发明了棺椁，而且会“重门击柝，以御暴客”。

古以卑宫室为美谈

古筑城郭宫室，皆役人民为之，故以卑宫室为美谈，事土木为大戒。崇宏壮丽之建筑，历代未尝无之。然以中国之大言之，则其数甚微耳。又地处平原，多用土木而少石材。即用砖亦甚晚，故大建筑之留诒者甚少。《日知录》曰："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，其城郭必皆宽广，街道必皆正直，廨舍之为唐旧创者，其基址必皆宏敞。宋以下所置，时弥近者制弥陋。"致慨于"人情之苟且，十百于前代"。此等足觇生计之舒蹙，治化之进退，诚为可忧。（《中国文化史六讲》，写于1929至1930年间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下册，第138页）

行的进化

当人住在山林中的时候，是只有人走出来的小路的，这个古人唤作蹊径。这时候，遇见小的水，就径在水里走过去，唤作"徒涉"；大的水，就没有法子了。后来住到平地上，路宽广了，也平坦了，就可以利用牛马，于是又发明了车，而且也发明了船。这等进化，据说也在黄帝、尧、舜时候。

工具的进化

和黄帝打仗的蚩尤，古书上都说他是"造兵的人"。"兵"，就是现在所谓兵器，古人是用铜做的。大约是炎、黄之间所发明。从周朝到汉朝，大概兵器是用铜，农器是用铁。《易经·系辞传》上说：神农作耒耜，黄帝作弓矢，都是用木的（这时候的箭，大约是用石镞的）。大约金属虽然发明，还没有能够广为利用。到了商代，才为金石并用时期，已有精巧的铜器，如钟鼎之类留传后世。相传纣王曾作玉杯象箸，亦足征那时进化之程度了。

宗教和哲学思想

以上所说的，是物质方面的进化。至于精神文明，则古人所笃信的为宗教，而哲学思想，亦就伏羲画八卦，该是古代所崇拜的八个神。大

禹时代，又有五行之说。五行，大约是古人所认为万物的原质的；借其相生相克，来说明万物的变化。

古人的五行说

古人说五行生成的次序是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他的原理是："以微著为渐。五行之体：水最微，为一。火渐著，为二。木形实，为三。金体固，为四。土质大，为五。"从轻微不可见的气，变成极博大的土，只是由于一种动力。一方面，固然由微而至著；一方面，也由著而仍至于微。气固可以成形质，形质亦可以复返于气。大概古人的意思，以为物质凝集的最紧密，就有质可触；次之就有形可见；再次之，就并形而不可见，而但成为一种气了。这种凝而复散，散而复凝的作用，是无时而或息的。所以说："易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"用现在的话解释起来，"易"就是"动"，"乾坤"就是"现象"，就是咱们所能认识的，只是动的现象。总而言之，他彻始彻终，只是把一个"动"字，说明世界的现象。（《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的关系》，原刊《沈阳高师周刊》第31、32期，1921年5月21、28日出版）

文字的发明

古书上多数说仓颉是造字的人，也有说他是古代帝王的，也有说是黄帝史官的。这都不确，因为文字本是迫于需要，众人合力，慢慢创造出来的，古代人民，结绳记事，后来才有书契，为文字之始。最初多属象形文字，如日字象日，月字象月，鱼字象鱼，鸟字象鸟。文化渐近，文字也渐多。遂有指事、会意、谐声、假借、转注五项以次出现，和象形称为"六书"。（六书，除象形外，指事是直指其事，如上、下二字，人在一上为上，人在一下为下。会意是体会字的意义，如武、信二字，止戈为武，人言为信。谐声是半形半声，如江、河二字，水旁为形，工可为声。转注是可以辗转互注的字，如考可训老，老亦可训考。假借是一字两用，如令为命令，又为司令，又训贤良。长为长短，又为长官，又训优长）

古代的氏族

人类最初的团结，是靠着血统的。当夫妇之伦未立时，人本来只知道母亲，不知道父亲是谁。后来夫妇之伦，虽然渐渐确立了，然而这时候，男子都是在外面，从事于战争打猎等事情。在后方看守器物、抚育儿童等事，都是妇女担任的。所以这时候的家，完全是女子所有。论血统，也是以女子为主。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女系氏族。中国的姓，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。驯伏动物，大概从来就是男子的事情。所以到牧畜时代，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。农业虽说是女子发明的（农业为女子所发明，是现在社会学家之说，求之古书，也是有证据的，如古人祭祀时，男子所进的祭品是动物，女子所进的是菜果之类。初次相见所送的贽，男子是羔、雉等类，女子却是榛、栗之类），到要开辟山林的时代，也就转入男子手中了。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，姓也改而代表男系。

古代姓氏之别

姓之始为女系，故于文“女生为姓”，如“姬”“姜”等字是也。其后女系易为男系，则姓亦用以表示男子之血统。而同出一始祖者，又有氏以表其支派，乃称姓为正姓，氏为庶姓。古人姓氏各别，如齐大公姜姓，吕氏是也。姓百世而不更，氏数传而可改。三代以前，大抵男子称氏，女子称姓。封建制度破坏，贵族谱牒沦亡，莫能审其得姓受氏之由，亦无新创之姓氏，而二者之别遂亡。（《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》，第24页）

部落和民族

人是生来会合群的，所以其团结，并不以血统为限。文化渐次进步，住居相近的人，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，这就是所谓部落。一部落之中，语言、风俗、信仰等，自然都相同。就是接近的部落，也会渐渐同化的。此等文化相同的人，就成为一个民族。

民族以文化为标准

所谓民族，本是以文化为标准的，并非有什么种族的成见。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。所以《春秋》之义，诸侯用夷礼，就当他是夷狄；用中国之礼，就当他是中国。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，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。所以同是一个国，当其未进化时，可以夷狄自居，及其已进化后，就以中国自居，而且以攘夷狄自任了。尊王攘夷，是当时霸主很重要的责任。因为（一）有一个共主，列国间的秩序，到底要容易维持些；（二）而野蛮之国的侵扰，又是文明之国的公敌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一册，第46、47页）

工商业的兴起

使人分裂争逐的是政治，把人连结起来的，是文化和经济。在古代，各个部落，大概都是自给自足的，后来交通渐渐的便利了，人的欲望，也渐渐的增加了，就发生交易的事情。最初的交易，只是以物易物；没有定期定地的。交易渐渐的繁盛了，就会约定时间和地方，像现在的市集一般。《易经》上说，神农氏日中为市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时候，货币也渐渐发生了，用作货币之物：大约渔猎民族是贝，游牧民族是皮，农耕民族是粟、帛。金属，因其便于收藏，易于分割，渐渐的为各种人民所爱用，就发生古代的钱刀。最初所交换的，大概都是天产品。因为这时候，用具粗劣，人人都会自造的。抑或一民族中，因原料的出产，或技艺的精良，所制造的东西，是别一个部落所没有，或虽有而不及他好，这种制造品也会出现于市场之上。商业的刺激，是可以促进产业分化的；如此，各部落中，亦就慢慢地发生所谓工业家了。

工商的缘起及变迁

工业之缘起及变迁，若以大势言之，则古代工业，率由官营，而后世渐变为民业，即其一大进化。盖官营则能者少，民业则能者多；官营则唯守成规，民业则竞矜智巧也。古代部落，率皆共产，力之出不为

己，货之藏不于己，取公有之物而用之，以己所有之物资人，皆无所谓交易也。唯共产限于部落之内，与他部落固不然，有求于他，势不能无以为易，而交易之事起矣。往来日数，交易日多，则敦朴日漓，嗜欲日起，而私产之习渐萌。私产行，则人与人之相资亦必以为易，此则商业之所由广也。（《中国社会史》，写于1920年代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3、27—28页）

第五章

周之建国及其政教

周公平定东方之后，制礼作乐，归政于成王。周朝文明的进步，大约就在这时候。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。古代的部落渐相往来，就有互相攻击的事。战败的国，对于战胜的国，就要表示服从，尽朝贡等礼节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。再进一步，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，改封自己的同姓、亲戚、功臣等。封建时代，有贵族、平民的等级。从大夫以上，都是贵族做的；士以下才用选举。教化，则在封建时代，大概是守旧的。一切举动，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。礼是生活的轨范。生活变了，轨范就不得不变。然而当时的所谓礼，却未必能如此。人就有貌为敷衍，而心实不然的，这个就是所谓“文胜”。古书上多说“周尚文”，又说“周末文胜”，我们看这两句话，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。

周朝的建国

夏、商以前，史事可考的较少，周朝就不然了。这一则因为年代较近，所传的书籍较多；二则因为周朝的文化，更为进步之故。周朝从后稷、弃受封以来，似乎颇受外族的压迫，但他始终能够保持农业社会的文明。到周太王（古公亶父）以后，就强大起来了。文王时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但还“以服事殷”。到武王，才合诸侯于孟津（黄河的渡口，在今河南孟津县），把纣灭掉。这时候，周朝对东方权力，还不甚充足。所以仍把纣的地方，封其子武庚；而武王派三个兄弟去监视他（管叔、蔡叔、霍叔，分处纣的畿内，合称“三监”）。武王死后，子成王年幼，武王兄弟周公旦摄政，武庚和三监都造反。淮夷、徐戎，亦都响应（淮夷，在淮水流域。徐国，在今安徽泗县）。周公东征，把武庚和三监灭掉。又使他的儿子鲁公伯禽（周公封于鲁，没

有就国，叫儿子伯禽去的），打破淮夷、徐戎。经营洛邑为东都。周朝的王业，到此就大定了。

“国”之古义

古所谓国，是指诸侯的私产言之。包括（一）其住居之所，（二）及其有收益的土地。大夫之所谓家者亦然。古书上所谓国，多指诸侯的都城言。都城的起源，即为诸侯的住所。诸侯的封域以内，以财产意义言，并非全属诸侯所私有。其一部分，还是要用以分封的。对于此等地方，诸侯仅能收其贡而不能收其税赋。其能直接收其税赋，以为财产上的收入的，亦限于诸侯的采地。《尚书大传》说：“古者诸侯始受封，必有采地。其后子孙虽有罪黜，其采地不黜，使子孙贤者守之，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，此之谓兴灭国，继绝世。”即指此。采地从财产上论，是应该包括于国字之内的。《礼记·礼运》说：“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，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。”乃所谓互言以相备。说天子有田，即见得诸侯亦有田；说诸侯有国，即见得天子亦有国；在此等用法之下，田字的意义，亦包括国，国字的意义，亦包括田。乃古人语法如此。今之所谓国家，古无此语。必欲求其相近的，则为“社稷”二字或“邦”字。社是土神，稷是谷神，是住居于同一地方的人，所共同崇奉的。故说社稷沦亡，即有整个团体覆灭之意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49页）

西周的兴亡

周公平定东方之后，制礼作乐，归政于成王。周朝文明的进步，大约就在这时候。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两代，算是西周的盛世。康王的儿子昭王，南征不返，这一次，似乎是伐楚而败的。（这一次实在伐楚而败，以致淹死在汉水里的；这时候的楚国，在今河南丹、淅二水的会口。可参看拙撰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）王室就开始衰微了。昭王子穆王，喜欢游玩。（现在有一部书，唤作《穆天子传》，是记周穆王西游的事情的。据这一部书，当时穆王的游踪，要到亚洲的中部和西部，这是决不可信的。这部书是南北朝时代出现

的，一定是汉朝既通西域以后的伪品。穆王西游的事，见于《史记·秦本纪》《赵世家》，都没有说出所游的地方来，以理度之，一定不能甚远；不过在今陕、甘境上罢了）徐偃王乘机作乱。这一次，却靠楚国帮忙打定。五传至厉王，因暴虐，为国人所驱逐。卿士周公、召公当国行政，谓之共和。（周初，周公旦、召公奭的后人，世为周朝的卿士）厉王死在外边，才立其子宣王。宣王号称中兴。然其子幽王，又因宠爱褒姒之故，把申后和太子都废掉（申国，在今河南南阳县），申侯就和犬戎伐周，把幽王在骊山下杀死（骊山，在今陕西临潼县）。太子宜臼即位，东迁洛邑，是为周平王。从此以后，史家就改称他为东周了。西周共十二主，二百六十多年。

论共和

古代政体之奇异者，莫如共和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云："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号曰'共和'。共和十四年，厉王死于彘。太子静长于召公家，二相乃共立之为王，是为宣王。"是周之无君者，十有四年也。案：国本非君所独治，特后世君权重，人臣之位，皆守之于君，无君，则臣莫能自安其位。又视君位严，君之职，莫敢轻于摄代，故不可一日无君。若古代，则君臣共治其国之义尚明，臣之位亦多有所受之，非人君所能任意予夺。君权既小，则一国之政，必待人君措置者较少。人臣摄代其君，亦视为当然，而其顾虑，不如后世之甚，则无君自属无妨。《左》襄十四年，卫献公出奔，卫人立公孙剽。孙林父、宁殖相之，以听命于诸侯。此虽立君，实权皆在二相，亦犹周召之共和行政也。然究犹立一公孙剽。若鲁昭公之出奔，则鲁亦并不立君也。然则此等事，古代必尚不乏，特书阙有间，不尽传于后耳。韦昭释共和曰："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。"可见无君而不乱，实由百官之克举其职也。（《中国社会史》，第327—328页）

平王东迁之失策

因不能还都而蒙受极大的损失的，历史上最早可考的，便要推东周。东周平王元年，为西元前七七〇年，下距秦始皇尽灭六国的前二二一

年，凡五百四十九年，其时间不可谓不长。西周之世，西畿应为声明文物之地，然直至战国时，论秦者尚称其杂戎狄之俗，在秦孝公变法自强以前，因此为东方诸侯所排摈，不得与于会盟之列，可见西周之亡，西畿之地，遭受破坏的残酷。当西畿未失之时，周朝合东西两畿之地，犹足以当春秋时之齐、晋、秦、楚，此其所以在西周时，大体上，能够维持其为共主的资格。到西畿既失之后，形势就大不相同了。昔人论东周之东迁，恒以为莫大之失策，诚非无所见而云然。（《还都征故》，原刊《启示》1946年第1卷第1期。）

周朝的封建制度

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。古代的部落，彼此的关系，是很少的。后来渐相往来，就有互相攻击的事。战败的国，对于战胜的国，就要表示服从，尽朝贡等礼节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。再进一步，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，改封自己的同姓、亲戚、功臣等了。西周时所封的国，这三种人很多。可见当时的王室，权力颇为强大。当时不但国外，就天子、诸侯、国内的卿、大夫，也是各有封地的。国和家，虽有大小尊卑之异，性质并无不同。内诸侯虽说不世袭，事实上也有世袭的。

先部族，后封建

分立之世，谓之封建，统一之时，号称郡县，为治史者习用之名。然以封建二字，该括郡县以前之世，于义实有未安。何则？封者裂土之谓，建者树立之义，必能替彼旧酋，改树我之同姓、外戚、功臣、故旧，然后封建二字，可谓名称其实，否即难免名实不符之诮矣。故封建以前，实当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，然后于义为允也。盖古之民，或氏族而居，或部落而处，彼此之间，皆不能无关系。有关系，则必就其才德者而听命焉。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，财力独裕，兵力独强，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，资其救恤；或有大役之际，听其指挥；又或为其所慑；于是诸部族相率听命于一部族，而此一部族者，遂得遣其同姓、外戚、功臣、故旧，居于诸部族之上而监督之，抑或替其旧酋而

为之代。又或开拓新地，使其同姓、外戚、功臣、故旧分处之。此等新建之部族，与其所自出之部族，其关系自仍不绝。如此，即自部族之世，渐入于封建之世矣。（《先秦史》，第374、375页）

周朝的官制

周朝的内官，据汉时讲经学的今文家说［今文、古文是汉朝人讲经学的两个大派别。今文家先出，因为他们的经书，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写的，所以称为今文；古文家晚出，他们自己说，曾得到古本的书籍，都是用古字写的，所以谓之古文今文家。对于经的解释，有许多不同的地方。又有种书，是古文家有，而今文家不相信的（如《周礼》和《左传》便是）。有种书，是今文家有，而古文家不相信的（如《春秋公羊传》便是）。其问题很为麻烦，我们现在不讲经学，对于他们两派的说法，无所偏主，只用史学上的眼光，分别去取，或者并存其说罢了。可参看本书第二十章］：有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，八十一元士。三公之职：为司马、司徒、司空。据古文家说：则三公、三孤，都是坐而论道的。政事均六卿所管。前者是汉朝相制所本。后者是隋以后六部之制所本。地方制度，也有两种：一种是今文家说，和井田制度相合；一种则和军制相应。大概古代的人民有两种：一种是要当兵的；一种虽亦会当兵，却不用作正式的军队；所以有这两种区别。（这是源于古代的人民，有征服和被征服两阶级，拙撰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一编第八章第五节、第九章第一节，可以参看）

周朝的学校选举制度

封建时代，有贵族、平民的等级。从大夫以上，都是贵族做的；士以下才用选举。（这是清朝时候俞正燮先生的说法，可参看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一编第八章第四节）选举的法子，据《周礼》说：从卿大夫以下的官，都有考查人民“德”“行”“艺”的责任。每三年，举行“大比”一次，调查户口和马牛车辇等数目。就在这时候，举出贤者、能者来。这就是所谓“乡举里选”。据《王制》《孟子》说：则古代城乡，都有学校。在城里的，三代都名为学；在乡间的，则或唤作校，或唤作

序，或唤作庠。各乡举出好人来，把他升送到司徒，司徒把他送到学里。在学优秀的，管理学校的大乐正，再把他进之于王。归司马量才任用。在学的时候，乡间举上来的人，和王太子、王子、公卿、大夫、士的嫡子，都是同学的，只论年岁长幼，不分身份尊卑。

周代的“乡举里选”

（周代）地方的组织，有两种说法：一种见于《周礼》，又一种见于《尚书大传》。这两种制度，似乎都是有的。在当兵的区域里，就用前一种制度。不用他做正式军队的区域里，就用后一种制度。管理公务的人，照《周礼》说：有比长、闾胥、族师、党正、州长、乡大夫。从乡大夫以下，都要考查人民的德行、才能、技艺。每三年，要举行一次“大比”。比就是查轧的意思。是所以清查人口、马牛、车辇等的数目的。贤能的人，也于此时举出，把其名氏送之于王。王就任用他去做比长、闾胥之类。《周礼》说：这叫作“使民兴贤，入使治之；使民兴能，出使长之”。就是所谓“乡举里选”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一册，第55—56页）

周朝的赋税

赋税两字，在现代意义相同。在古代，则税是指现在的田赋，赋是出兵车和马牛等军用品，及当兵的人。周朝的税法名为“彻”，就是使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，按其收获量，取其十分之一，就是田赋之征。此外尚有力役之征，如令人民筑城，修道路是。还有布缕之征，即令人民纳绢布若干。据《礼记·王制》说：人民服力役，每年该以三日为限。商业是只收他的地租钱而不收税。关亦只是盘查而不收税。所谓“市廛而不税，关讥而不征”。（这句话见在《礼记·王制》和《孟子·公孙丑上篇》。廛是居住的区域，就是后世所谓宅地）

上古无商税关税

取民之法，最早者有三：一曰税，二曰赋，三曰役。而此三者，实仍是一事。盖邃古职业少，人皆务农，按其田之所获而取之，是为租。马牛车辇等供军用者，自亦为其所出，是为赋。有事则共赴焉，是曰役。至于山林薮泽等，其初本属公有，自无所谓赋税。关之设，所以讥察非常，不为收税。商则行于部族与部族间，不为牟利之举。当部族分立之时，物产既少，制造之技亦尚未精。则或必需之品，偶尔缺乏，不得不求之于外。又或其物为本部族所无，不得不求之于外。此时奢侈之风未开，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，于民生利病，关系甚巨。有能挟之而来者，方且庆幸之不暇，安有征税之理？《金史·世纪》："生女直旧无铁，邻国有以甲胄来易者，景祖倾赀厚贾，以与贸易，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。得铁既多，因之以修弓矢，备器械，兵势稍振。"古厚待商人，多以此等故也。故山、海、池、泽征商之税，无一非后起之法也。（《先秦史》，第422—423页）

周朝的兵制

军队的编制，以五人为单位。今文家说：师就是军；天子六师，方伯二师，诸侯一师（见《公羊传·隐公五年》何休注）。古文家说：五师为军；王六军，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（见《周礼·夏官》）。大约今文家所说，是较古的制度；古文家所说，是较晚的制度。当时的军队，是用车兵和徒兵组成的，还没有用马队。（中国交通和军事上，都是到战国时代，才渐用骑的；以前多是用车，这是因为这时候，汉族专居平地，山地都为夷狄所据，尚未开拓之故，可参看顾炎武《日知录》"骑""驿"两条）

车战、骑战之兴替

车战之废，与骑战之兴，实非一事。盖骑便驰骋，利原野，吾国内地，古多沟洫阻固，骑战固非所利，即戎狄居山林，骑亦无所用之也。《左氏》隐公九年，北戎侵郑，郑伯御之，患戎师，曰：彼徒我车，惧其侵轶我也。昭公元年，中行穆子败狄于大原，亦不过毁车崇卒而已。僖公二十八年，晋作三行以御敌。《周官》有舆司马、行司

马。孙诒让《正义》，谓即《诗·唐风》之公路、公行，行指步卒，其说是也。《大司马职》云："险野人为主，易野车为主。"苏秦、张仪言七国之兵，虽皆有骑，然其数初不多。世皆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以取中山，其实乃欲临胡貉。攻中山凡五军，赵希将胡、代之兵为其一（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），初不言为骑兵。盖中山亦小国，不利驰骤也。李牧居代、雁门备匈奴，乃有选骑万三千匹（《史记》本传），逾于仪、秦所言秦、楚举国之数矣，以所临者为骑寇也。故车战在春秋时稍替，骑战至战国时始兴。（《先秦史》，第420页）

周朝的刑法

古代的五刑，据说是始于三苗的（三苗国君姜姓，为蚩尤之后）。周穆王时候，还是用这五刑。又制定一种赎罪之法，见于《书经》的《吕刑》篇。但实际出于五刑以外的酷刑，亦在所不免。（《左传》昭公六年，郑国铸刑书，晋国的大夫叔向写信给郑国的宰相子产，反对他。信中说："夏有乱政，而作《禹刑》。商有乱政，而作《汤刑》。周有乱政，而作《九刑》。"可见夏朝时候，就有成文法了。铸刑书，就是公布刑法，叔向还加以反对，可见春秋时代，公布刑法的还不多）成文法大概很早的时代就有了。但在西周以前是不公布的。

俗、礼、法

邃古之时，人与人之利害，不甚相违，众所共由之事，自能率循而不越。若此者，就众所共由言之，则曰俗。就一人之践履言之，则曰礼。古有礼而已矣，无法也。迨群治演进，人人之利害，稍不相同，始有悍然违众者。自其人言之，则曰违礼。违礼者，众不能不加以裁制，然其裁制也，亦不过诽议指摘而已。利害之相违日甚，悍然犯礼者非复诽议指摘所能止，乃不得不制之以力。于是有所谓法。法强人以必行之力强于礼，然其所强者，不能如礼之广。于其所必不容己者则强之，可出可入者则听之，此法之所以异于礼也。（《先秦史》，第422—423页）

周朝的教化

以上所说，是周朝政治的大略。至于教化，则在封建时代，大概是守旧的。一切举动，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。这个就是所谓礼。虽说“礼不下庶人”（见《礼记·曲礼上篇》），不过行起礼来，不能像贵族的完备，如其违反相沿的习惯，还是要受制裁的，所以说“出于礼者入于刑”。礼是生活的轨范。生活变了，轨范就不得不变。然而当时的所谓礼，却未必能如此。人就有貌为敷衍，而心实不然的，这个就是所谓“文胜”。古书上多说“周尚文”，又说“周末文胜”，我们看这两句话，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。

尚文之弊

昔人谓周末文胜；文胜者，过于形式之美，而情实不足相副之谓也。吾国自周以后，未能改文胜之习。凡事但求表面，而不讲实在；如建筑不曰以资居处，而曰以壮观瞻；练兵不曰以求克敌，而曰以壮军容，皆是此等思想之流露。彼此以浮文相欺，明知其实非如此，而恬不为怪（不但公事如此；即私人交际之间，亦复如此），皆是此弊，崇尚文辞，特其一端耳。（《文史通义评》，写于1920至1930年代，见《史学四种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06页）

第六章

春秋与战国

西周以前，小国多，有一个强国出来，列国都会服从他，如此，便是三代以前的“王”。东周以后，大国多了，虽有强国，不容易达到这个地位，就不能想做“王”，而只争做霸主了。战国时代，情形又不同了。前此较小的国，这时候多已灭亡，否亦衰微已甚，不能在大国间做个缓冲，而诸大国则地益广，兵益多，遂成为互相吞并之局。秦因地势险固，易守难攻；且秦国民风，最为朴实勇敢；秦孝公又用商鞅，定变法之令，强迫全国的人民都尽力于农，遂成为最富的国家。

春秋时列国的争霸

东周以后，王室衰微，不能号令天下，而诸侯争霸之局起。霸主是源于古代的“方伯”。（伯字是长的意思，霸字是同音假借字）在古代，天子本可命令一个诸侯，做某一方面的若干诸侯之长（如周文王在纣时做西伯，就是西方诸侯之长；齐太公在周朝初年，管理东方的五侯九伯），这个就是所谓“方伯”，春秋时代，则纯用兵力争夺。强的国，诸侯都服从他，天子亦就命令他做霸主。大抵西周以前，小国多，有一个强国出来，列国都会服从他，如此，便是三代以前的“王”。东周以后，大国多了，虽有强国，不容易达到这个地位，就不能想做“王”，而只争做霸主了。春秋时代，晋、楚、齐、秦号称四大国。吴、越是到末期才强盛的。四大国中，晋、楚两国，争霸的时期最久。

中国历史的有确实纪年，是起于共和元年的，就是公元前八四一年。至前七七一年而西周亡，从前七七〇年起为东周，至前二二一年而秦并天下。又历五百四十九年，其中从前七二二年起，至前四八一年

止，共二百四十二年，称为春秋时代。自此以后，为战国时代。表中的前四七三年，实在已是战国的初期了。因其距春秋还不甚远，而吴、越相争，大部分系春秋时代的事，所以破例列入表内。春秋之义，因孔子采鲁国史作《春秋》一书，每年系时以记事，故以为名。战国乃因其时七国战争不止而为名。

东周列国形势

《管子·霸言》曰："强国众，合强攻弱以图霸；强国少，合小攻大以图王。"此言实能道出东周以后，与西周以前形势之异。盖强国少，则服一强，即可号令当时之所谓天下，此为古人之所谓王。强国多，则地丑德齐，莫能相尚，即称雄一时者，亦仅能使彼不与我争，而不能使之臣服于我，此为古人之所谓霸。春秋之世，所谓五霸迭兴者，只是就中原之局言之。至于各霸一方，如秦长西垂，楚雄南服，则虽当他国称霸之时，情势亦迄未尝变，即由是也。观此，知王降为霸，实乃事势使然，初非由于德力之优劣。而事势之转变，则社会之演进实为之。盖文化之发舒，恒自小而渐扩于大。其初只中心之地，有一强国者，其后则各区域中，各自有其强国，遂成此地丑德齐之局也。西周以前，史事几唯所谓天子之国为可知，东周以后，则诸大国所传皆详，天子之国，或反不逮，即由于此。（《先秦史》，第150页）

战国的互相吞并

战国时代，情形又不同了。前此较小的国，这时候多已灭亡，否亦衰微已甚，不能在大国间做个缓冲，而诸大国则地益广，兵益多，遂成为互相吞并之局。这时候，晋分赵、韩、魏，而河北的燕渐强，合齐、秦、楚为七大国。七国之中，又以秦为最强。因为：（一）由地势险固，易守难攻。（二）且秦国民风，最为朴实勇敢。（三）而秦孝公又用商鞅，定变法之令，强迫全国的人民都尽力于农，秦遂成为最富的国家。诸侯之势，本已不能敌秦，还要互相攻战，"合纵""连衡"之局，都不能持久，遂次第为秦所灭。（秦灭六国用兵的经过，可参看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一编第五章第二节）

春秋战国一大变

春秋之世，诸侯只想争霸，即争得二三等国的服从，一等国之间，直接的兵争较少，有之亦不过疆场细故，不甚剧烈。至战国时，则（一）北方诸侯，亦不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，而先后称王。（二）二三等国，已全然无足重轻，日益削弱，而终至于夷灭，诸一等国间，遂无复缓冲之国。（三）而其土地又日广，人民又日多，兵甲亦益盛，战争遂更烈。始而要凌驾于诸王之上而称帝，再进一步，就要径图并吞，实现统一的欲望了。春秋时的一等国，有发展过速，而其内部的组织，还不甚完密的，至战国时，则臣强于君的，如齐国的田氏，竟废其君而代之，势成分裂的，如晋之赵、韩、魏三家，则索性分晋而独立。看似力分而弱，实则其力量反更充实了。边方诸国，发展的趋势，依旧进行不已，其成功较晚的为北燕。天下遂分为燕、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秦、楚七国。六国都为秦所并，读史的人，往往以为一入战国，而秦即最强，这是错误了的。秦国之强，起于献公而成于孝公，献公之立，在公元前三八五年，是入战国后的九十六年，孝公之立，在公元前三六一年，是入战国后的一百二十年了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374—375页）

异民族的同化

东周时代，大国都在沿边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原来当时的二等国，如鲁、卫、宋、郑、陈、蔡等，所居的都是古代中原之地，习于苟安，所以其民渐流于弱；晋、楚、齐、秦、吴、越等国，都居于边地，却以竞争磨砺而强。而且边陲之地，都是旷废的，易于开拓，所以幅员也广大了。然则当时的异族，又是怎样呢？古代和汉族杂居在黄河流域的是猃狁，春秋时，分为赤狄、白狄。赤狄在河南、河北、山西，都灭于晋；白狄在河北的灭于晋，陕西的灭于秦。羌人在陕、甘境上的灭于秦。嘉陵江流域的巴，岷江流域的蜀，战国时亦为秦所灭。长江中流的民族，古称九黎，属于三苗之国。周以后，其他为楚国所开拓淮水流域的淮夷、徐戎，亦服楚。山东半岛的莱夷，则灭于齐。闽

粤断发文身的民族，古称为越、吴，越先世，都是和此族人杂居的，越灭后，其王族还散布沿海一带，做他们的君长。而楚王族庄 ，又溯牂牁江而上，直打到现在的云南省城，就是当时所谓滇国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开辟了现在的大同，燕国则排斥东胡，开辟了现在的辽热。总而言之：到秦灭六国时，黄河、长江两流域和辽、热两省，都已入中国的版图了。

第七章

周代之社会概况

封建的全盛时代，无甚贫富之差。只有有土的封君，可以征收租税，还可以使人民服劳役，是比较富裕的。到商业兴起后，社会的组织，就要逐渐变迁了。工业也变作私人营利的事业了。人民的贫富，就渐渐不均。富者的势力，逐渐增大，虽封君也无如之何了。何况这时候的贵族，还在互相兼并。这是商业资本抬头，封建势力逐渐没落的时代。商业资本既兴，此种等级，就不能维持了。封建制度，既然日渐破坏，宗法也就逐渐没落，都变作五口、八口的小家庭了。

封建时代的社会组织

周朝是一个社会组织剧烈变迁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古代的社会，大抵是自给自足的。其时经济的基础是农业，农人所种的田都是公家的，用公平的方法分配工人所做的器具，是供给众人用的，由公众养活他。（古代公产社会里，本有这一种人，到封建时代，就成为工官）商人是代表本部落，到别部落去交换的，盈亏和他本身无关。所以这时候的人，无甚贫富之差。只有有土的封君，可以征收租税，还可以使人民服劳役，是比较富裕的。这是封建的全盛时代。

商业资本的兴起

到商业兴起后，社会的组织，就要逐渐变迁了。此时各部落的生活，实已互相倚赖，从前要多造的东西，这时候可以不造，而向人家换得，该少造的东西，却可以多造，去和人家交换。从前职业的分配，就不再合理，就要逐渐破坏了。向来平均分配的田，因人口增加，感觉不足，于是用为经界的阡陌、沟洫，逐渐被人开垦。（田间的陆地，总称为阡陌，亦就是往来的道路。水路总称为沟洫。把这些地

方，开垦做田，总称为“开阡陌”。世人误以为开阡陌是商鞅所做的事，这是错的。开阡陌是人口增多，土地不足时自然的趋势，商鞅不过承认他罢了。可参看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一编第九章第三节）田的分配，就不能公平，没田种的，愿意出报酬，借人家的田种；只有坏田的人，也愿意出报酬，种人家的好田，就发生所谓田租。（国家对于农田所征收的，古代谓之“税”，汉时谓之“田租”，宋以后谓之“赋”。有领土权的私人，征收佃农的，历代亦称为田租，又称地租。土地不曾私有时，只有国家所收的为田税，所以税额减轻，农民就受实惠；私家所收的地租发生后就不然了）田以外的土地总称为山泽。从前本来公有，遵守一定的规则，大家可以使用。（如《孟子·梁惠王上篇》所说的“数罟不入洿池，斧斤以时入山林”）至此，亦落入私人手中。（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载，因种树畜牧、开矿、煮盐致富的人，就是占据山泽之地的）工业也变作私人营利的事业了。商人则买贱卖贵，更可以得大利。人民的贫富，就渐渐不均。富者的势力，逐渐增大，虽封君也无如之何了。何况这时候的贵族，还在互相兼并，“破国亡家者相随属”呢？这是商业资本抬头，封建势力逐渐没落的时代。东周之世，这种趋势，正在加速度的演变中。

社会进化之畸形

社会的进化是畸形的，有许多事情固然今胜于古；有许多事情却是古胜于今。大抵在物质方面，今胜于古的多；至于社会组织，则确有古胜于今之处。这并非我们的聪明才力或道德，不及古人，实因古代的社会小，容易受理性支配，后世的社会却不然，如庞然大物，莫之能举，所以只得听其自然。（《来皖后两点感想》，原刊《安大周刊》1932年第87期）社会的组织而要求其合理，是必须随时改变的。但这是件极难的事。往往其组织已和其所处的地位，利害冲突，不能相容了，而人还没有觉得。即使觉得，抑或因种种方面的障碍，惮于改革；或虽欲改革而不能；又或勉强为之而致败。于是因事实的迁流，旧制度逐渐破坏，新制度逐渐发生；而此所谓新制度，全是一任事势迁流之所至，无复加以人为修整的余地，各方面自不免互相冲突。乃

亦听其迁流之所至，互相争斗，互相调和。所求者，不过含有矛盾性的苟安，和前此无一物不得其所的大顺世界，全然背道而驰了。（《中国社会变迁史》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下册，第200页）

等级的破坏

封建时代，人是要讲究身份的。饮食、衣服、宫室、车马，各有等级，丝毫不能僭越。商业资本既兴，此种等级，就不能维持了。前此贵族对于平民，是有很大的势力的；至此亦逐渐丧失，而代之以富人对于穷人的权力。甚至贵族的本身，也不能不俯首乞怜于他们。总而言之：从前的富和贵，贫和贱，是合一的；这时候，富的人，实际上就受社会尊贵，穷的人就被贱视。虽然在法律上的地位，富与贵，贫与贱，都得一样受法律的制裁，确只是具文而已。

贵贱等级平，贫富阶级起

东周以后，为封建制度破坏，商业资本兴起之时，故贵贱之等级渐平，而贫富之阶级随起。其现象之重要者为：（一）诸侯大夫，互相兼并，亡国破家者，皆降为平民；（二）而平民社会中人，亦多渐跻高位，如游士是也；（三）井田制度破坏；（四）山泽之地，亦为私人所占；（五）工业亦入私人之手；（六）商业日益兴盛。于是贫富不均，而社会之风气，亦大变矣。（《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》，第28页）

宗法的破坏

古代平民的家庭，本止五口、八口，贵族则多系聚族而居。在父权伸张的情势下，就发达而成宗法。宗法是崇奉一个男子做始祖，他的继承条件，第一个是嫡，第二个是长，嫡长子代表始祖，是为大宗宗子。以后代代如此继承。嫡长子之外，其余的儿子，都别为小宗。小宗宗子，可以管辖五世以内的亲族，就是从自己高祖分支下来的人。大宗宗子，则凡同出于始祖的人，都要受他管辖。所以古代的贵族，

团结的力量极厚，然而此等制度，做宗子的，必须为有土之君才行。因为如此，才能养活其族人；否则各自谋生，就要散而之四方了。所以宗法是要和封建并行的。封建制度，既然日渐破坏，宗法也就逐渐没落，都变作五口、八口的小家庭了。（五口、八口之家，是“一夫上父母，下妻子”。这是财产私有之世，相生相养，天然的一个团结。至于合数百口而成一大家族，则是交易未盛，每一个大家族，即为自给自足的生产团体，有以致之。交易盛行之后，此等家庭团体，自然不能存在了。普通的议论，都说中国人是大家族，这是错的。中国此等大家族，除非内地经济极落后的地方，还有存在；以中国之大论起来，实在不算得什么，较之欧洲人，只多上父母一代。宗法制度，可参看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一编第八章第一节）

第八章

春秋战国之学术思想

春秋战国时代，社会组织，虽然日益变坏，学术思想则确是大有进步。在官之学，变为私家自由研究的学问。其时世变日亟，想借学术以救世的人甚多。合这几种原因，学术思想，就大为兴盛了。孔子学术的特色，在能就人伦日用之间，示人以不可须臾离的道理。老子以为后世的社会太坏了，想返到古代的淳朴。墨翟是主张节俭的，又反对当时用兵的人攻击人家。主张用整齐严肃的法律，去训练人民的是法家。先秦诸子之学，是各守专门，各有特色的。后世著书自成一家言，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，纵有独见，仍不如先秦诸子。

学术思想发达的原因

春秋战国时代，社会组织，虽然日益变坏，学术思想则确是大有进步。第一，在封建时代，学术为贵族所专有。到社会组织变迁，人民有余力能够研究学术的人就多了。第二，贵族既多失其地位，一变而为平民，于是在官之学，变为私家自由研究的学问。私人的教育，大为兴盛。第三，其时世变日亟，想借学术以救世的人甚多。而贵族腐败，贤君往往要登庸有才能的人，士人就有以立谈而致卿相的，因此想借学术以弋取富贵的人，亦就不少。合这几种原因，学术思想，就大为兴盛了。

评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

近来的人，都说春秋战国，是我国学术思想，最为发达的时代，后世都比不上他，这话也未必然。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，固然有各专一门，各极高深的长处；也有偏执己见，不了解他人的立场的毛病。譬如墨子的主张节俭，自因为当时贵族奢侈，人民穷困之故。社会穷困

之时，应得节俭，是从古以来如此的，看下文便可知道。庄子却说他的道理太苦了，人不能堪，然则坐视着冻饿的人冻饿，你还是奢侈你的，抚心自问，能堪不能堪呢？荀子又说有好政治，穷是不足为患的。墨子何尝说穷是最后的忧患？天然的忧患？不过在当时困穷的情形之下，节俭就是最好的政治罢了。这不过举其一端，其余这一类的地方还很多。总而言之：当时学术的能够分争角立，互相辩论，固然有其好处；然亦因其在初兴之时，彼此的立场，未能互相了解之故。到后世，没有这种激烈的辩争了；固然由于思想的停滞；然亦因其在社会上通行得久了，各种学问的所长所短，大家都已了然，所以用不着甚么激烈的辩论。我们试看：《史记》的末一篇《自序》载他父亲司马谈论阴阳、名、法、儒、墨、道六家的话，以及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论各家的话，大都有褒有贬。其所褒贬，大致可说是得当的，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，我只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发达，有光采的时代，不说他是最好的时代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一册，第68—69页）

孔子

春秋、战国的学术派别是很复杂的。我们现在拣几家最重要的来讲讲。在当时的人物中，最受后世崇拜的是孔子。孔子的学术，就是所谓儒家之学。他的特色，在能就人伦日用之间，示人以不可须臾离的道理。他的哲学思想，最高的是“易”和“中庸”。易是发明宇宙万有，无时不在变动之中；所以我们做事该时时观察环境，定一个最适当的应付方法，那就是所谓“中庸”了。他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想，也是很高远的。他所想望的境界是“大同”，而其终极的目的，在于治国平天下。至于修身齐家，是达这目的的基本工夫。

儒家的理想与价值

儒家的理想，颇为高远。《春秋》三世之义，据乱而作，进于升平，更进于太平，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，再逆挽到大同。儒家所传的，多是小康之义。大同世之规模，从升平世进至太平世的方法，其

详已不可得闻。几千年来，崇信儒家之学的，只认封建完整时代，即小康之世的治法，为最高之境，实堪惋惜。但儒家学术的规模，是大体尚可考见的。他有一种最高的理想，企图见之于人事。这种理想，是有其哲学上的立足点的。如何次第实行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。儒家之道，具于六经。六经之中……此等高义，既已隐晦。其盛行于世，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，乃在个人修养部分。（一）在理智方面，其说最高的是中庸。其要，在审察环境的情形，随时随地，定一至当不易的办法。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，是随时随地，必有其一，而亦只能有一的，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。（二）人之感情，与理智不能无冲突。放纵感情，固然要撞出大祸，抑压感情，也终于要溃决的，所以又有礼乐，以陶冶其感情。（三）无可如何之事，则劝人以安命。在这一点，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。（四）其待人之道，则为絜矩（二字见《大学》）。消极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积极的则“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所求乎朋友先施之”。我们该怎样待人，只要想一想，我们想他怎样待我即得，这是何等简而该。怎样糊涂的人，对这话也可以懂得，而圣人行之，亦终身有所不能尽，这真是一个妙谛。至于（五）性善之说，（六）义利之辨，（七）知言养气之功，则孟子发挥，最为透彻，亦于修养之功，有极大关系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303—304页）

先秦诸子

孔子被后世的人尊为圣人，他所做的书，和后人记他的言行，或记录阐发他的道理的书，亦被尊为经。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（《仪礼》）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据儒家说：都是孔子所删定的，谓之六经，其中《乐》是没有书本的，所以又称五经。解释经的书，汉人谓之“传”，记载故事的，汉人谓之“记”；如《礼记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左氏传》《穀梁传》就是。《孝经》《论语》汉人亦称为传。《孟子》本是儒家的子书。《尔雅》是儒家的辞典。《周礼》，汉朝的今文家是不信他的，但是这许多，后世也总称为经。《大学》

《中庸》，本是《礼记》里的两篇。宋朝的朱子，把他摘出来，合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称为四书］其余诸家则都称为子。诸子中重要的有老子。他的见解，是以为后世的社会太坏了，想返到古代的淳朴。他又主张天道是循环的；刚强的人，终必摧折；所以主张守柔。又有庄子，鉴于宇宙的广大和变化无穷，主张齐万物、一生死。老子和庄子的学术，都称为道家。墨家之学，是墨翟所创。他是主张节俭的，又反对当时用兵的人攻击人家，他却极善于守御。主张用整齐严肃的法律，去训练人民的是法家，最著名的人物是商鞅和韩非。当时列国，用这一派人物的，多能收富国强兵之效。（还有申不害，做过韩国的宰相；李克，亦作李悝，做过魏国的宰相；吴起虽然是兵家，他的治国，也很近于法家的，曾做过楚国的宰相；一时都收富强之效）此外，讲用兵的法子的有兵家。讲外交的法子的有纵横家。讲农学的有农家。讲医学的有医经、经方两家。（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前者是针灸一派，后者是方剂一派）以古代宗教上的迷信做根据，而研求哲理的，则有阴阳家等。先秦诸子之学，是各守专门，各有特色的。后世著书自成一家言，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，纵有独见，仍不如先秦诸子了。

先秦诸子各有所本

先秦诸子，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，是各有所本的，而其所本亦分新旧。依我看来：（一）农家之所本最旧，这是隆古时代农业部族的思想。（二）道家次之，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。（三）墨家次之，所取法的是夏朝。（四）儒家及阴阳家又次之，这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。（五）法家最新，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。以上五家，代表整个的时代变化，其关系最大。其余如名家，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，纵横家、兵家等，只效一节之用，其关系较轻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310页）

先秦诸子可分家不可分人

先秦诸子，大抵不自著书。今其书之存者，大抵治其学者所为，而其纂辑，则更出于后之人。亡佚既多，辑其书者，又未必通其学。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，共有若干，即合而编之，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，题之曰某子云耳。然则某子之标题，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，不谓书即其人所著。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，大不相同。

治先秦之学者，可分家而不可分人。何则？先秦诸子，大抵不自著书；凡所纂辑，率皆出于后之人（张孟劬尝以佛家之结集譬之）。欲从其书中，搜寻某一人所独有之说，几于无从措手；而一家之学，则其言大抵从同。故欲分别其说属于某人甚难，而欲分别其说属于某家则甚易。此在汉世，经师之谨守家法者尚然。清代诸儒，搜辑已佚之经说，大抵恃此也。故治先秦之学者，无从分人，而亦不必分人。（《先秦学术概论》，世界书局1933年版，第17、20页）

第九章

本期结论

从上古到战国，是我国从部落进于封建，从封建进于统一的时代。上古期中，最当注意的，是异民族的同化，和疆域的开拓。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。住居中国的民族，大的也有许多，然都先后同化于我。社会的组织，也是随时代而有变迁的。大抵人当生活艰难的时候，总是合力去对付自然的。到生活略为宽裕些，就不免有人要剥削他人了。这都是人类在进化的途中，发生出来的病态。中国古代的哲人，对于社会的病态，都是很注意，想要设法纠正他的。这一点，也是我国文化的光辉。

上古史的性质

从上古到战国，是我国从部落进于封建，从封建进于统一的时代。自此以前，我国还分立为许多国；自此以后，就合为一大国了。这是讲中国史的人天然的一个段落。

中国历史演进三阶段

中国历史可划分三大时期。羲、农、巢、燧利物前民，文化由来，遐哉尚矣，虽书阙有间，传说要非尽虚诬，此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，一也。孔子删《书》，断自唐虞，史公作《记》，始于黄帝，惇史留诒，盖自兹始。斯时部落林立，异族错居，以累代之尽力经营，而林立者始渐合并，错居者始渐同化，至于嬴秦，遂胥宇内而为郡县，此自分裂入统一之世，二也。自秦讫今二千余年，就大体言之，疆域实无甚变更，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，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，虽亦有时凭恃武力，荐居上国，至于声明文物，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。一再传后，其族且与我同化，泯然无迹焉。文化足以裨益者，唯

一印度，亦仅及神教哲学而止耳，此为闭关独立之世，三也。自欧人东来，而局面乃一变，其文化既与我大异，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，我国受其影响，遂至凡事皆起变化，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，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，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。其中又可分为二期：一自欧人东来，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，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；一自戊戌变政起，讫于现在，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。（《中国近代史讲义》，写于1930年代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3—4页）

上古史的年代

上古史年代，虽然大部分都不确实。然依普通记算：夏朝大约四百年，商朝六百年，周朝八百年，已经有二千年了。（此项计算之法，见于《汉书· 律历志》，系根据古书中所载的干支及日食等天象，用历法推算的，虽不能密合，却不致如传说等的年代，相差很远）再上推至黄帝元年甲子，则在民国纪元前四千六百零八年了。（如依齐召南《历代帝王年表》黄帝元年甲寅，则当在民国纪元前四千六百十八年）秦朝统一天下，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，那么，我国开化的时代，就该在民国纪元前五千年左右，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了。

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

上古期中，最当注意的，是异民族的同化，和疆域的开拓。中国现在，所以能做世界上有数的大国；而人口的众多，且为世界各国之冠；实在是这个时代，建立下来的根基。而这两者，实在还是一件事。

周秦之间的文化扩张

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，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。西周以前所传的，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，其余各方面的情形，都很茫昧。固然，书阙有间，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，然果有文化十

分发达的地方，其事实也决不会全然失传的，于此，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，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。东周以后则不然，斯时所传者，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，所谓天子之国，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。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，不过自泰岱以西，华岳以东，太行以南，淮、汉以北，为今河南、山东的大部分，河北、山西的小部分。渭水流域的开发，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。到春秋时代，情形就大不然了。当时号称大国的，有晋、楚、齐、秦，其兴起较晚的，则有吴、越，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，山东的东北境，陕西的中部，甘肃的东部，及江苏、浙江、安徽之境。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、卫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许等，反夷为二三等国了。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。其原因何在呢？居于边地之国，因为和异族接近，以竞争磨砺而强，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，该是其中最主要的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372页）

文化的进步

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。住居中国的民族，照第六章所述，大的也有许多，然都先后同化于我，就可见得我族文化的独优了。什么叫文化呢？依广义的解释，除天然现象之外，一切都该包括于文化之中。合以前各章所述的社会组织，政治制度，学术思想，以及衣、食、住、行等的进化而观之，就可见得我族文化的大略了。

社会组织的变迁

社会的组织，也是随时代而有变迁的。大抵人当生活艰难的时候，总是合力去对付自然的。到生活略为宽裕些，就不免有人要剥削他人了。人的剥削人，有两种法子：一种是靠武力，一种是靠财力。靠武力，就酿成各民族各部落间的斗争，战胜的役使战败的人，而成立封建制度。靠财力，则人和人，当交易之时，总想损人利己，本是大家互相剥削的行为了。这都是人类在进化的途中，发生出来的病态。中国古代的哲人，对于社会的病态，都是很注意，想要设法纠正他的。只这一点，也是我国文化的光辉。

治天下与安天下

先秦诸子之思想，有与后世异者。后世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分，先秦之世，则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合。盖在后世，疆域广大，人民众多，一切问题，皆极复杂。国家设治之机关，既已疏阔；人民愚智之程度，又甚不齐。所谓治天下者，则与天下安而已。欲悬一至善之鹄，而悉力以赴之，必求造乎其极，而后可为无憾，虽极宏毅之政治家，不敢作是想也。先秦诸子则不然。去小国寡民之世未远，即大国地兼数圻，亦不过今一两省，而其菁华之地，犹不及此。夫国小民寡，则情形易于周知，而定改革之方较易。风气淳朴，则民皆听从其上，国是既定，举而措之不难。但患无临朝愿治之主，相助为理之臣。苟其有之，而目的终不得达，且因此转滋他弊，如后世王安石之所遭者，古人不患此也。职是故，先秦诸子之言治，大抵欲举社会而彻底改造之，使如吾意之所期。“治天下不如安天下，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”等思想，乃古人所无有也。（《先秦学术概论》，第9—10页）

第二编

中古史

第十章

秦代之统一与疆土之拓展

秦始皇的治国内，规模是颇为阔大的。可惜他严刑峻法，又极其奢侈。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。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，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，而他据以实行的。政策虽好，行之却似过于急进。法家之学，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。国家和社会不是一物，所以国家的权力，只该扩张到一定的程度，过此以往，便无功而有罪。法家不知此义，误以为国家的利益，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，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。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，还不改变政策，这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大原因。这种错误，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，也不是偶然的事实；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。

秦始皇的政策

公元前二二一年，秦王政尽灭六国，统一全国。他自称为始皇帝。有人劝他封建子弟，他不听。而把全国分做三十六郡（秦王政二十六年，自称始皇帝，后世则称二世、三世。是年，分全国为三十六郡，郡名详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、裴骃《集解》。但近人王国维曾加以考订，纠正错误。始皇后因增置燕齐地六郡为四十二郡，后又取百越增置六郡为四十八郡，盖皆用六为数。并见王著《观堂集林·三十六郡考》），每郡各置“守”“尉”“监”三个官。（守，汉时称为太守；尉，称为都尉；监，在秦朝是派御史去做的，谓之监御史，汉朝则由丞相派史去做。分全国为十二州，谓之州刺史）又把全国的兵器，都聚到他的都城咸阳（今陕西咸阳县），铸了十二个铜人和别种器具。又要统一全国的思想，除医药、卜筮、种树的书外，只许博士官有书（博士是太常属官。太常是管礼仪的，博士在秦汉时，都是用学者做的，

当时说“官”，譬如现在说“公署”）。民间的书籍，一概烧掉。史官也只许存留秦国的历史。

秦统一的原因

秦朝的统一，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。我们须注意：此时交通的便利，列国内部的发达，小国的被夷灭，郡县的渐次设立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，本有趋于统一之势，而秦人特收其成功。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：则（一）他地处西垂，开化较晚，风气较为诚朴。（二）三晋地狭人稠，秦地广人稀，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，使之任耕，而使自己之民任战。（三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，裁抑贵族的势力，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，有一个邀赏的机会。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376—377页）

郡县的由来

县之起源有三：（一）灭国而为之。古书多记灭国为县者；其不记其兴灭建置者，县名亦率多旧国名，可推想其灭国而为县也。（二）卿大夫之采邑，发达而成为县。《左氏》昭公二年，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，羊舌氏之田为三县。五年，薳启强言：“韩赋七邑皆成县。”此卿大夫采地，浸盛而成县者也。（三）并小乡聚为之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，言商君治秦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，此则国家新设之县，君之者不复世袭者也。凡一县，大抵自成一行政区域。大国之吞灭小国，非改若干小行政区为一大行政区，乃以一国而包若干个行政区域也。故被灭之国，仍为政治上之一单位，不过改世袭之君为任命之官吏而已。边荒之地，则称为郡，本与县不相统属。但（一）郡之地必广大，至其渐次发达，民政加详，则可分设为县。（二）又郡率有兵力，以之保护县；而以县之物力支持郡，亦相甚宜。如此者，县皆易受郡之统属。战国以前，郡皆设于边地；至秦始皇灭六国，觉到处有用兵力控制之必要，乃举天下而分为三十六郡矣。然秦之旧地，固仍属内史也。（《中国文化史》，原为1942年在常州青云中学教授高二中国文化史的讲义，见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第125页）

秦时疆土的拓展

他又发兵，把今两广、安南、福建地方打平，置为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、闽中四郡。派赵佗率兵五十万戍守五岭（大庾、骑田、都庞、萌渚、越城，皆在两广，与江西、湖南交界之地），这时候，北方的游牧民族，以匈奴为最强，据着现在的河套（河套在秦汉时称河南，唐以后谓之河曲，明以来才称河套）。秦始皇派蒙恬去把他赶掉，将战国时秦、赵、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，以为北边的防线。（秦朝的长城，大略沿阴山东行，经过热、辽两省的北部，东端要到现在的朝鲜境内；和现在的长城，路线几全然不同。现在的长城，大概是明朝所造，关于长城的始末，可参看王国良《中国长城沿革考》，商务印书馆本）

秦始皇筑长城

秦始皇帝筑长城，誉之者以为立万古夷夏之防，毁之者以为不足御侵略，皆不察情实之谈也。头曼以前之匈奴，此等小部落，大兴师征之，则遁逃伏匿，不可得而诛也；师还则寇钞又起；留卒戍守，则劳费不资；故唯有筑长城以防之。长城非起始皇，战国时，秦、赵、燕三国，即皆有之。皆所以防此等小部落之寇钞者也。若所邻者为习于战陈之国，则有云梯隧道之攻，虽小而坚如偪阳，犹惧不守，况延袤至千百里乎？然则长城之筑，所以省戍役，防寇钞，休兵而息民也。本不以御大敌。若战国秦时之匈奴，亦如冒顿，控弦数十万，入塞者辄千万骑，所以御之者，自别有策矣。谓足立万古夷夏之防，几全不察汉后匈奴、鲜卑、突厥之事，瞽孰甚焉。责其劳民而不足立夷夏之防，其论异，其不察史事同也。（《秦始皇筑长城》，见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中册，第675—676页）

秦朝的灭亡

秦始皇的治国内，规模是颇为阔大的。可惜他严刑峻法，又极其奢侈。打破六国之后，都把他们的宫室，在关中仿造一所，后来又自造

一所阿房宫，又在骊山（见第五章）自营葬地，都穷极壮丽。还要相信方士的话，派他们到蓬莱去求神仙。他自己又要到处游行，借此镇压全国。前二一〇年，秦始皇出游，死在现在的河北省里。他的长子扶苏，因谏止他坑儒，被他谪罚出去，到蒙恬处做监军。（古代的太子，照习惯是不带兵的。派他去监军，就是表示不立他做太子的意思）小儿子胡亥，这时候跟随着他。宦者赵高，替胡亥游说丞相李斯，假造始皇的诏书，把扶苏、蒙恬都杀掉。胡亥即位，是为二世皇帝。信赵高的话，把李斯杀掉，政治更乱。

秦政与法家的短处

秦始皇，向来都说他是暴君，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。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。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，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，而他据以实行的。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，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，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，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。秦始皇的政策虽好，行之却似过于急进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391页）

法家之学，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。国家和社会，不是一物，国家和社会的利益，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一致的，过此以往，便相冲突。国家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所以国家的权力，只该扩张到一定的程度，过此以往，便无功而有罪。法家不知此义，误以为国家的利益，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。社会的利益，彻头彻尾，都可用国家做工具去达到，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。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，还不改变政策，这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大原因。这种错误，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，也不是偶然的事实；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。（《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（二续）》，原刊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1936年第4卷第7期）

二世篡位必非史实

古太子皆不将兵。使将兵，即为有意废立，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。扶苏之不立，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。二十余子，而胡亥独幸从，则蒙毅谓先王之举用太子，乃数年之积，其说不诬。始皇在位，不为不久，

而迄未建储，盖正因欲立少子之故。扶苏与蒙氏，非有深交，而李斯为秦相，积功劳日久，安知扶苏立必废斯而任蒙恬？斯能豫烛蒙恬用，己必不怀通侯印归乡里，岂不能逆料赵高用而己将被祸乎？故知史所传李斯、赵高废立之事，必非其实也。（《秦汉史》上册，第22页）

秦始皇死的明年，戍卒陈胜，在今安徽地方起兵。于是反者纷纷而起。六国后人，一时俱立。秦朝派兵出去征讨，初时颇获胜利，后来楚怀王（战国时，楚国有个怀王，和齐国联盟。上了秦国人的当，和齐国绝交。秦人趁势把他打败，后来秦国人又诱他去会盟，要求他割地，怀王不听，秦国人就把他扣留起来，死在秦国，楚国人很哀怜他。此时楚国世家项氏，在吴国的旧地起兵，有人劝他立楚怀王的后人，以收拾楚国的民心。项氏听了他，即以怀王的谥法，为其生时的称号）派项籍北救赵（新兴的赵国被围在巨鹿，现在河北的平乡县），刘邦西入关。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。刘邦也乘秦朝内乱，二世为赵高所弑，赵高又被新立的子婴所杀，从武关入秦（在今陕西商县之东。这是从河南南阳进陕西的路），子婴只得投降。秦朝就此灭亡，时在前二〇九年。

楚汉的分争

秦朝的灭亡，也可以说是封建政体的一个反动。于是六国之后，和亡秦有功的人，都自立为王。当时兵力最强的是项籍，所以封地的支配，实际是由他决定。他自立为西楚霸王（铜山一带，战国时也是楚国的地方，当时称为西楚。霸王的霸，就是霸诸侯的霸。当时所封的人都称王，项籍是诸王之长，所以称为霸王），建都在现在的铜山县。刘邦则封于汉中，称为汉王。分封才定，山东、河北方面，已有不满现状起来反抗的人，项籍出兵征讨。汉王乘机，打定关中。合好几国的兵，直打进楚国的都城。被项籍还兵打破。汉王乃坚守荥阳、成皋一带（荥阳，今河南荥泽县，这是黄河的一个渡口，守此，楚兵就不能渡河而北。成皋，今河南汜水县，其西境就是虎牢关，守此，

楚兵就不能向西）。有萧何留守关中，替他补充军队和粮饷。而派韩信打定山西、河北，绕出山东，彭越又在楚国后方捣乱。于是楚国兵少食尽，乃和汉约以鸿沟中分全国（当时的一条运河，从今河南省城附近东南流，和淮、泗两水通连）。约定，项籍东归，汉王背约追击他。项籍走到乌江（大江的渡口，在今安徽和县南），自刎而死。汉王遂即皇帝位，是为汉高祖。时在前二〇二年。秦亡后，全国纷争了五年，又统一了。

汉初史事多传说

（汉初史事多）此等性质的传说，至汉初实尚不乏，断不容轻信为事实。试举俗所谓鸿门宴之事为例。范增说：与项王争天下者必沛公，岂是事实？且军门警卫，何等森严，安有樊哙能撞倒卫士，直达筵前，指责项王之理？古人筵宴，中间诚有离席休息之时，且或历时颇久，然亦必有一个限度；乃汉高祖可召张良、樊哙等同出，与哙等脱身回向本军，张良度其已至，然后入谢。筵宴间的特客，离席至于如此之久而无人查问；带有敌意的宾客，与数人间行出军，亦无人盘诘，项羽的军纪，有如此之废弛者乎？张良献玉斗于范增，范增受而碎之，骂项王“竖子不足与谋”，且当场言“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，吾属今为之虏矣”。增年已七十，素好奇计，有如此之鲁莽者乎？种种事迹，无一在情理之中。然则汉高祖与项羽此一会见，真相殆全然不传；今所传者，亦一则想象编造的故事也。此等传说，在秦汉间实未易枚举。且如指鹿为马之说，又岂可以欺孩稚邪？（《中国史籍读法》，见《史学四种》，第206页）

第十一章

两汉之政治概况

汉初，承全国大乱之后，专务休养生息。到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，国内颇为富庶。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，他对外国用兵，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。可惜他性好奢侈，既要开疆拓土，又要营宫室，求神仙，还要出去巡游。财政不足，就用了许多言利之臣，以致民愁盗起，国内几致大乱。汉去封建之世近，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。以当时中国之国力，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，所立之功，虽十倍于汉武可也。（汉武）虽能摧匈奴，通西域，县朝鲜，平两越，开西南夷，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，有以致之。

汉初的政治

汉高祖即帝位后，把功臣中功劳大的，都封做王，小的封做侯，然异姓封王的，不久都灭亡，都大封子弟和同姓为王。高祖死后，儿子惠帝懦弱，高祖的皇后吕氏专权。惠帝死后，吕后就临朝称制，又封诸吕为王。吕后死后，大臣共讨诸吕，迎立高祖的庶子文帝。汉初，承全国大乱之后，专务休养生息。文帝在位，尤其恭敬节俭。他的儿子景帝，也能谨守他的政策。所以当武帝初年，就是汉朝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，国内颇为富庶。

汉时民生仍窘迫

《史记·平准书》说武帝初年的情形道：“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。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，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大仓之粟，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；而乘字牝者，摈而不得聚会。守闾阎者食粱肉，为吏者长子孙；居官者以为姓号。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义

而后绌耻辱焉。”这真可谓国富民安了。然而又说：“当是之时，网疏而民富，役财骄溢，或至兼并。豪党之徒，以武断于乡曲。”兼并是该行之于穷困之时的。富庶之日，如何反行起兼并来呢？可见其所谓富者，不过总计全国的富量，有所增加，而并不是均摊在众人头上。所以这时候的富人，固然远较天下初平时为富，穷人则还是一样；而贫富相形之间，其悬殊或者反较大乱初平时为甚。（《中国社会变迁史》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下册，第244—245页）财富总量有所增加，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。所以汉代的人，提起当时的民生来，都是疾首蹙额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上册，第127页）

汉初的大封同姓，原是为防制异姓的，但是到后来，同姓诸王，倒成为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了。景帝时，吴楚七国，到底起兵造反，给汉朝打平，于是把诸侯治理百姓和补用官吏的权柄一齐剥夺。这时，列国规模，与他郡县相差不远。武帝时从主父偃的弱藩之策，又命诸侯将自己的地方，分封子弟，于是诸侯都变作小国。诸侯只得衣食租税，不许就国。汉初的封建，就名存实亡，而郡县制度就逐渐推到全国了。

秦汉时之新局势

秦汉时之新局势：一、内战乍息，民生获苏。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废除，得以完成广大之分工，国富总量之增加，殆非前此所能想象。二、统一则国力强盛，便于对外；然中国在此时，开始与骑寇相遇。三、封建制度告终。秦尽废封建，经楚汉之争、汉初之翦灭异姓、吴楚七国之乱，而封建之实，遂荡然无存焉。此时之政情：一、民主政治之废坠。此由（一）民意无表现之方法，如古之大询于众庶等。（二）民意之表现为习惯，习惯愈不适于时势，则拘束之力愈弱。故君主之地位，日益神圣。最后，遂谓其权系受之于神，而非受之于民，两汉、新莽之言符瑞是也。（此节与西方颇相似）二、地方自治之废坠。古之国，等于后世之县。国君等于县令，县令实不能躬亲办事，而地方公务悉废矣。三、放任政治之形成。贵族既倒，处于治者

之地位者，为官僚阶级，同时亦即成为榨取阶级。而此时于官僚阶级，非铲除之时也，于是取监督之方式矣。政治上之首领，理宜加以监督。但监督者少，被监督者太多，势不能给，则唯有将所办之事，减至最小限度，使其无所藉以虐民。中国之良吏，每劝人民早完国课，少打官司，免得与吏役接触，此正与政府之取放任主义同。顾亭林讥后世大官多，小官少。而不知其在昔时之政治上，只重监督官僚阶级，不使虐民，兴利治国，固在其次也。自汉以来，中国之政治向如此。（《中国文化史》，见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第137、138、139页）

武帝的文治武功

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，他对外国用兵，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，其事都见下章。他在内治上，也有几件著名的事情。第一，他置五经博士，是国家设立太学之始。（当时仅就固有的官吏中，拣其有学问的，替他招致弟子；既未营建校舍，亦未设立教官。博士本非学校教师，但后来设立太学后，教师未曾别立名目，即以博士为名）第二，他命郡国选举孝廉，是科举制度的先声。（此时未有考试之法，但唐以后的科举制度，是从此制变化而成的，参看本书第十八章）第三，他又听董仲舒的话，重用治儒家之学的人。于是春秋、战国时各学派之中，儒家之学，就归于一尊了。可惜他性好奢侈，既要开疆拓土，又要营宫室，求神仙，还要出去巡游。财政不足，就用了许多言利之臣，以致民愁盗起，国内几致大乱。幸而晚年悔过，能够与民休息。昭宣两代，政治也都算清明，才算危而复安。

评汉武帝

汉去封建之世近，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。以当时中国之国力，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，所立之功，虽十倍于汉武可也。汉武严而不明，任喜怒而不任法。置宿将而任椒房之亲；又任严酷之吏，以深文随其后；虽能摧匈奴，通西域，县朝鲜，平两越，开西南夷，实当时中国国力，与四夷相去悬绝，有以致之。计其所失亡，中国转远过于夷

狄，盖国力之浪费者多矣。（《古史家传记文选》中册，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，第119页）

前汉的灭亡

汉朝离宗法社会近，很看重宗室和外戚。元帝以后，政权入于外戚王氏之手，王氏中又出了一个大人物，汉遂为其所篡。这个人就是王莽。王莽以公元九年篡汉，改国号为新，他是鉴于汉时社会贫富的不均，要想实行社会政策的，他的魄力，可以算是很伟大。惜乎行之不得其法，弄得举国骚然，新莽亦终至灭亡。

两汉间社会文化一大变

中国之文化，有一大转变，在乎两汉之间。自西汉以前，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，竭力攻击。东汉以后，此等议论，渐不复闻。汉、魏之间，玄学起，继以佛学，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，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。东汉以后，志士仁人，欲辅翼其世，跻世运于隆平，畀斯民以乐利者甚多，其用思不可谓不深，策划不可谓不密，终于不能行，行之亦无其效者，实由于此。故以社会演进之道言之，自东汉至今二千年，可谓误入歧途，亦可谓停滞不进也。（《秦汉史》上册，第197页）

后汉的兴起

后汉光武皇帝，是前汉的宗室，他以新莽之末起兵，和湖北地方的群盗连合，当时军中先有汉朝的宗室刘玄，号为更始将军，大家立他做皇帝。大破莽兵于昆阳（今河南叶县），汉兵分路入关，关中群盗亦起，王莽为乱兵所杀。更始移都长安，为群盗所制，政治紊乱。关东流寇赤眉入关，更始遂败亡。光武先别为一军，出定河北。后来把赤眉打破；割据或扰乱一方的人，亦都打平。建都在洛阳，所以史家亦称为东汉。

后汉国力远不如前汉

后汉自公元二十五年光武帝即位起，至公元二二〇年为魏所篡止，共计一百九十二年；若算到公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废立，东方起兵讨卓，实际分裂之时为止，则共得一百七十五年；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，然其国力的充实，则远不如前汉了。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，对于西、北两面的控制，不如前汉之便；又承大乱之后，海内凋敝已极，休养未几，而羌乱即起，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。两汉四百年，同称中国的盛世，实际上，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15页）

后汉的乱亡

光武、明、章三帝算是后汉的治世。和帝以后君主每多幼稚，母后临朝，外戚专权。皇帝长大了，因满朝都是他的党羽，只得和宦官谋诛灭他，结果宦官又因之专权。在这两种恶势力互相消长之下，国政日趋不振。到桓、灵二帝的时代而达于极点。灵帝死后，子少帝年幼，太后的哥哥何进当国，要想诛灭宦官，而太后不肯。何进乃召外兵进京，以胁迫太后，宦官大惧，把何进杀掉。何进的官属，遂举兵大杀宦官。正在纷乱之际，凉州将董卓带兵入京，政权遂尽入其手。董卓把少帝废掉，立其弟献帝。行为又极暴虐。东方州郡，起兵攻击他。董卓乃胁迫献帝，迁都长安。东方的兵，都纷纷自占地盘，不能追击。旋汉朝的宰相王允，和董卓的部将吕布合谋，把董卓杀掉。而卓将李傕、郭汜，又起兵为卓报仇，攻陷长安。献帝为其所制，久之，乃得逃到洛阳。因地方残破已甚，召曹操的兵入卫。从此大权归于曹操，汉帝只剩得一个空名了。

汉朝政治制度的劣点

汉朝的政治制度，有两个劣点，是引起三国以后的分裂和战乱的：

（一）秦汉时代，外官本分郡县两级，郡就直接隶辖中央。一郡的地方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（边郡也有很大的，然地广人稀，文化经济都落后，依旧没有实力），其势不足以反抗中央，所以柳宗元说：“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。”（见其所著《封建论》）后汉灵帝时，黄巾贼张角造反，虽然旋即打定，然而余党扰乱的很多，乃将向来专司监察的州刺史，改为州牧，变成了地方行政官吏，一州地方，有现在一两省大；又值纪纲废弛之际，州牧遂多据地自专；郡太守和有兵权的人，亦都纷纷割据，遂成为分裂之局。（汉武帝置十三州部，每州置一刺史以督察郡国，司隶校尉为中央官吏，督察京畿，不在十三州部之列。后汉并朔方于并州，改交趾为交州，合司隶校尉部仍为十三州，汉末又改刺史为州牧，威权愈重）

秦汉官制特色

秦汉官制的特色：（一）这时候的中央政府，宰相是个副贰天子，治理天下的；九卿等官，也各有独立的职权，都是分治天下众务的；不是天子的私人。到后来，纷纷任用什么尚书、中书、侍中做宰相；把九卿的职权，也夺归六部；于是所任用的，全是天子玩弄之人，君权愈张无限。（二）是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，和后世大不相同。这个有好处，亦有坏处。（三）则这时候去古还近，地方自治的意思，还有存留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：“二年二月癸未令，举民年五十以上，有修行，能帅众为善，置以为三老，乡一人。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，与县令、丞、尉，以事相教。”可见得这时候，对于三老等官视之甚重，和后世名存实亡的，大不相同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二册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，第71页）

（二）秦汉承战国之后，其兵制尚有征兵制度的意味。百姓到二十三岁，都隶名兵籍，归各郡的都尉。讲肄课试，到五十六岁，才得免除，汉初用兵，还都由郡国调发的。武帝以后，因用兵多了，免得骚扰平民，乃多派“罪人”（亦有并不是罪人的，如贾人、赘壻都是，不过取其不是普通农民而已。赘壻大抵是没有田产的人。本章末节所

论，可参看拙撰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二编第八章第一、第四两节）出兵打仗谓之“谪发”。虽然于人民有益，却是人民因此和当兵渐渐的生疏了。后汉光武因图减省起见，把都尉裁掉，民兵亦因之而废，此时被中国征服的异族多入居塞内，渐渐用他当兵（如当武帝时，外族内附而用以为骑者， 就置有越骑校尉等。宣帝时调羌骑卫金城。这都是借外族内附而用以当兵的例子），遂至异族强而本族弱，造成五胡乱华之祸。

秦汉间兵制一大变

秦汉之世，为中国兵制之一大变。古代兵农合一之说虽诬，然至战国，业已成为举国皆兵之局。一统之后，疆理既恢，征戍之途弥远。夫地大人众，则不必举国皆兵，而后足以御侮；征戍远则民劳，不得不加以体恤；于是罪人、奴隶与异族之降者杂用。盖自秦已启其端，至汉武之世而大盛。更经新室之乱，光武崛起，急欲与民休息，而民兵之制遂废。国之强弱，诚不尽系乎兵；兵之强弱，亦不尽系乎制度；然使民兵之制犹存，终必略加以训练，不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，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。然则典午以降，异族之凭陵，武夫之跋扈，其原虽不一端，要不得谓与民兵之废无关系也。（《秦汉史》下册，第675页）

第十二章

两汉疆域之开拓与对外交通

秦汉是我国疆域开拓的时代。秦始皇开其端，而汉武帝成其功。当张骞使月氏时，今甘肃西北境，尚属匈奴。却好匈奴的王，守今甘肃西北境的来降，汉朝以其地为郡县。西域的路，自此开通。汉朝曾出兵远征大宛。又把公主嫁给乌孙，和他共攻匈奴。宣帝时，在今新疆的中部，设立西域都护，保护天山南北两条通路。西域都是些小国，汉攻匈奴，并不能得它的助力，而因此劳费殊甚，所以当时人的议论，大都是反对的。但是史事复杂，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。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，与中国陆地相接，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，中西的文明，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。且西域之地，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，亦将成为中国之患。汉通西域之后，对于天山南北路，就有相当的防备，后来匈奴败亡后，未能侵入，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。

汉初域外的形势

秦汉是我国疆域开拓的时代。秦始皇开其端，而汉武帝成其功。汉初，匈奴以阴山为根据地，东击破东胡，西击破月氏，后又征服漠北诸小民族，和西域三十六国（历史上所谓西域，有广狭两义，此处是初时狭义的西域，专指天山南路，后来自此以西的地方，亦都称为西域）。月氏先逃到伊犂河流域，又为乌孙所攻。逃到阿姆河流域，征服大夏，就是西史的巴克特利亚（Bactria，即今之阿富汗国境）。其西安息，则是西史的帕提亚（Parthia，即今之伊朗国境）。更西条支，乃叙里亚之地。［当公元前四世纪之末，中国战国时候，马其顿亚历山大王，征服亚洲西部，死后其部将据叙利亚（Syria）自立，是为条支，后其东方，又分裂为帕提亚、巴克特利亚（Bactlia）两国，即中国所谓安息及大夏］再向西，就是罗马帝国，当时所谓大秦了。

（大秦一名犂鞬，见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。当时或系专指叙利亚。近人张星烺谓系指罗马帝国在东方的领土为大秦。参看《东西交通史料汇篇》卷一页八《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》一文）从安息向东南则到印度，从前谓之天竺，亦谓之身毒。从辽东向东，半岛的北部为朝鲜，南部为三韩（马韩、弁韩、辰韩）。再渡海而东，就是现在的日本，当时称为倭人。

以上是域外的形势。而秦时已隶版图的闽、广、安南，此时亦自立为南越、闽越两国（南越是秦朝的尉，据两广安南之地自立的。闽越是春秋时越国的子孙，灭秦有功的。汉朝封为闽越王，在今福建闽侯县，还有一个，封于浙江的永嘉县的，为东瓯王，因为闽越所攻击，自请举国内徙江、淮间）。云贵两省秦时略有交通，汉时复绝。自此往西北，在四川和陕甘两境上的异族，当时总称为西南夷。再向西，便是青海境内的羌人了（在大通河流域，当时谓之湟水）。

汉平匈奴

秦末，中国大乱，匈奴又入据河套。汉高祖自将去打他，被围于平城（今山西大同县）。后来用刘敬的计策，把宗室女嫁给他的单于，和他讲和。是为中国以公主下嫁，与外国结和亲之始。武帝初想约月氏共攻匈奴，派张骞往使，因月氏无意报仇，不得要领；后来才决意自行出兵攻击。先把他逐出漠南，又屡次派兵到漠北去打他，匈奴自此衰弱，到宣帝时又有内乱，其呼韩邪单于，遂入朝于汉。郅支单于逃到西域，为汉人发西域兵攻杀。

论武帝征匈奴

汉武帝东征西讨，所开拓者颇广，后世盛时之疆域，于此时已略具规模，读史者或称道之。然汉人之议论，则于武帝多致讥评。（宣帝初即位，欲褒先帝，令列侯、二千石、博士议，夏侯胜即言武帝无功德于民，不宜为立庙乐，见《汉书》本传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之叙事，《汉书·西域传赞》之议论，于武帝皆深致讥焉。而《汉书·武五子传

赞》，言之尤痛。）何哉？予谓是时之开拓，乃中国之国力为之，即微武帝，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，而武帝轻举寡虑，喜怒任情，用人以私，使中国之国力，为之大耗，实功不掩其罪也。汉世大敌，莫如匈奴。匈奴之众，不过汉一大县。又是时匈奴，殊无民族意识。试观军臣单于以嗜汉物，几堕马邑之权，然仍乐关市可知。贾生五饵之策，欲以车服坏其目，饮食坏其口，音声坏其耳，宫室坏其腹，荣宠坏其心（见《新书》），非处士之大言，其效诚有可期者也。使武帝而有深谋远虑，当时之匈奴，实可不大烦兵力而服。即谓不然，而征伐之际，能多用信臣宿将，其所耗费，必可大减，而所成就，反将远胜，此无可疑者也。《史记》言卫青仅以和柔自媚于上。霍去病则少而侍中，贵不省士，其从军，天子为遣大官赍数十乘，既还，重车余弃粱肉，而士有饥者；其在塞外，卒乏粮，或不能自振，而去病尚穿域蹋鞠，事多类此。此等人可以为将乎？较之李广将兵，乏绝之处，见水，士卒不尽饮，广不近水，士卒不尽食，广不尝食者何如？李广利之再征大宛也，出敦煌六万人，负私从者不与，马三万匹，军还，入玉门万余人，马千余匹而已。史言后行非乏食，战死不甚多，而将吏贪，不爱卒，侵牟之，以此物故者众，其不恤士卒，亦去病之类也。天子尝欲教去病孙吴兵法，对曰："顾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学古兵法。"此去病不学无术之明征，亦汉武以三军之众，轻授诸不知兵法之将之铁证。世顾或以是为美谈，此真势利小人之见。世多以成败论人，其弊遂中于读史，皆由势利之见，先有以累其心也。汉去封建之世近，士好冒险以立功名；不知义理，徒为愚忠；皆与后世绝异。即以李广之事论之。广与程不识，俱为边郡名将，匈奴畏之久矣。又尝俱为卫尉，天子知其能亦久矣。征胡而择大将，非广、不识辈而谁？乃汉武之所任者，始则卫、霍，后则李广利也。以椒房之亲，加诸功臣宿将之上，不亦令战士短气矣乎？（《秦汉史》上册，第129—131页）

汉通西域

当张骞使月氏时，今甘肃西北境，尚属匈奴。张骞在大夏，见今四川临邛县的竹枝，问他们："从哪里来的？"他们说："从身毒买来。"张骞因此想到从四川西南出，一定可通西域。汉朝就因此通西南夷。然通西域的路，依旧没有走通。却好匈奴的王，守今甘肃西北境的来降，汉朝以其地为郡县。西域的路，自此开通。汉朝曾出兵远征大宛。又把公主嫁给乌孙，和他共攻匈奴。宣帝时，在今新疆省的中部，设立西域都护，保护天山南北两条通路。西域三十六国都属都护管理。

史事"祸福"难豫烛

西域都是些小国，汉攻匈奴，并不能得他的助力，而因此劳费殊甚，所以当时人的议论，大都是反对的。但是史事复杂，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。（一）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。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腊、罗马等，距离中国很远，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，交流不甚密切，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，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，中西的文明，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。（二）而且西域之地，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，亦将成为中国之患，汉通西域之后，对于天山南北路，就有相当的防备，后来匈奴败亡后，未能侵入，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。所以汉通西域，不是没有益处的。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，并非当时所能豫烛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04页）

汉平朝鲜

朝鲜在战国时，属于燕国。秦末，燕人卫满率众避难，逃到朝鲜，自立为王。汉朝兴起，约为外臣，传子及孙，引诱汉朝逃人，南方辰国（即三韩之辰韩）要入朝，又被阻住。武帝因命将征讨，平定朝鲜，置为郡县。

汉平两越及西南夷

秦立闽中郡，不久便废。汉兴，封越君（百越酋长）为闽越王。到武帝时，闽越和东瓯（今浙江永嘉）常相攻，东瓯自请迁居内地，武帝依从。并派兵灭闽越，也迁其民于内地。南越是赵佗所立的国，汉封为王，传子及孙，其相吕嘉杀王，发兵造反，武帝遣将平定，尽有今两广、安南之地，置为郡县。武帝又平定滇国（今云南昆明）、夜郎（今贵州遵义）、邛、筰、冉、（今四川西境）诸西南夷，也置为郡县。

后汉的武功

王莽时，中国大乱，匈奴和西域都背叛。后汉光武时，匈奴又因内乱，分为南北。南单于降汉，入居中国塞内。公元八九、九一两年，和帝命窦宪大出兵以攻北匈奴，北匈奴逃到西域，后来转辗入于欧洲。当东胡为匈奴所破时，其余众分为乌桓、鲜卑两族。汉武帝时，招致乌桓，居今辽、热境上，助中国捍御匈奴；鲜卑在其北方，北匈奴亡后，其地遂为鲜卑所据。明帝末年，班超带着三十六个人，出使西域，攻杀匈奴的使者，说降诸国。明帝死后，汉朝无意经营西域，召他回来。而西域诸国，多有留着他不肯放的。班超亦愿意立功，遂留居西域。即发服从诸国的兵，把不服诸国攻下。这真是古今罕有的奇功了。

历代的治边方略

中国历代，对于属地，系取羁縻政策的。政府或设官以管理其通路，如汉朝的西域都护是；又或驻扎于几个要点，如唐朝的都督府是。此等官吏对于服属的部族，加以管理，有违命或互相攻击或内乱之事，则加以制止。防患于未然，使其事不至扩大而成为边陲之患，此即所谓守在四夷。但中国的政情，是以安静为主的。不但向外开拓，即对于边疆的维持，亦不能费多大的国力。所以到服属的部族真个强盛时，中国所设的管理机关，就只得撤退。再进一步，就患仍中于边陲了。历代的武功，除西汉一朝，去封建时代近，其君主及人民，都略有侵略的性质外，其余如唐朝及清朝，实都不过如此。看似武功煊

赫，拓土万里，实则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乱，并不是中国的兵怎样的强。总而言之，开疆拓土，甚至于防守边陲，在中国政治上，实向不视为要务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88—189页）

汉时的海上交通

汉时，海路交通，亦已极发达，从广东的合浦入海，能通行到印度洋沿岸［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：中国当时的航路，到黄支为止。黄支，据近来人考据，说是印度的建志补罗（Kancipura）］。西域商船，也有聚集于安南的东京湾的。中国的丝，在欧洲最为著名，与黄金同重同价。罗马人久想和中国人通商，但终为条支人所隔。班超平定西域后，派部将甘英到罗马去，亦为条支人所阻。直到一六六年，大秦王安敦（以年代考之，该是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，生于一二一年，没于一八〇年），才遣使从日南徼外（汉郡名，在今安南之境），献象牙、犀角、玳瑁，这是历史上记载中欧有国交之始。至于民间的交往，那自然久在其前了。倭人在前汉时，有百余国到乐浪郡来献见。公元五七年，乃有直达中央的。光武帝赐以“汉委奴国王”之印。这颗印，现在已在日本的筑前发现了。

第十三章

两汉之学术与宗教

春秋战国之世，诸子百家之学，本是立于平等地位的，汉初还是如此。从武帝以后，儒家在学校、选举两方面，都占了优势，别一家就不能和他竞争了。汉时儒家之学，就是所谓经学。经学有今古文之分。从大体上说，则汉人去古近，对于古代的事情，知道得总要多些；所以汉人的经说，无论今古文，都为后人所宝贵。史学在汉朝，亦颇发达。司马迁之《史记》，班固之《汉书》，所谓正史，都是沿用这一种体例的。文学的发达，韵文较散文为早。散文至西汉而达于极点。东汉以后，渐渐的开出骈文的风气了。秦汉之世，懂得“祠灶”，讲究神仙的，都称为方士。当时的社会，迷信的空气很浓厚，遂成为后来道教的根源。后汉时，佛教在社会上，渐渐的流行了。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，还不大讲到他的哲理。

汉代的崇儒

春秋战国之世，诸子百家之学，本是立于平等地位的，汉初还是如此。从武帝以后，儒家在学校、选举两方面，都占了优势（见本书第十一章），别一家就不能和他竞争了。这也有个原由：学术的趋向，是要适应环境的。战国时，列国竞争剧烈，整饬政治，训练人民，最为紧要，所以法家之学见用。汉初需要休养生息，所以从高、惠时萧何、曹参做宰相，以至文、景时代，都谨守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。到武帝时，海内业已富庶了；武帝又是好大喜功的人；要讲改正制度，兴起教化，那自然儒家之学，就会应运抬头了。

中国学术之分期

吾国学术，大略可分七期：先秦之世，诸子百家之学，一也。两汉之儒学，二也。魏晋以后之玄学，三也。南北朝、隋唐之佛学，四也。宋明之理学，五也。清代之汉学，六也。现今所谓新学，七也。七者之中，两汉、魏晋，不过承袭古人；佛学受诸印度；理学家虽辟佛，实于佛学入之甚深；清代汉学，考证之法甚精，而于主义无所创辟；最近新说，则又受诸欧美者也。历代学术，纯为我所自创者，实止先秦之学耳。（《先秦学术概论》，第1页）

文字的变迁

汉时儒家之学，就是所谓经学。经学有今古文之分。讲到这个问题，又要先晓得文字的变迁。中国的文字，从发明以后，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，递有演变，今已不尽可考，但所用的总是圆笔，这种字，后世称为篆书（篆者传也，传其物理，施之无穷。见《法书考》）。秦时，行政上使用文字较多，向来的写手不够用，乃叫徒隶帮着写，徒隶是不会写字的，画在上面就算，于是圆笔变为方笔，这种字人家称为隶书，虽然写得不好，因其简便，反而通行了。以上所说是笔画形状的改变，字体的构造，随时代而不同，自然也是有的。一时不觉得，积久之后，就大相悬殊了。

秦汉时文字变迁最烈

秦汉之世，为我国文字变迁最烈之时。综其事：则字形变迁之多，一也。字数一面增加，一面洮汰，二也。文字之学，成于是时，三也。行文渐以古为准，浸成文言分离之局，四也。书法渐成艺事，五也。盖文字之用，远较先秦时为宏，故其变迁之烈如此。自经此大变后，其势遂渐趋于安定矣。（《秦汉史》下册，第734页）

汉代的经学

古人的读书，多数是用口辗转传授的，不必都有本子，但是传之久了，总有人把他写出来，所用的，自然是当时通行的文字。汉初讲经

的人，虽然亦有派别，大体无甚出入。到前汉末年，刘歆（刘歆，字子骏，前二三年被王莽所杀）等人，才说鲁共王曾破坏孔子的旧宅，得到许多古书。此外，自然还有从别一方面来的，都藏在汉朝的秘府里。他们以此为据，说前此传经的人，经文有缺误之处，久而久之，相信这一派说法的人，对于经文的解释，也就和前此的人，有不同的地方了。人家因称这一派为“古文”，而称前一派为“今文”。汉时，国家所立的五经博士，都是今文之学。（前汉末年，曾立过几家古文，后汉时复废）但在后汉时代，私家教授，古文之学，颇为盛行。古文家虽说比今文家多得了些古书，然都无传于后。文字异同之处，只多无关紧要。重要的，倒是经说的异同，今古文的短长，我们不讲经学，无须去评论他。从大体上说，则汉人去古近，对于古代的事情，知道得总要多些；所以汉人的经说，无论今古文，都为后人所宝贵。

汉代的史学

史学在汉朝，亦颇发达。前代的历史材料，都是零零碎碎的。汉武帝时，司马迁才把他采集起来，做成功一部《史记》。后汉时班固又用其体例，专述前汉一朝的事情，谓之《汉书》，后世所谓正史，都是沿用这一种体例的。

《史记》体例多沿袭而非新创

《史记》为正史中第一部，后来的史书，都系沿袭他的体例。盖当太史公时，前代所留诒的史材，除述制度的典礼以外，其述人事的，可分为（一）《春秋》，（二）《系世》，（三）《语》，三者。《史记》的年表、世表，系据《春秋》《系世》制成；本纪、世家，有兼据《春秋》及《系世》的，亦有更益之以《语》的；而列传则大致系根据于《语》。知此，则知后世之正史，以人为纲，以致将事实寸寸割裂，要看一件大事，必须兼阅本纪及许多篇传，殊觉不便，其咎实不在于史公。因为史公所据的材料，是各有来源，本不相干的。照古人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的例子，异来源的材料，本不以之互相订补，并不使之错居一简。譬如《齐世家》和《管晏列传》，《鲁世

家》和《孔子世家》，便是各有来源，不能搀杂的。《史记》的多复重、矛盾，即由于此。而《史记》的列传，所以忽详忽略，或分或合，莫名其妙的，亦由于此。譬如管仲、乐毅，是何等大人物？然而《管晏列传》中，所详叙的，只有管仲和鲍叔的关系，述其相桓公霸诸侯的事反甚略。乐毅亦然，于其外交及军事，并没有详叙，而只备载其和燕惠王往返的书函。老子为什么要和韩非同传？《孟子荀卿列传》中，为什么要兼载这许多人？而又语焉不详？后世史学家、文学家想出许多说法来，总不能使人满意。如其不用私知穿凿，而但就古书义例求之，则可以一语斩尽葛藤，曰：其所据的材料，本来如是而已。普通列传，传者以人为主，则史公亦以人为主而传之。类传的传者，以事为主，则史公亦以事为主而传之。这种体例，如其说是好的，史公不应尽冒其功；如其说是坏的，史公不能尽尸其咎，正和后来的史家，袭用《史记》的体例，只负模仿的责任，不负创作的责任一样。（《古史家传记文选》上册，导言第11—12页）

汉代的文学

文学的发达，韵文较散文为早，春秋战国是散文发达的时代，至西汉而达于极点。东汉以后，句调求其整齐，字面求其美丽，渐渐的开出骈文的风气了。诗在古代，都是可以合乐的，五经中的《诗经》，就是如此。《诗经》大体是四言，汉时变为五言，渐渐的不能合乐了。汉武帝曾采集各地方的民歌，立了一个机关，谓之“乐府”，叫精于音律的人，替他定了谱，会做文章的人，按谱填词，诗中就又开出乐府一体。

韵文、散文与骈文

文学的发达，韵文是先于散文的。韵文之先于散文，乃因其时文字寡少，亦且文具缺乏，书写艰难，所以把要记的话，作成简短的句子，更加之以协韵，以便讽诵而广流传。然虽如此，这种精简的句子，到底不与口语相合，不与口语相合，即不能达意而无遗憾，所以到文字增多，足以代表口中的每一个音，因而能代表口中的每一句话，而文

具亦较完备，书写觉得便利时，我们便照着口中的言语写下来了。这便是散文时代。到西汉末年，所谓骈文者，渐渐兴起。骈文的特征，是语句的整齐。（一）无甚长甚短之句；（二）句多对偶，相对偶之句，长短相等。此其出之于口，即为音调的啴缓。啴缓的音调，和散文变化繁多、忽缓忽急的音调，究竟哪一种美呢？这是随着各人的好尚，和时代的风气而有不同的。在西汉末年，则群以啴缓为美，此为骈文兴起的主要原因。同时，骈文还有两个较次要的条件：即对于词汇加以选择，务求其可以引起美感；喜引用故事，并不正式叙述，而只以一两语包括之，此即所谓用典。其目的，在于使人从简单的语句中，得到丰富的想象，所以骈文在原则上忌用生事，因为既不叙述，而用生事，则为人所不能解，不但无从想象，抑且转生扞格矣。然则用字亦当以熟为贵，而汉人辞赋，每多喜用生字者，则以其字在当时实并不生，虽罕见，然与语言相合，正如今人用形声之法的造新字，亦为人人所能解也。（《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》，写于1951年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上册，第489—491页）

道教的起源

中国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对象很多，用理论把他分起类来，则为天神、地祇、人鬼、物魅四种（名见《周礼·春官 》）。列国分立时代，交通不甚发达，所以其势力都只限于一地方。秦汉之世，此等懂得“祠灶”的，以及燕、齐之间，讲究神仙的，都称为方士。（讲祠灶的，抑或称为巫）当时的社会，迷信的空气很浓厚。所以像秦皇、汉武等雄主，也很相信他。后汉末年，有张角创太平道，借着符水治病，聚集徒党造反。又有张陵，自称在四川山中学道，创五斗米道。（学道的人，都出五斗米，所以谓之五斗米道。本篇文字变迁和古文经发现的始末，可参看拙撰《中国文字变迁考》第三章）张角、张鲁等，虽然不久灭亡，然而此等迷信的流传，迄不能绝，遂成为后来道教的根源。

佛教的输入

佛教的输入，旧说以为在公元六七年，是汉明帝派人到西域去请来的，其实不然（佛教输入问题，可参看梁启超《饮冰室文集·佛教之初输入》），因为明帝的哥哥楚王英，已经相信佛教了。佛（释迦）在世的时代，大略和孔子相差不远（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，当周灵王二十一年；释迦生于公元前五五七年，当周灵王十五年。又孔子没于公元前四七九年，当周敬王四十一年；释迦没于公元前四七八年，当周敬王四十二年。故二人完全同时）。佛没后，其教北行至大月氏，南行至锡兰。中国同西域和南洋交通后，这两条路上，都有输入的可能。到底是什么年代，从什么地方输入的？则现在还难确答。后汉时，佛教在社会上，渐渐地流行了。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，还不大讲到他的哲理。

第十四章

两汉之社会概况

汉代是一个封建势力崩溃未尽，商业资本愈益抬头的时代。汉朝救济政策：一是法律上重农抑商，二是减轻田租。但是法律上的抑制，并不能减削他们经济上的势力。当时学者的议论，法家注重节制资本，儒家注重于平均地权。王莽的变法，综合儒、法两家的议论，规模可谓很阔大，计划也可以说很周详。然而行之不得其法，于是天下大乱。从此以后，就再没有敢说根本改革的人了。汉朝的风气，接近于封建时代，战国以来的任侠心理，仍然在民众间憧憬着。所以中流社会中人，慷慨激发的很多。如张骞、班超等人物，在后世是很少的。东汉儒生尊尚气节，光武、明、章诸帝，表章节义，敦厉名实，其影响委实不小。

汉代社会情形

汉代是一个封建势力崩溃未尽，商业资本愈益抬头的时代。当时的富豪，可分两种：其一是大地主，包括（一）田连阡陌，（二）和擅山泽之利的人；其二是实业家，包括（一）大工，（二）和大商（当时的工业家，大概自营贩卖，所以混称为商人；但照理论分析起来，实在包括工业家在内，如煮盐和制造铁器便是）。贫民则“常衣牛马之衣，食犬彘之食”（董仲舒的话，见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，很为可怜。

汉之刻剥其民为史所不详者多

八年，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（今河北正定县），还，见宫阙壮甚，怒，谓萧何曰：“天下匈匈，苦战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是何治宫室过度也？”何曰：“天下方未定，故可因遂就宫室。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，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。”高祖乃说（悦）。

何之言，实文过免罪之辞。闻安民可与行义，劳民易与为非矣，未闻天下匈匈，可因之以兴劳役。昧旦丕显，后世犹怠，岂有先为过度之事，而冀后世之无所加者乎？论史者多称何能镇抚关中，实则其为茧丝殊甚。彭城之败，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，是时楚、汉战争方始，则其后此所发，皆本无役籍者可知也。是岁，关中大饥，米斛万钱，人相食，令民就食蜀、汉。《食货志》言秦钱文曰半两，重如其文，汉兴，以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荚钱，不轨逐利之民，畜积余赢，以稽市物，痛腾跃，米至石万钱，马至匹百金，即此时事也。废重作轻，而又放民私铸，物之腾踊宜矣。顾归咎于民之逐利，可乎？然则汉之刻剥其民，而为史所不详者多矣。（《秦汉史》上册，第55页）

汉朝救济政策

汉朝救济政策：（一）是法律上重农抑商。如不许贾人衣丝、乘车，和市井的子孙不得学习为吏之类。（二）是减轻田租。汉初十五而税一；文帝曾将田租全行豁免；景帝以后，复收半额，计三十而税一，可谓轻极了。这两种办法，是受晁错贵农重粟之论的影响很大的。但是法律上的抑制，并不能减削他们经济上的势力，而当时私家收租，要十取其五；公家的田税无论如何减轻，也总无补于事了。

汉时钱价贵，人民负担仍重

汉朝的赋税，可分为三种：一是田租，就是古时的税，是取得很轻的。汉初十五而税一。文帝时，因行晁错入粟拜爵之令，到处都有积蓄，于是全免百姓的田租。到景帝二年，才令百姓出定额的一半。于是变为三十而税一了。后汉初，因天下未定，曾行什一之税，后来仍回复到老样子。一是算赋，亦称口赋，又称口钱。这是古时的赋。人民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，每人每年，出钱一百二十个，以治库兵车马。从七岁到十四岁，每人出钱二十个，以食天子。武帝又加三个钱，以补车骑马。这一笔税，在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轻，然而汉代钱价

贵，人民的负担实在很重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上册，第103页）

当时学者的议论

学者的议论，分为两派：（一）法家，是注重节制资本的。武帝时，桑弘羊曾行其策，把盐、铁和酒，都收归官营；又想出“均输”“平准”两法，官自贩卖物品。然官营事业，都极腐败，徒然破坏富豪，贫民仍未见其实惠，而且反受其害。（当时官办事业，腐败的情形，可参看《盐铁论·水旱篇》）（二）儒家，注重于平均地权，激烈的要恢复井田制度，缓和的，也想替有田的人立一个最大的期限，谓之“限民名田”。二者都成为空论，没有能实行。

汉世言社会改革之主张

社会始于公产，自公产之制破坏后，人心便觉其不安。先秦诸子无不欲举社会彻底加以改组者，而其改组社会，必藉政治之力。此固近世工业革命以前，欲改革社会之通蔽也。汉世学术，皆沿自先秦，其中最有主张者为儒、法二家。今表示前汉、新室之世重要之议论及制度如下：

学派	主　张	汉　世	新　世
儒家	平均地权	急激者主恢复井田，缓和者主限民名田，皆未实行	王田之制，系行急激派主张
	节制消费	法令颇多，不宜实行	同左
法家	节制工商	汉世重农抑商法令，桑弘羊盐铁官卖，耿寿昌之常平仓	五均、六筦
	干涉借贷	官贷粮食，贷者或勿收	司市、泉府

先秦诸子之主张至新莽而彻底实行，实行之而失败，自此无复敢言彻底改革者，视社会之病态，为无可如何之缺陷矣。（《本国史复习大略》，写于1944年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上册，第644—645页）

王莽的变法

到王莽出来，才综合儒、法两家的议论。（一）把天下的田，改名王田，不许卖买。一人有田超出百亩的，责令分给九族、乡党。（二）重要的实业，收归官营。（三）拣几处大都市，立司市之官，令其求得各物的平价；有用而滞销的东西，照本钱买进，到物价昂贵时，则照平价卖出。（四）经营各种事业的人，都要按其所得收税，由当时新设的泉府，将来借给贫民。王莽的变法，规模可谓很阔大，计划也可以说很周详。然而行之不得其法，不但不能建设起一种新秩序来，反把旧秩序破坏了。于是天下大乱，王莽亦随之灭亡。从此以后，就再没有敢说根本改革的人了。

王莽之败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的共同失败

王莽的变法，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，其理由已述于前。固然，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，但这只是枝节。即使手段很高强，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。因为根本上铸定要失败的事，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。但是王莽的失败，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，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。因为王莽所行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，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。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。经过这一次改革失败之后，人遂群认根本改革为不可能，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思想，从此告终了。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，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95—96页）

汉朝的士气和武风

汉朝的风气，是接近于封建时代的，而战国以来的任侠心理，仍然在民众间憧憬着。所以中流社会中人，慷慨激发的很多。如张骞、班超等人物，在后世是很少的。不过两汉比较起来，东汉似较西汉为厚，一般儒生尊尚气节，虽导源于王莽的僭汉，而光武、明、章诸帝，表章节义，敦厉名实，其影响委实不小。后汉桓、灵二帝时，宦官专权，亲党遍布州郡。诸名士列官内外的，或直言指斥，或尽法惩治，宦官乃诬为党人，加以禁锢，后来又加以逮治。诸名士很多慷慨就戮的，其有逃亡的，所至之处无不“破家相容”，这就是党锢之祸。这种风气，在社会上竟酿成一种清议的特殊势力，而以后魏晋的清谈之风，则又是这种势力的反响。

士大夫阶级之变迁

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之特质：（一）自视与平民不同。（二）勇于战斗。（三）不好利。观西汉之世，贾谊、董仲舒之议论最可见之。其时文臣如公孙弘、盖宽饶；武臣如张骞、傅介之、常惠、陈汤、李广、李陵、班超等，均尚属此风气中人。但社会之组织既已变迁，风气终必随环境而改变，遂至奢侈嗜利颓废。晋初之石崇、王戎、王衍等是其代表。以一时论，无中等阶级为国之桢干，是其弊；以永久

论，特殊阶级消泯，是其利。（《本国史复习大略》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上册，第648—649页）

第十五章

三国之分裂与晋之统一

后汉从黄巾之祸起，再加以董卓的扰乱，各处州郡，纷纷割据，就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了。三国的分裂，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。其一是封建的余习。人心是不能骤变的。在封建时代，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，秦汉以后，虽然统一了，然此等见解，还未能全行破除。试看汉代的士大夫，仕于州郡的，都奉其长官为君，称其机关为本朝，有事为之尽忠，死则为之持服，便可知道。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。魏晋之际，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。自三国以前，异族恒为我所服，至五胡乱起，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。

后汉的分裂

后汉从黄巾之祸起，再加以董卓的扰乱，各处州郡，纷纷割据，就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了。当时地最广，兵最强的，割据幽、并、青、冀四州袁绍。而吕布在徐州，袁术在扬州，亦有相当的兵力。曹操是割据兖州的，后来汉献帝召他入卫，他因洛阳残破，把献帝迁都到许昌，成为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之势。刘备在徐州，和吕布竞争失败了，投奔曹操。曹操表荐他做豫州牧。和他合力，把吕布、袁术打平。刘备和献帝的近臣合谋，要想里应外合，推翻曹操，曹操把他打败，刘备逃到荆州，投奔刘表。曹操南征荆州，刘表恰巧死了，他的儿子，把襄阳投降曹操。刘备逃到夏口（汉水的下流，古时亦称夏水，所以汉水入江的口子，称为夏口），和在江东的孙权合力（当时袁术只占扬州的北部，扬州的南部，都是孙权的哥哥孙策打定的），把曹操在赤壁打败（山名，在湖北嘉鱼县）。刘备就将荆州全行恢复，又西取益州，国内就成为三分之局了。

三国分裂的心理因素

三国的分裂，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。其一是封建的余习。人心是不能骤变的。在封建时代，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，秦汉以后，虽然统一了，然此等见解，还未能全行破除。试看汉代的士大夫，仕于州郡的，都奉其长官为君，称其机关为本朝，有事为之尽忠，死则为之持服，便可知道。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。赤壁战时，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。所以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的，如张昭等，都主张迎降。只有周瑜和鲁肃，主张抵抗，和孙权的意见相合。《三国志》载周瑜的话，说曹操名为汉相，实系汉贼，这是劫持众人的门面话，甚或竟是事后附会之谈。东吴的君臣，自始至终，所作所为，何曾有一件事有汉朝在心目之中？说这话要想欺谁？在当时东吴朝廷的空气中，这话何能发生效力？孙权一生，最赏识的是周瑜，次之则是鲁肃。孙权当称帝时，说鲁子敬早有此议，鲁肃如此，周瑜可知。为什么要拥戴孙权做皇帝？这个绝无理由，不过是一种崛强之气，不甘为人下，孙权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，则更不过是一种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。赤壁之战，是天下三分的关键，其事在公元二〇八年，至二八〇年晋灭吴，天下才见统一，因这一种蛮悍的心理，使战祸延长了七十二年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23页）

三国的鼎立

当刘备西取益州时，孙权想夺荆州，刘备乃将荆州和他平分。后来曹操平定汉中，刘备又把他夺取。因命守荆州的关羽，出兵北伐，孙权乘机袭取荆州，关羽败死。曹操死后，儿子曹丕，于二二〇年，篡汉自立，国号魏。刘备和孙权于次年亦相继称帝，刘备国号汉，史称蜀汉，孙权国号吴。刘备出兵攻吴，为陆逊所败，惭忿而死，托孤于诸葛亮。诸葛亮是个绝世奇才，把区区的益州，治理得很好，国富兵强，屡次出兵伐魏，惜乎天不假年，大功未成，死在军中，蜀汉自此就渐渐的不振了。吴则本来是自守的时候居多。

凡事少用机谋

关羽的败，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。因为失去荆州，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，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。从汉中向关中，道路是艰难的；魏国防守之力，亦得以专于一面；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，未必不由于此。

这件事情，如其就事论事，关羽的刚愎而贪功，似应负其全责；如其通观前后，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，实在是失败的远因。倘使刘备老实一些，竟替刘璋出一把力，北攻张鲁，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。张鲁既下，而马超、韩遂等还未全败，彼此联合，以扰关中，曹操倒难于对付了。刘备心计太工，不肯北攻张鲁，而要反噬刘璋，以致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，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。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，仍能进取汉中，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，却变作独当大敌。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，而荆州丧失的祸根，就潜伏于此了。

不但如此，刘备猇亭之败，其祸机实亦潜伏于此时。伐吴之役，读史的人说他是忿兵，也未必是真相的。刘备到底为什么要去征吴呢？大约自揣兵力，取中原不足，而取荆州则自以为有余。殊不知吴、蜀的兵力，本在伯仲之间，荆州既失，断无如此容易恢复之理。旷日持久，就转招致猇亭的大败了。然其祸根，亦因急于要取益州，以致对于荆州不能兼顾之故。所以心计过工，有时也会成为失败的原因的，真个阅历多的人，倒觉得凡事还是少用机谋，依着正义而行的好了。（《三国史话》，开明书店1943年版，第87—88页）

晋朝的统一

魏文帝曹丕篡汉后，传子明帝，性极奢侈，魏朝的政治，就此紊乱了。明帝死后，嗣主年幼，大权落入武官司马懿之手。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，前后相继执掌魏国的政柄。司马昭时，乘蜀汉衰弱把他灭掉。他的儿子司马炎，就篡魏自立，是为晋武帝。于二八〇年灭吴，全国就又统一了。从董卓入洛阳至此，共计九十二年。

魏晋为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

魏晋之际，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。自三国以前，异族恒为我所服，至五胡乱起，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。五胡之乱，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立。越十三年，愍帝被虏，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。自是南北分立。自元帝建武元年，至陈后主祯明三年，凡二百七十三年，而南卒并于北。隋文帝虽云汉人，然民族之异同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，此则不独隋室，即唐室之先，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。唐室武功，超轶汉代，然实用蕃兵、蕃将为多，与汉之征匈奴，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。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，虽不久覆灭，然契丹、党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，又纷纷窃据，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。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，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。（《两晋南北朝史》上册，开明书店1948年版，第1—2页）

第十六章

中华民族之新融合

晋朝统一后，不久而五胡乱华，东晋立国南方，北方自立的，共有十六国。后来北方再并于后魏，南方则传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，是为南北朝。从西晋到南北朝，统一只有三十七年，分裂倒有二百七十二年。这个长期的分裂，其大原因，是两汉时代，所接触的异族太多，一时不及同化，政治上又措置不善之故。从东晋到南北朝，北方始终为异族所占据。当时异族割据的，多用其本族人或其他异族为兵，所以汉人在政治上很难翻身。直到南北朝的末年，才靠民族文化的力量，把他们全行同化。所以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的政治，是衰败的；民族的潜势力，却是优越的。

两晋南北朝总说

晋朝统一后，不久而五胡乱华，东晋立国南方，北方自立的，共有十六国。后来北方再并于后魏，南方则传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，是为南北朝。从西晋到南北朝，统一只有三十七年（晋武帝虽于公元二六五年篡魏即位，而于公元二八〇年始灭吴，统一全国，故从二八〇年，推算至三一六年，只有三十七年），分裂倒有二百七十二年。这个长期的分裂，其大原因，是两汉时代，所接触的异族太多，一时不及同化，政治上又措置不善之故。经这一次扰乱之后，中华民族却又融合了许多新分子了。

两晋南北朝非黑暗时代

两晋、南北朝之世，是向来被看作黑暗时代的，其实亦不尽然。这一时代，只政治上稍形黑暗，社会的文化，还是依然如故。而且正因时局的动荡，而文化乃得为更大的发展。其中关系最大的，便是黄河流

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，分向各方面迁移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44—445页）其大成就有四焉，而皆与民族之动荡移徙有关，故民族之移徙，实此时代中最大之事也。四者唯何？一曰士庶等级之平夷。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。三曰山间异族之同化。四曰长江流域之开辟。（《两晋南北朝史》上册，第5页）

晋初五胡分布的形势是：匈奴、羯在山西（羯是匈奴的别种，因其居于羯室得名。羯室，在今山西辽县）；氐、羌在陕、甘；鲜卑在今辽热、察、绥，以至宁夏、甘肃之境。匈奴刘渊乘晋朝内乱，自立为帝，灭西晋，史称前赵，为后赵石勒所灭。石勒是羯族，据中原大部分，后并于前燕。前燕慕容氏是鲜卑族，据有辽东、辽西、河北地方（辽东为太守公孙度所据，其子渊，为魏所灭），后为氐苻坚所灭，是为前秦。苻坚吞并北方，又想灭晋，晋兵抵抗，苻坚大败于淝水（在今安徽寿县），遂为羌姚苌所灭，史称后秦。东晋刘裕北伐，灭后秦。

五胡之乱的远因

晋时五胡之乱的先声，实在是后汉时的羌乱。羌乱的原因，据班彪说：是“数为黠吏小人，所见侵夺，穷恚无聊”，以致于此。（见《后汉书·羌传》）而既叛之后，郡县之吏，都无心于守土。强迫人民，迁徙至内地。以致死亡流离，不可胜计。朝廷命将征讨，也拥兵自守，全不以寇贼为意。中央政府的大臣，又像清平世界，没有乱事一般。以致当时有个有志之士，唤作王符的，恨极了，在他所著的《潜夫论》中说：应该叫这班大臣子弟去当兵，免得他们看着百姓的流离死亡，不以为意。然而小吏黠人，侵夺降羌，政治家固然有不加管束之罪，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人？又为什么要听其横行呢？这个，社会与政治，也应分负其责的。譬如石勒，是个羯酋。在其未起事之前，曾被晋朝的并州刺史掠卖到山东，做人家的奴隶。当时的掠卖，并非偶然的事情，是大规模的，是有意的。掠了许多人，两个人合戴一面枷。（见《魏书·石勒传》）这还成什么话？然而官掠人卖，也要有人

买。我们再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，知道当时四川地方，有一种人唤作僚。僚人程度甚低，往往自卖或相卖。于是梁、益二州（梁州今汉中，益州今成都），就岁岁伐僚以自利。把他卖给人家做奴婢。于是“公卿氓庶之家，多有僚口”。就知道当时贪利之徒，待异族的酷虐了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果然全社会人，个个都不造业，哪得会有恶报呢？所以我说：五胡之乱，政治和社会，是要分负责任的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第95—97页）

淝水战后，鲜卑慕容氏复起，一据山东为南燕，一据河北为后燕，一据关中为西燕。又有鲜卑拓跋氏起于绥远，据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，史称后魏，灭后燕，和在热河的北燕。南燕，为东晋所灭。在甘肃的有前凉、后凉、南凉、北凉、西凉、西秦，先后兴起，最后仅余西秦、北凉二国，又有在陕北的夏国，夏灭西秦。夏和北凉，都为后魏所灭。还有据四川的成国，为东晋所灭。东晋为刘裕所篡，国号宋，和后魏对峙，为南北朝。

南北朝的大略

南北朝初年，南朝的疆域还不小，然宋文帝北伐不胜，魏太武帝反自将南下，直抵江边，遂成北强南弱之势。历宋、齐两朝，迄不能振作。到梁武帝时，南朝颇为太平，而北朝从孝文帝南迁以来，风俗渐趋奢侈，留守北边的将士，因待遇不及南迁的人，也心怀不平。这时候，魏明帝在位，太后胡氏专权，政治大乱，北边和中原，乱事蜂起。秀容川的尒朱氏（秀容川，在平城之北。尒朱氏是北方部落的酋长，受封于此的），起兵定乱，又因暴虐，为高欢所灭。魏主靠着关中的宇文泰以抵御高欢，高欢亦别立一君，魏遂分东、西。高欢死后，其将侯景来降。梁武帝想乘机恢复河南，然亦未成功，侯景反在境内造反，都城被陷，梁武帝忧愤而死。元帝立国江陵，遣陈霸先等打平侯景。而江陵为西魏所陷，元帝被害，陈霸先立其幼子于江东，旋篡位，是为陈武帝。北方，东、西魏为高氏、宇文氏所篡，是为

齐、周。后来齐灭于周，周又为外戚杨坚所篡，是为隋文帝，南下灭陈，统一南北。

异民族的新融合

从东晋到南北朝，北方始终为异族所占据。（北齐说是渤海高氏，渤海是汉郡名，为今河北东南境，然高欢久居北方，早和鲜卑同化了。宇文氏亦是鲜卑）异族的酋长也有骄淫暴虐，十足现出野蛮人的性质的；也有平平稳稳，颇能接受汉人的文化的。其中最热心摹仿汉人的要算魏孝文帝。他因为要求汉化之故，不顾阻力，从平城迁都到洛阳。迁都之后，禁胡服，禁胡语，易姓名，还强迫鲜卑人和汉人结婚。从大体上论起来，五胡的文化，都较汉人为低。其同化于汉人，自是当然的结果。唯当时异族割据的，多用其本族人或其他异族为兵，用汉人的很少，所以汉人在政治上很难翻身。直到南北朝的末年，才靠民族文化的力量，把他们全行同化。所以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的政治，是衰败的；民族的潜势力，却是优越的。

汉以“柔和”的方式同化异民族

当时的龙争虎斗如此，后来却如何终于同化了呢？这个可说：全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优劣。文化便是生活，生活劣者总不得不改而从优。我们试看《晋书·北狄传》说：当时的匈奴部落，“随所居郡县，使宰牧之，与编户大同，而不输贡赋”。则可知其时匈奴的生活，实已很接近于汉人。所以《王恂传》说：太原诸郡，以匈奴、胡人为田客的，动有百数。又如《后汉书·冉夷传》说：他们“冬则避寒入蜀为佣，夏则避暑反其邑”。可知当时汉族和异族，人民之间，关系亦已极其密切。设非有五胡之乱，政治上的逆转，同化得总还要快些。这是说普通人民。若说五胡中的贵人，和中国的文化，亦已很为接近。如刘渊，《晋书·载记》上说他文武兼资。尝耻“随、陆无文，绛、灌无武”。这些话，或者不免增饰。然而总不全是子虚的。此外五胡中的酋长，除极无道的外，亦没有不读中国书的。齐文襄执政，延师以课诸弟，即其一例。（《北齐书·孝昭纪》）文化之为物，是最能使人爱

慕，而忘掉人我的界限的。两种文化相形之下，亦是最易使文化劣等的民族，自惭形秽，而愿意舍己从人的。如此，积之久，自然有像北魏孝文帝这种人，自愿革除胡化，同于华夏了。我们只要看：胡、羯的运命短，鲜卑的运命长；尔朱氏终败，而高欢卒成；愈到后来，愈是接近于汉族的得胜，便见得汉族同化的力量，在无形中逐渐进行。只有一次（冉闵大杀胡、羯），汉人露出很鲜明的民族色彩。其余则大概都是忍辱负重，在平和中，靠着文化的优越，潜移默化地，慢慢地把胡人同化于我的。基督说：“哀恸者福矣；饥渴而慕义者福矣；矜恤者福矣；施和平者福矣；为义而遭迫害者福矣。”汉民族真足当之而无愧了。然而为人当刚柔得中，民族亦然。一味柔和，虽胜于强暴之徒，亦不是民族的全德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第100—103页）

第十七章

两晋南北朝之文化与社会

两晋南北朝，以学术思想论，倒也很有特色的。汉儒都喜欢注古，就不免有“泥古”之弊，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响，有喜欢讲哲学的风气，又和佛教的哲学相接近。五世纪初年，大乘经典，渐渐流行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。因为和异族接触的多了，本族的文化，就因之而起变迁。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既占优势，生活自然要宽裕些，养成一种优游暇豫，不肯做事情的习惯。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，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。三国时代，南方士大夫的风气，还是颇为剽悍的。晋初的周处，还很有武烈之风。倘使元帝东渡以后，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，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，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，必有功效可见。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，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，直到晋末，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，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。

玄学和佛学

两晋南北朝，以政治论，虽然衰败；以学术思想论，倒也很有特色的。汉时儒学盛行，儒学都喜欢注古，就不免有“泥古”之弊，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响。三国中叶（魏废帝正始年间，正始，自二四〇到二四九），北方就有喜欢讲哲学的风气，他们在儒家的书中，注重《易经》；在道家的书中，则取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很热心地互相讲论。他们这种讲论，谓之“清谈”，所讲论的学问，谓之“玄学”，很有许多高妙的见解。因此又和佛教的哲学相接近。佛教有大、小乘之分，大乘的哲学，比小乘更为高妙。初期盛行的，都是小乘，到五世纪初年，大乘经典，才渐渐流行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。

清谈者未必不事事

晋代为玄学时代，其风起于正始时。玄学之兴起，实为汉世儒家泥古之反动。故其重要之观念，为重“道”而遗“迹”。道者今所谓原理，迹则事实也。谈玄者谓之清谈，世皆訾其误国。然清谈者未必不事事，不事事者亦不必皆能清谈。谓不事事误国可，谓因清谈而不事事者误国可，清谈而勤于事，固不能谓其误国也。正始诸贤，皆有志当世之士，则其明证。其后或为司马氏所戕贼，或则隐晦以求自全，此乃军阀之罪恶，岂可释之而罪学者邪？玄学之蔽，乃在承新莽改革失败之后，不复敢言社会革命，而徒欲移易人心，遂至陷入唯心论。观鲍敬言之无君论，徒能斥现行政治之恶，而绝无办法可知。次则其人虽有学问，而不胜其物质之欲，不能自振，且冒于财利。此已为学者之失，而非其学之咎矣。（《中国通史晋朝部分纲要》，写于1952年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上册，第631—632页）

中外文化的和合

因为和异族接触的多了，本族的文化，就因之而起变迁。这时候，论建筑则有寺、塔；论图画则有佛画；论雕刻则有佛像（现在河南洛阳伊阙，山西大同武州山的佛像，都是后魏时所刻），都是从印度来的。而音乐从西域输入的亦不少。衣服的式样，本有南北两派，南派是宽博的，北派是窄小的。（可参看林惠祥《文化人类学》第三篇第六章九十九页，商务印书馆本）中国的衣服，本近南派，到这时代，衣裳和深衣渐渐的没有人着了，径用从前衬在里面的袍衫做外服，而便服则多着裙襦；靴也渐渐的通行。再进一步，就要以袴褶为外服了。（参看本书第四章。古人穿在外面的短衣，衬在里面的反有长衣。单夹的叫衫，装绵的叫袍。靴是北族之物，中国所没有的。褶是一种较短的外服。袴褶服既不着裙，亦不着袍衫，径以袴为外服，隋唐时，天子亲征，中外戒严就着他，其源也是起于南北朝）古人都是席地而坐，就坐在床上，也是跪坐的。这时代则渐用“胡床”，垂脚而坐。这些，都可以说是受北族的影响。

道教的成立

因为佛教输入，而道教也随之而形成。道教的根源，是古代的方士和神巫，已见第十三章。玄学盛行以后，他袭取老、庄的哲理；佛教盛行以后，他又摹仿他，造作经典，装塑神像；宗教的条件，渐渐完具。五世纪初年，嵩山道士寇谦之，自称遇见老子，叫他改正张陵的伪法，后来又说老子的玄孙李谱文，命他统治嵩山周围百万方里的土地。北魏太武帝相信他，把他迎进京城，筑坛传教。从此以后，道教就算作一种大宗教，和儒、释并称了。

儒释道三教并立

中国向以儒、释、道三教并称。三教并立之原理：（一）孔教专行于政治社会方面，放弃灵魂界之地盘，以让释、道；（二）释、道皆专于灵魂界，而放弃政治社会方面，故不与俗界生冲突；（三）此为中国之宗教与欧洲大异之处，故中国无教争之祸。至释、道二教，在教旨上，实无根本之区别，所以能并立者，则因旧日迷信之对象，不易铲除。佛教虽并不排斥中国之旧信仰，且企图将中国之旧信仰编入彼教之中。然究为来自国外之宗教，不能悉数网罗。道教则在教理上远非佛教之敌。故二者亦不得不并立。此为政治所承认者，其流行于民间者，仍时与政治革命、社会革命为缘，而为其鼓动之工具。异族入据之时，则又含有民族主义，如元、清时白莲教及太平天国是也。（《本国史复习大略》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上册，第651页）

文学与美术

这一期的文学，就是所谓骈文。虽然不切实用，却也很为美丽。中国的字，因其构造的繁复，亦成为美术之一。隶书源起，本是为求应用的，后来也变成美术品，当时的人别称为八分书。其专供应用的，则成为现在的正书。（八分书笔画之末，有向上之势，谓之“挑法”。隶书的笔画，都是秃的，现在的正书，乃对于行、草之名，实在就是隶书。所以从前人善写正书的，历史上往往说他善隶书。现在多以八分书为隶书，正书另是一种，实在错了。本章文字的变迁，可参看拙撰《中国文字变迁考》第四、第五章）然正书和求快捷的行草，亦都成

为美术。这时期中，最工于书法的，为晋朝的王羲之，后人推为“古今之冠”。（见《晋书》本传）

门阀的兴起

文化的发达如此，为什么政治上会弄得这样糟呢？这个不能不归咎于社会的不好。从秦朝以后，古代的封建制度，在政治上虽已消灭，贵族在法律上，虽已失其地位；然其在社会上的地位，是不容易一时消灭的。汉朝用人，不论门第，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不占势力。三国时，魏因其尚书陈群的建请，采行九品中正的制度，于各州置大中正，各郡置中正，令其品评当地的人物分为九等，而尚书凭以选用，中正的评论，只讲门第，不论好坏，有所谓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的说话。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就占了便宜。加以五胡乱华，中原人物，流离迁徙，他们到了一处新地方，还要标明旧时的郡望，以表示尊贵（如王氏标明为琅邪的王，崔氏标明为博陵的崔之类，因为别地方的王姓、崔姓，门第未必都是好的。本问题可参看拙撰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二编下第三章第七节）；流俗也就尊重着他。他们在政治上既占优势，生活自然要宽裕些，养成一种优游暇豫，不肯做事情的习惯，反自以为高尚。读书人不必说了，就做官的也是如此，所以后来的人，称此为“清谈误国”。然而当时，这一班人，倒是处于重要的地位的，这就当时的政治，所以腐败的一个大原因。

门阀政治之危害

魏晋以降，门阀制度渐次形成，影响及于选举，高位多为贵族所蟠据，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，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，政治自然不免腐败。三国时代，南方士大夫的风气，还是颇为剽悍的。自东晋之初，追溯后汉之末，不过百余年，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等人物，未必无有。晋初的周处，即系南人，还很有武烈之风。倘使元帝东渡以后，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，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，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，必有功效可见。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

持，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，直到晋末，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，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26页）

第十八章

隋之统一与唐之继起

公元五八九年，隋灭陈，统一全国，从此到七五四年，即安禄山造反的前一年；从大体上说来，总算是治平盛强之世。论史者率以汉、唐并称，其实非也，隋唐五代，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，其于先汉，则了无似处。汉、唐并称中国盛世，贞观、永徽之治，论者以比汉之文、景。然非其时之君臣，实有过人之才智也。唐太宗不过中材。论其恭俭之德，及忧深思远之资，实尚不如宋文帝，更无论梁武帝。武后以一女主，而易姓革命，开旷古未有之局，论者多以为奇，其实无足异也。若谓皇帝之名，本无足歆，居之，徒足招人讥议，且授人以攻击之柄而自蹈危机，何必为是？则试问至二十世纪，袁世凯何以犹冒不韪而为之，以致身败名裂乎？从来居权势之地者，多无学识，亦罕能深思远虑，不能以读史者之见衡之，求之深而反失之也。

隋唐的概说

公元五八九年，隋灭陈，统一全国，从此到七五四年，即安禄山造反的前一年，共一百七十二年；虽然有盛有衰，有治有乱，然从大体上说来，总算是治平盛强之世。安禄山反后，唐朝就入于衰亡时期了。

汉唐并称，了无似处

论史者率以汉、唐并称，其实非也。隋唐、五代，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，其于先汉，则了无似处。何以言之？

先汉虽威加四夷，然夷狄之入居中国者绝鲜，后汉则南单于、乌丸、鲜卑、氐、羌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，卒成五胡乱华之祸。而唐代亦然，沙陀入据中原，犹晋世之胡、羯也。蕃、浑、党项，纷纭西

北，卒自立为西夏，犹晋世之氐、羌也。而契丹雄据东北，与北宋相终始，亦与晋、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。一矣。汉有黄巾之乱，而州郡据地自专，终裂而为三国；唐有黄巢之起，而长安之号令，不出国门，终裂而为五代十国。二矣。不特此也，汉世儒者，言井田，言限民名田，法家则欲行均输，筦盐铁，初犹相争，至新莽遂合为一，功虽不成，其欲一匡天下，措斯民于衽席之安，其意则皎然也。而自魏晋以来，人竞趋于释、老，绝不求矫正社会，而唯务抑厌其本性，以求与之相安。本性终不可诬也，则并斯世而厌弃之，而求归于寂灭，为释、老者虽力自辩白，然以常识论之，岂不昭昭如此耶？夫举一世而欲归诸寂灭，是教社会以自杀也。教社会以自杀，终非社会所能听从，故至唐而辟佛之论渐盛，至宋而攘斥佛、老之理学兴焉。然宋儒之所主张者，则以古代社会之组织为天经地义，而强人以顺从古代之伦纪而已；人心之不能无慊于古道，犹其不能无慊于今日之社会也。而宋儒于此，亦唯使人强抑其所欲求，以期削足而适履，此与言佛、老者不求改革社会，而唯务抑厌人之本性者，又何以异？此又其若相反而实相类者也。世运岂真循环耶？非也。世无不变之事，亦无骤变之物，因缘相类者，其所成就，亦不得不相类，理也。然则自后汉至于南北朝，与夫隋唐、五代之世，其因缘之相类者，又何在也？（《隋唐五代史》上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—2页）

隋朝的治乱

隋文帝是很勤政爱民的。当他在位时，有善政也有秕政，而尤以偏听皇后独孤氏的话，立炀帝为太子，这桩事最为失策。炀帝即位之后，骄奢异常。隋朝是建都在长安的，他却以洛阳为东都，开了一条运河，从黄河通到淮水里，接连现在淮南运河；又开通了现在的江南运河。他坐着龙船往来于洛阳、江都之间。虽然开运河是利交通的事，然工程太大，一时民力不及，还要如此恣意巡游，自然国家元气要大伤了。他又巡幸北边，招致塞外诸异族，发大兵三次征伐高句丽；就弄得民穷财尽，乱者蜂起。

历代开凿之河运

中国地势，西高东下，大川皆自西徂东。故其交通，东西易而南北难。自河域通江域之运河，相需最亟。古代以人工开凿者，盖有二焉。一为邗沟，一为鸿沟也。娄敬言河渭漕挽天下，西给京师。则自泛舟之役以来，其利迄未尝替。至后汉明帝时，而引汴渠自荥阳至千乘之大工程出焉。盖当时富力，皆在山东，故亟谋自长安通齐地之水运也。东晋以后，富力渐集于江淮，则运道亦一变。隋开通济渠，自东都引谷洛入河，又自河入汴，自汴入淮，以接淮南之邗沟。自江以南，则自京口达余杭，开江南河，凡八百里。唐世江淮漕转，二月发扬州，四月自淮入汴，六、七月至河口，八、九月入洛。自此以往，有三门之险，欲凿之而未成，乃陆运以入于渭。此自东南通西北之运道也。宋都汴京，水道四达。东河通江淮（亦曰里河），西河通怀孟，南河通颖寿（亦曰外河，今惠民河其遗迹也），北河通曹濮。四河之中，东河之利最巨，淮南、浙东西、荆湖南北之货，皆自此入汴。岭表之金银香药，亦陆运至虔州入江。陕西之货，有入西河入汴者。亦有出剑门，与四川之货，同至江陵入江者，盖东河所通，三分天下有其二矣。元有天下，始引汶水，分流南北，以成今日之运河，历明、清无改。（《中国文化史六讲》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上册，第140—141页）

隋唐的兴亡

隋末发乱的：在北方，以河北的窦建德，河南的李密、王世充为最强；南方的萧铣，据江陵，地盘最大。长江下流，亦有好几个据地争衡的，后来都给杜伏威所并。太原留守李渊，因拒突厥不利怕获罪，听他次子世民的话起兵，先取关中，以为根据地，旋平河西陇右。刘武周根据马邑（马邑，今山西马邑县），南侵并州，亦给唐王李渊父子打败。公元六一八年，李渊即帝位于长安，是为唐高祖。同年，李密为王世充所破，投降唐朝，旋又借名出关，要想自主，被唐朝伏兵击杀。世民伐王世充，窦建德来救，世民分兵往御，一战而擒。王世

充也就投降。又遣兵打定萧铣，杜伏威亦来降，其余割据一地方的，虽然很多，都不曾费什么兵力。隋朝平陈后，共三十年而亡；隋亡后不过五六年，国内又平定了。

唐初到开元的治乱

唐高祖起兵后九年，传位于世民，是为太宗。太宗是个贤明英武的君主，任用房玄龄、杜如晦为宰相，时人号为“房谋杜断”。又有魏征，能直言谏诤，他多听从。所以在位时，政治清明，国内太平，武功亦盛。世称“贞观之治”。

评唐太宗

汉、唐并称中国盛世。贞观、永徽之治，论者以比汉之文、景，武功尤远过之；然非其时之君臣，实有过人之才智也。唐太宗不过中材。论其恭俭之德，及忧深思远之资，实尚不如宋文帝，更无论梁武帝；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，更无论宋武帝、陈武帝矣。若高祖与高宗，则尤不足道。其能致三十余年之治平强盛；承季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久乱之后，宇内乍归统一，生民幸获休息；塞外亦无强部；皆时会为之，非尽由于人力也。（《隋唐五代史》上册，第66页）

太宗在位二十三年，死后，子高宗继立。初年遵守太宗的遗规，政治亦颇好。后来宠信武后，任其干预政事，治迹遂衰。高宗死后，武后废其子中宗而立睿宗。旋又废之自称皇帝，改国号为周。武后自高宗时判决奏事，至称帝，先后五十年，年八十二，才因老病，被宰相结连卫兵，胁迫她退位，而使中宗复位。武后也算得一个奇才。惜乎专图扩张权势，滥施爵禄，以收买人心；又用严刑峻法，以图遏止反抗，受害的人很多。外患亦亟，国威几乎坠地。中宗复位后，宠爱皇后韦氏，任其所为。韦后也想学武后的样子，而才具不及，中宗为其所弑。睿宗的儿子隆基，起兵定乱，奉睿宗即位。不久就传位于隆基，是为玄宗。中宗时，政界污浊的情形，较武后时更甚。直到玄宗出来，任用贤相姚崇、宋璟、张九龄。姚能治事，宋为人方正，张亦

能直言；竭力整顿，政治才复见清明，世称“开元之治”。玄宗在沿边设立节度使，加重其兵权，镇服四裔，唐朝又见兴盛。然边兵既重，而玄宗在位岁久，又宠信杨贵妃，怠于政事；开元以后，就变成天宝之乱了。

评武后

武后以一女主，而易姓革命，开旷古未有之局，论者多以为奇，其实无足异也。专制之世，政权谁属，人民本不过问；天泽之分既严，称兵废置，往往有反叛之嫌，苟非握大权，拥强兵，自度全国莫能与抗者，亦多不敢为是；此历代篡夺之主，所以获安其位也。母后临朝，有帝王之实者，本自不乏，特未尝居其名耳。武后在高宗时，盗窃政柄，已余二十年，其形势，又非她临朝摄政者比，实既至矣，易其名何难？特视其欲不欲耳。武后为纵恣而无忌惮之人，有以旷古未有之局歆之者，自将试为之，而革命之局成矣。若谓皇帝之名，本无足歆，居之，徒足招人讥议，且授人以攻击之柄而自蹈危机，何必为是？则试问至二十世纪，皇帝之名，更何足歆？袁世凯何以犹冒不韪而为之，以致身败名裂乎？从来居权势之地者，多无学识，亦罕能深思远虑，不能以读史者之见衡之，求之深而反失之也。（《隋唐五代史》上册，第123页）

第十九章

隋唐之武功与对外交通

中国之史，非徒中国一国之史也，东方诸国之盛衰兴替，盖靡不苞焉，即世界大局之变动，亦皆息息相关，真知史事之因果者，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。此其故何哉？世界各民族，因其所处之境不同，而其开化遂有迟早之异，后起诸族，必资先进之族之牖启，故先进之国之动息，恒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。先进之国，在东方为中国，在西方则在地中海四围。东西民族之动息，亦各有其时，月氏、匈奴，皆自东徂西者也；铁勒、突厥、回纥、沙陀、黠戛斯，则自西徂东者也。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，实在唐世，读隋唐、五代史者，于此义亦不可不知。

隋唐时域外的形势

隋唐是武功昌盛的时代，要说这时代的武功，先得把当时域外的形势，作一个鸟瞰。北族从鲜卑侵入中原后，继其后的为铁勒。鲜卑的分部柔然，利用他和北魏相抗。南北朝末年，柔然衰了，为起于阿尔泰山的突厥所灭。周、齐分争，怕突厥和敌人连合，都很敷衍他。突厥因此益骄。西域诸国，两晋时代，国交上无甚关系（只有前秦时代，曾遣吕光征服西域诸国，然未及旋师，苻坚已在淝水战败；吕光自立为后凉国，亦不久即亡），然其人来到中国的很多，商业上的往还亦很盛（当时称西域人为胡，历史上所谓胡人的，大都是西域人。甘肃省西北部，始终是中国和西域互市的地方）。尤其是佛教，从西域输入的不少。南北朝时，大月氏已被印度笈多朝所灭，嚈哒继兴。［嚈哒二字，就是月氏的转音。自大月氏灭亡后，月氏余种，仍留在吐火罗（古之大夏，今之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地方），又乘印度之衰而复起，且侵入印度。及为突厥所破后，印度乌苌王灭之］ 后来嚈哒

又为突厥所破，从天山北路向西，直抵欧洲，中间包括巴尔哈什湖、咸海、里海区域都服属于突厥。

在朝鲜半岛上，当西汉末年，汉族的威力，渐渐失坠。其地的土著民族，自立为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三国。到三国时代，汉族的威力，渐渐失坠。东晋时，前燕侵入中原后，辽东空虚，遂为高句丽所占，对中国颇为桀骜。百济也和他联合，共攻新罗，新罗却是倚赖中国的。热河境内为鲜卑遗族奚、契丹所据。吉、黑两省：松花江、乌苏里江流域，是靺鞨所据；黑龙江流域，是蒙古人的祖先室韦所据。青海境内，和四川的北部，是前燕慕容廆的庶兄—吐谷浑在西晋时侵入的，并征服其地的羌人。雅鲁藏布江流域，有印度阿利安人侵入，为吐蕃之祖。（《唐书》所说吐蕃的起源，是传闻之辞，不足为据。此说系西藏人自述之辞，该可信些。参看拙撰《中国民族史》第十二章）

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在唐世

中国之史，非徒中国一国之史也，东方诸国之盛衰兴替，盖靡不苞焉，即世界大局之变动，亦皆息息相关，真知史事之因果者，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。此其故何哉？世界各民族，因其所处之境不同，而其开化遂有迟早之异，后起诸族，必资先进之族之牖启，故先进之国之动息，恒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。先进之国，在东方为中国，在西方则在地中海四围。东西民族之动息，亦各有其时，月氏、匈奴，皆自东徂西者也；铁勒、突厥、回纥、沙陀、黠戛斯，则自西徂东者也。黠戛斯虽灭回纥，而未能移居其地，西方东略之力，至斯而顿，而东方之辽、金、元、清继起焉。辽之起，由其久居塞上，渐染中国之文明，金、元、清则中国之文明，先东北行而启发句骊，更折西北行以启发渤海，然后下启金源，伏流再发为满洲，余波又衍及蒙古者也。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。五胡乱华之后，隋唐旋即盛强，而沙陀入据之后，则中国一厄于契丹，再厄于女真，三厄于蒙古，四厄于满洲，为北族所弱者几千年，则以铁勒、突厥等，皆自西来，至东方而其力已衰，而辽、金、元、清则故东方之族类也。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，实

在唐世，读隋唐、五代史者，于此义亦不可不知。（《隋唐五代史》上册，第4页）

隋朝的武功

隋文帝得天下后，用外交手段离间突厥的大可汗及其主西方的可汗，突厥由是分为东西。东突厥给隋朝征服，西突厥至炀帝时亦来朝。炀帝曾发兵侵掠吐谷浑，在青海附近，设立四郡，又招致西域诸国，前来朝贡。戍守和供帐，所费不赀。又发大兵亲征高句丽，被高句丽打败。再发大兵往征，到第三次，才得高句丽请降的虚名。而天下骚动，内乱遂起了。

炀帝纵侈，裴矩罪不可恕

炀帝之事四夷，始于西域，导之者裴矩也。矩于外交，不可谓无才，然时边方无衅，勤远略徒以劳民；炀帝之纵侈，矩宁不之知，顾又长逢其恶；其罪实不可恕也。（《隋唐五代史》上册，第33、34页）西域诸胡，则本和中国无大关系。他们大抵为通商而来。在两利的条件下，不失怀柔远人之意就好了。而炀帝动于侈心，任用裴矩，招致西域诸胡，沿途盛行供帐。甚至有意使人在路旁设了饮食之肆，邀请胡人饮食，不取其钱，说中国物力丰富，向来如此的。胡人中愚笨的，都惊叹，以为中国真是天上。其狡黠的，见中国也有穷人，便指问店主人道：你这白吃的饮食，为什么不请请他们？店中人无以为答。如此，花了许多钱，反给人家笑话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上册，第166—167页）

唐初的武功

隋末大乱，突厥复强，群雄在北边的，都称臣奉贡。唐高祖亦曲意和他联络，唯突厥侵寇仍不绝。太宗即位后，于六三〇年，遣李靖把他灭掉。西北诸君长，共上太宗“天可汗”之尊号。铁勒诸部中有薛延陀，继居漠北，又被太宗遣李世灭掉。回纥再居其地，就很恭顺中国

了。对于西域：太宗曾征服天山南路诸国，西突厥则到六五七年，才被高宗遣苏定方灭掉，中国的属地，就直达波斯（今伊朗）。

唐高祖曾称臣突厥

历代为中国患的，莫甚于北狄；而所谓北狄，尤以起于蒙古地方的，最为切近。隋唐时代，在这方面的，为突厥、回纥。当隋时，曾乘突厥内部的分离，运用外交手腕，一度使之臣伏。然及隋末，突厥之势又强。当时起于北方的群雄，都称臣于他；即唐高祖亦所不免（此事唐时的史官，已隐讳掉。所以在历史上，没有正式的记载。只在《突厥传》里，太宗既灭突厥之后，口里露出一句，说：从前太上皇为生灵之故，所以“奉突厥，跪而臣之”）。不过此时高祖并非中国的共主，不能代表中国国家，算不得中国的耻辱罢了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第118、119页）

东北诸族，奚、契丹、靺鞨、室韦等，亦都来朝贡。西南则吐蕃盛强，侵犯四川西边。太宗发兵把他打败。旋许其请和，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。公主好佛，吐蕃开始接受汉化，信仰佛教。其时北印度的乌苌国强盛，唐僧玄奘前往游学，对他盛称太宗威武，乌苌王就遣使来朝，太宗命王玄策往使，适乌苌王死，权臣篡国，发兵拒玄策。玄策发吐蕃、泥婆罗的兵（现在尼泊尔之地），把他杀败，擒送阙下，这是中国兵威，对西南所至最远的一次。只有高句丽，太宗自将往讨，仍未能得利，直到高宗时，才遣苏定方灭百济，遣李（避太宗讳，去世字）灭高句丽。日本派兵来救百济，被刘仁轨同新罗王大败之白村江口（在朝鲜全罗道），这些征服和来降的国或部落，唐朝都就其地设立都督府、州，即以其君长为都督、刺史，听其自治，是为羁縻府、州。唐朝另就边要地方设立“都护府”，或“都督府”，驻兵防卫，加以管理。

唐玄宗时的武功

唐朝的武功，到高宗时而达于极盛。然吐蕃的猖獗，亦起于此时，青海和西域两方面，都很受其扰害；突厥遗族，亦时有反侧。到武后时，突厥竟复有唐初的疆域，契丹也叛变过一次，河北大受蹂躏。玄宗即位后，才把吐蕃打退，恢复黄河上游之地，东突厥亦于七四四年再为中国所灭，从此不能复振了。

隋唐的对外交通

对外的交通，可分水陆两路说。陆路：在隋朝时候，通西域的路共有三条，（一）自天山北路出黑海与里海间抵欧洲。（二）出葱岭到波斯。（三）出葱岭到北印度。唐时，又加（四）从安南经云南、缅甸到印度的一条路。（五）从这条路上，还可分支达柬埔寨，和海路衔接。海路：欧洲和中国是久有交通的。据阿剌伯人的记载：公元一世纪后半，西亚细亚的商船就达后印度半岛。第三世纪，中国商人，渐次西航，由广州达槟榔屿，四世纪到锡兰，五世纪到亚丁，终至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，独占商权。当时的狮子国（今锡兰），实为世界商业的中心，中国人、印度人、马来人、波斯人、犹太人等诸民族经商者，都荟萃于此，直到七世纪末，阿剌伯人才代之而兴（据梁启超《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》）。故在八世纪初期，因他们直航中国，其时广州、杭州、泉州诸地，又成为东亚的贸易中心。然则盛唐之世，正是中国和阿剌伯海权交替的时代了。南洋群岛，隋唐时代，来朝贡的亦颇多。隋炀帝曾一度用兵于流求，那就是现在的台湾了。（见《北史·流求国传》，又《隋书》已有流求之名。该书云：“自鼊鼊屿一日便至。”则当指今之台湾。又《元史》云：“流求在南海之东，漳、泉、兴、福四州界内，澎湖诸岛与流求相对，天气清明时望之，隐约如烟如雾。”可知元明前，犹指台湾为流求）

第二十章

隋唐之政治与学术

秦汉时的宰相，是有相当的权力，而地位亦颇尊严的。然自武帝以后，其权已渐移于尚书；曹魏以后，又移于中书；刘宋以后，又参以门下。至唐代，遂以此三省长官为相职。总之，政治上正式的机关，其权恒日削，而皇帝的秘书和清客一类的人，其权恒日张。外官的变迁正相反。内官的权限，日趋于轻；外官的权力，却有日趋于重之势。“三老”“啬夫”“游徼”，都是自治职。秦汉而后，日益废坠，至隋唐而荡焉。其故则由于民能自治，与君主专制不相容也。考试的法子，到唐代而其法才大备。然有考试的好法子，而所考的都是无用的东西，却是可惜了。租庸调法，不夺其私有之田，无田者则由官给，以渐平均地权，其立法之意诚甚善，而其所主张的方法，则有未善。这因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，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，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。

隋唐政治概观

隋唐的政治制度，是承袭魏晋、南北朝的。西汉的政治制度，沿袭秦朝；秦朝的制度，虽为古今官制上的一大变局，也有多少从列国遗留下来的成分在内。所以从东汉以后，就渐起变迁。魏晋、南北朝，都是承着这个趋势的。隋唐时代，乃因既成的事实，而加以整理。

隋唐的官制

秦汉时代，相权颇重，到东汉则渐移于尚书，曹魏时又移于中书，刘宋时又移于侍中。隋唐时代，乃以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为相职（侍中为门下省的长官）。中书和皇帝面议办法，门下省加以审查，由尚书省行下去。尚书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统辖诸司，各为

全国所职掌的最高行政机关。各机关分立，处事虽极精详，不免嫌其迟滞，所以后来，三省长官，不大除人，但就他官，加一个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等名目，其人就算宰相。实际上，中书、门下两省，亦是先行合议的，并非事后逐件审查。御史一官，其初该是帮皇帝看文书的。看文书要审查其办法的合不合，所以后来变为弹劾之官，在隋唐时亦很有威权。

历代相权之变迁

秦汉时的宰相，是有相当的权力，而地位亦颇尊严的。然自武帝以后，其权已渐移于尚书；曹魏以后，又移于中书；刘宋以后，又参以门下。至唐代，遂以此三省长官为相职，而中书、门下，尤为机要。后来两省长官，不复除人，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，即为宰相。其事务，则合议于政事堂。政事堂初在门下省，后移于中书省。宋元之世，遂以中书省为相职。中书、门下等官，其初起，虽是天子的私人，至此其权力又渐大，地位又渐尊了。明世，乃又废之而代以殿阁学士。清代，内阁之权，又渐移于军机处。总而言之，政治上正式的机关，其权恒日削，而皇帝的秘书和清客一类的人，其权恒日张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49页）

外官：从汉末州郡握兵后，中央的权力，总不甚完全（参看本书第十一、十五章）。两晋以后，喜欢侨置州郡（譬如现在辽宁省，为日本强占，辽宁省的人有逃到河北的，就在河北省里设一个辽宁省，就是所谓“侨置”。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，还未完全脱离属人主义的原故），州的疆域，就渐次缩小；后来竟至与郡相等，隋唐时乃并为一级，于其上设置观察等使，仍为监察之官。

内官日轻，外官日重

外官的变迁，则和内官正相反。内官的权限，日趋于轻；宰相九卿等，有独立职司的官，职权多见侵夺。外官的权力，却有日趋于重之势。秦汉时代的两级制（郡县），到汉末改设州牧，就变成三级制。

隋朝统一以后，当时的所谓州，已经和前此的郡，区域大小，并无分别了。于是把州、郡并做一级。唐朝也沿其制，而于其上再设一个道的区域。以后，把天下分做四十余道，各置观察使。这种使官，都称为监司之官。他的责任，只是驻于所察诸郡中的大郡，访察善恶，举其大纲，并不直接理事，颇和汉朝刺史的制度相像。然而到后来，往往侵夺州郡的实权，州郡不敢与抗。而且这时候，已经是军人的世界了。有军马的地方，就都设了节度使。凡有节度使的地方，任凭有多少使的名目，都是他一个人兼的。于是中央政府，毫无实权，可以管辖地方，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二册，第42—43页）

秦汉时，县大率方百里，每十里为一乡。每乡都有“三老”管教化；“啬夫”管收税，听讼；“游徼”管巡查，禁止盗贼，这些都是自治职。实际上，县令等于古代一国之君，一切民政，要他直接办理，是来不及的，全靠这种自治职，能够实心办事，政治才得推动。汉朝此等自治职，地位还很高；也真有相当的权力，能够办事。魏晋以后，此等规模，却渐渐废坠了。这是中国政治，所以废弛的一个大原因。

地方自治与君主专制不相容

盖中国自治之废，既千余年矣。（秦汉而后，日益废坠，至隋唐而荡焉。其故则由于民能自治，与君主专制不相容也）民间利害切己之事，虽多出于自谋，特由政治疏阔，官不为谋，无可如何而然，非法之所许也。唯其非法之所许也，则人民于自治之权，失之已久，一旦授之，未必遂能自有。又向之自治，出于人民之自谋，则必其智之所及，智及之，力自足以监察之。且其所举至简，则亦无利可图，而事非法之所许，则又无权力可藉，故虽不能兴大利，尚不至转蒙其害也。（《本论》，写于1916年，见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上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291页）

隋唐的选举制度

学校，只有在西汉时代，真是学问的重心。因为其时社会的程度还低，研究学问的人，究竟不多，学者求师和求书都难，所以各地方的人，真有到京城里去求学的。（据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十六“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”条，但东汉时代，私人讲学已盛，赵氏之说，实在只可指西汉）东汉以后，情形就渐渐的变了。三国以后，则学校有名无实，不过是贵族或读书人的一条猎官的捷路，而人才的拔取，就移到科举。科举的前身是汉朝的郡国选举，是不加考试的。于是请托、运动等弊端百出。后汉以后，考试的法子，就渐次兴起，然都不是常行的。直到唐代，而其法才大备。唐朝的法子，是会应试的人，先向地方官报告；地方官加以考试，择取合格的，送进京城；由礼部再加考试，这是举士，称为“乡贡”。“乡贡”以外，别有制举，由帝王亲自主试，甄拔非常的人才。又举士与举官不同，前者不过得到一种国家承认的出身，后者才能由国家授以官禄，是由吏部主试的。关于举士所设的科目甚多，常行的为明经、进士两科。明经试经书，只重记诵；进士试诗、赋，更不切实用。有考试的好法子，而所考的都是无用的东西，却是可惜了。

科举与考试不可混为一谈

科举制度，所考的东西，有用无用，是一个问题；考试制度本身的好坏，又是一个问题。帖经、墨义和诗赋，虽然无用，论考试制度的本身，确实是公平的。因有科举制度，所以能够逐渐将等级铲平；因有科举制度，所以人民向学的，不待劝勉而增多。这都是科举制度，给予我们的好处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二册，第23页）世之论者，率多混科举与考试为一事。因科举之有弊，遂并考试而不敢言。殊不知科举之弊，在于所试之非其物，而不由于考试。考试之法，唯有一弊，必不可免者，即应试者之所学，但求其足以应试而止，他皆不问。王安石变法之后，所以叹“本欲变学究为秀才，不图变秀才为学究”也。然使所试者为有用之事，则应试者终必略有所知。苟去其所试之物，而保留考试之制，夫固未尝不可行，且行之而必有利者也。（《考试论》，原刊《光华期刊》1928年第2期）

隋唐的兵制

隋唐的兵制，是很为有名的，就是所谓府兵。府兵之制是起于北周的，到唐朝而更为完备。其制：于重要的去处，设立折冲府，有折冲都尉以下许多武官；百姓名隶兵籍的，都属于折冲府，以农隙教练，有事时征集，命将统率出征；事罢归来，依旧各归其府。这一种制度，没有养兵之费（不过隶名兵籍的，也要“蠲其租调”），而可以得多兵之用；兵无屯聚之患，亦不至无家可归，难于遣散；确自有其优点。惜乎承平既久，有名无实。到玄宗时，连皇帝的卫兵，都调不出来，而要改用募兵了。

中国历史上的“兵”

唐朝的兵制，也是沿袭南北朝的。近人南海康氏说：“中国承平的时候，可以算是没有兵。虽然有唤作兵的一种人，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，如以壮观瞻等，并不是要他打仗。”这句话最通。秦汉时代，承袭着战国的余风，全国还有些尚武的风气；东汉而后，就渐渐显出无兵的样子了。从五胡乱华起，到南北朝末止，却可以算得一个长期战争，其中东、西魏（周、齐）对立的时候，竞争尤其剧烈；所以产出一种略为整齐的兵制。有名的“府兵”制，是起源于后周的。到高宗武后时，久不用兵，府兵法就渐坏，至于宿卫不给。宰相张说，就请募兵宿卫，谓之“彍骑”。玄宗时，这种宿卫的兵，也是有名无实，诸府又完全空虚，内地竟无一兵，而边兵却日重。所以安禄山一反，竟无从抵御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二册，第48、49页）

隋唐的法律

中国的法律，是定于晋、唐两朝的；刑法则定于隋朝。秦朝所用的法律，是战国时魏国宰相李悝所编的《法经》，共只六章（李悝所作《法经》，共六篇：曰《盗法》《贼法》《囚法》《捕法》《杂法》及《具法》是），不够应用，汉时乃逐渐增加。专制时代，命令是和法律有同等效力的；成案则当时名为“比”；亦可引用，条文既已繁

多，编纂又极错乱，奸吏遂得上下其手。汉时屡有编纂之议，始终未能成功。晋初，才编成一部有条理的《晋律》，此法历代相沿，《唐律》也是以《晋律》为本的。唐以后编纂法律的，有金、明、清三朝，都以《唐律》为本，《清律》又沿袭《明律》。所以中国从采用西洋法律以前，历代的法律，可以说根本上是相同的。

至于刑法：则古代本称“伤及身体”为刑，和“死”为对称。因为死亦是伤害身体的，所以又称死为“大刑”。拘禁及罚作等，皆不称为刑。儒家说：古代风俗淳朴，用不着刑罚，只要有一种办法，叫犯罪的人，觉得羞耻就够了。如犯死罪的人，叫他穿一件无领的衣裳就是。这种办法，儒家称为“象刑”，因又称伤及身体的为“肉刑”。汉文帝曾把肉刑废掉，死刑之外，只留髡、笞两种。然笞法实际多至死亡，“髡法则又仅剔其毛发”，不足以资惩创，所以刑罚轻重，很难得其平（此说根据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刑考序》）。周、齐时，徒、流之法，才渐次兴起。到隋时，乃定以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为五刑，各分等级，从此以后，也就历代相沿了。

隋唐的赋税

当两汉时代，儒家鉴于地权的不平均，也有想恢复井田的，也有想限民名田的，已见本书第十四章。后来此两法都没有能实行，乃又有一种议论，说井田之制，宜于大乱之后，人口减少，土田无主时推行。晋武帝平吴之后，乃定一种户调式。因男女、老幼，以定授田的多少。户调式定后，国内不久就乱了，究竟推行至如何程度，现已无从稽考。北魏孝文帝定均田令，授田之法，也和晋朝相同，又举出露田和桑田的区别。露田是受之于官，也要还给官的，桑田则许其私有。唐时，将官授的名“口分田”，私有的名“世业田”，世业田以二十亩为限。多的，可以出卖，而不得卖其应有之数；不足的可以买进，亦不得超过定限。田多，足以计口分授的谓之“宽乡”；不够的谓之“狭乡”。狭乡受田，较宽乡减半。肯从狭乡迁到宽乡，是有补助的（许其卖口分田，就是以卖价补助其迁移费的意思）。

其取于人民的：则农田所出的谷物谓之“租”，为公家服役谓之“庸”，随其地之所产出丝、麻及其织品谓之“调”。这就是有名的租庸调法。此法的用意，诚然很好，但不易严密执行；后来，官吏管理逐渐懈弛，加以豪强的兼并，天灾兵乱的相继，到唐朝中叶，册籍既坏，人民多逃亡，租庸调旧制，遂不能行。德宗时，杨炎为宰相，以公元七八〇年改行两税法。凡人民，只就现居其地的立为簿籍，不问年纪大小，但以贫富定纳税的多少，分夏秋两季征收。这两税法从那时行起，上下称便，历五代而至宋明，颇能继租庸调之废而适应需要。

立意虽佳，方法未善

统观三法（晋朝的户调式，北魏的均田令，唐朝的租庸调法），立法之意，是不夺其私有之田，无田者则由官给，希冀减少反抗，以渐平均地权，其立法之意诚甚善。然其实行至何程度，则殊可疑。即使实行了，而人总是有缓急的，缓急的时候，不能不希望通融，在私产制度之下，谁肯白借给你来？救济的事业，无论如何，是不能普遍的。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。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，无物可以抵卖的。如此，地权即使一度平均，亦很难维持永久。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？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，不论事实，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收效的了。中国历代，社会上的思想，都是主张均贫富的，然其宗旨虽善，而其所主张的方法，则有未善。这因历代学者，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，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。在中国，思想界的权威，无疑是儒家。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，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，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96、97、101页）

隋唐的学术

从魏晋以后，讲经学的人，渐渐流于繁琐。只注意于一事一物的考证，而于大义反非所问。南北朝以后尤甚。唐朝的啖助，讲《春秋》才不拘三传，而自以其意求之于经。（三传，谓《左氏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，都是解释《春秋经》的）道、佛两教，从魏晋以后，逐渐

兴盛，几乎要夺儒家思想之席。唐朝的韩愈，做了一篇《原道》，对于佛老，力加排斥。这都是宋朝学术思想的先驱。

讲史学：则（一）唐朝人搜辑当时史料，编纂当代历史的风气颇盛（关于这一个问题，可以把拙撰《史通评》外篇第二做参考，页七五至八七，商务印书馆本）。（二）中国历代，每后一朝兴起，必修前一代的历史。现在所谓正史，大抵是如此修成的。从南北朝以前，都是一个人独力修纂（就官纂的也是如此，可参看《史通·古今正史篇》），唐朝才开“合众纂修”之局。虽然见解的高超，体例的划一，不如私人所修的，材料却收集得多了。（三）前此作史的人，不大讲史法。到唐朝则有刘知幾著《史通》，对于这一个问题，专门加以研究。（四）又有杜佑著《通典》，专记历代的制度，也是开宋朝史学兴盛的先声的。

刘知幾与《史通》

自司马迁以后，史学界有许多名家，不过觉得史料要保存，要编纂，以诒后人而已，编纂的方法如何，加以研究的很少。到唐朝的刘知幾，才于此加以检讨。据《唐书》的《刘知幾传》，和他同时，怀抱相类的思想的，有好几个人，可见这是史学上进化自然的趋势，刘知幾只是一个代表。他著了一部《史通》，对于古今的史籍，加以批评。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两种，评论其可称为正史的，共有几家；其体裁适用于后世的，共有几种。对于材料的去取，以及编制的方法，文辞的应当如何，都一一加以研究。实为作史方法的一个大检讨。（《历史研究法》，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，第21—22页）

隋唐的文艺

魏晋、南北朝时，骈文愈做愈趋于靡丽，太不切实用了，于是反对的声浪渐起，尤以周、隋两朝为甚，然习惯既久，一时变不过来。直到唐朝，韩愈、柳宗元，才做成一种新式的文学。他们这种文字，是不学东汉以后，而以西汉以前为法的，所以自称为“古文”。又或称

为“散文”。而对于四六对仗称为“骈文”。从此以后，就骈散分途，各适其用。

韩、柳的古文改革

从齐、梁以后，文字日趋于绮靡，以致不能达意。在此种情势之下，欲谋改革，有三条路可走：其（一）是废弃文言，专用白话。唐代禅家的语录，以及民间通行的通俗小说（《敦煌石室书录》，有《唐太宗入冥记》《伍子胥故事》等书），就是从此路进行的。此法在从前尚文之世，不免嫌其鄙陋。而且同旧日的文章，骤然相隔太远，其势亦觉不便。所以不能专行。其（二）则以古文之不浮靡者为法。如后周时代，诏令奏议，都摹拟三代是。此法专模仿古人的形式，实亦不能达意，而优孟衣冠，更觉可笑。所以亦不可行。第（三）条路，则是用古人作文的义法，来运用今人的语言。如此，既不病其鄙陋，而又便于达意。文学的改革，到此就可算成功了。唐时，韩愈、柳宗元等人所走的，就是这一条路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上册，第187页）

诗在唐朝，算是极盛的。古代文字，不分四声。梁、陈以后，才渐渐讲求，于是诗和文都生出律体。不论诗文，调平仄的，都可以称为律。诗的律体，是到唐朝而大成的。又诗的根本，是从歌谣而来，所以多长于“比”“兴”，含蓄不露，到唐朝人才特长
于“赋”（“赋”“比”“兴”是作诗的三种法子，见在《诗经》第一首的《序》里。“兴”是因此而及彼，如见名花而思美人。“比”是以此喻彼，如以名花比美人。“赋”是实写，如描写名花或美人的艳丽），其中最著名的，如杜甫的诗，描写天宝乱离的情形，十分详尽，后人至称为“诗史”。白居易《新乐府》，描写当时社会上、政治上种种黑暗的状况，也是很能够动人的。中国古代的音乐，汉以后渐渐失传，已见本书第十四章。却是魏晋以后，汉武帝时的新声，又渐渐失传了。只有一部分，还保存于南朝。北朝则从外国输入的音乐，流行特盛。隋时，称南朝的旧乐，从外国输入的为燕乐。新乐日盛，而旧乐渐渐

式微。根据此等音乐的声调所做成的作品，谓之词。唐朝人开其端，至五代而渐盛。通俗的文艺，是到宋以后才盛行的，然其端亦开于唐朝。唐人有所谓“变文”，系将故事演变而成，如《大舜至孝》《目莲救母》之类；又有所谓“俗文”，则是将佛经翻成通俗文字的，这是后来平话的起源；又有佛曲及劝世诗，亦为后世宝卷、弹词之祖。

论唐诗

论唐诗者，或分为初、盛、中、晚四期。初唐之浑厚，盛唐之博大，中唐之清俊，晚唐之纤丽，可谓各擅胜场。（《隋唐五代史》下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117页）唐宋诗相较，自以唐诗为胜。以唐诗意在言外，而宋诗意尽句中。唐诗多寓情于景，宋诗或舍景言情。诗以温柔敦厚为宗，自以含蓄不尽为贵。宋诗非不佳，若与唐诗并观，则觉其伧父气矣。然宋之变唐，亦有不得不然者。无论何种文字，皆贵戛戛独造，而贱陈陈相因。唐诗初、盛、中、晚，各擅胜场。在彼境界之中，业已发泄殆尽。率此而往，其道则穷。故宋人别辟一境界。虽不能如唐诗之浑厚，然较诸因袭唐人，有其形而无其质者，则有间矣。（《宋代文学》，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，第47页。）

书法：在南北朝时，南人是擅长真书和行、草的，北碑则犹存分、隶古意。隋碑结构严正，而笔画渐趋妍丽，已能兼两派之长。唐人擅长书法的尤多，如欧、虞、颜、柳等（欧阳询、虞世南、颜真卿、柳公权），至今写字的人，还奉为模范。南北朝时，山水画渐渐兴起，到唐朝而更盛。其中王维的画，专取清微淡远；李思训的画，则注重着色，钩研成趣。所以李、王二人又为后世山水画“南北宗”之祖。人物画，亦因受佛画和雕刻的影响，较之古代的画风，更形工巧。

第二十一章

隋唐之社会与宗教

经过三国到南北朝长期的战乱而复见统一，国内太平，兵革不作，自然社会要欣欣向荣了。隋唐五代，为风俗侈靡之世，盖承南北朝之后，南方既习于纵恣，北方又渐染胡俗也。中国文化和富庶的重心，两汉时代，还是在北方的，三国以后，南方虽亦有战事，究竟平安得多。又自五胡乱华以来，北方人纷纷南迁，学术、技艺等，都随之而输入南方。南方的文化和富庶就大形发达，骎骎驾于北方之上。因为中外交通的繁盛，外国宗教，多有输入中国的。中国的文明，在各方面都颇充实的，唯在宗教方面，则颇为空虚。此由中国人注重于实际的问题，而不甚措意于玄想之故。信教既不甚笃，则凡无害于秩序和善良风俗的，都可以听其流行。所以在政治上、社会上，都没有排斥异教的倾向。

隋唐初年的富庶

经过三国到南北朝长期的战乱而复见统一，国内太平，兵革不作，自然社会要欣欣向荣了。果然，在隋文帝时，虽然统一未久，国内已见富庶的气象，虽经隋末的丧乱，然到唐太宗初年，又有“行千里者不赍粮，断死刑岁仅二十九人”的盛况了。（见《唐书·食货志》）

隋唐五代为风俗侈靡之世

隋唐五代，为风俗侈靡之世，盖承南北朝之后，南方既习于纵恣，北方又渐染胡俗也。史家极称隋文帝之恭俭，谓其令行禁止，上下化之，举开皇、仁寿之间，丈夫不衣绫绮，而无金玉之饰为证。此亦庶僚为然耳，居高明者，奢纵曷尝少减？如杨素即其一也。贺若弼，史称其家珍玩不可胜计，婢妾曳罗绮者数百，功名之士如此，下焉者可

知。（唐）太宗虽享美名，实亦奢侈，高宗以后愈甚，至武后而大纵。玄宗初，颇有志惩革，后乃变本加厉。如王琚，史言其著勋中朝，又食实封，典十五州，常受馈遗，下檐帐设，皆数千贯。作造不遵法式。每移一州，车马填路，数里不绝。携妓从禽，恣为欢赏，垂四十年焉。此等人而亦漫无裁制，能无速天下之乱乎？至于武人，则尤不可说。郭子仪，元勋也，史称其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。又不必武夫也。《旧书·杜亚传》曰：出为淮南节度，承陈少游之后，淮南之人，望其铲革旧弊，而亚自以才当公辅，连出外职，志颇不适，政事多委参佐。招引宾客，谈论而已。又盛为奢侈。江南风俗，春中有竞渡之戏，万舟并进，以急趋疾进者为胜。亚乃令以漆涂船底，贵其速进。又为绮罗之服，涂之以油，令舟子衣之，入水而不濡。亚本书生，奢纵如此。然则所谓书生者，又岂大愈于武夫哉？五代风气，更加横流溃决，不可收拾。（《隋唐五代史》下册，第721、722、723、724、725页）

南方文化经济的发达

中国文化和富庶的重心，两汉时代，还是在北方的，三国以后，北方经过长期的战乱，南方虽亦有战事，究竟平安得多。又自五胡乱华以来，北方人纷纷南迁，学术、技艺等，都随之而输入南方。南方的文化和富庶就大形发达，骎骎驾于北方之上。汉时建都长安，漕转关东之粟，到唐时，漕运却要仰给于江、淮了（唐朝的漕运，是跟着水的涨落走的，二月里发扬州。四月里自淮入汴。六、七月到黄河口。八、九月入洛水。中间有一节，水运不通，陆运以入于渭，直达长安）。

商业的发达

承平时代，商业本来容易兴盛。当时江、淮的商船，大的载重至八九千石，驾舟的至数百人，岁一往来，其利甚大。（见《唐语林补遗》）北至河、洛，南至闽、越，亦有不少商船。（唐朝刘晏说的话，见《旧唐书》卷九十四）九世纪中叶，政府用兵安南，艰于运

饷，有人献议，从长江下流用船运往，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从海路运粮之始。（说据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）然商人的运输货物，必已远在其前了。海路对外国的贸易，也极兴盛。（已见前一章）陆路自隋时已置互市监，管理西域的互市。唐时，又在广州设市舶司，以管理海路的贸易。

饮茶之习，起于三国时。（见《三国·吴志·韦曜传》）南北朝以前，还只行于南方，隋唐之世，渐渐普及全国。唐中叶以后，国家既收茶税，回纥也驱马市茶。（见《唐书·陆羽传》）又中国从前所谓糖，只有谷物制的。唐太宗时，才从北印度的摩揭它，输入造蔗糖的法子。（见《唐书》本传）这又是因商业兴盛，而影响到农、工业上了。唐朝陶瓷业亦最盛，尤以昌南镇的瓷，名闻全国。其后渐次发达，乃成名动全球之景德镇瓷器。（见吴仁敬等《中国陶瓷史》，商务印书馆《中国文化史丛书》本）

唐世茶药并称

茶至唐世，通行尤广，其贩运亦大盛。《新唐书·陆羽传》：羽嗜茶，著经三篇，言茶之原、之法、之具尤备。天下益知饮茶矣。当时贡献、赏赐、赠遗，无不以茶，而军中尤以为重。《新唐书·陆贽传》：贽陈西北边事，言“关东戍士，衣廪优厚，继以茶药，资以蔬酱”。《兵志》云：德宗时，边兵衣饷多不赡，而戍卒屯防，药茗、蔬酱之给最厚。诸将务为诡辞，请遥隶神策军，廪赐遂赢旧三倍，盖即据贽疏言之。兵士得茶，不必皆自饮，盖亦可以鬻卖换易？凡饮食之物，有刺激之性者，人多谓其可以治病，古之酒，明末之烟则然。茶之初兴，盖亦如此？故唐世尚与药并称。此亦人竞求之之一端欤？（《隋唐五代史》下册，第801、802、804页）

隋唐时的宗教

因为中外交通的繁盛，外国宗教，多有输入中国的。波斯的拜火教，从北周时输入，谓之胡天，后来又造了一个祆字。唐时，波斯为大食

所灭，拜火教徒，在西方颇受压迫，因此东来的更多。基督教即景教，为波斯人阿罗本所输入。公元六三五年到长安，太宗许其造寺，后来改称大秦。又有摩尼教，武后时初来中国，其教为回纥人所信，唐中叶后，回纥人来的多了，摩尼教又随之而入，遍于江、淮诸州。［景教名义，因耶稣生时，明星出现，碑文有“景宿告祥”之语。祆字系从示从天，读他烟切。Zoroastrianism为波斯国教，立善恶二元，以光明代表净和善，黑暗代表秽和恶，所以崇拜火及太阳。摩尼教（Manichaeism）原出火教，亦行于波斯。景教是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安派（Nestorism），因创异说为同教徒所驱逐的。阿罗本（Olopen）系波斯人，从波斯来，所以初建寺时，名为波斯寺］祆教、景教、摩尼教，当时的人，谓之“三夷寺”。唐朝因为自己姓李，道教所崇奉的老子也姓李，尊为玄元皇帝，奉《道德经》为群经之首，特置“道举”，考取所举之人，在政治上很受优待，然尚不足与佛教争衡，三夷寺更无论了。但是回教亦于唐时输入，有隆隆直上气象。僧尼既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还要据有很大的田产，众多的奴婢；这都是财政和经济上损失，自然要引起反响，所以当八四五年武宗乘回纥的衰亡，就把他和“三夷寺”一同禁绝了。武宗死后，佛教旋即恢复。然（一）出世的议论，既渐为一般人所怀疑，（二）信仰的人多了，不能再讲高深的教理。于是各宗皆衰，只有不立文字的禅宗，和专门念佛的净土宗（净土宗的念佛，有“观”“想”“持名”三法。“观”，如观看佛像，“想”，如想象佛像，“持名”，就是口宣佛号，系使人心有所主，不致散乱的法子。现在所谓念佛，却只知道“持名”一端了），还流行着。佛教到这时候，在哲理上渐渐失其地位，而要有别种新哲学起而代之了。

中国佛教的特色

中国的文明，在各方面都颇充实的，唯在宗教方面，则颇为空虚。此由中国人注重于实际的问题，而不甚措意于玄想之故。信教既不甚笃，则凡无害于秩序和善良风俗的，都可以听其流行。所以在政治上、社会上，都没有排斥异教的倾向。而各种宗教，在中国都有推行

的机会。其中最发达的，自然要推佛教。佛教初输入时，大约都是小乘。中国的佛教，有一特色，便是大乘的发达。佛教在印度，日渐衰颓，所以大乘在印度的盛行，不过六七百年之谱。其余诸国，不能接受大乘教义，更不必论了。独在中国，则隋唐之间，小乘几于绝迹，而且诸宗远祖，虽在印度，其发挥精透，则实在我国，华严和禅宗皆然。天台宗则本为智者大师所独创，这又可见我国民采取融化他国文化的能力了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上册，第189—190页）

第二十二章

中国文化之东被

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源之地；他的文化，是对各方面都有传播的；而对东方的成绩，尤其良好。“水性使人通，山性使人塞。”中国古代文化的重心，在黄河下流，而从山东半岛航行向辽东，尤其便利，所以在先秦时代，东北已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了。从辽东再向东南拓展，就成为朝鲜的文明；再渡海，就达到日本。中国的文字、儒学、佛学，都是从百济输入日本的，而当丧乱之际，东北和半岛的汉人，避难出海的亦不少，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，如养蚕、建筑、酿造等，亦即随此等人而传入日本。

中国文化东被的原因

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源之地；他的文化，是对各方面都有传播的；而对东方的成绩，尤其良好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“水性使人通，山性使人塞”。中国古代文化的重心，在黄河下流，而从山东半岛航行向辽东，尤其便利，所以在先秦时代，东北已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了（说本日本鸟居龙藏《满蒙古迹考》，此书大可一看，尤其重要的，是第三十三章。陈念木译，商务印书馆本。又傅斯年等合著的《东北史纲》第一卷亦可看，商务印书馆寄售）。从辽东再向东南拓展，就成为朝鲜的文明；再渡海，就达到日本。

朝鲜和日本的文化

古代的朝鲜，本来就是箕子之后（箕子时的朝鲜国，现在不能知其在何处。大约是逐渐东北迁的。到燕开辽东郡时，朝鲜必已在半岛了）；汉时，半岛北部，又是中国的郡县；所以其文化，竟和中国一样；只是语言没有能够同化罢了（朝鲜、安南，沐浴中国的文化都极

深，始终没有完全同化，就是因为语言未能同化之故。可见语言为民族最重要的条件，爱护民族的人，决不可轻弃自己的语言）。日本和半岛交通，在半岛隶属中国时已然（见本书第十二章），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自立后，也还继续主从关系，而和百济的往来，尤其密切。中国的文字、儒学、佛学，都是从百济输入日本的，而当丧乱之际，东北和半岛的汉人，避难出海的亦不少，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，如养蚕、建筑、酿造等，亦即随此等人而传入日本。

论朝鲜的文化

东洋诸国承袭中国的文化，而程度较高的，自然要推还朝鲜和日本，而朝鲜的文化，实在还在日本之上，这不能因其国势陵夷，而日本曾一时强盛，遂妄生轩轾的。两民族的同化，最紧要的条件是语言，而文字即语言的扩大，所以看甲民族对于乙民族的文化了解深浅，只要看其在文学上了解的深浅，日本的汉学家，也都会做中国的诗文，然终于免不了所谓“倭臭”，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，朝鲜则绝无此弊。即此，便可见两国华化的深浅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，况且朝鲜日本，环境都和中国不同，所以其学术虽受之于我，而其所阐发，仅有为中国学者所不知的。（《到朝鲜去搜书》，原刊1945年11月6日上海《正言报》）

文化不能无偏弊，受其利者，往往并其弊而亦袭之。中国文化之弊，在于文胜而失之弱。自宋以后，陈义弥高，去事情弥远，其人又气矜之隆，黠者乘之，遂植党以自利，此其弊，韩人亦皆袭之，然文化之演进深者，虽有其弊，久之亦必有以自救。故中国虽迭扼于辽、金、元、清，至近世，又见侮于西方诸国及东方之倭，今也卒能却敌而中兴。韩国之获再建，亦其伦也。（《中韩文化叙》，原刊《中韩文化》1945年12月创刊号）

隋唐时代的中日交际

日本当三国时，其女主卑弥呼，曾遣使来朝，受封为亲魏倭王。东晋南北朝时，又数次遣使和南朝交通。其表文多自称倭王，再加一个都督某某等国诸军事、安东将军的称号，中国亦就照他的自称封授他。此等事，日本的学者，都不认为其王室所为。他们所承认的，则自公元六〇八年小野妹子的使隋始。这一次，已带着学生和僧人来。唐时，日本更专置“遣唐使”，从公元六三〇到八九四年，前后共计十九次。（据日本木宫泰彦《中日交通史》，陈捷译，商务印书馆本）日本自东晋以来，向与百济交通，由百济输入中国文化。东晋时，百济博士王仁携《论语》和《千字文》至日本，为日本有文字之始。唐时，日本留华学生，如吉备真备与日僧空海等创“平假名”与“片假名”，为日本拼音文字，此皆中国文化东被影响最大的。至于政治风俗，都模仿中国了。

渤海的兴起

高句丽灭后，余众北走，据地自立。（此事在公元六九六年，即武后万岁通天元年。反叛的人，《旧唐书》说是高丽别种大祚荣，《新唐书》则名乞乞仲象，而祚荣为其子。又说他是“粟末靺鞨附高丽者”。案旧时史籍所用“种”字或“种姓”字，都与姓氏、氏族相当，却与民族无涉。甲民族中人，归附乙民族后，往往称为乙民族之别种。粟末靺鞨，是归附高句丽很久的，故《旧唐书》有高丽别种之称；论其民族，自系靺鞨。至乞乞仲象，亦当有其人，而《旧唐书》漏未叙及。《新唐书》下文但称为仲象，则乞乞当系其姓，后来祚荣姓大，有人疑其系据中国文义自造的） 唐封为渤海王，遂建国，时在公元七一二年（唐睿宗先天元年）。其疆域包括现在的吉、黑两省，和清朝咸丰年间，割给俄国的地方；还有朝鲜半岛的一部。一切制度，亦都以中国为模范，和日本、高丽，都曾通过使节，直到九二七年，才为契丹所灭，前后共二百十五年。虽暂受契丹的羁绊，然其民族所开化，则已不可遏抑了。

第二十三章

唐之衰亡与五代之纷乱

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，虽和汉朝相等，其声威所至，或且超过汉朝，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，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，唐朝实非汉朝之比。玄宗时，府兵制度业已废坏，而吐蕃、突厥都强，契丹势亦渐盛。欲图控制、守御，都不得不加重边兵，所谓藩镇，遂兴起于此时，天下势成偏重。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，亦和汉朝不同。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，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，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。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，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。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，当其种类昌炽，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，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。

安史之乱

唐朝的兵威，虽然和汉朝一样盛，却有一点不同。汉朝的征伐，所用的多是汉兵，唐朝却多用蕃兵、蕃将。其初边庭没有重兵，玄宗为要对付吐蕃、突厥、奚、契丹，西北两边，兵力才重，而安禄山又以胡人而兼范阳、平卢两镇节度使，就酿成“天宝之乱”。安禄山的造反，事在七五五年，兵一动而河北、河南相继陷没，潼关不守。玄宗逃四川，留太子讨贼，太子即位于灵武，是为肃宗。安禄山是没有谋略的，所以唐朝得任用郭子仪，再借用回纥等国的兵，把两京收复。时安禄山已为其子所杀，唐兵围之于相州（今河南安阳县），势已垂下，而禄山之将史思明，降而复叛，就从范阳南下，杀败唐兵，再陷洛阳。唐朝又任用李光弼，和他相持，到七六一年，史思明又为其子所杀，才算把他打平。安、史乱后，河西、陇右（河西，今甘肃省黄河以西之地，余为陇右），都给吐蕃攻陷。回纥骄横异常，云南的南

诏国，又时有侵寇；藩镇遍于内地，中央行政的权力，不甚完整，唐朝的局面，就很难收拾了。

安史之乱之根源

安史之乱，皇室的腐败只是一个诱因，其根源是别有所在的。（一）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，虽和汉朝相等，其声威所至，或且超过汉朝，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，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，唐朝实非汉朝之比。汉武帝时，攻击匈奴，前后凡数十次；以至征伐大宛，救护乌孙，都是仗自己的实力去摧破强敌。唐朝的征服突厥、薛延陀等，则多因利乘便，且对外多用蕃兵。玄宗时，府兵制度业已废坏，而吐蕃、突厥都强，契丹势亦渐盛。欲图控制、守御，都不得不加重边兵，所谓藩镇，遂兴起于此时，天下势成偏重。（二）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，亦和汉朝不同。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，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，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。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，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。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，当其种类昌炽，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，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56、457页）

若论军事上的实力，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？汉朝对外的征讨，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，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。这以一时论，亦可使中国的人民，减轻负担，然通全局而观之，则亦足以养成异族强悍，汉族衰颓之势。安禄山之所以蓄意反叛，沙陀突厥之所以横行中原，都由于此。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，也和这有间接的关系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119页）

藩镇的跋扈

藩镇为患最甚的，是安、史余党，直到德宗时，才加以讨伐。其时平卢、天雄、成德三镇，连合拒命。卢龙本恭顺朝廷，后亦加入为乱，德宗发泾原兵东讨，路过京城，因赏薄作乱，奉朱泚为主，德宗逃到奉天（今陕西武功县），又逃到汉中，因兵力不够，只得赦其余诸

镇，专把朱泚打平。宪宗时，淮西尤为跋扈，宪宗用宰相裴度，坚持用兵，到底把他攻下，河北三镇（卢龙、成德、天雄），亦一时降服。然宪宗死后，旋即背叛，终唐之世，不能再取了。河北三镇以外，其余诸镇也时有背叛的，就不叛的，也总不免有些专横。而节度使实亦多为其兵所制，因为他们的得位，多是由军士拥戴的，军士既骄横又有野心的人，要从中利用，所以当时的节度使，也是岌岌不能自保的，弄成“地擅于将，将擅于兵”的局势了。

唐藩镇之弊

唐代藩镇之弊，总括起来，是“地擅于将，将擅于兵”八个字。一地方的兵甲、财赋，固为节度使所专，中央不能过问。节度使更代之际，也至少无全权过问，或竟全不能过问。然节度使对于其境内之事，亦未必能全权措置，至少是要顾到其将校的意见，或遵循其军中的习惯的。尤其当更代之际，无论是亲子弟，或是资格相当的人，也必须要得到军中的拥戴，否则就有被杀或被逐的危险。节度使如失众心，亦会为其下所杀。又有野心的人，煽动军队，饵以重赏，推翻节度使而代之的。此等军队，真乃所谓骄兵。凡兵骄，则对外必不能作战，而内部则被其把持，一事不可为，甚且纲纪全无，变乱时作。唐中叶以后的藩镇，所以坐视寇盗的纵横而不能出击；明知强邻的见逼，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并；一遇强敌，其军队即土崩瓦解；其最大的原因，实在于此。这是非加以彻底的整顿，不足以有为的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70—471页）

宦官的专权

藩镇既跋扈于外，宦官又专权于内。唐朝有一种禁军，是开国时的兵士，无家可归的，给他渭水北岸的闲田耕种，子孙世袭，做皇帝的护卫。安、史乱后，本在青海地方的神策军，入驻京畿，也就算禁军。唐德宗回銮后，把“神策军”交给宦官统带，宦官因此干与政事，历代的君主多由宦官拥立，顺宗、文宗想要除掉他们，始终不能成功。

唐朝的分裂

八七四年，黄巢创乱，从山东经河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，直打到广东。再从广东打回河南，攻陷潼关。僖宗逃到四川，各处的藩镇，多坐视不救；来的亦不肯向前。先是西突厥别部，有支住在新疆巴里坤湖附近的，名为沙陀突厥，初和吐蕃勾结，后来吐蕃又疑心他，乃归降唐朝，唐朝拣他的精锐，编成沙陀军，驻扎在山西北部，其酋长李克用（沙陀酋长姓朱邪氏，李是唐朝的赐姓）造反，给卢龙军打败，逃到阴山附近的鞑靼中。此时无法，只得赦李克用的罪，召他回来，居然把黄巢打平，然河东从此就落入沙陀手里了。黄巢乱后，唐朝的命令，全然不行，藩镇互相争斗，其初本以李克用为最强，后来宣武的朱全忠，尽并河南、山东，威服河北，李克用也弱了。其时宦官依旧专权，关内的节度使，全是他们的党羽。昭宗的宰相崔胤，结连朱全忠，想除掉他们。宦官迫胁昭宗，逃到凤翔，朱全忠进兵围攻，经一年多，凤翔不能守，乃奉昭宗出城，于是大杀宦官，昭宗亦被朱全忠劫迁到洛阳，旋杀之而立其子。九〇七年，唐遂为朱全忠所篡，是为梁太祖。

论梁太祖

梁太祖的私德，是有些缺点的，所以从前的史家，对他的批评，多不大好。然而私德只是私德，社会的情形复杂了，论人的标准，自亦随之而复杂，政治和道德、伦理，岂能并为一谈？就篡弑，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，岂能偏责一人？老实说：当大局阽危之际，只要能保护国家、抗御外族、拯救人民的，就是有功的政治家。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，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，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？在唐、五代之际，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，而历来论者，多视为罪大恶极，甚有反偏袒后唐的，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68页）

五代的纷乱

此时北方梁、晋两国对立。南方分为吴、吴越、闽、楚、南汉、前蜀六国。梁太祖死后，末帝幼弱，为后唐庄宗所灭。庄宗又灭掉前蜀，旋为明宗所篡。明宗女婿石敬瑭镇守河东，明宗死后，养子废帝，要把他移到山东。敬瑭造反，割燕、云十六州，以求救于辽。辽兵南下，废帝败死。辽人册敬瑭为晋帝，是为晋高祖。高祖事辽甚谨，死后其侄出帝，和辽开衅。九四七年，为辽人所执，辽太宗入大梁，旋因中国人不服，北还。太原留守刘知远入大梁，是为后汉高祖。仅四年，而为周所篡。

周世宗的雄略和宋朝的统一

五代中，唐、晋、汉三朝，都是沙陀人，到后周，汉人才又恢复。其时吴已为南唐所篡，又吞并闽、楚，和后蜀都有窥伺中原之意，都要和辽人连结，北汉更其是专倚赖辽人的。周太祖的儿子世宗先把国内整顿好，又把这三国都打败，然后出兵伐辽，把瀛、莫、涿三州恢复；进攻幽州，惜乎天不假年，在军中遇疾，未几就死了。嗣子幼弱，遂为宋太祖所篡，时公元九六〇年。宋太祖承周世宗之后，国内业已富强。其割据诸国，大都乱弱。乃先将南平、后蜀、南汉灭掉，旋又灭掉南唐。太宗即位后，吴越纳土归降，公元九七九年，出兵灭掉北汉，全国就统一了。

周、宋对外之异

宋太祖治内之策，大抵沿袭周世宗，其对外与之异。世宗之意，似欲先恢复燕、云，故于南唐、后蜀，皆仅加以膺惩，使不能为患而止。太祖之意，则主先平定中国，故不仅对辽专取守势，即于北汉之恃辽为援者，亦姑置之。此固不易言其得失。唯周宋间适值辽穆宗在位，国势中衰之际；至中国平定，而辽势亦已复张矣。从事后观之，失此机会，殊为可惜也。（《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》，第93页）

第二十四章

宋之统一与变法

中央的大权旁落，总是由于兵权和财权的旁落。宋太祖有鉴于此，所以特设转运使于各路，以收财赋之权。诸州的兵，强的都升为禁军，弱的才留在本州。如此一来，前此兵骄和外重之患，就都除掉了。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。宋朝的政策，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，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。到后来，养兵未得其用，而财政却因之而竭蹶，就成为积弱之势了。王安石的新法，用意是很好的。但行之不得其宜，以致有名无实，或者反致骚扰。在朝诸臣，纷纷反对，遂分为新、旧两党。

宋朝的积弱

中国虽然统一了，燕、云未复，总是一个很大的创伤。所以宋太宗灭北汉后，就进兵伐辽，不幸打得大败。后来又北伐一次，亦不得利，辽人却屡次南侵，到真宗时，遂成澶渊之盟，宋朝出岁币，和辽国讲和（辽主称宋为兄。宋给辽岁币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）。此事在一〇〇四年。真宗死后，仁宗继立，西夏又造反，前后用兵十年，宋朝亦总不得利。一〇四四年，亦以岁赐成和（银绢共二十五万两、匹）。

宋初国势不振

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，非有几十万大兵，能够连年出征，攻下了城能够守，对于契丹地方，还要能加以破坏扰乱不可。这不是容易的事，所以宋太祖不肯轻举。而太宗失之轻敌，灭北汉后，不顾兵力的疲敝，立刻进攻。于是有高梁河之败。至九八五年，太宗又命将分道北伐，亦不利。而契丹反频岁南侵。自燕、云割弃后，山西方面，还有

雁门关可守，河北方面，徒恃塘泺以限戎马，是可以御小敌，而不足以御大军的。契丹大举深入，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名，宋朝受威胁殊甚。一〇〇四年，辽圣宗奉其母入寇，至澶州。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，御驾亲征，才算把契丹吓退。然毕竟以岁币成和。（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）宋朝开国未几，国势业已陷于不振了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78页）

宋朝积弱的原因

宋朝的积弱如此，却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宋朝承晚唐、五代之后，不得不厉行中央集权政策。宋太祖既于燕会之际，讽示宿卫诸将，令其解除兵权；各州武臣出缺的，又都代以文臣；州、刺史、县令，都不除人，命京朝官出知（“知”是差遣的名词，本官不除人）。设转运使于各路，以经理财赋。诸州的兵，强壮的都送进京，升为“禁军”；留州的谓之“厢军”，是无甚战斗力的。重要去处，却命禁军轮班前往守卫，谓之“番戍”（“番”字，就是唐、宋时候的“班”字）。如此，藩镇跋扈之弊，自然没有了。然而后来，兵数日增，而战斗力反日减。中国历代的取民，本是以田租、口税为正宗的。唐中叶以后，因地方为藩镇所专，国用不足，乃收盐、茶等税以给用；还有藩镇所兴的苛税和商税等，宋朝虽尽力减免，因为养兵之故，亦未能全行除掉。仁宗以后，兵数超过百万，既不能对外作战，却又不敢说裁，遂成为“竭天下之财，以养无用之兵”的局面了。

宋初政策的利弊

中央的大权旁落，总是由于兵权和财权的旁落。宋太祖有鉴于此，所以特设转运使于各路，以收财赋之权。诸州的兵，强的都升为禁军，直隶三衙。弱的才留在本州，谓之厢军，不甚教阅，名为兵，其实不过给役而已。如此一来，前此兵骄和外重之患，就都除掉了。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。宋朝的政策，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，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。到后来，养兵未得其用，而财政却因之而竭蹶，就成为积弱之势了。又历代的宰相，于事都无所不统。宋朝则中

书治民，三司理财，枢密主兵，各不相知，而言路之权又特重。这原是因大权都集于中央，以此防内重之弊的。立法之初，亦可谓具有深意。然而宰相既无大权，而举动又多掣肘，欲图改革，其事就甚难了。这就是后来王安石等所以不能有所成就，而反致酿成党争的原因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上册，第217页）

宋代社会情形

论到社会的情形，宋时也是很恶劣的。晚唐、五代之世，暴政诛求，豪强兼并，地权不平均，农民饱受高利贷的剥削；而其时役法又特坏。古代的役，系筑城郭、修道路等事，至于在官署中典守府库，供奔走使令等役，则其事非人人所能为，本不能按户“签差”，而且要支给报酬的。晚唐以后，乃将此事责之人民，调查其丁口的多少，赀产的厚薄以定所谓“户等”，而随时派他当差。有几种重、难的差使，当着的人，总要因赔累而至于破产的。这是当时人民最苦的事。

宋时农民的困苦

宋朝的农民是很困苦的。从唐中叶以后，豪强兼并，地权不平均，历五代、两宋之世，始终没有能够改正。加以南渡以后，两浙的腴田，都落入富豪世家之手，收租奇重。末年，贾似道做宰相，因国用窘迫，又把贱价强买做官田，即以私租为官税。在北方，则处异族压迫之下，私田多被强指为官田，拨给女真人。其不能强指为官田的，也要把别的地方来和他互换，以便腾出整块的地方，来给女真人聚族而居。又宋、金两朝的役法，都是很苛酷的。处此环境之下，还能够勉强维持，其勤勉和技术的进步，也可想而见了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二册，第114—115页）

王安石的变法

仁宗之后，经英宗以至神宗，用王安石为宰相，厉行新法，新法中重要的是：（一）把常平、广惠仓的钱谷，春耕时借贷给农民，到秋收

后，加息随赋税交还，谓之“青苗钱”。（二）又令人民当差的出“免役钱”，不当差的出“助役钱”，把这钱来雇人充役，这叫“差役法”。（三）“市易法”，市中滞销的货物，由官收买，或与官物交换。又借官钱于商人，令纳息。（四）“均输法”，凡籴买税敛、上供之物，皆得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，以便利商人。（五）王安石是主张民兵的，他于大裁冗兵之后，又主保甲法。先令保丁警备盗贼，后来教保长以武艺；令其转教保丁。（六）“保马法”，凡民间愿养马者，每户一匹，以官马给之，或付官价使自购。死病要补偿。这法多致赔累，最为病民。（七）他又是主张养士的，乃于太学立外、内、上三舍，令学生以次而升，升到上舍的，可不经礼部试，径赐之以进士第。（八）至于科举，则因当时风气，只看重进士一科，所以把“诸科”都裁掉（进士以外，各种科目，总称诸科），独存进士；而废诗赋，改试策、论、经义。

论王安石变法

王安石的变法，旧史痛加诋毁，近来的史家，又有曲为辩护的，其实都未免有偏。王安石所行的政事，都是不错的。但行政有一要义，即所行之事，必须要达到目的，因此所引起的弊窦，必须减至极少。若弊窦在所不免，而目的仍不能达，就不免徒滋纷扰了。安石所行的政事，不能说他全无功效，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，则亦不容为讳。他所行的政事，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，青苗就未必能然。方田均税，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，后人踵而行之，则全是徒有其名。学校、贡举则并未能收到育人才之效。宋朝当日，相须最急的，是富国强兵。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，旧日史家的议论，则说他是专注意于富强的，尤其说王安石偏于理财。此因关于改革社会的行政，不为从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。他改革的规模，固不止此，于此确亦有相当的注意。其结果：裁汰冗兵，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，所置的将兵，则未必精强，保甲尤有名无实，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79—480页）

青苗立法之意颇善。然实人民自相扶助之事，一经官手，则因设治之疏阔，而监督有所难周，法令之拘牵，于事情不能适合，有不免弊余于利者。此安石所以行之一县而效，行之全国而不能尽善也。（《中国文化史六讲》，第119页）

新旧的纷争

王安石的新法，用意是很好的。但行之不得其宜，以致有名无实，或者反致骚扰，自然也不能免。在朝诸臣，纷纷反对，遂分为新、旧两党。神宗始终行新法没有变。神宗死后，哲宗年幼，太皇太后高氏临朝，用司马光为相，把新法全行废掉，新党全排斥。但是旧党又分蜀、朔、洛三大党，蜀党推苏轼，朔党推刘挚，洛党推程颐，为其党首领。各党互相攻讦，纷闹意见，授新党以间隙。太皇太后死后，哲宗复行新法，谓之“绍述”。用新党，贬逐旧党。哲宗死后，徽宗即位，初说要调和新旧，旋又倾向新法。然而所用的，是一个奸佞的蔡京，徽宗既奢侈无度，蔡京又妄作妄为，政治弄得糊糟一团；反要联合金人，希冀恢复燕、云，遂至召北狩之祸。

论宋之党争

从来论党的人，每将汉朝的甘陵，唐朝的牛李和宋朝的新旧党，并为一谈，这是大错。汉朝的甘陵，只是一班轻侠自喜、依草附木之徒，再加以奔走运动，营求出身，以及有财有势，标榜声华之士，以致闹成党锢之祸；唐朝的牛、李，只是官僚相排挤，哪里说得上政见？宋朝的新旧党，却是堂堂正正，各有其政见的。固然新旧党中，各有坏人；新旧党互相排挤报复，也各有不正当的手段；然而不害其为有政见。他们对于多种政治问题，都有不同的见解；而其见解，都是新党代表我所谓进化派，旧党代表我所谓保守派的。旧时的议论，都左袒旧党；现在的议论，则又左袒新党；其实二者是各有长短的。新党的所长，在于看透社会之有病而当改革，而且有改革的方案；而其所短，则在于徒见改革之利，而不措意于因改革所生之弊。旧党攻击因改革所生之弊，是矣，然而只是对人攻击，而自己绝无正面的主张。

（《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（六续）》，原刊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1936年第5卷第1期）

第二十五章

辽夏金之兴起与对宋之关系

辽是鲜卑民族，圣宗时，为辽全盛时代。澶渊之盟，即成于此时。西夏是党项部落，唐时归化中国的，五代以来，遂陷于半独立的状态。宋初，李继迁之孙元昊，僭号称帝，和宋交兵十年，亦以岁赐成和议。金朝的部落，是隋唐时的黑水靺鞨，其王室的始祖函普，外借辽人的声威，内靠自己的兵力和手腕，把吉林和朝鲜北境的生女真，次第征服。酋长吴雅束之弟阿骨打有大志，乘辽衰，乃叛辽即帝位，国号金。宋约金攻辽，不算失策，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，不能发愤自强，而又轻率启衅，结果汴京不守，徽钦北狩。宋朝当南渡之初，盗贼的纵横，诸将的骄横，高宗用秦桧做宰相，称臣以求和于金。

宋辽的关系

辽是鲜卑民族，在今热河省内西辽河上流。其众分为八部。唐朝末年，幽州守将暴虐，人民多逃亡出塞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，将其招致，又计并八部为一。当九世纪中叶，回纥为黠戛斯所破，逃奔西域。漠南北无甚强部，零碎的部落，都给他征服，属地西至河西，北至克鲁伦河，又东北吞灭了渤海。直属于辽的人民，谓之部族，多数以畜牧为业，举国皆兵，所以兵多而且强。太宗时，得了燕、云十六州之地，国势更盛。周世宗时，辽穆宗在位，沉湎于酒，国势中衰，所以世宗得乘机恢复关南（瓦桥关，在今河北雄县，周世宗复瀛、莫后置此关，与辽分界）。圣宗时，为辽全盛时代。澶渊之盟，即成于此时。圣宗死后，兴宗继立，遣使来求关南之地。宋仁宗增加岁币，将和局维持。（银、绢各增十万两、匹）兴宗死后，辽也渐渐地衰了。

宋以后外交失败之缘由

外交者，列国并立之世，然后有之者也，故必国人先自视为列国之一，然后有外交之可言。秦汉以降，吾人久以天朝自居，而鄙列国为小蛮夷，其自视重，则其所以责人者，常过于其分，而有失国际上平衡之义（如五口通商以前，英人屡遣使求通好于吾，吾人概以朝贡目之，赐之敕谕，却其所求。此等事无益实际，徒招恶感，最为无谓）；其视人轻，则平时常有藐视他邦之意，而虑患不免于甚疏，一旦与接为构，实力弗如，乃张皇而莫知所措（甲午之役，吾国朝士多执旧图，谓日本小于朝鲜，且先存成见，谓唯西洋诸国为可畏，东洋之国何能为？轻率开衅，以致于败）。吾国自宋以后，外交之失败，皆坐此也。（《苏秦张仪》，中华书局1915年版，第7—8页）

宋夏的关系

西夏是党项部落，唐时归化中国的。其酋长拓跋思恭因平黄巢有功赐姓李（拓跋氏是鲜卑姓，大约是鲜卑人党项中做酋长的），为唐定难节度使。唐朝从中叶后，河西、陇右，陷于吐蕃，回纥衰亡未几，吐蕃亦内乱，中国乘机，把其地恢复。然实力不大及得到，从五代以来，西北一隅遂陷于半独立的状态。宋初，定难节度使李继捧以银、夏、绥、宥四州来降（银州，即今陕西米脂县；夏州，即今横山县；绥州，今绥德诸县；宥州，今鄂尔多斯右翼前旗），其弟继迁叛去。宋人征讨不克，继迁之孙元昊，于公元一〇三八年，竟僭号称帝，和宋交兵十年，亦以岁赐成和议。神宗时，要想经略西北，听布衣王韶《平戎三策》的话，先把甘肃南部和青海的蕃族征服，开辟其地为熙河路。然后来进兵攻夏，夏人溃黄河以灌营，不利。哲宗时，又与夏开衅，诸路同时进兵，占地筑砦。夏人不能支持，请辽代为求和，宋人因顾虑对辽的关系，讨伐亦就未能彻底。

金朝的兴起

金朝的部落，是隋唐时的黑水靺鞨，在今松花江流域，其王室的始祖，则来自高丽，名唤函普（《金史》上没有说他的姓）。渤海盛强时，靺鞨部落，都服属于他。五代时辽灭渤海，黑水靺鞨也归附于辽。入辽籍的谓之熟女真，不系籍的谓之生女真。生女真程度甚低，后来函普入，从高丽迁入完颜部，娶其部中之女，其子孙遂以完颜为姓。辽人用他做生女真部族节度使，他们教导生女真，渐次开化，会造房子，会种田，会利用车舆。外借辽人的声威，内靠自己的兵力和手腕，把吉林和朝鲜北境的生女真，次第征服。辽朝末主天祚帝，是很荒淫的，他一味喜欢打猎，年年派人到生女真去求名鹰，骚扰得很厉害。生女真有个酋长叫吴雅束，其弟阿骨打有大志，乘辽衰，乃于公元一一一四年叛辽，明年即帝位，国号金，是为金太祖。

辽、金、元立国情形各有不同

辽、金、元三朝，立国的情形，各有不同。契丹虽然占据了中国的一部分，然其立国之本，始终寄于部族，和汉人并未发生深切的关系。金朝所侵占的，重要之地，唯有中国。他的故土和他固有的部族、文化尚未发展，虽可藉其贫瘠而好掠夺的欲望，及因其进化之浅，社会组织简单，内部矛盾较少，因而有诚朴之气、勇敢之风，能够崛起于一时，然究不能据女真之地，用女真之人，以建立一个大国。所以从海陵迁都以后，他国家的生命，已经寄托在他所侵占的中国的土地上了。所以他压迫汉人较甚，而其了解汉人，却亦较深。至蒙古，则所征服之地极广，中国不过是其一部分。虽然从元世祖以后，大帝国业已瓦解，所谓元朝者，其生命亦已寄托于中国，然自以为是一个极大的帝国，看了中国，不过是其所占据的地方的一部分的观念，始终未能改变。所以对于中国，并不能十分了解，试看元朝诸帝，多不通汉文及汉语可知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500页）

宋朝的南渡

当金人攻辽得利时，宋朝派人去要求他“克辽之后，把石晋所割的地方，交还中国”，金太祖约宋夹攻，所得的地方，即为己有，这是

金、宋开始发生外交关系。而宋人进兵不能克，南京（辽时共分五京。上京，今热河林西县；中京，今热河平泉县；东京，今辽宁辽阳县；西京，今山西大同县；南京，即今之北平）仍由金兵攻下，此时金人所得的地方，已经太多了，所以仍有将石晋所割的地方交还，但是已有一班汉奸，替他出主意，阻止他了。于是营、平、滦三州，非石晋所割的地方，就不肯还。而且将平州建为南京，派辽朝的降将张瑴驻守。又尽俘燕民而去，只还宋朝一个空城，人民流离道路，不胜其苦，过平州时，求张瑴做主。张瑴就据城叛金，给金朝打败了，投降宋朝。宋朝受了他的降，宋、金就因此开衅。宋朝此时兵力腐败，金兵从燕、云长驱南下，河东尚有太原固守，河北竟毫无阻当，金兵直抵汴京，宋人不能解围，许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讲和（太原，今山西阳曲县；中山，今河北定县；河间，今河北河间县）。旋因西路金兵，亦来索赔，宋人不与，兵衅再开，太原亦陷，金兵两路都会。汴京不守，徽、钦二帝，遂都北狩。（此时徽宗传位于钦宗，为太上皇）这事在公元一一二七年，史称为“靖康之难”。

宋南渡时之窘境

宋朝当南渡之初，最窘的便是：（一）盗贼的纵横，（二）诸将的骄横。当时盗贼之多，前节已说过。其中最强悍的，是李成（据江淮湖湘十余郡）、张用（据襄汉）、孔彦舟（据武陵）、杨太（洞庭湖里的水寇）、范汝为（在福建）等几个人，都给张浚、岳飞、韩世忠打平，而孔彦舟、李成都降齐。当时诸将的情形，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：金人为患，今已五年。陛下以万乘之尊，而依然未知税驾之所者，由将帅无人，而御之未得其术也。如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王𤩽之徒，身为大将，论其官，则兼两镇之重，视执政之班，有韩琦、文彦博所不敢当者；论其家，则金帛充盈，锦衣肉食；舆台厮养，皆以功赏补官；至一军之中，使臣反多，卒伍反少。平时飞扬跋扈，不循朝廷法度。马端临也说：“建炎中兴之后，兵弱敌强，动辄败北，以致王业偏安者，将骄卒惰，军政不肃所致。”“张、韩、刘、岳之徒……究其勋庸，亦多是削平内难，抚定东南耳；一遇女真，非败即

遁；纵有小胜，不能补过。”这种兵，好靠着他谋恢复否？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三册，第5、6、7、9页）

南宋和金朝的和战

二帝北狩后，高宗即位于南京（此为宋之南京，今河南商丘县），初用主战的李纲做宰相。旋又变更宗旨，将他罢斥。宗泽招降群盗，固守汴京，请他回銮，不听。李纲请他暂驻南阳，又不听。而逃到扬州，又逃到杭州（扬州，今江苏江都县；杭州，今浙江杭县）。金人尽取河南、陕西。兀术又渡江追击高宗，高宗从明州逃入海（明州，今浙江鄞县）。金朝这时候亦“士马疲敝，粮储未丰”（兀术的话）。兀术北归以后，不再主张进兵，乃将河南、陕西之地，封宋降臣刘豫，希冀得以休息。而刘豫动了野心，屡次入寇，给宋朝打败了，又要求救于金，金人见仍不免于麻烦，乃又将他废掉。

此时宋高宗用秦桧做宰相，秦桧被俘在北时，和金朝的宗室挞懒有交情，而挞懒在金朝，颇有权力，秦桧乃遣使往北，请其将河南、陕西之地，还给宋朝，挞懒已应允了。不意兀术回京，事情中变，挞懒被杀，兀术再兴兵南下。宋刘锜在顺昌，岳飞在郾城（顺昌，今安徽阜阳县；郾城，今河南郾城县），都获胜利；吴璘亦从四川出兵，收复陕西州郡，而高宗、秦桧，坚决主和；召还诸将，放弃河南、陕西，称臣以求和于金，是为宋、金第一次和议。金海陵庶人立，从上京迁都于燕，又迁都于汴。举大兵南伐，因其淫虐不道，兵才起而后方已拥立世宗。海陵急于渡江，被虞允文在采石矶打败（在今安徽当涂县北），改走扬州，为其下所杀。此时宋高宗亦传位于孝宗。孝宗是主张恢复的，出兵北伐，亦不利。一一六五年，第二次和议复成。第三次则宋宁宗时，宰相韩侂胄，出兵北伐，累战不利。宋朝政局变动，杀韩侂胄，函首畀金以成和，时为一二〇八年，当金章宗之世。和议成后未几，蒙古的兵，亦就到金朝塞外了。

第二十六章

宋之学术思想与社会概况

宋朝的学术思想，欲以中兴儒家之说，而斥佛教之出世与道教之荒诞。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对印度思想的反动，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调和。所以在中国，欲求治心之自己受用及其对治事方面的良好影响，与其求之于佛学，不如求之于理学。宋儒对于经学，是自以其意，推求圣人之意，不拘守前人之说的。虽或流于武断，然应该据理推断之处，其立说自胜前人。史学大家很多，《资治通鉴》《通志》《文献通考》，都是综贯古今的名作。古文虽兴于唐代，其盛行却是在宋代的。宋人诗是径直言情的，虽不如唐人的含蓄，诗境却比唐人恢廓了。宋人的学问是要讲究躬行实践的，所以其立身行己，都有可观，这确是他们的长处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社会的变迁，执意要推行的，往往是不合时宜，这又是他们的短处。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，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，宋儒似乎很为相宜。

宋代的理学

宋朝的学术思想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是很有其地位的。尤其理学是宋朝特有的学术思想，其发达之原因有四：（一）自唐季以来，就有书院的创立，当时老师宿儒，在院内聚徒讲学，号称山长。到了宋朝，书院更加兴起，最著的有四大书院，即湖南的岳麓，江西的白鹿，河南的应天和嵩阳。定章程，招俊秀，讲诵问难，学问因之大进。（二）宋儒之辈出，是欲以中兴儒家之说，而斥佛教之出世与道教之荒诞。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对印度思想的反动，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调和。原来佛教的哲学，确是很高尚的，然在中国的学术是以政治和伦理为立脚点的，看起来，就未免偏于消极了。这所以有宋朝

人的“辟佛”（宋儒虽然兼辟佛、老，实在是辟佛的话，居其多数），而其学问讲到精微之处，实已兼包佛学之长。（三）当时印刻之业兴，购书读书，都比从前便易，学术可以普及，亦为思想界之大助。（四）五代以来，士风扫地，名节荡然，宋代诸儒既注重伦理道德，故多致力于修身格物之学，希圣希贤。宋学巨子，就是周、程、张、朱。北宋时又有邵雍算是别派，南宋时有陆九渊，则是和朱熹对峙的。他们明理的方法，可以分为朱、陆两派。朱子之学，是原本于小程子的，主张“即事物而求其理”；陆子则主张先发本人之明，然后细细理会去。邵雍是研究数理的，他以为天地万物，根本上只是一体；质的变化，就是量的变化；所以想就数理上推求宇宙的原理、原则。这本是一种哲学，后世卜、筮、星、相等迷信之事，都假托他，可谓去题万里了。

理学的价值

佛学中治心的一方面，自然是有其很大的价值的，然其精华，在中国，已被理学摄取了，而且还能除去一部分佛学因宗教而来的渣滓。所以在中国，欲求治心之自己受用及其对治事方面的良好影响，与其求之于佛学，不如求之于理学。于此点，康（有为）、梁（启超）两先生，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。梁先生有专著《德育鉴》，此外在其《新民丛报》时代的著述中，康先生的《不忍杂志》中，都有许多暮鼓晨钟、发人深省的议论。读者若不厌陈旧，求得而读之，很可以为引入理学，尤其是理学中最进步的一派即阳明之学的阶梯。这种著作，原无所谓新与旧的。（《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》，原刊《月刊》1946年第1卷第3期）

宋代的经史之学

宋儒对于经学，是自以其意，推求圣人之意，不拘守前人之说的。虽或流于武断，然应该据理推断之处，其立说自胜前人。史学：大家很多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郑樵的《通志》，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，都是综贯古今的名作。袁枢因《通鉴》作《纪事本末》，又为

史家创一新体。此外搜辑当代历史的也很多；考证前代史籍，订正其错误的人也不少。

宋代经学的特色

宋人说经，自成一派。前此经学，皆以汉人为宗。虽汉人说经，亦自有派别，然南北朝、隋唐义疏之学，必宗汉人之一派，未有祧汉人而自求之于经者也。其有之，自唐之啖助、赵匡始。宋人大畅其风，于诸经皆以意说，不为前此成说所囿。其长处，在能矫正旧说之误；其短处，则在主观太甚，妄以己意测度古人。而于训诂名物等，宋儒所说，尤不如汉儒之可信。此清代所以矫其弊而复崇汉学也。（《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》，第110页）

宋代的文艺

古文虽兴于唐代，其盛行却是在宋代的。普通所谓唐、宋八大家，宋朝人实占其六。宋朝人的骈文，也是很生动流走的，谓之“宋四六”。诗：该以江西派黄庭坚为宋人的代表。宋人诗是径直言情的，虽不如唐人的含蓄，诗境却比唐人恢廓了。词以宋朝为极盛，北宋之晏殊、周邦彦，南宋之辛弃疾、姜夔，都是名家。还有后世的平话，也是起源于宋人，像《宣和遗事》等类皆是的。

宋朝士大夫的风气

宋朝人的学问是要讲究躬行实践的，所以其立身行己，都有可观。他们大多数，知道治化的根本，在于社会。还能制定乡约，或冠、昏、丧、祭的礼节等，行之于地方，以求化民善俗，这确是他们的长处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社会的变迁，所执意要推行的，往往是不合时宜的古礼，亦且古代社会等级之制甚严，在后世已经平等些了，他们因泥古之故，并此也要回复，就未免冷酷而不近人情，这又是他们的短处。他们论事，大抵要合乎理想，而不甚肯迁就事实；论人，大抵要辨别其心术，而不甚肯拘泥于形迹。这固然有彻底的好处，然亦有时，因

此而流于迂阔；又或苛责君子，使无容身之地，而小人反得逍遥事外。他们大概好争意气，因此容易结成党派。所以宋朝士风，概论起来：初宋则喜党争；中宋多习苟安；晚宋则力崇名节。如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、谢枋得等，均为宋之季世，作掉尾之一大活动，这就是宋代士风的特征了。

论宋儒

南北朝之世，因其君不足以为君，而有“殉国之感无因，保家之念宜切”的贵族，到晚唐、五代之世，此种风气，又盛行了。于是有历事五朝，而自称长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道，有许多想借重异族，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。由今之道，无变今之俗，如何可以一朝居？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。经宋儒提倡之后，士大夫的气节，确实是远胜于前代。但宋儒（一）因其修养的工夫，偏于内心，而处事多疏。（二）其持躬过于严整，而即欲以是律人，因此，其取人过于严格，而有才能之士，皆为其所排斥。（三）又其持论过高，往往不切于实际。（四）意气过甚，则易陷于党争。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，失却理性，就使宅心公正，也不免有流弊，何况党争既启，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？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、多方掩饰的伪君子，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。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，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，就真有宅心公正、顾全大局的人，也苦于无从措手了。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。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，宋儒似乎很为相宜。宋儒有一个优点，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，尽其相生相养之道，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，使人人各得其所的。他们否认“治天下不如安天下，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”的苟简心理，这一点，的确是他们的长处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76页）

宋代社会状况

宋代的社会状况，始终是很黯淡的。但也未尝没有畸形的发达。地权的不平均，农民受高利贷的剥削，始终未能救正。南渡以后，贵戚势家，聚于江、浙一隅，更其变本加厉。近代江、浙田赋的独重，就是

导源于这时候私家收租的苛刻的。（南宋末年，宰相贾似道，把私家的田，租额重的，硬收买做公田，即以私租为官租。元时，江、浙的田亩，收租还是重的。明太祖平张士诚后，又把私家的租额，就算作国家的税额，从此以后，虽屡经减少，浙西的租税，较之别处还独重）其时国土既蹙，又承丧乱之后，用兵则有兵费，讲和又有岁币，国用浩大，苛税繁兴。如“和籴”和“预买”［中国从前，国家立于私人的地位，和人民做交易，谓之“和”。买米的谓之“和籴”，买其余一切东西，谓之“和市”或“和买”，雇人做工，或租用人家的东西（如舟、车之类），谓之“和雇”，宋朝变为赋税的“和买”是布帛，其中先付价后取物的，谓之“预买”］，本来都是卖买，后来都变成租税了。还有经总制钱，“板帐钱”“月桩钱”等，都是把许多无名苛敛，聚集起来的。所以当时的人民，实在非常之困苦。但是困苦的仍旧困苦，奢侈的还是奢侈。所以在一方面，社会反而显出繁荣的状况。譬如历代的都市，都是禁止夜市的，唐朝还是如此（唐朝两京诸市，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，日入前七刻，击钲三百而散，见《唐书·百官志》两京诸市署令）。宋朝却不然了。其时临安各种卖买，几于都有夜市。不但应用之品，就供享乐消耗的也很多。（宋朝商市情形，见宋人所撰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等书）海外贸易，宋朝较之唐朝，也更形发达。杭州、嘉兴、宁波、泉州、广州、青岛等处，都曾设过市舶司。除抽税外，香药、犀、象等品，由官专卖，利息也很丰。总而言之：农民困苦，而商业资本活跃，历代本是一律的，然在宋朝，则此等现象，似乎更甚了。

印刷术的发达

工业中，印刷术的发达，对于文化的传播，有极密切的关系。中国古代，要传之永久的文字，就把他刻在金石上。这是以供人观览为目的，意不在于印刷。五九〇年，隋文帝敕天下废像遗经，悉令雕版，才可称为印刷术之始。然隋唐时还不盛行，直到九三二年，后唐宰相冯道，请令国子监将九经雕板印卖，宋初又续刻诸史，从此以后，官、私、商贾，刻书的才渐多。十一世纪中叶，毕昇又发明了活字

版，得书的难易，较之从前，不可以道里计；书籍流传于后的，也就迥非唐以前所可比了。（可参看孙毓修《中国雕板源流考》，商务印书馆本）

第二十七章

元代之武功

侵入中国之民族，对待汉人之态度，各有不同。以大体言之，仰慕汉人之文化，视汉族为高贵而欲攀附之者，五胡及沙陀也。明知汉族文化之优，与之接触，则必为所同化，因而欲竭力保存本族之文化，与汉族立于对峙之地位者，金与清也。介乎二者之间者，辽也。不了解汉人文化，唯恃其征服之势，肆力压制与暴虐者，元也。元人不了解中国之文化，不通中国之语文，实为其根本之点。宋朝的灭亡，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，一时未能急剧转变，以适应于竞争之故。原来游牧民族，以掠夺为生产，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，所以其势甚强，文明民族，往往为其所乘，罗马的见轭于蛮族，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、金、元、清，正是一个道理。

蒙古的兴起

一二一〇年，蒙古侵金而塞外的轩然大波起。蒙古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蒙古在唐时称为室韦，地在额尔古讷河南，后来西徙到敖嫩河（敖嫩河亦名斡难河，今名鄂诺河，为黑龙江之北源）上源。他大约曾和鞑靼人混合，所以又自称鞑靼。金朝灭辽后，金的势力，不大及得到北方。他只从河套地方起，造一道边墙，东北迤，达到女真旧地，并使汪古部守备边患。塞北诸民族遂纷纷自相争斗。十二世纪后半，蒙古族的伟人奇渥温帖木真出，把漠南北诸部落次第征服，声威直达畏兀儿。一二〇六年，诸部共上他以成吉思汗的尊号，这就是元太祖。

蒙古高原的部族较西域诸国为强

在历史上，蒙古高原的部族，本来较西域诸国为强。这是因为一居沃土，一居瘠土之故。所以匈奴、突厥等，虽然失败于东，还能雄张于西。但是匈奴、突厥的西略，都在既失败于东方之后，不过做个桑榆之补。至于合东方的部族，并力西向，则自西辽大石开其端，蒙古却更进一步；而当时的西方，又没有一个真正的强部；所以成功大而且快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三册，第48页）

金朝的南迁

金朝当世宗时代，从上京迁到燕，又从燕迁到汴京。把女真人搬进中原来，以镇压汉人，夺了汉人的田地，给他们耕种。而女真人一家百口，陇无一苗，都将田给汉人承种收租。因为生活的优裕，尚武的性质，反而消失了。蒙古兵一到，金兵大败。河北、河东都受蹂躏，宣宗只得弃中都迁都开封。

金人速亡的原因

女真初兴的时候，他的势力真是如火如荼，却到元朝一兴，就“其亡也忽焉”，这是什么原故？我说，金朝人开化本晚，所居的地方又瘠薄，又累代用兵不息，却因此养成一种坚苦尚武的性质。这就是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。然而从进了中原以后，他这种优点，就都失掉了。南迁以后，又想用本族人来制驭汉人。于是把猛安谋克所统属的人户，搬到内地；括民田给他耕种。这种“猛安谋克户”所占的田，面积很广，纳税极轻；而且都是好田。然而他们的经济能力，很是薄弱的。得了这种好的家产，并不能勤垦治生。大抵是不自耕垦，尽行租给汉人。有“一家百口，陇无一苗”的，“有伐桑为薪”的。“富室尽服纨绮，酒食游宴；贫者多慕效之。”于是汉族长于殖产的好处，并没学到；本族耐苦善战的特质，倒先已失掉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三册，第30、31页）

成吉思汗的西征

唐中叶以后，葱岭以西，多被大食国所征服，后来大食的威权衰了，他东方的镇将，也很多据地自立的。辽朝灭亡时，其宗室耶律大石，率众西走，立国于西方，是为西辽。和花剌子模（Khorezm。在波斯东北部，为突厥族所据地，后灭塞尔柱克突厥，尽得波斯地，旋又取得阿富汗全境，《元史》又称为西域国）并称西方大国。成吉思汗侵金时，乃蛮余孽，逃到西辽，和花剌子模里应外合篡了西辽的王位。蔑儿乞余孽，也出入蒙古边界，要想乘虚报仇。成吉思汗乃北归，遣将把这两国打平，蒙古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直接。因花剌子模镇将，杀掉西行的蒙古商队，成吉思汗大怒，就起大兵西征。花剌子模王不敢抵御，想听他饱掠扬去，遂被逼逃入里海岛中而死。成吉思汗尽定其地，又追击其王子，渡过印度河，想从西藏东归，因道路难行；又闻西夏背叛；乃仍从原路而还，别将则打败钦察、俄罗斯的联军［钦察，亦作乞卜察兀（Kipchak）］，这事在一二一九到一二二二年。因为蒙古大兵都在西方，金人乃得暂时支柱。

夏金的灭亡

金宣宗南迁后，仍把女真户都迁到河南，倚为主力的军队。然女真终于不能复振，既要抵御蒙古，又和宋、夏都开了兵衅，国力更形疲敝。成吉思汗东归后，于一二二七年，伐夏未克而死。遗命把夏国灭掉了，然后发丧。太宗立，遣弟拖雷，闯入宋境，从汉中走湖北西北境，以入河南。自己则从孟县渡河，两路合攻汴京。金哀宗又迁于蔡州，至一二三四年，而为宋、蒙古的联军所灭。

约元攻金非为失策

约金攻辽，还为金灭，这是北宋的覆辙。所以读史的人，多以宋约元攻金为失策。这亦未必尽然。宋朝和金朝，是不共戴天之仇，不能不报的。若说保存金朝以为障蔽，则金人此时，岂能终御蒙古？不急进而与蒙古联合，恢复一些失地，坐视金人为蒙古所灭，岂不更糟？要知约金攻辽，亦并不算失策，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，不能发愤自强，

而又轻率启衅。约元灭金之后，弊亦仍在于此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89页）

蒙古对东西南三方面的用兵

这时候，宋朝理宗在位，史弥远、贾似道相继为相，国势衰微。灭金之后，却想恢复三京（谓东、西、南三京。北宋时，以开封为东京，洛阳为西京，归德为南京，大名为北京），以致和蒙古开了兵衅。川、楚、江淮，地都沦陷。幸而蒙古从太宗到宪宗的初年，还继续出兵西征。所以宋朝还未即受灭亡之祸。

西征之次第，是太宗遣侄拔都率兵五十万，定钦察，进攻俄罗斯，这时俄国分作数十国，蒙古兵来，或降服、或破灭，蒙古兵遂陷莫斯科。更西侵波兰及匈牙利，大破北欧的联军，兵锋直到奥地利的都城维也纳，和意大利的威尼斯，全欧震恐。因得太宗病没的信，蒙古军才退去。及至宪宗即位，又遣弟旭烈兀西征，先剿平里海南山中的木剌夷，进攻大食，屠都城报达（报达，亦作八吉打），威势直到小亚细亚和埃及。其间太宗又遣将东征，降高丽。宪宗遣将南征，从青海入吐蕃，灭大理（就是唐朝的南诏）。

宋朝的灭亡

一二五九年，四方大略都被蒙古平定了。蒙古宪宗乃大举入四川，使弟忽必烈攻湖北；因合州守将王坚善守，宪宗死于城下（现在四川的合川县）。忽必烈急顾北归，而贾似道不知道，遣使求和，许称臣，画江为界。忽必烈北归自立，建国号为元，是为元世祖。贾似道把和议隐瞒掉，诈称大捷。元使来的，都被他拘执起来。由是和议遂绝。此时元人因北方藩王叛乱，还未能专力对宋，所以宋朝又得偷安了几年。公元一二六八年，忽必烈遣阿术，力攻襄阳。襄阳坚守五年，到底于一二七三年陷落。明年，元兵遂大举入建康，继进陷临安，恭帝北狩。宋臣如张世杰、陆秀夫、文天祥等，又立其弟益王于福州，益

王死后，又立其弟卫王，辗转迁徙到崖山（在广东新会县南海中），一二七九年，为元人所灭，宋亡。

论宋之灭亡

宋朝的灭亡，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，一时未能急剧转变，以适应于竞争之故。原来游牧民族，以掠夺为生产，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，所以其势甚强，文明民族，往往为其所乘，罗马的见轭于蛮族，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、金、元、清，正是一个道理。两国国力的强弱，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，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。旧时的政治组织，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。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，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。试看宋朝南渡以后，军政的腐败，人民的困苦，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酖毒、歌舞湖山可知。虽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，招致了异族的压迫，却又因异族的压迫，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，替民族主义，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源，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490—491页）

建立大帝国

元朝在世祖时，其疆域跨有亚洲大部分，和欧洲东北部。世祖更遣将南征安南、缅甸。攻爪畦，虏其王。唯东征日本，因遇飓风以致失利。这时，元帝直接统辖金、宋两朝和高丽、吐蕃、大理诸国的地方。此外有四大汗国：一曰钦察汗国，为太祖长子术赤封地，其子拔都继之，统辖俄罗斯和里海、咸海以北之地。二曰窝阔台汗国，乃太宗之后，统辖金山（阿尔泰山）以北乃蛮故地。三曰察合台汗国，太祖子察合台封地，统辖葱岭东西，西辽花剌子模故地。四曰伊儿汗国，乃宪宗子旭烈兀封地，统辖里海、咸海以南大食故地。于是蒙古建立空前的大帝国。

侵入民族对汉人之态度各有不同

侵入中国之民族，对待汉人之态度，各有不同。以大体言之，仰慕汉人之文化，视汉族为高贵而欲攀附之者，五胡（献文帝以前之拓跋氏除外）及沙陀也。明知汉族文化之优，与之接触，则必为所同化，因而欲竭力保存本族之文化，与汉族立于对峙之地位者，金与清也。介乎二者之间者，辽也。不了解汉人文化，唯恃其征服之势，肆力压制与暴虐者，元也。此盖由其（一）侵入之先，或居塞内及附塞之地，或则距中国较远，故其渐染汉族之文化，本有深浅。（二）其侵入中国后，其本据地或已不存（如五胡与沙陀），或虽存而断不能再行退回（如金清），或仍勉足自立（如辽及未迁洛前之拓跋氏），或则领土甚广，视中国不过其一部分（如元）。元人不了解中国之文化，不通中国之语文，实为其根本之点。（《史籍选文评述》，写于1953至1954年间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上册，第900页）

蒙古的分裂

从太祖称汗以来，到世祖灭宋，不过七十余年，遂建立大帝国，然太祖身死未几，内部分裂之机已肇。原来蒙古的大汗，是要由宗王大臣等公推的。太宗之立，由于太祖的遗命，所以不曾有异议。太宗死后，他的后人，就和拖雷的后人争位，定宗得立，旋短命而死。宪宗被推，太宗后人谋叛，被宪宗诛戮，宗室中遂势成水火。宪宗死后，世祖不待推戴，径行自立。阿里不哥举兵反抗，被世祖打败。而海都自立于西方，钦察、察合台两汗国，都附和他。蒙古大帝国，就从此分裂了。

元朝的衰亡

元帝把国内分作“蒙古人”“色目人”“汉人”“南人”四等（蒙古人是元朝同族，色目人是西域各地人，汉人是契丹、女真和中国北方人，南人是中国南方人），一切权利，都不平等（如各官署都要用蒙古人做长官，汉人、南人，只可做副贰）。在路、府、州、县之上设立行省，以图控制。边陲和紧要的地方都封了藩王。黄河流域，都用蒙古兵和诸部族兵驻守。

行省制度

中国古代之省，为中央行政机关，设宫禁中，省，察也，言出入此中，必检察也。唐官制有六省，而其最尊者为尚书省、中书省。行者，言不在本处而在别地，故省之政治机关，外设者称行省，历代亦有之，唯为临时者。如金伐宋，设行台尚书省等，然事毕即撤。至元即于路、府、州、县之上，别设行省（即行中书省），分中国本部及蒙古之地为十三区，置行中书省十一，行御史台二（江南、陕西），以省统路府，以路府统州县，而府亦有隶于路下者；州有在路府下而统县者；又有与路、府并列者，皆置达鲁花赤，以为正官。其目的则在控制便利起见。盖中国旧以县属郡，后改为州，其尊者称府，唐以道、宋以路以统州，道、路约当今日小省二分之一，大省三分之一，控制地方之权既小，而中央统此多数之道、路亦不易，既立行省制，则行省长官控制地方之权大，而中央政府亦仅需统此十三行政长官而已，一举二得。（《本国史（元至民国）》，见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第66页）

他们的用人，是功臣、亲戚的后裔，诸王、公主的私人，杂然并进。设官专详于户、工两部。他们优待喇嘛僧和西域商人，听其驰驿，要汉人供应。元世祖时，曾两次用兵于日本，又屡次发兵征安南、占城和缅甸，丧师甚多。从世祖以后，继承之际，没一代不是争夺。这如何好治理中国呢？所以到一三三三年顺帝即位后，四方反抗的，就风起云涌了。

蒙人入中国者之腐化

自古民族，不接触则已，苟有接触，则必至互相同化而后已。蒙古人入中国，不久即受中国同化。由积极方面观之，《元史》诏禁蒙古人与汉人交关通婚，或强移其居地。消极方面，则元亡时蒙古兵毫无能为。皆为被中国同化之证也。盖受同化之原则，一为人数寡于他民族，一为文明程度低于他民族。前者因以少数人入居他民族中，势必改其语言、生活以适应多数人之新环境，而为其同化。后者则悦文明

较高民族之纷华靡丽，上下靡然从风，率一国之人，悉改其故有生活、风俗，而习文明民族之生活，而为其同化。夫蒙古之人民既寡于汉人，而其入主中国，又唯以武力，经济为剥削，以求获得物质增高其生活程度，莫不乐华风而习之，即上者禁之亦不可也，故卒为中国所同化。兵制废坏，尚武之风沦亡，而败亡遂之矣。（《本国史（元至民国）》，见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第67页）

明太祖的恢复

元末革命军中，首先出兵北伐的，是颍州白莲教徒刘福通，可见白莲教传到后来，虽然渐失其意义，其初起，确是含有民族主义的。惜乎这时候，有个察罕帖木儿，起兵帮助元朝。察罕帖木儿死，其子库库帖木儿继之。刘福通北伐的兵，给他打败。然而顺帝荒淫，太子干涉，朝臣和军人，又分党相争，终于不能支持。明太祖朱元璋，是初从郭子兴起兵凤阳，后来别为一军，渡江据今南京以为根据地的。他先把湖北的陈友谅、苏州张士诚灭掉。其余诸雄，亦均慑服。一三六七年，乘元朝内乱，遣兵从河南、山东，分道北伐，两路兵会于德县，北扼直沽。明年，顺帝遂弃北平而去，元亡。

第二十八章

中国文化之西渐

中国文化的西渐，由来已久。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上说：当时西域的人，本来不知道用铁的，还是中国人教导他，这事怕已在纪元之前了。到六世纪中叶，中国的蚕种，又由波斯人传到欧洲，遂产出希腊的绢丝。唐中叶以后，中国和大食的交通极其频繁。罗盘针、火药、印刷术这三种事物，是从中国经大食人之手，传到西方去的。有了罗盘针，海船才能横绝大洋，这是欧洲人近代，足迹遍及全世界的原因。有了火药，才有近代的军机，战事的情形才大变，不但打倒封建政体，使欧洲支离破碎的局面，焕然改观，并可向外发展了。至于印刷术，则无论在研究学术，以及教育方面，关系都极重要。所以说：这三者，实在是西洋近代文明的根源。

铁器和蚕丝

中国文化的西渐，由来已久。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上说：当时西域的人，本来不知道用铁的，还是中国人教导他，这事怕已在纪元之前了。到六世纪中叶，中国的蚕种，又由波斯人传到欧洲。［当时波斯僧侣有布教于中国境内者，得到蚕卵，藏在空杖里，献给罗马帝君士坦丁，遂产出希腊的绢丝，大概是从天山南路的和阗传出的。后来西西里（Sicily）与东罗马战，得到很多希腊人做俘虏。逐渐把养蚕的法子，传入西西里，次第由此再传入意大利和法兰西诸国]

古代蚕利盛于西北

蚕业兴起，略与农业同时。《农政全书》引《淮南蚕经》，言黄帝元妃嫘祖，始育蚕治丝茧。说固未可尽信。然《易·系辞传》言："黄帝尧舜，垂衣裳而天下治。"疏曰："以前皮衣，其制短小，今衣丝麻布

帛，所作衣裳，其制长大，故言垂衣裳也。”《虞书》亦有“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”之文。知黄帝尧舜时，蚕织必已发明矣。三代之政，天子亲耕，后亲蚕。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。”男耕女织并称本业，至于今未替。此其所以能以丝织，著闻五洲也。然古代蚕利，盛于西北，而后世唯盛于东南。偏僻之处，且有绝不知纺织之利者。此则疆域广大，各地方风气不齐，而治化亦不能无进退故也。（《中国文化史六讲》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下册，第121页）

罗盘针火药印刷术

唐中叶以后，中国和大食的交通极其频繁，而西洋近代的三大发明，遂都经大食人之手，由中国传入欧洲。所谓三大发明，是罗盘针、火药、印刷术。欧洲和大食方面，关于罗盘针的记载，最早在十二三世纪间；中国则在公元一一一九年，朱彧著《萍洲可谈》，已经说广州的商人，能利用罗盘针航海了。朱彧的话，是得之于其父亲在广州，还在十一世纪之末。（见桑原骘藏《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》本文二《考证》三十一，页九二至九五，商务印书馆本）火药，西洋发明的年代有两说：一说在公元一二四二年，一说在公元一三五四年顷。（见一九二九年版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）中国则在公元一〇四二年，宋朝曾公亮等奉敕所撰的《武经总要》，已载有火药的制法了。（《武经总要》，商务印书馆《四库全书珍本》。此处所引，见卷十二，页六十五）后来南宋与金人战于采石矶，虞允文以火药制为“霹雳炮”，这是中国用火药之始。而西洋战争用火药，尚在一三四〇年左右。至于印刷术，活字版实始于宋仁宗时代，明初已改用铜活字。欧洲人能利用，事在公元一四三八年，才知道用金属的活字。（按《西史》所载，公元一四二三年有 Harlem地方的人 Lawrence Johnson Coaster创木版印刻。到一四三八年德人 Johann Gutenberg始发明活字版，铸铜为字，后又经 Peter Sehöffer改良活字铸造，遍行欧洲）较之我国先后相去，更不可以道里计。所以西人都承认，这三种事物，是从中国经大食人之手，传到西方去的。还有和印刷术有关的造纸，亦系由中国传往。据

说：在第三世纪时代，就已传布到楼兰。（据瑞典人斯文赫定最近西北考察所得的结果）当公元七五一年，玄宗天宝十年，唐镇将高仙芝因和大食争石国（今俄属塔什汗），战败于怛罗斯城，中有中国造纸工人，均被大食俘虏。大食人就利用他，在中亚、波斯、大食、埃及等处，先后设厂造纸。到十二世纪，就输入欧洲了。（见向达《中外交通小史》第五章，商务印书馆本）有了罗盘针，海船才能横绝大洋（以前离海岸不能甚远），这是欧洲人近代，足迹遍及全世界的原因。有了火药，才有近代的军机，战事的情形才大变，不但打倒封建政体，使欧洲支离破碎的局面，焕然改观，并可向外发展了。至于印刷术，则无论在研究学术，以及教育方面，关系都极重要。所以说：这三者，实在是西洋近代文明的根源。

马哥孛罗

元朝兴起以后，东西交通，格外兴盛，元朝的用人是不拘种族、宗教的，所以西域人仕于其朝的很多。商人教士的往来，亦都很盛，其中最著名的，则有意大利的马哥孛罗（Marco Polo。可参看《中外交通小史》第八章；及张星烺《马哥孛罗》，商务印书馆本），元世祖时，在中国做官，在中国前后共二十年。回去之后，著了一部《游记》，为欧洲人知道中国情形之始。

第二十九章

明之内政与外交

明太祖起于草泽，而能铲除胡元，戡定群雄，其才不可谓不雄。他虽然起于草泽，亦颇能了解政治，所定的学校、科举、赋役之法，皆为清代所沿袭，行之凡六百年。卫所之制，后来虽不能无弊，然推原其立法之始，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，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。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，并不能算不弘远。只可惜他私心太重，废宰相，使朝无重臣，至后世，权遂入于阉宦之手。明朝的兵威，以成祖时为最盛，然边防的规模，实在也是成祖时坏掉的。成祖以大宁地方，赠兀良哈。宣宗时，徙治独石口。北边所守者，遂成今长城之线。若能始终保持太祖时之形势，则对蒙古可取攻势，而至满洲，可有自热河趋吉林之快捷方式，不单凭出山海关趋辽阳之一道也。

成祖的北迁

明太祖勤于政事，又能厘定制度；治国的规模，亦颇弘远。唯私心过重，封建诸子四十余人，又因猜忌之故，开国功臣，尽遭杀戮。太祖太子早死，孙建文帝立，太祖子燕王棣，起兵北平，把南京攻陷，建文帝不知所终，燕王自立，是为成祖，迁都北平。

明太祖私心太重

明太祖起于草泽，而能铲除胡元，戡定群雄，其才不可谓不雄。他虽然起于草泽，亦颇能了解政治，所定的学校、科举、赋役之法，皆为清代所沿袭，行之凡六百年。卫所之制，后来虽不能无弊，然推原其立法之始，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，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。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，并不能算不弘远。只可惜他私心太重。废宰相，使朝无重臣，至后世，权遂入于阉宦之手。重任公侯伯的子

孙，开军政腐败之端。他用刑本来严酷，又立锦衣卫，使司侦缉事务，至后世，东厂、西厂、内厂，遂纷纷而起。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。其封建诸子于各地，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506页）

明初的武功

明朝的兵威，以成祖时为最盛，然边防的规模，实在也是成祖时坏掉的。元顺帝弃大都后，他的后裔，渐次退却到外蒙古，有好几代都遇弑，蒙古大汗统绪遂绝，继立的改称鞑靼可汗。此时鞑靼衰弱，而瓦剌和热河东北的兀良哈强盛（兀良哈，清朝译作乌梁海），都给成祖击破，吉、黑两省的女真，亦都服属，设立羁縻卫所。最远的奴儿干都司在黑龙江口，海中的库页岛，亦来朝贡。安南从宋太祖开宝元年，公元九六八年独立，成祖乘其内乱，把他灭掉，改设交趾布政使司，和内地一样。又遣郑和下西洋，航路直达非洲东岸，国威可谓极盛了。但成祖把大宁弃给兀良哈，宣宗时，开平卫遂因势孤内徙。（开平，就是现在的多伦县。元世祖即位于此，建为上都。明初于此设卫，宣宗时内徙独石。大宁在今热河省赤峰、承德之间）安南则因官吏行政不善，宦官奉使的又暴横，叛乱不绝，宣宗遂亦放弃，其地重属中国，只有十九年（一四〇九至一四二七）。

明之边防坏于成祖

明太祖虽居南京，而北方边防规模颇远，即元之上都置开平卫。又因元之大宁路之降（大宁路，属辽阳行省，其北境来降），设泰宁、朵颜、福余三卫（今热河地，朵颜地险而兵强，当时边外诸卫，都隶北平行都司），而宁王权居大宁以节制之（大宁，在今热河隆化县境），地跨辽、热、吉三省间。成祖起兵，虑宁王袭其后，诱而执之。以兀良哈（今乌梁海）兵从征有功，即位后，即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，徙治保定。以大宁地方，赠兀良哈。后遂徙大宁都司于保定。于是，开平势孤。宣宗时，徙治独石口。北边所守者，遂成今长城之线。而宣（宣化）、大（大同）为极边矣。若能始终保持太祖时

之形势，则对蒙古可取攻势，而至满洲，可有自热河趋吉林之快捷方式，不单凭出山海关趋辽阳之一道也。今既为成祖所坏，故对蒙古始终取守势，而趋满洲之快捷方式，亦遂断矣。（《本国史（元至民国）》，见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第71—72页）

土木之变

明朝的重用宦官，也是起于成祖时候的，而设“东厂”，使司侦缉事务，贻害尤烈。宣宗死后，英宗年幼，宠信太监王振。瓦剌酋长也先入寇，王振挟帝亲征。至大同，知兵势不敌，还师，为敌兵追及于土木堡（在今察哈尔怀来县西），英宗北狩。幸得于谦，扶立其弟景帝，固守京城。也先攻城不克，侵边又不利，乃奉英宗回国。怨恨于谦的人，乘景帝卧病，以兵闯入宫中，奉英宗复位，是为“夺门之变”，于谦被杀。

明中叶的内忧外患

英宗复位后，传子宪宗，政治都不见良好，宪宗死后，孝宗即位，较为清明。孝宗死，武宗继之，耽于游戏，始而信任太监刘瑾，听其专权妄为，后又宠幸武官江彬，引导他各处去游玩。人心震动，畿南盗起，宁王宸濠，又在江西造反，几至大乱。武宗死后，世宗继立。世宗在明朝皇帝中，驾驭宦官是最严的。然因相信神仙，怠于政事，一任宰相严嵩蒙蔽，国事遂至大坏。

先是元太祖后裔达延汗，又统一蒙古，留其幼子居漠北，是为喀尔喀部，达延汗与其孙徙牧近长城附近，是为察哈尔部。其孙子俺答居归化城，为土默特部。十六世纪中叶，俺答为边患最深。又从明初以来，就有所谓倭寇，因其时日本内乱不止，失败的武士和浪人，遂为寇于海外。明世宗时最为猖獗，沿海各省，大被其患。世宗殁，二传至神宗，年幼，宰相张居正当国，政治颇见振作。倭寇亦被良将戚继光、俞大猷等剿平。其时俺答受喇嘛教感化，不复为边患，而察哈尔部转炽。居正用戚继光、李成梁以守蓟、辽，东北边亦得安静。然居

正死后，神宗旋复怠荒，任用宦官，借开矿为名，到处骚扰索诈，又派他们到各省去做税使，穷乡僻壤，米盐琐屑无一得免。

日本从开国以后，历代都和虾夷为敌。八世纪末，遂置征夷大将军，以守卫东北，后来政权遂入其手，是为幕府。屡起争夺，幕府的权柄，又旁落于手下的将士，各据封土，全国分裂。神宗时，丰臣秀吉起而把他打定。因念乱源终未尽绝，想把他们牺牲到国外去，就起兵侵朝鲜。朝鲜李氏，因承平既久，兵备废弛。日兵至，不能御，其王逃到义州。神宗发大兵去救援他，初战胜利，旋因轻进中伏致败。于是“封贡”议起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。秀吉不受，又发兵侵朝鲜。明兵和他相持，迄无胜算。直到秀吉死后，日本兵才退回。这一役，明朝损失无算。

第三十章

明之衰亡与奋斗

明朝的内治，亦是败坏于成祖时的。太祖定制，内侍本不许读书。成祖破南京，颇得宦官为内应，才选官入内教习。从此以后，内之则有所谓秉笔太监，而宰相的票拟，决于内官的批红。外之则监军、出镇、奉使，无一件事不参预。明朝的权柄，就全落到宦官手里了。神宗深居宫禁，二十多年，不曾视朝。听凭一班太监，出去妄作妄为。朝臣又结党相攻，言官互相攻击。遇有国家大问题，往往先争意气，把国事的利害，反搁置了。

神宗之怠荒

明神宗时，日兵退出朝鲜之后，建州酋长努尔哈赤，早已起来，自称后金汗。神宗贪乐荒怠，有二十多年未坐过朝，每遇官职有缺，也不去补授，朝臣互相参劾，也置之不理，内政腐败已极，于是有三大案出来。

神宗怠荒 古今罕见

明朝的内治，亦是败坏于成祖时的。太祖定制，内侍本不许读书。成祖破南京，颇得宦官为内应，才选官入内教习。从此以后，内之则有所谓秉笔太监，而宰相的票拟，决于内官的批红。（票拟，谓由宰相对于奏本，拟具办法，写出进呈皇帝。批红，谓由皇帝用朱笔批示，决定办法。明时皇帝深居宫中，坐朝之时甚少，批红往往委之内监）外之则监军、出镇、奉使，无一件事不参预。明朝的权柄，就全落到宦官手里了。到神宗中年以后，而其衰乱更甚。神宗的怠荒，是历代君主所没有的。他深居宫禁，共有二十多年，不曾视朝。听凭一班太监，出去妄作妄为。朝臣又结党相攻。言官互相攻击，吏部举行察典

（即考查官吏成绩的好坏，以定升降黜陟），亦彼此互相排挤报复。遇有国家大问题，往往先争意气，把国事的利害，反搁置了，诒害颇大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》第二册，第140页；第三册，第13页）

东林党及三大案

当时有朝臣顾宪成，在东林书院（顾宪成是江苏无锡人，东林书院就在无锡）讲学，友朋很盛，时常议论朝政得失，批评执政贤否，时人称其徒为东林党。神宗晚年，有男子张差持梃入太子宫被获，东林党人说有人主使，谋危太子，非东林党人以为不过是疯汉，并无政治意义。这是所谓“梃击案”。神宗死后，子光宗继位，得疾，服宰相所荐医生的红丸，无效而死。东林党人以为是弑君，非东林党人以为与药无干，这是所谓“红丸案”。光宗死后，其子熹宗嗣位，光宗妾李选侍占住乾清宫，被东林党人勒令移出，非东林党以为不应上逼母妃。这是所谓“移宫案”。两党藉这三大案为题，攻争不息。非东林党人和宦官魏忠贤相结，把东林党著名的人下狱拷死，直到熹宗死，其弟思宗继位，才治魏忠贤及其同党的罪，但国政已不堪设想了。

学校与书院

学校的起源，本是纯洁的，专为研究学问的；惜乎后来变为国家养成人才之所。国家养成人才，原是很好的事；但因（一）事实上，国家所代表的，总是业经通行、已占势力的理论。所以公家所立的学校，其内容，总要比较陈旧些。社会上新兴的，即在前途有真正需要，而并非在过去占有势力的学科，往往不能尽力提倡。（二）而且其本身，总不免因利禄关系而腐化。于是民间有一种研究学问的组织兴起来，这便是所谓书院。书院是起于唐、五代之间的。宋初，有所谓四大书院者，朝廷咸赐之额。此外赐额、赐田、赐书的还很多。但书院并不靠朝廷的奖励和补助。书院之设，大概由（一）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。（二）或为好学者的集合。（三）或则有力者所兴办。他是无所为而为之的，所以能够真正研究学问，而且真能跟着风气走。在理学盛行时代，则为讲学的中心；在考据之学盛行的时代，亦有许多从

事于此的书院；即其确证。新旧两势力，最好是能互相调和。以官办的学校，代表较旧的、传统的学术；以私立的学校，代表较新的、方兴的学术；实在是最好的办法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279页）

流寇之祸

思宗在位年间，外则满洲格外猖獗，占据辽东，进犯京城。内则流寇大起，到处焚杀，流寇首领李自成破了京城，思宗自缢死。满洲乘机入山海关，逐去李自成，入北京称帝。

明人之奋斗

满洲入关后，明人奉福王即帝位于南京。满兵南下，屠扬州，杀督师史可法（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人，殉难后求尸不得，葬衣冠于扬州梅花岭），渡江入南京，虏福王北去。明人又立唐王于福州，同时明人又有奉鲁王称监国于绍兴，鲁、唐二王不睦，后唐王竟被满兵所杀。明人又立桂王于广东，竭力抵抗满兵，历十余年，西南诸地（桂王为明末帝，年号永历，故亦称永历帝。 他初立时，尚有两广云贵之地）尽失，逃奔缅甸，被缅人献出缢死。明将郑成功（郑成功，福建南安人，唐王赐姓朱，时称为国姓爷。桂王封为延平郡王，授招讨大将军）仍坚守台湾，直到清康熙帝时，才把台湾郑氏灭掉。明室虽然已亡，这民族奋斗的精神，为前代所没有。

第三十一章

中华民族的拓殖

西人东航之初，中国人的足迹，早已遍布南洋了。中国西北负陆，而东南面海。闽、广之北，限以重山，其民不易向中原分布，所以移徙到海外的很多。南洋群岛，气候和煦，物产丰饶，实在是中国的一片好殖民地。不但如此，中国人做事平和，凡事都以共存共荣为目的。以民族拓殖的成绩而论，通先后而观之，则我族南进之力，似优于北进。中国的文明，本植根于黄河流域，其北进者，当战国之世，即已拓展至今之热、察、绥及辽宁。其后遂无甚进展，甚至并此诸地，而有时亦不能保。南进者则长江、珠江、闽江诸流域，次第凝合为一体。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，虽未能如此，然吾族在其地之势力，仍极巩固。

中华民族近代的发展

中国民族，拓殖的能力，本来是很伟大的。尤其近代，对于东北和南方的拓殖，更为值得纪念的事情。

历代的南进

南洋一带，气候炎热，物产丰饶，本来是最适宜于拓殖的地方。中国人民，移殖其地，也由来很久了。据阿剌伯人的记载：九四三年顷，就有多数华人，在苏门答腊，从事种植。大约是避黄巢之乱前去的。宋时，正南诸国，以三佛齐［三佛齐即今之浡淋邦（Palembang），在苏门答腊东部，为其都会。南北朝称干陀利，唐称室利佛逝，宋称三佛齐，明改称旧港］为最强。东南诸国，以阇婆（阇婆即今之爪哇，唐宋均称阇婆，明概作瓜哇，当系爪哇之讹）为最强。而三佛齐

已有中国文字，阇婆屋宇，亦和中国相同。可见华人移殖的，必已不少。元时称爪哇为新邨，三佛齐为旧港。又可见华人移殖的次第了。

郑和的出使

中国历代政府，对于南方，都不甚注意，只有元、明两朝，是个例外。元世祖定中国后，遣使招致南洋诸国。因爪哇拒命，曾经用过一次兵，其事在一二九二年。明初交通外国，还承袭元代的规模。太监郑和，奉成祖之命，出使西洋。从一四〇五到一四三三年，前后奉使凡七次。郑和的出使，是带着水兵走的，所至加以宣谕，服从的赏赐金帛，不服的就威之以兵，曾经三擒番长。后来出使的人，没有一个不称道他的名字，以夸耀诸番的。

明代南洋的拓殖

明代马来半岛、爪哇、苏门答腊、吕宋、满剌加、浡泥都有多数华人移殖，从事开发。如爪哇的新邨，本来是荒凉之地，后来中国人流寓，聚集至千余家，遂成为富庶之区。诸番舶多往互市，又如马来半岛的锡矿，实在是华人发现的；其渔业，亦从华人移殖之后，才大形进步。现在半岛的锡矿，还有百分的六十四，属于华人；西岸的渔业，亦全在华人手中；可以为证。这都是指固定居民而经营农矿等事业的，其往来各岛间的商业操之于华人，那更不待论了。

明人对外拓展不靠政府助力

西人东航之初，中国人的足迹，早已遍布南洋了。中国西北负陆，而东南面海。闽、广之北，限以重山，其民不易向中原分布，所以移徙到海外的很多。南洋群岛，气候和煦，物产丰饶，实在是中国的一片好殖民地。不但如此，中国人做事平和，凡事都以共存共荣为目的。假使开发南洋的责任，而由中国负之，南洋群岛的土人，决没像现在饱受压迫，濒于灭亡之惨。徒以昔时狃于“不勤远略”之见，有此基础，不能助以国力，向前发展，这真是一个大错误。不但如此，因海

防的废弛，通商政策的不得宜，反还因海洋交通，而深受其害，这便是所谓倭寇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上册，第281—282页）

华人在南洋的政治势力

当时华人在海外，握有政治势力的也很多。譬如梁道明在三佛齐，闽、粤军民，渡海从之者数千家，雄视一方。明成祖遣使招致，道明即随使来朝。以副头目施进卿代领其众。其时又有个陈祖仪，在旧港做头目，专劫往来客人。郑和遣人招谕，祖仪却潜谋袭击，进卿告知郑和，把他擒获，就在旧港设立宣慰司，用进卿为使；进卿死后，还传女施二姐；则中国竟在南洋施行土司制度了。此类在南洋有势力的华人还很多。西人东来以后，也还有能和他们奋斗的。

民族拓殖南进优于北进

以民族拓殖的成绩而论，通先后而观之，则我族南进之力，似优于北进。中国的文明，本植根于黄河流域，其北进者，当战国之世，即已拓展至今之热、察、绥及辽宁。其后遂无甚进展，甚至并此诸地，而有时亦不能保。南进者则长江、珠江、闽江诸流域，次第凝合为一体。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，虽未能如此，然吾族在其地之势力，仍极巩固，已如前述。此其成绩，相去可谓甚远，盖一由地利之殊，一亦由近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以前，耕稼及工商之国，皆不能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，而蒙古地方，又适为东洋史上的侵略地带之故，此固无足为异。（《论外蒙古问题（上、下）》，原刊《平论半月刊》1945年12月第7期，1946年1月第8期）

拓殖的成绩

综观华人拓殖的成绩，实可说在世界诸民族之上，不论寒冷和炎热的气候，我们都能耐得住，这一点，尤为特出。所以不论南进北进，成绩都是好的。现在虽因国力不足，暂居他人羁轭之下。然其他的民

族，既然多数是中国人，则论民族自决主义，其地的主权，自然应属之于我，这一点，是任何人不能不承认的，只要我国民，能够为长期间的奋斗就是了。

第三十二章

元明之文化与社会状况

到十五六世纪间，王守仁出，而学风才一变。王守仁的宗旨，是以人心的灵明为“知”，这个知，是生来就有的，无待于学，所以谓之“良知”。良知是能够知是知非的，只有昏蔽，不会丧失。如此，凭你在“事上磨炼”也好，“静处体悟”也好，简单直捷，一了百了。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。明朝末年，顾炎武、黄宗羲等大儒出，学风又有转变。顾炎武的特色，在于（一）博学，（二）实事求是，（三）讲求实用。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，都是想做实事的。这时代的社会经济，颇为可怜。建设的情形，实在有些退化了。这一由于地方的款项，多提归中央；一由于北方遭外族长期占据的结果。

元明时代的学术思想

元明时代的学术思想，是承宋朝而渐变的。理学本兴起于北方，然到南宋时北方反而绝迹了。元兵下湖北，得儒者赵复，北方的学者，多奉以为师。程、朱之学，乃复行于北。直到十五六世纪间，王守仁出，而学风才一变。王守仁的宗旨，是以人心的灵明为“知”，这个知，是生来就有的，无待于学，所以谓之“良知”。良知是能够知是知非的，只有昏蔽，不会丧失。人只要时时磨砺他，使他晶莹，遵照他的命令做就得了。这个便唤作“致良知”。这是何等简易直捷的方法。

王守仁的“致良知”

王守仁之说，是承陆九渊之绪，而又将他发挥光大的。所以后来的人，亦把他和九渊并称，谓之陆王，和程朱相对待。守仁之说，以心之灵明为“知”，为人人所同具。无论如何昏蔽，不能没有存在的。此“知”是生来就有的，无待于学，所以谓之“良知”。人人皆有“良

知”，故无不知是非之理。但这所谓“知”，并非如寻常人所谓“知”，专属于知识方面。“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”，知其恶，自然就恶，知其善，自然就好。决非先知其恶，再立一个心去恶；先知其好，再立一个心去好的。好之深，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；恶之甚，自然万不肯去做。所以说“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”，所以说“知行合一”。既然知行就是一事，所以人只要在这“知”上用功夫，就一切问题，都解决了。时时提醒“良知”，遵照他的指示做：莫要由他昏蔽，这个便是“致良知”。如此，凭你在“事上磨炼”也好，“静处体悟”也好，简单直捷，一了百了。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，几经进化，然后悟出来的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上册，第295—296页）

理学家的流弊，在于空疏；王学既行，更加以“猖狂妄行”之弊；人心就要穷而思返了。加以明朝末年，内政腐败，外敌凭陵；所以顾炎武、黄宗羲等大儒出，学风又有转变。顾先生做《日知录》，说：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。国之兴亡，肉食者谋之；天下兴亡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。”他所谓“国”，就是现在所谓王朝；所谓“天下”，就是所谓国家，这是给民族主义以何等的意识。黄先生《明夷待访录》，对于君主政体，痛下攻击，也是专制时代的人所不能言，不敢言的。此外，他们关于根本问题的议论还极多。而他们读书又极博，一洗前此空疏之弊，又为清朝的考据学，导其先路。

顾炎武的特色

顾炎武的特色，在于（一）博学。他于学问，是无所不窥的。看他所著的《日知录》，便可以知道。（二）实事求是。无论讲什么学问，都不以主观的判断为满足，而必有客观的证据。看他所著的《日知录》《音学五书》，便可知道。（三）讲求实用。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，都是想做实事的，不是想谈学问的。所以他们讲学问，也带有实用的色彩。看顾炎武所著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便可以知道。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颜元、刘献廷等，都带有这种色彩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103页）

元明时代的文艺

文艺，大体也承宋人之风。其最有特色的，是戏曲同平话。古代俳优、歌舞、百戏，各为一事。优伶专以打诨、取笑为主。歌舞不演故事。扮演只百戏中间有。南北朝以来，才渐有以扮演兼歌舞的，然辞句和动作，仍不合所扮的人的身份。元朝的南北曲，才合三者为一，造成现在的旧剧。宋朝人的说话，就是现在所谓说书。说书的人，是各有其底本的；后来把这底本略加涂饰，就成为现在的平话。（现在通称为小说。然小说的名目，包括很广，平话只可算其中的一种）再进一步，就可专为阅读而著作了。此等文字，从元明以后，日趋兴盛，实为现代平民读物的大宗。

白话小说

骈散文与诗，皆为宋代之贵族文学。词虽可歌，其辞句亦不尽与口语相合。然当时自有以白话著书者。其大宗为儒、释二家之“语录”及“平话”。语录与文学无涉，而平话则为平民文学之大宗。平话即今人所谓白话小说，此等原用为说话之底本，非以供娱情者之目治，然岁月久而分化繁，遂亦成为可以阅读之书矣。此近世白话小说之缘起也。白话小说进化之途有二：（一）则真实之言愈少，而捏造妆点之言愈增。（二）则口语之成分日减，目治之成分日增。小说原于口说，后乃变为目治之物。口舌笔札，势不能尽相符合。于是专供目治之小说，与备说书人之用之底本，机势亦日趋变异。（《宋代文学》，第103—104、110、119页）

元明时代的社会阶级

元朝在中国时，民族间不平等的待遇颇多。其尤为暴虐的，则是行军之际，以俘虏为奴婢。这本是很不合理的，而元朝诸将，还要把降民诈称俘虏，汉人入奴籍的就更多（见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“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”条）。直到明朝，此等蓄奴的风气，还不能免；而明

时绅权特重，士大夫居乡的，都非常暴横，也是元时异族压制，遗留下来的恶习。

元时输入的宗教

元时外国的宗教，输入的也颇多。然最尊重的为喇嘛教，元世祖奉八思巴为帝师，为西藏宗教兴起之开始。但那时尚属红教，到明成祖时，宗喀巴创立黄教，传授达赖、班禅二喇嘛，青海、西藏、西康、蒙古，次第信从，遂有今日之盛了。基督教当元世祖时，许在北平设立教堂，但信他的也多是蒙古人，所以元亡而遂绝。只有回教在这时代，是呈相当的盛况，而元亡以后，亦还能保其相当的地位的。原来元朝所用的色目人，以西域人为最多，西域人大概是回教徒，他们多数和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畏兀儿人同族，所以传播较为容易。他们的保守其宗教，又比别种教徒，来得坚固些。现在西北、西南，回族遍布，各地方亦都有回教信徒，实在是开始于元代的。

元明时代的社会经济

这时代的社会经济，是颇为可怜的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说：“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，其城郭必皆宽广，街道必皆正直；廨舍之为唐旧创者，其基址必皆宏敞；宋以下所置，时弥近者制弥陋。”可见这时代，建设的大概情形，实在有些退化了。这一由于地方的款项，多提归中央；一由于北方遭外族长期占据的结果。武力的不竞，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呀！但是在这时代，也有一件事情，值得纪念的，那就是木棉之利的普及于全国。宋以前，木棉的种植，只限于交、广一带。宋末，才渐渐移殖到江南。有一个黄道婆，从崖州到松江，教人民以纺织之法，从此以后，木棉就衣被苍生了。山东运河的开成，也算这时代一件大事。

木棉的推广

麻、丝的使用，自然是一个大发明。丝的使用，起于黄帝元妃嫘祖（说不足信）。麻的发明，起于何时，亦无可考。知用麻、丝之后，织法的发明，亦为一大进步。现在衣服材料，为用最广的是木棉。其普遍于全国，是很晚的。此物，《南史·林邑传》谓之吉贝，误为木本。《新唐书》作古贝，才知为草本。《南史》姚察门生送南布一端，白居易《布裘》诗“桂布白似雪”，都是指棉布而言。但只限于交、广之域。宋谢枋得《谢刘纯父惠木棉》诗：“嘉树种木绵，天何厚八闽？”才推广到福建。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至元二十六年，置浙江、江东西、湖广、福建木棉提举司，则推广到长江流域了。其所以能推广，和纺织方法，似乎很有关系的。《宋史·崔与之传》：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，工作由妇人。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说：松江土田硗瘠，谋食不给，乃觅木棉种于闽、广。初无踏车椎弓之制。其功甚难。有黄道婆，自崖州来，教以纺织，人遂大获其利。木棉岭南久有，然直至宋元间才推行于北方，则因无纺织之法，其物即无从利用，无利之可言了。所以农工两业，是互相倚赖，互相促进的。（此节略据《陔余丛考》）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242、243、244页）明清之交，始及于黄河流域，棉织之自南输北者大减，民颇受影响，吴伟业曾作七古咏及之。民国初，浙江云和县之下流社会，冬尚未知衣棉。一物之传，其难如此。（《本国史（元至民国）》，见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第93页）

从宋到明币制的变迁

中国的币制自汉以前，本来金、铜并行（战国时已有用金的法子。譬如孟子之齐，齐馈兼金一百而不受，于宋馈七十镒而受，于薛馈五十镒而受。秦人散金行间以图六国，可为战国用金之证。后来秦并中国，制币为二，黄金以镒计，铜钱重半两。是为汉以前金铜并用之证），其时铜钱价贵，黄金除豪商、贵族外，人民是不很有的。后来贸易发达，铜钱增多，价格渐跌；黄金却因佛教输入，写经、塑像，消耗甚多，渐渐的减少了。乃于铜钱之外，兼用布帛。布帛是不能久藏的，且亦嫌其笨重，北宋时，四川乃发生纸币，谓之“交子”（交子

是货物交换媒介的意思。先是唐宪宗时代，已有一种“飞钱”制的发生。宋代官商，都感到旅行带多数的钱，累重不便，私自为券，是为“交子”），由富人主持其事，担任兑现。行之久，富人穷了，付不出现来，争讼繁兴，乃改由公家发行。宋、金、元、明四代都用他。宋人谓之“交子”“会子”“关子”，金、元、明都称“钞”。因历代都不免于滥发，价格都跌落到不能维持，明朝宣宗时候，就把他收回烧毁，不再行用了。纸币既跌到不能行使，铜钱又已绝迹，人民乃不得已而用银。其事起于金朝末年（事在金哀宗正大年间。正大，自公元一二二四至一二三一年。银的初起，是因铜钱被纸币驱逐净尽，用来代铜钱，以便小额交换的；不是因铜钱价格太低，而兼用银子的），到明朝废钞票后，就赋税也渐次收银了，然只是用私量的法子行使，始终没有铸造。和铜钱，亦听其各以本身的价格涨落，始终没有厘定主辅的关系或比价。

隋唐后币制之变迁

隋唐之世，宇内清平，交易复盛，铜钱感觉不足：国家既无此大量之经费整理，私铸、私销亦不能禁绝。既苦不足，又病紊乱。而交易之额日巨，铜钱运输，又觉不便。于是唐中叶后有飞钱，宋初有交子。飞钱乃后世之汇兑，交子则兑现之纸币也。由民间自为，而其后皆由政府之干涉，以至失败。货币为量物价之尺，其本身之价格宜划一而不宜纷歧。金银铜铁，本身同为实物，价格自难齐一。与其以两种以上之金属为主辅币，而设法维持其比价，自不如以一种金属为货币，而以纸代表其巨数。故飞钱、交子之兴，实合于货币进化自然之趋势，而为政府利用之以筹款之策所破坏。纸币既跌价不复可用，铜钱又被驱逐几尽而不能恢复，乃不得不代之以银。此事起于金之末年，至明宣宗时尽废钞币而大成。故中国之用银，乃所以代铜钱供零星交易之用，非以钱质量值轻；而以银与之相权。故对于以银为主币，视铜钱为辅币之理（即视铜钱之本身无价格，而视为银币之几分之几），始终不能了解。至前清末年，欲行银本位制，始终多所扞格，

直至法币行，而货币政策乃告成功。（《本国史复习大略》，见《吕思勉遗文集》上册，第655—656页）

第三十三章

本期结论

从秦始皇统一起，到明末止，为时约近二千年。这二千年中，我国独立为东亚的一个大国；四周诸国，文化程度，皆出我之下；此种情势，始终没有变更。对北族的民族斗争，我国盛强时，则能把他们征服；衰乱时，就不免反受其害。论经济状况，商业资本，始终是最活跃的。中国幅员广大，而劳力低廉，只要扩充销路，就有利可图了。正不必要想到节省劳力，以谋减轻成本，所以几千年来，大家不向使用机器上着想；即有聪明的人，偶尔想到，也不会被利用，而不久就失传了。这是中国人不能进于工业资本的原因。因为国太大了，人民参与政治，其势无从实行。政府监督之力，有所不及。多所兴作，往往反致民累，结果酿成政治上的一种“惰性”。

本期的民族斗争

从秦始皇统一起，到明末止，为时约近二千年。这二千年中，我国独立为东亚的一个大国；四周诸国，文化程度，皆出我之下；此种情势，始终没有变更。国际上最剧烈的，就是对北族的民族斗争，我国盛强时，则能把他们征服；衰乱时，就不免反受其害；如汉之后有五胡，隋唐之后有辽、金、元是。

文明民族何以反被野蛮民族所征服

从来野蛮民族的勃兴，和文明民族文化的传播，实在极有关系。在东西历史上，文明民族，都受野蛮民族的蹂躏。如中国之于辽、金、元、清，希腊之于马其顿，罗马之于日耳曼。说者多以为野蛮民族性质强悍，勇于战斗之故。其实不然，单靠勇于战斗，是不能征服人家的。然则其原因在哪里呢？我说这在社会组织上。因为我们的社会，

是在病态中进化的。一方面，文明程度，固然逐渐加高；一方面，组织病态，亦在逐渐加深。所以以文明程度论，固然文明人优于野蛮人；以社会组织论，实在野蛮人胜于文明人。我们说具体一些的话：在政治上，我们有阳奉阴违之弊；又有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诈起的弊。假使在两军相当之际，我们的将帅，就可以找一句推托的话，逗挠不前；我们的军需官，甚而可以藉图私利。这许多事情，在野蛮社会里，大抵是很少有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古来的人，也早就见到。譬如在《史记·秦本纪》里所载由余对秦穆公的话，《匈奴列传》里所载中行说（当时的一个汉奸）诘难汉使的话，都是这一个道理。历代文明民族，和野蛮民族相争之时，文明民族里所谓内奸，总是很多；甚至有倒戈以攻其祖国的；而野蛮民族中，此等现象，却极少。就可见得文明社会病状的深刻。因为病状深刻，所以其社会中的分子，利害和社会全体相反的多了。所以文明民族的文明，向野蛮民族传播，达到一定的程度，文明民族自身会有危险的，然则还是社会组织不正常的罪罢了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第126、130页）

本期的文化

文化：在本期中，也大有变迁。第一步，是诸子百家之学，均居次要，而儒家处于独尊的地位。第二步，是印度哲学输入，在思想界占重要的地位。第三步，便是儒、释思想调和，而发生一种新哲学了。以宗教论：则固有的崇拜对象，集合而成道教，和专讲人伦日用的儒教，出世的佛教，鼎峙而称三教。其余外国的宗教，输入的也还不少，但不占重要的位置。

本期的经济和社会组织

论经济状况，在本期之中，商业资本，始终是最活跃的。因为从统一以后，各地方的联结，已经密切，各地方的人，已经非互相倚赖不能生存了。虽然偏僻之处，保存其自给自足的状况的，也不是没有，然在全国中，是不占重要的地位的。从商业资本再进一步，就可达到工业资本了，然必销路畅旺，工价高昂，感到人力的不足，才会想到利

用机器。中国幅员广大，而劳力低廉，只要扩充销路，就有利可图了。正不必要想到节省劳力，以谋减轻成本，所以几千年来，大家不向使用机器上着想；即有聪明的人，偶尔想到，也不会被利用，而不久就失传了。这是中国人不能进于工业资本的原因。社会组织当封建制度初崩溃时，人心上还觉得很不惯，要想回复他。经过王莽的扰乱，也就无人再敢提及，习而安之了。

本期的政治

本期的政治，始终是采取放任主义的，所以一切事情，不免废弛，这也有个不得已的原因：因为国太大了，人民参与政治，其势无从实行（中国民权遗迹，都在古代；后世国家扩大之后，就没有了。这并非理论上以为不该有，只是限于事实，无从行使）。政府监督之力，有所不及。多所兴作，往往反致民累，结果酿成政治上的一种“惰性”。既集大权于君主一身，其势不得不图控制之便，于是治民之官日少，治官之官日多（顾炎武语，见《日知录》。如地方自治废弛；汉于郡县之上，又加州牧，元于路府之上，再加行省都是），尤以乱世为甚，一个控制不住，就成尾大不掉之势，如后汉和唐代的末年就是。这个唤作“外重”。然反之，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大，没有人能裁制他，则淫昏之君，甚至于奸佞之臣，以及宦官女谒等，又皆能为所欲为，民被其毒。总而言之：专制君主，本不是良好的政体，这二千年来，政治上的受其弊，也可以说是很深了。

官僚与放任消极之政治

中国的政治，是取放任主义的。从前的政治家，有一句老话，说“治天下不如安天下，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”。只这一句话，便表明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。中国的政治，为什么取这种消极主义呢？原来政治总是随阶级而兴起的。既有阶级，彼此的利害，决不能相同。中国政治上的治者阶级，是什么呢？在封建时代，为世袭的贵族。封建既废，则代之以官僚。所谓官僚，是合（一）官；（二）士，即官的预备军；（三）辅助官的人，又分为幕友、吏胥、差役；（四）与官相

结托的人，亦分为绅士、豪民。此等人，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，都是要剥削被治者以自利的。固然，官僚阶级中，未尝无好人，视被治阶级的利害，即为自己的利害。然而总只是少数。这是因为生物学上的公例，好的和坏的，都是反常的现象，只有中庸是常态。中庸之人，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，亦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的，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位。社会的组织，使其利害与某一部分共同，他就是个利他者。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对立，就不免要损人以自利了。所以官僚阶级，决不能废督责。（督责二字，为先秦时代法家所用的术语。其义与现在所谓监察有些相似，似乎还要积极些）然中国地大人众，政治上的等级，不得不多，等级多则监督难。任办何事，官僚阶级都可借此机会，以剥民以自利。既监督之不胜其监督，倒不如少办事，不办事，来得稳妥些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行放任政策，总还可以苟安，行干涉政策，就不免弊余于利，就是为此。因此，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48—149页）

第三编

近世史

第三十四章

中西交通之渐盛与西学之输入

近代中西相互的关系，和中古时代不同。中古时代，往来的不过商人；国家除偶通使命外，无甚深切的关系。近代则不然，西洋各国，都要尽力向海外发展了。基督教传布于中国，唐、元时代，即已有之，但对中国社会，没有发生什么深切的影响。近代西人的发明，足以补我们之所不及的，是科学，所以科学的输入，实在是一件大事。科学，最初是由教士之手输入的。科学首先被中国人采用的，为天文、历法、地理、数学、炮术、医学等，可见当时对于科学，还只知道应用一方面，而没有知道他的真价值啊！

新航路的发现

从蒙古西征以后，土耳其人被迫立国于小亚细亚，后来渐次强盛，侵入欧洲，至十五世纪，而地中海东岸和黑海沿岸之地，尽为所据，对于欧人东行的，异常苛税为难。欧人乃想另找一条路，以达东方，其结果，就有两条新航路发现。新航路发现以后，葡萄牙人首先东来，一五一六年到广东，至一五五三年，遂租得澳门为根据地。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吉利等，相继东来。向中国通商，都受葡人阻碍。西班牙人乃占据菲律宾，开辟马尼剌；荷人则占据苏门答腊、爪哇、满剌加、中国台湾；南洋非复郑和航行时的南洋了。英国和法国，在印度竞争，而英人较为得势。

新航路发现前的中西交通

从亚洲的东方到欧洲，陆路本有四条：（一）自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。（二）自蒙古经天山北路，出两海之间（谓咸海、里海）。（三）自天山南路逾葱岭。（四）自前后印度西北行，两道并会于西

亚。第一路荒凉太甚。第二路则沙漠地带，自古为游牧民族荐居之地，只有匈奴、蒙古自此以侵略欧洲，而两洲的声明文物，由此接触的颇少。葱岭以西，印度固斯以南，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。然第三路有沙漠山岭的阻隔，第四路太觉回远，而沿途亦多未开化之国，所以欧、亚两洲，虽然陆地相接，而其交往的密切，转有待于海路的开通。自欧洲至东洋的海路：一自叙利亚出阿付腊底斯河流域；二泛黑海，自阿美尼亚上陆，出底格利斯河流域。两路均入波斯湾。三自亚历山大黎亚溯尼罗河，绝沙漠而出红海。这都是自古商旅所经。自土耳其兴，而一二两道，都入其手，第三道须经沙漠，不便，乃不得不别觅新航路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7—8页）

中西相互的关系

近代中西相互的关系，和中古时代不同。中古时代，往来的不过商人；国家除偶通使命外，无甚深切的关系。近代则不然，西洋各国，都要尽力向海外发展了。中国对于远方人，素取怀柔主义。通商为两利之事，向为历代所欢迎。唯（一）西人航海的，都是冒险的青年，未免有不规则的举动。（二）又中国历代，对于海寇，都是疑忌的。明朝人经过倭寇之患，疑忌更甚。西人船坚炮利（《明史·外国传》说："荷兰所恃，唯巨舟大炮，舟长三十丈，广六丈，炮有铜有铁，巨铁炮长二丈，发之可洞裂石城，震数十里，世所称'红夷炮'即其制也。"案中国初得到的炮，叫"佛郎机"，后来所得的叫"红夷"。清朝的时候讳"夷"字，改称为"红衣"，并封他为"红衣大将军"；"佛郎机"是中国人称葡萄牙、西班牙人之辞。称荷兰为"红夷"，亦曰"红毛番"），也足以引起华人戒惧之心。（三）加以宗教的传播有些格不相入，中西相互之间，就未免形成隔阂了。

中西隔阂之缘由

中国和西洋的交通，由来甚早，历代西方的估客，梯山航海而来的不少。近世欧人东来，自然犹以敌意遇之。然（一）历代东西交通，所贩卖的，大概是珍奇之品，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，见之自然适得其

反。而且交广之地，天高皇帝远，肆意诛求，究难发觉。所以通商地方，或专司通商事务的官吏，特别容易贪污。（二）商人唯利是图，自更无所不至。主人畏客，乃五口通商以后的特别的情形。客子畏人，则千古一辙。在外商无力争持，中国官吏不能秉公判断的情形下，中国商人，自然要极其力之所能至，以榨取外商。（三）班超对任尚说：能来西域的吏士，必非孝子顺孙。何况远越重洋的冒险家？此辈从其一方面说，自然是个英雄，从其又一方面说，究竟是怎样一种人，却很难下个断语。怀抱大志的首领如此，何况其余附随的人呢？当时各商船的水手等，甚有类于海盗的行为。因此，很足以引起大多数对通商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民的反感。（四）中国历代不甚奖励人民向海上发展。因为海上的情形，不甚熟悉，对于海盗不易犁庭扫穴，遂觉其较诸陆上的盗贼，可怕得多。明朝承倭寇之后，此等恐怖心尤甚。又加当时的欧洲人，船炮的坚利，已非中国所及。所以对于他尤为畏恶，积此四端，遂酿成近世中西交通之始，一种隔阂的情形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63—164页）

教士的东来

基督教传布于中国，唐、元时代，即已有之，但对中国社会，没有发生什么深切的影响。近代西洋宗教改革，旧教在欧陆，渐次失势，想传播于海外。西人东来的时候，就有教士跟着同来。教士中首先到中国的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），事在一五八二年。他先到广东肇庆，学习华文、华语，改着华装。然后到韶州，设立天主堂，继到南京，后往北京广结当时的士大夫，并向神宗献方物，神宗许其在北京建立天主堂，时在一六〇五年。士大夫很多和他往来，然亦有攻击他的，至一六一六年，遂遭禁止，教士都逐回澳门。直到满明启衅，明朝需用大炮，召他们监制，教禁才无形解除。

科学的输入

近代西人的发明，足以补我们之所不及的，是科学，所以科学的输入，实在是一件大事。科学，最初是由教士之手输入的。中国人也很欢迎他，初期精通西学的人，如徐光启、李之藻等，他们的相信西教，自然还是因科学引起的。科学首先被中国人采用的，为天文、历法、地理、数学、炮术、医学等，汤若望（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）东来后，徐光启便荐他参与修历的事。到明朝末年才修成。未及颁行，而清朝人入关。汤若望上书自陈。清朝就用其所定的历法，谓之时宪历。汤若望亦被任为钦天监监正。清世祖死后，习旧历法的杨光先，上书攻击。汤若望等一时得罪。但到后来，毕竟因旧历法的不准，仍黜杨光先而用南怀仁（Ferdinand Verbiest）。清圣祖是最留心于格物之学的，他所任用的西教士亦很多。但是，这时候中国人对于科学，究竟还未能认识其真价值。所以杨光先攻击西教士，就说“其制器精者，其兵械亦精”，疑心他的将来要成大患，就是清圣祖，也说：“千百年后，中国必受西洋各国之害。”（杨光先的话，见其所著的《不得已书》。清圣祖的话，见其《御制文集》，后来同治年间，反对新法的大学士倭仁奏议中曾引之。当时各种科学书，差不多都有译著，但不受人注意）可见当时对于科学，还只知道应用一方面，而没有知道他的真价值啊！

科学输入的阻碍

中国和外国的交通，也有好几千年了。虽然彼此接触，总不能无相互的影响，然而从没有能使我国内部的组织，都因之而起变化的。其有之，则自近世的中欧交通始。这其间固然有种种的关系，然而其最主要的，还是东西文化的差异。东西文化最大的差异，为西洋近世所发明，而为中国所缺乏的，便是所谓科学。所以科学的传入，是近世史上最大的事件。科学与宗教，虽若相反，其最初传入，却是经教士之手的。杨光先曾说：“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，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。”他又说：“他们不婚不宦，则志不在小。其制器精者，其兵械亦精。”“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，来不稽其所从来，去不究其所从去；行不监押，止不关防；十三省山川形势，兵马钱粮，靡不收归图籍，

百余年后，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。”杨光先的见解，在今日看起来，似乎是偏狭，是顽固。但是中国历代，本有借邪教以创乱的人；而基督教士学艺之精，和其无所为而为之的精神，又是中国向来没有看见过的。这种迷信的精神，迷信不深的中国人，实在难于了解。杨光先当日，有此疑忌，却也无怪其然。不但杨光先，怕也是当日大多数人所同有的心理。即如清圣祖，他对于西洋传入的科学，可以说是颇有兴味的。对于基督教士，任用亦不为不至。然而在他的《御制文集》里，亦说“西洋各国，千百年后，中国必受其累”。这正和杨光先是一样的见解。人类的互相了解，本来是不大容易的。在学艺上，只要肯虚心研究，是非长短，是很容易见得的。但是国际上和民族间的猜忌之心，一时间总难于泯灭，就做了学艺上互相灌输的障碍。近世史的初期，科学输入的困难，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1、13、14页）

第三十五章

清代之勃兴

清朝的初起，和辽、金、元情形又微有不同。辽、金、元初起时，都不甚了解中国的情形。清朝则未入关时，已颇能译汉书、用汉人了。清世祖立，年方六岁。叔父多尔衮摄政，闻北京危急，勒兵于关外以伺隙，恰有守将吴三桂，因李自成掠其爱妾，开关降清，清人和他合兵，把李自成打败。清朝初入关时，不意中国的抵抗力，如此薄弱，所发檄文，还承认福王的自立，虽下剃发之令，亦旋即取消。清朝对西南，兵力本不够进取，这时候，颇想维持现状，而桂王因孙可望跋扈，求助于李定国，可望攻之，大败，转而降清。

清朝的起源

清朝的祖宗，就是明朝的建州卫指挥使，名猛哥帖木儿（清朝人自己说：他的祖宗，是天女吞朱果而生，姓爱新觉罗，名布库里雍顺，这全是有意造作的话，不足为据），地在朝鲜会宁府河谷，后为七姓野人所杀。子董山，弟凡察，分为左、右二卫，迁居佟家江流域。董山因桀骜，为明所诛戮，于是左卫衰而右卫强。明李成梁守辽东时，右卫酋长阿台背叛。满洲部人尼堪外兰，引李成梁的兵，把他围困，阿台是左卫酋长叫场的孙婿，他失的女婿。（叫场，《清实录》作觉昌安，追谥景祖。他失，《清实录》作塔克世，追谥显祖）叫场、他失入城，劝他投降，阿台不听。城破，叫场、他失亦被杀。他失的儿子，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，向明朝呼冤，明朝仍给以官职。此时努尔哈赤势甚微弱。后来渐次强盛，灭掉尼堪外兰，征服满洲和长白山两部，并俘掠东海部，以增加人众，遂犯扈伦，灭哈达。哈达、叶赫是明人称为“南关”与“北关”的。哈达即亡，明人乃遣兵助守叶赫。

明朝的战争

一六一六年，努尔哈赤叛明，明人派大兵二十万，分四路东征，三路皆败，清兵遂灭叶赫，进陷辽、沈，清太祖从新宾（清时称兴京）迁都到辽阳，又迁都沈阳。明朝因调度乖方，辽西又多残破，拟尽撤守备入关，而袁崇焕誓以死守宁远，清太祖攻之，大败，受伤而死。太宗立，先征服朝鲜，回兵攻宁远、锦州又大败，太宗乃击破察哈尔部，从喜峰口入寇。袁崇焕亦发兵入援，明思宗中太宗反间之计，把袁崇焕杀掉，锦州遂不能守。然山海关仍屹然为重镇，清兵虽从长城各口深入，蹂躏河北、山东，到底不敢久留。

明军事失败之原因

明之兵部，有干涉参谋之权，前敌将帅之行动，受其指挥；而朝中并非兵部之人员，亦得干涉兵部之行动，往往发言。兵部受其牵掣。此等非兵部之人员，其于兵略何知，其识已不如兵部；而兵部居内，其于前敌战阵之事何知，其识复不如前敌将帅。而前敌将帅为兵部所制，兵部为其他无识之人员所制，此明军事上失败之大原因也。（《本国史（元至民国）》，见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第85页）

清朝的入关

明朝的流寇，起于一六二八年，因剿办不得其法，到处入关流窜，遂成不可收拾之势。后来分为两大股：张献忠入川；李自成在陕西僭位，东陷山西，分兵犯北京，思宗自缢而死，时为一六四四年。先一年，清太宗亦死了，子世祖立，年方六岁。叔父多尔衮摄政，闻北京危急，勒兵于关外以伺隙，恰有守将吴三桂，因李自成掠其爱妾，开关降清，清人和他合兵，把李自成打败。自成逃回陕西，清世祖遂入北京。

清与辽、金、元之不同

清朝的初起，和辽、金、元情形又微有不同。辽、金、元初起时，都不甚了解中国的情形。清朝则未入关时，已颇能译汉书、用汉人了。当太祖之时，憎恶汉人颇甚，当时俘获汉人，都发给满人为奴。尤其是读书人，得者辄杀。到太宗时，才知道欲成大业，单靠满洲人，是不行的。所俘汉人，都编为民户，令其与旗人分居，且另选汉官治理。对于读书人，则加以考试。录取的或减免差徭，赏给布帛。于明朝的降臣、降将，尤其重视。清朝当日的创业，和一班投效的汉人，如范文程、洪承畴、吴三桂等，确是很有关系的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7页）

明朝的灭亡

明人立福王于南京，荒淫无度，朝臣还要互争党见，诸将又不和。清兵攻陕西，李自成走死湖北，清兵遂移攻江南，扬州失陷，督师史可法殉国。福王北狩，清兵直打到杭州，乃北归。清朝初入关时，不意中国的抵抗力，如此薄弱，所发檄文，还承认福王的自立，虽下剃发之令，亦旋即取消。至此，乃又下令强迫剃发易服，以摧挫中国人的民族性，人心大愤，江南民兵蜂起，然不久即失败。清兵进陷闽、浙，明朝在宁波监国的鲁王，逃走舟山，后来舟山失陷，乃到厦门依郑成功。在福州正位的唐王殉国，清兵遂陷广东。明人又立桂王于广西。清朝又遣吴三桂入川，张献忠败死。然川南、川东，都附明桂王。李自成余党在湖南，亦受招抚，助明抗清，江西、广东，亦都反正，合云南、贵州共有七省之地，但残破之余，到底敌不过新兴的气焰。至一六五一年，各地相继失陷，桂王穷居南宁，遣使到贵州，求助于张献忠余党孙可望，可望遣李定国等分路出兵，杀败吴三桂，恢复四川，并攻破桂林，把明将降清的孔有德诛戮。清朝对西南，兵力本不够进取，这时候，颇想维持现状，而桂王因孙可望跋扈，求助于李定国，定国派人迎王入滇，可望攻之，大败，转而降清。明降臣洪承畴守湖南，因请清兵大举。李定国力战不胜，乃奉桂王入缅甸，吴三桂又发大兵出边胁迫，缅人乃奉桂王入三桂军，为其所害，时在一六六二年，明朝至此灭亡。

三藩的灭亡

明朝既灭亡，清朝乃封降将三人，以守南方之地，是为“三藩”。一六七三年，因撤藩令下，吴三桂首先举兵。耿、尚二藩，亦都响应。贵州、广西、四川、湖南，先后陷落。声势颇张，然三桂年老，不能用弃滇北上之计，徒和清兵相持于湖南、江西，兵势遂渐促。耿、尚二藩，又转而降清，三桂死后，其孙遂于一六八一年，为清所灭。

台湾郑氏

然而天南片土，还保存着汉族的衣冠，这便是台湾郑氏。先是清兵破福建，实由明朝叛臣郑芝龙，暗中输款，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独不肯，据金门、厦门，和清朝相抗。清攻桂王时，成功大举入长江直薄南京，因势孤退出，旋从荷兰人手里，夺取台湾，以为根据地。成功死后，子经继立。三藩平后，清朝颇想同他讲和，而郑氏的降将不肯。郑经卒后，国有内乱，一六八三年，遂为清人所灭。

第三十六章

清初之政治及武功

清朝初入关时，屠杀是很厉害的。圈占民地，以给旗人，贻害亦很烈。但其政治，确较明末为整饬。圣祖在位岁久，勤于政事。世宗虽然残忍，亦颇严明，与民休养生息，便又现出富庶的景象了。中国的国民，自助的力量，本来是很大的。只要国内承平，没甚事去扰累他，那就虽承丧乱之余，不过三四十年，总可复臻于富庶。清朝康熙年间，又算是这时候了。武功是时会之适然。中国的国情，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。所以自统一以后，除秦汉两朝，袭战国之余风，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，其余都是守御之师。不过因了国力的充裕，只要（一）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，（二）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，即足以因利乘便，威行万里。历代的武功，多是此种性质，而清朝，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。

清初的政治

清朝初入关时，屠杀是很厉害的。圈占民地，以给旗人，贻害亦很烈。但其政治，确较明末为整饬。圣祖在位岁久，勤于政事。世宗虽然残忍，亦颇严明，与民休养生息，便又现出富庶的景象了。高宗虽然奢侈，表面上也还能维持着这个盛况，所以从一六八一年三藩平定起，到一七九五年，即乾隆的末年，总算是清朝的治世。清初，汉人虽因流寇的骚扰，军人的专擅作伥，精疲力尽，不得不屈服于异族羁轭之下，然而反抗的心理，总是不能没有的。但满族为收拾人心起见，亦颇知用牢笼政策以为缓和。所以圣祖、高宗时，曾两开博学鸿词科；又网罗儒臣，编纂书籍（编纂书籍以圣祖、高宗时为最多，圣祖时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万卷，高宗时之《四库全书》三万六千余册，尤为最大编著），一面又大兴文字之狱，把明人著述，涉及满洲

事实的，都加以销毁（文字之狱，如圣祖时，庄廷 《明史》案，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，皆至灭家。世宗、高宗时，因诗文字句有毁谤嫌疑而起大狱者更众。余见下章）；以摧挫士气。禁止满、汉通婚；满人不得学汉人风俗。满兵驻防各省的，亦和汉人分城而居；并把满、蒙封锁起来，不许汉人移殖。这许多，都是金、元人所想不到，而亦不敢行的。

兴于统一，败与内溃

大凡民族的强盛，总是从统一同族起的。清太祖之兴，也是如此。大凡北族的灭亡，总是由于内溃。而其内溃，则总是由于宗室之中，相争不决的。这是从匈奴以后，都是如此。读者请把匈奴、突厥、薛延陀等等的事情，一加考校，自然见得。其互相争而能够终定于一的，就可以暂时支持。辽、金两朝的初叶，就是其适例。清朝从太宗到世宗，累代相承，总算把骄横的宗室压服。其部族，就可以保得不至于内溃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三册，第31、47页）

盛世与国民的自助力

中国的国民，自助的力量，本来是很大的。只要国内承平，没甚事去扰累他，那就虽承丧乱之余，不过三四十年，总可复臻于富庶。清朝康熙年间，又算是这时候了。而清初的政治，也确较明中叶以后为清明。当其入关之时，即罢免明末的三饷。又厘订《赋役全书》，征收都以明万历以前为标准。圣祖时，曾叠次减免天下的钱粮。后来又定“滋生人丁，不再加赋”之例，把丁赋的数目限定了。这在农民，却颇可减轻负担。而当时的用度也比较地节俭。所以圣祖末年，库中余蓄之数，已及六千万。世宗时，屡次用兵，到高宗初年，仍有二千四百万。自此继长增高，至一七八二年，就达到七千八百万的巨数了。以国富论，除汉、隋、唐盛时，却也少可比拟的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9页）

蒙回藏的平定

清朝的武功，是颇有可观的。这也并不是满洲人有什么力量，还不过是利用中国的国力罢了。清朝当入关前，漠南蒙古，即已为其所征服。漠北蒙古，则不过每年送他一匹白驼，八匹白马（清朝谓之“九白之贡”），还无甚深切的关系。此时蒙古信喇嘛教，已渐流于弱；而天山北路的卫拉特渐强。西藏人所信的喇嘛教，系唐中叶后，由印度传入的。其后专炫幻术，颇多流弊。十五世纪，宗喀巴生于西宁，乃改良教义，另创新派。他的信徒，都着黄衣冠，和旧派的红衣冠区别。世因称旧派为红教，新派为黄教。黄教推行日广，至十六世纪中，遂普及青海和蒙古。（其时俺答征服青海，留两个儿子据守。他这两个儿子，先相信了喇嘛教，因而感化到俺答）黄教教规，不许娶妻。教中尊宿，都以呼毕勒罕（再生的意思。据他们说：教中的尊宿，来去都可以自由，死前即预知将来托生何所的。可以依着他的指示，去找这地方新生的孩子。找到了，用种种方法试他，决定他是再来人，就把他迎接回去，施以特别的教养；达到一定年龄，就可以承袭其地位和职务。如其没有预示托生之所，也有用占卜的方法决定的），主持教务。宗喀巴两大弟子达赖和班禅，都住在拉萨；其第三大弟子哲卜尊丹巴，则住居库伦；而后藏拉达克的藏巴汗，仍为红教护法。十七世纪中，西藏第巴桑结（第巴，官名，达赖喇嘛只管教务，政务是另行设官管理的，第巴即其中之一），招和硕特固始汗入藏，攻杀藏巴汗，奉班禅居日喀则，固始汗留子达延汗在西藏，而自己徙牧青海。桑结又招准噶尔噶尔丹入藏，把达延汗攻杀。于是准噶尔统一四卫拉特，势大张，遂徙牧阿尔泰山，突发兵袭外蒙古，喀尔喀三汗（外蒙喀尔喀，有汗号的，共有三人：一土谢图汗，一车臣汗，一扎萨克图汗。清世宗时，扎萨克图汗所属郡王策凌，曾自练精兵，把准噶尔打败。清朝乃使之独立，是为三音诺颜汗。喀尔喀自此以后，就有四汗了），都复走漠南，时在一六八九年。清圣祖为之出兵，击破准噶尔，噶尔丹因旧地为其兄子所据，穷蹙自杀，喀尔喀还治漠北。圣祖死，和硕特谋叛，亦给世宗打平。高宗时，准部内乱，又乘机把他征服。天山南路，从元朝以来回教盛行，回教教主后裔，居于喀什噶尔，甚得人民尊信。准噶尔强时，曾将其酋长兄弟两人，

拘质于伊犁，清平准部后放归。二人却据天山南路，和清朝相抗，又给高宗打平，时为一七五九年。于是葱岭以西诸回部，亦都来朝，是为清朝武功最盛之世。

武功是时会之适然

武功是时会之适然。中国的国情，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。所以自统一以后，除秦汉两朝，袭战国之余风，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，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，喜欢立功绝域外，其余都是守御之师。不过因了国力的充裕，所以只要（一）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，（二）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，即足以因利乘便，威行万里。历代的武功，多是此种性质，而清朝，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。自唐中叶后，喇嘛教输入吐蕃，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。明末，俺答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。其结果，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征服，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，连蒙古人的性质，也渐趋向平和，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。在清代，塞外的侵略民族，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。而其部落较小，侵略的力量不足，卒为清人所摧破。这是清朝人的武功，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519—520页）

西南诸国的平定

安南从脱离中国自立后，南并占城，国势颇盛。其西邻的暹与罗斛，则明初合并为一国，受封于中国，为暹罗国王。更西，在半岛的西部，元、明两代，还大都是中国的土司。其后中国实力不能及，而缅甸及自立为国。十八世纪后半，缅甸强盛，吞并暹罗，又侵犯云南，清高宗出兵讨伐，不胜。安南当明末，其王黎氏，曾为其臣莫氏所篡，后藉其臣郑氏、阮氏之力，才得复国，而颇薄待阮氏，阮氏遂南据顺化形同独立。这时候，阮氏又为西山的阮文岳所灭，是为新阮，并灭黎氏，清高宗讨伐新阮，亦不得利。然两国都怕清朝再出兵。华人郑昭，流寓暹罗，曾做过暹罗的官。暹罗亡时，郑昭罢职在家，后来亦起兵恢复暹罗，将缅甸驱逐。缅甸又怕他和中国夹攻，亦都请和朝贡于清。西藏边外的廓尔喀，曾举兵犯藏，给清朝打败。哲孟雄不

丹，则本是西藏的属部，这三国亦都来朝贡。清朝的疆域，就和汉、唐相颉颃了。

清史的分期

清代的历史，可分为前后两期：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四朝，国内大体平安，对外的用兵，亦多胜利，此时虽已与西洋交通，尚未感觉其影响，纯为闭关独立之旧，其情形颇与汉、唐盛世相似，此时期约历一世纪半，可称为前期。至嘉庆时而内乱作，道光时五口通商，渐受外力影响，而情形一变矣。在前期一世纪半中，海内尚未大定，然政治及社会之情形，业已好转。中国社会，本来在秩序安定的情形下，数十年间，即可转为富庶。康熙中叶后，适逢其时，故国内渐见升平气象。雍正承之，行政稍加严肃，于政治风纪及财政，均有裨益。乾隆时遂臻极盛。高宗性本奢侈，中年后任用和珅，大肆贪黩，政治风纪大坏。而社会情形，亦适逢恶化之时。于是哀机潜伏，至其末年，内乱爆发，转入后期矣。（《本国史（元至民国）》，见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第90页）

第三十七章

中华民族之扩大

中华民族的扩大，本已不止一次，而到近代，则其成绩尤为显著。其在北方，因蒙古受了喇嘛教的感化，满洲人又入据中原，三百年来，北境均平安无事，遂成为拓殖的好机会。辽东西久为中国郡县；就吉、黑两省，也很适宜于农耕；所以这三省，拓殖的成绩，最为优良。新疆方面，汉人移殖的较少；西藏、青海更少。然这两方面，靠了宗教的力量，实在同化了许多复杂的民族。西洋各国因争教而致分裂，我们则信仰自由，各种宗教，互相尊重，因此而收到团结联合的效果，这真是民族的“度量相越”了。

满蒙的同化

中华民族的扩大，本已不止一次，而到近代，则其成绩尤为显著。其在北方，因蒙古受了喇嘛教的感化，满洲人又入据中原，三百年来，北境均平安无事，遂成为拓殖的好机会。清朝对于汉人，猜忌是很深的，山海关以外，都不许汉人移殖；即蒙古亦然。（清朝的奉天将军，每到年终，要奏报本年并无汉人私行出关，直到光绪年间，还是如此。真可发一大噱。蒙古从前汉人前往经商，是要领有票据的。居住不准满一年。且不许在蒙古造屋）然此等无谓的禁令，敌不过汉人自然膨胀的力量。所以从清朝入关后，山东人民，渡海前往东三省的，依旧不少。从海口沿官道深入，渐次分布于内地。就是因犯罪遣戍到黑龙江的人，也有在那里成家立业的。咸、同乱后，汉人更出长城，移殖到蒙古东部，又由此而入吉、黑。清朝明知禁令之无益，亦就默认其解除。而此时外患渐亟，并觉得东三省有充实的必要，就更有官自开放，招人前往垦殖的事情了。辽东西久为中国郡县；就吉、黑两省，也很适宜于农耕；所以这三省，拓殖的成绩，最为优良。满

语、满文几于不复存在。一切风俗，亦和内地无异。据最近的调查，三省的居民，十五分的十四，都是汉人。这都是前人辛苦经营的成绩呀！次之就要算内蒙了。

只有“移民实边”，不可“限民虚边”

关东三省，是清朝的老家。（其实也算不得他的老家，因为辽东西本来是中国的郡县）他入关以后，还想把他保守着。（倘使老家给汉人占据起来，他就无家可归，真正在中原做了客帝了）而东三省的形势，和蒙古的关系，又很为密切的。所以想把这两处，通统封锁起来。关东三省中，只有少数的“民地”。此外就都是“旗地”和“官地”，汉人出关耕垦，是有禁的。蒙古亦有每丁的私有地，和各旗公共之地。都不准汉人前往垦种，就汉人前往蒙古经商的，也要领了票据，然后可往。且不得在蒙古住满一年。不准在蒙地造屋。他的意思，无非怕汉蒙联合，要想把汉蒙隔绝了，满蒙却联结一气，以制汉人，然而这种违反自然趋势的命令，到底敌不过汉族天然膨胀之力。当康熙时，山东的人民，已经陆续地向关东移住了。这种封锁的政策，虽然不能阻止汉人的自然移殖，毕竟把汉人的移殖，阻止得缓了许多。现在蒙满之地，还是弥望荒凉，都是这种封锁政策的罪恶。倘使当初不存一“联合满蒙，以制汉人”的谬见，早早把满蒙开放，设法奖励汉人的移殖，到现在，就不敢说和内地一样，怕总比现在的情形，充实的加倍不止。决不会有后来抱着满蒙这么一大片的地方，反忧其“瓠落而无所容”的患害。不但如此，汉官昏愦，到底也比什么将军副都统等清楚些。（就使官都昏愦，幕里也总有明白的人）倘使早早招徕汉人，设置州县，沿边的情形，也总要比较明白。像前五四、五二两年（一八五八、一八六〇），一举而割掉几千万方里的地方的事情，怕不会有罢？总而言之，从古以来，只听见“移民实边”，没听见“限民虚边”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58、59—60页）

回藏的开拓

新疆方面，汉人移殖的较少；西藏、青海更少。然这两方面，靠了宗教的力量，实在同化了许多复杂的民族。回族在现在，只是一个宗教上的名词。所谓汉回，除信仰回教以外，其余一切，与汉人无异。就是别种民族，如缠回等，亦因其信仰回教，而风俗渐趋于同一了。青藏方面亦然，以该地方地势的崎岖，民族的复杂，非藉喇嘛教的力量，断不能像现在的大略趋于一致的。西洋各国因争教而致分裂，我们则信仰自由，各种宗教，互相尊重，因此而收到团结联合的效果，这真是民族的“度量相越”了。

西南的开拓

西南方面，历代的开拓，亦是到近代才竟其全功的。湖南和贵州的东部，属于洞庭流系，为苗族的根据地。其中唯湘江流域，开拓最早。澧、沅、资三水流域，则是从隋唐到清朝，逐渐开辟的。贵州于一四一三年列为布政司（明成祖永乐十一年），其东南部的苗疆，则到清朝雍正年间强制执行“改土归流”的政策（“改土归流”为雍正四年云南巡抚兼总督鄂尔泰奏请用此策以平苗疆。所谓改土归流，就是改土司为流官的意思）才算成功。广西一省，明代用兵最多。雍正改流时，开辟亦不少。云南当明时，还全省都是土官，就正印是流官，亦必以土官为之副。后来逐渐改流，亦是到清朝雍正年间大定的。四川西北境的大小金川，清乾隆时，抗命最烈，前后用兵五年，糜饷七千万，然后平定。一时虽然劳费，却也获长治久安之功。总而言之：西南一带，现在只是地利有待于开辟，以民族论，可说是没有问题了。

西南的改土归流

清朝对于川、滇、黔、桂诸省的用兵，虽然事在疆域之内，然和西南诸省的开拓，实在大有关系。原来西南诸省，都系苗、傜、倮罗诸族所据。虽然，自秦汉以降，久列于版图，而散居其地的种落，终未能完全同化。元时，其酋长来降的，都授以土司之职，承袭必得朝命。有犯顺、虐民，或自相攻击的，则废其酋长，代以中国所派遣的官吏，是之谓改流。虽然逐渐改流的很多，毕竟不能不烦兵力。此等用

兵，虽一时不免劳费，然在西南诸省的统治和开发上，总可算有莫大利益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35页）

第三十八章

清初之外交与中叶之政治

西人的东来，远在明朝中叶，其时除广东一隅外，以全国论，可谓不曾受到什么影响，到清朝就不然了。最初在国交上发生关系的，就要数到中、俄的划界交涉。侵略国的思想，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。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，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，置诸羁縻之列。所以黑龙江两岸，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，尚且不能实力经营。若说如俄国，立国本在欧洲，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，以求海口于太平洋，这是万想不到的事。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，历史上国情的不同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。清朝的势力，在表面上，到乾隆时为极盛，然而盛极必衰，其危机也就潜伏于这时候的。

中俄交涉

西人的东来，远在明朝中叶，其时除广东一隅外，以全国论，可谓不曾受到什么影响，到清朝就不然了。最初在国交上发生关系的，就要数到中、俄的划界交涉。蒙古西征以后，俄人本隶属于其所分封的钦察汗。到十五世纪，俄人渐强，而钦察汗后裔，互相争斗，俄人遂脱蒙古羁绊而自立。其时哥萨克族（Cossacks，即哈萨克 Kazak的音讹，此种人自亚入欧，住在俄罗斯南部草原）归附俄人，替他向东侵略西伯利亚。

国情不同是近世受侵削之根源

侵略国的思想，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。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（中国当汉、唐盛时，西伯利亚南部诸国，亦都曾朝贡服属。在唐时，并曾置羁縻府州），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，置诸羁縻之列—所以黑龙江两岸，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，尚且不能实力经

营。若说如俄国，立国本在欧洲，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，以求海口于太平洋，这是万想不到的事。然而近世的帝国主义，则竟有如此的。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，历史上国情的不同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65页）

清朝入关时，俄人的远征队，已达到黑龙江边。在江外造了尼布楚、雅克萨两城。此等远征队，专事剽掠，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大为不安。清圣祖屡次致书俄将，请其约束，都无效。一六八五年，乃命黑龙江都统出兵，攻毁雅克萨城。俄人又修理驻守，清兵亦再进兵围攻。会圣祖前托荷兰商人致书俄皇，此时得其覆书，请先解围，然后两国各派使臣，会商疆界。圣祖乃将围兵撤退，公元一六八九年，两国使臣，相会于尼布楚［中国使臣为索额图，俄使为费耀多罗（Fedor A. Golovin）］，俄人要求划黑龙江为界，中国则要求以外兴安岭为界。彼此相持，势将决裂，此时俄人在东方的兵力，还不够和中国为敌。俄使护从的兵，也较中国使臣为单薄，乃照中国的意思，西以额尔古讷河；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；以外兴安岭为界。岭南诸川，流入黑龙江的，都属中国，是为《尼布楚条约》。约定后，在北京设俄罗斯馆，许俄国派学生到中国来，学习满、汉文字，后又许俄商三年到北京贸易一次，免其税项。

《尼布楚条约》定后未几，而准噶尔之事起，外蒙全归向中国，于是又发生蒙俄界务问题。此事于公元一七二七年，订《恰克图条约》解决。自沙宾达巴哈以东，都行订定。（就是现在的蒙、俄疆界。中、俄界约，唯这一段，订定后没有变动）以恰克图为通商地点。到高宗时，就停北京贸易，专在恰克图。

广东通商交涉

广东方面的通商，中国人认澳门为各国居留之地，而事实上，为葡人所把持，各国都感不便，而以英国为尤甚。台湾郑氏灭亡后，清朝曾开四处海口通商，然事实上，各国贸易，皆在广州。此时广东的对外贸易，为公行所专，外人颇受剥削［公行，亦称洋行。其时的洋行，

是由华人设立的。五口通商以后，才由外人设立而雇用中国人做买办。和内地的牙行一般，因与外洋商人往来，故称洋行，最著的为十三洋行。当时外商营业的居所，名为商馆（Factory），限定只得与公行交易，税项由他估定，还有官吏所收的“规礼”，公行所抽的“行用”，亦要一并加上，行用初时颇轻，后来逐渐加重到好几倍］，英人住在广州商馆里，受种种拘束，尤不自由（如不准携眷；不准坐轿；出外游玩，限于逢三、八日等）。英人乃于公元一七九二、一八一六两年，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来，要求改良通商章程，都不得结果。［公元一七九二年，英使为马甘尼（Macartney），近译亦作马戛尔尼。公元一八一六年所派为阿姆哈司（Amherst）。前一次，适值高宗八旬万寿，中国人强指其为祝寿来的，赏以礼物筵宴，于其所要求的事，则赐给英吉利国王敕谕两道，一概驳斥不准。后一次因国书衣装落后，仁宗召见，英使以疾辞，仁宗疑其傲慢，将其押解回广东］先是英国在中国的贸易，亦为东印度公司所专。公元一八三四年，乃将其专利权取消。公司的代理人，中国谓之“大班”，英国派贸易监督官前来，中国官吏，仍当他是大班，不肯和他平等交际，后来英人又改派义律为领事［Charles Elliot，此为甲必丹义律。后来鸦片战争时，合伯麦（G.Bremer）统兵前来的，为加至义律，近译亦作为乔治义律（George Elliot）］，和中国交涉，亦不得要领，义律乃报告本国政府，说要得中国平等待遇，非用兵力不可，两国的战机，就潜伏了。

澳门问题的由来

明朝在广州，本来设有市舶司。其初外国船来通商的，都停泊在海洋之中，就船贸易。公元一五三五年，指挥使黄庆，才许他们在澳门居住。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。后来葡萄牙人，就渐渐的筑城置戍，据为己有了。当时曾有人请把他们驱逐出去，仍在海洋中就船交易。广东官吏筹议说：“香山内地，官军环海而守；彼日食所需，咸仰于我，一怀异志，立可制其死命。移泊外洋，大海茫茫，转难制驭。”遂作罢。这话在当日，原是合乎情势的。但是到后来，情势变

迁，澳门就竟给葡萄牙人占据去了。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，初尚按年交纳地租，到公元一八四九年，那时候，已经是清朝的道光末年，在五口通商之后了。葡人借口其头目被杀，就抗不交租。后来清朝和欧、美各国，多数立约通商，独葡约因澳门问题，不能成立。其时还有“由中国偿还葡人筑路、建屋之费，把澳门收回”之议，未能有成。时鸦片久已用洋药之名，抽收税厘，而从香港、澳门偷运入境的，非常之多。中国要求英国人缉私。英国人说：“澳门如不缉私，香港亦难照办。”中国不得已，于公元一八七七年，和葡人订立条约，许其“永居，管理澳门”，而葡人允许助中国人缉私，竟成割让澳门以交换查缉私烟之局了，这是何等痛心的事？澳门既割弃后，界址又未能画定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三册，第3、9—10页）

传教的情形

利玛窦等初来传教时，一切顺从中国的风俗，拜孔子，拜祖宗，都在所不禁（他们的解释说：“中国人拜孔子，是敬仰其人格；拜祖宗，是报恩的意思；都没有求福免祸之见，不能算崇拜偶像。”），后来别派教士，有向教皇攻击他的。教皇遣使到中国来禁止。清圣祖大怒，将其使逐归澳门，命葡萄牙人拘禁。（教皇所派使 Tournon，旧译作多罗，新译作铎罗。被葡人监察甚严，忧愤而死）然教皇仍不肯将其禁令取消，于是在华传教的教士不能再容忍中国人的风俗，彼此隔碍就渐深。到一七一七年，清朝就禁止天主教传布。教士除在京效力的外，一概逐归澳门。（后因澳门地小不能容，许居广州天主堂，而禁止出外行走）各地方的天主堂，都改为公廨。

清中叶的内政

清朝的势力，在表面上，到乾隆时为极盛，然而盛极必衰，其危机也就潜伏于这时候的。高宗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，他件件事情，都要摹仿圣祖，而没有他的聪明勤力，凡事都喜欢装饰表面。又好奢侈，六次南巡，沿途供帐，所费甚巨。中岁后任用和珅，贪赃枉法，为古今

所无，官吏都不得不贿赂他，于是上司诛求下属，下属剥削百姓，吏治大坏，社会就骚然不安了。

一七九五年，高宗传位于仁宗。明年，白莲教徒，就以“官逼民反”为词，起事于湖北，蔓延四川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等省。攻剿十年，才算全平。同时，东南有“艇盗”，闽、浙、广东，大受其害。到公元一八〇九年才平定。而一八一三年，北方又有天理教之变。教首李文成、林清，至结连内监，袭入宫禁，其党亦叛于山东、河南。宣宗时，回疆又有张格尔之变。张格尔，就是天山南路教主的后裔，清平天山南路时，逃到浩罕去的。至是借其兵入寇，陷南路数城。这许多叛变，虽然都经戡定，然而人心摇动的情形，就可以见得了。

清朝的财政，是当康熙时代，就有余蓄的。乾隆最盛时，曾达七千余万两，嘉庆以后，内外多故，就开始患贫。至于兵力，则当吴三桂起事时，满兵已不足用。“绿营”亦徒有其名，川楚教匪的勘定，实在是得力于乡勇的。以如此腐败的政治，而要当西人方兴之焰，自然要败坏决裂了。

中国历代财政之窳敝

凡百政事，总是有了钱，才能够举办的。所以财政实为庶政的命脉。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，理财之法，是不能不讲的。中国的政治，既是放任主义，所以其财政亦极窳敝。全国最重要的赋税是地丁。地即田税，丁乃身税，本指力役而言。责民应役，其弊甚多，乃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。而所谓折纳钱者，又不是真向应役的人征收，而是将全县丁额，设法摊派于有田之家，谓之丁随粮行。名为丁税，其实还是田税。清朝所谓编审，就是将丁税之额，设法改派一番，和清查户口，了不相干。所以各县丁税，略有定额，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。清圣祖明知其然，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：令后此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。新生人丁，概不出赋，而旧有丁赋之额，仍要维持，就不得不将丁银摊入地粮了。至此，地丁两税，乃正式合并为一。所以昔时租税的基本部分，全为农民所负担，其伸缩之力极小。财政困难时，加赋往往召

乱。但不加赋，又无以应付事情，这亦是从前政治难于措置的一端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54—155页）

第三十九章

鸦片战争

鸦片战争，是中西正式冲突的开始。这是积了种种的障碍，到此爆发的；所谓禁烟，倒不过是一个导火线。种种的经过，都是不谙外情当然的结果。中国当承平时，政治是放任的，兵备是废弛的。林则徐查办烟案，兵怨之，夷怨之，私贩怨之，莠民亦怨之，反恐逆夷不胜。英兵所至，到处官逃民散，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，社会的情形，积重如此，又岂一日所能转变？中国人和外国人交涉，是自尊自大惯了的，也是暗昧惯了的。从此以后，中国在外交界上，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。所可惜的，当时别种方面，虽然屈从英国人，禁烟一事，仍旧可以提出的。而当时议约诸人，于此竟一字不提。倒像英国的战争，专为强销鸦片而来；中国既然战败，就不得不承认他贩卖鸦片似的。

鸦片的输入

鸦片战争，是中西正式冲突的开始。这是积了种种的障碍，到此爆发的；所谓禁烟，倒不过是一个导火线。鸦片在唐德宗贞元时，已由大食商人输入中国。［宋初所修《开宝本草》，也有其名（开宝，宋太祖年号，公元九六八至九七五年）］但是从前只作药用。明末，烟草输入，吸食的人渐多，其中有一种，是以鸦片和烟草同熬的，谓之鸦片烟。那时代吸烟草也有禁令，后来就解除了。鸦片烟则讫未弛禁，然吸者亦不绝。明神宗万历年间，鸦片初由葡萄牙人输入，每年不过几千箱。十八世纪中叶，英人独占印度，印度的恒河流域，是鸦片产地，输入遂逐渐增多，后来竟近三万箱。那时候的中西贸易，输出以丝、茶为大宗，输入以呢、布、钟表为大宗，出入本略可相抵。鸦片输入激增后，进出口不能平衡，乃不得不将现银输出。银是清朝时候

用作货币的，既然银条外流，内地银荒日甚，于是银价上涨，货值日跌。经济界颇受影响。（当时赋税都系收钱，换成银两解上去，钱贱银贵，征收的官吏，就要赔累。盐商卖盐交课亦然）而吸烟的人，志气颓唐，身体衰弱，尤为民族一大危机。于是禁烟之议起。

禁烟问题的两派

中国是时，没有这许多出口货与之相抵，只得输出银两，银是清代用为货币的，官吏征收钱粮，盐商卖盐，所收的都是铜钱，及其解交国库，则都须换成银两。银钱相易，前此都有赢余，此时则不克赔累，影响于财政颇巨。于是严禁之议复起。私运为大利之所在，能否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，一切禁绝，颇成问题。而对外方面，通商上的症结深了，能否一切不顾，专办禁烟，亦成问题。做《中西纪事》的夏燮，眼光是很旧的，然而他论禁烟之事，亦说不宜同时断绝通商。且说晁错策七国，削之反速而祸小，不削反迟而祸大，当时情事，适当其反。西人万里而来，不过图利，若使其有利可得，战祸或竟可消弭于无形。可见当时战事，烧烟其名，争通商之利其实，为众所共知。所以当时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奏，颇主缓和。主开禁收税，但只准以货物交易，不许用银，官员、士子、兵丁禁吸，余不问，且许栽种。然积弊须以渐除，固是一理，要用迅雷疾风的手段，加以震慑扫荡，然后爬罗剔抉的工作，乃得继之而进行，亦是一理。林则徐在当时，大约是主张后者的，至于对外的关系，则非当时所知，总以为前此办理的不善，由于官吏的畏葸不负责任。于是严厉的行动，就开始了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74—175页）

林则徐的禁烟

一八三八年，宣宗将禁烟问题，命臣下详议，多数主张严禁。湖广总督林则徐，奏语尤为激烈。（则徐有“烟不禁绝，国日贫，民日弱，数十年后，岂唯无可筹之饷，抑且无可用之兵”诸警语）宣宗即命他到广东去查办。明年，则徐迫令英人缴出鸦片二万另二百八十三箱（每箱一百二十斤），把他悉数烧毁。下令各国商船：进口的要

具“夹带鸦片，船货没官，人即正法”的甘结。各国都照具了，独有英国不肯。义律命英商退往澳门，则徐断其接济。义律遂以兵船封锁广州，然未得政府的允许，究不能和中国开战，乃又请他国斡旋愿具“夹带鸦片，船货充公”的结，但请删“人即正法”四字，则徐亦不许。

虽林则徐对外仍是隔膜

中英交战之时，英船尝三犯台湾。第一次在鸡笼，第二次在大安港，都搁浅。当姚莹等捕获英人时，廷寄命其将该国地方，周围几许？所属之国，共有若干？其最为强大，不受该国约束者，共有若干人？英吉利至回疆各部，有无旱路可通？平素有无往来？俄罗斯是否接壤，有无贸易相通？逐层密讯，译取明确供词，切实具奏。林则徐在广州时，奏称震于英吉利之名者，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，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。不知该夷兵船笨重，吃水深数丈，仅能取胜外洋，至口内则运掉不灵，一遇水浅沙胶，万难转动。是以货船进口，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，而兵船更不待言矣。从前律劳卑冒昧，一进虎门，旋即惊吓破胆，回澳身死，是其明证。且夷人除枪炮以外，击刺步伐，俱非所娴，而其腿足缠束紧密，屈伸皆所不便，若至岸上，便无能为，是其强非不可制也。又其陛辞时，奏称内地茶叶、大黄，禁不出口，已足制诸夷之命。至广州，又奏茶叶、大黄两项，臣等悉心访察，实为外夷所必需。其隔膜至于如此，岂在短时期中，能有知己知彼之望？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78、179页）

中英的开战

公元一八四〇年，英国国会通过了用兵。于是英人派兵二万余前来，攻击广东沿海，不克。改攻厦门，旋亦弃去。北陷舟山，又到大沽投英国首相致中国的信。信中提出六项要求。其时督抚怕多事，宣宗遂派琦善在广东查办，林则徐时已授为两广总督，革职，遣戍新疆。琦善既至，和英人磋议。英人要求割让香港，琦善不敢许。英人就进兵

攻陷海口炮台。琦善不得已，允许了他。清朝闻英人进兵，大怒，将琦善革职，另派大臣督兵进剿。英国亦嫌交涉软弱，撤去旧员，改换新将。［第一次带兵来的，见第三十八章“广东通商交涉”注文，后来所换的为璞鼎查（Henry Pottinger）］清兵到广东，进攻不胜，英兵至，再陷厦门、舟山，进破宁波、乍浦。又撤兵入长江，陷上海、镇江，直逼南京，清朝无可如何，乃派耆英等和英人议和，订立《南京条约》。

社会情形积重难返

中国当承平时，政治是放任的，兵备是废弛的。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写给刘韵珂的信，说各处调到的兵，纷扰喧呶，毫无纪律，互斗杀人，校场中积尸不知凡几。甚至夷兵抢夺十三行，官兵杂入其中，肩挑背负，千百成群，竟行遁去，点兵册中，从不闻清查一二。又说：林则徐查办烟案，兵怨之，夷怨之，私贩怨之，莠民亦怨之，反恐逆夷不胜，前辙不能覆蹈。刘韵珂写给人家的信，亦说除寻常受雇，持刀放火各犯外，其为逆主谋，以及荷戈相从者，何止万人？英兵所至，到处官逃民散，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，而非如入无人之境，社会的情形，积重如此，又岂一日所能转变？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79页）

南京条约

《南京条约》，大致是照英国人的要求订定的。其中重要的条款是：（一）开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五口通商。准英商携眷居住，英国派领事驻扎。（二）割让香港。（三）偿还烟价六百万元。商欠三百万元，并赔军费一千二百万元。（四）英人得与华人任意交易，无庸拘定行商。（五）进出口税则，秉公议定。英货既完进口税后，由中国商人，运入内地，只可照原税酌加几成。（六）中、英官吏，以平等的礼节往来。这是专为打破前此口岸任意开闭，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，税额繁苛，不许英官和中国平行之局的。

自尊自大是外交失败的根源

中国人和外国人交涉，是自尊自大惯了的，也是暗昧惯了的。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，便是五口通商之役。这一次的交涉，弄得情见势绌；种种可笑，种种可恨，种种可恼；从此以后，中国在外交界上，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。这种事情，其原因，自然不在短时间内。若要推本穷原论起来，怕真个“更仆难尽”。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，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。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，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。读者只要善于会心，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11—12页）

南京条约的善后

《南京条约》，订明英兵占据定海和鼓浪屿，俟赔款交清，五口开放后，方行撤退。中国乃派耆英往广东，与英人筹议善后问题。此时问题的症结，为广东的英领事要入城，而华人固执一七九三年“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”的上谕，加以拒绝。民气既不能压抑，英人又无可通融，耆英深以为苦。一八四六年，五口都已开放，赔款亦已付清，耆英请英人撤兵，英人又要求他订立舟山群岛不得割让他国之约，而耆英亦要求英人，将入城问题，延缓两年，英人也答应了。耆英遂急求内调而去，留下一个纷扰的根株。中、英条约定后，各国都相继东来，美、法、瑞典都和我国立有条约。唯俄人要在海路通商，仍给中国拒绝。

战败仍可禁烟

五口通商一役，种种的经过，都是不谙外情当然的结果，无足深论。所可惜的，当时别种方面，虽然屈从英国人，禁烟一事，仍旧可以提出的。当义律到天津投书的时候，津海道陆建瀛，就主张把禁烟一层，先和他谈判。而当时议约诸人，于此竟一字不提。倒像英国的战争，专为强销鸦片而来；中国既然战败，就不得不承认他贩卖鸦片似

的。于是中国对于鸦片，既无弛禁的明文；而实际上反任英人任意运销，变作无税的物品。直到前五三年（一八五九年），《天津条约》订结之后，才掩耳盗铃的，把他改个名目，唤作洋药，征收关税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18页）

第四十章

太平天国

从秦汉以后，中国历史上，有一公例：承平了数十百年，生齿渐渐的繁起来；一部分人的生活，渐渐的奢侈起来；那贫富也就渐渐的不均起来；这种现象，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酿成大乱为止。嘉、道以后，内乱时起，外患迭乘；清朝的威望，扫地以尽；革命的种子，就有萌芽的机会了。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，无过于（宋儒）尊王攘夷之论。尊王攘夷，孔门相传，确有此义。然所以尊王，原是想一匡天下；而所以要一匡天下，则免于被发左衽，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后来顾亭林先生分别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”。其所谓国，实指王室而言。所谓天下，似指国家，然中国人于国家的观念，向来不甚晶莹，亭林所云天下，与其说是指国家，无宁说是指民族。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至宋而后形成。

民族主义的勃兴

当明室灭亡之时，有志于革命的人，见事无可为，乃想将民族主义的根苗，流传后代，于是有会党的组织。（见邹鲁《中国国民党史稿》第一篇第一章）在粤江流域的为三合会，在长江流域的为哥老会，都以反清复明为口号。从桂王败亡，台湾破灭以后，看似汉族全被征服，其实革命种子，仍潜伏于社会之中。嘉、道以后，内乱时起，外患迭乘；清朝的威望，扫地以尽；革命的种子，就有萌芽的机会了。

民族主义至宋后形成

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，无过于（宋儒的）尊王攘夷之论。尊王是晚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裂冠毁冕的结果。攘夷则是燕云十六州割弃，终北宋之世不能恢复，更加以女真猾夏的结果。这四个字原是从《春秋

经》里来的。尊王攘夷，孔门相传，确有此义。然所以尊王，原是想一匡天下；而所以要一匡天下，则免于被发左衽，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所以周天子尚在，而孟子力劝齐梁之君以图王业，可见孟子是没有扶翼周室之心的。如此看来，攘夷之义实更重于尊王。后来顾亭林先生分别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”，“国之兴亡，肉食者谋之；天下兴亡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”。其所谓国，实指王室而言。所谓天下，似指国家，然中国人于国家的观念，向来不甚晶莹，亭林所云天下，与其说是指国家，无宁说是指民族。此义初非亭林所自创，自宋儒的言论推之，是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的，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至宋而后形成。（《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》，原刊《学林》1940年12月第2期）

太平军的起事

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，广东花县人。生于一八一二年，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。他少有大志，为要运动下级社会，不得不借助于宗教，广东和外人接触早，对于基督教，认识较多。他乃采取其说，自创一教，称为上帝教。自称天父的次子，称基督为天兄。和同县冯云山，到广西桂平、武宣一带传布。这一带地方的人民，风气朴实，性质勇敢，信他的人很多。恰好广西大饥，盗匪遍地。人民办团练自卫，土著与客民，又相龃龉，他就乘机，以一八五〇年，起事于桂平的金田村。

太平军起事的背景

从秦汉以后，中国历史上，有一公例：承平了数十百年，生齿渐渐的繁起来；一部分人的生活，渐渐的奢侈起来；那贫富也就渐渐的不均起来；这种现象，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酿成大乱为止。大乱过后，可以平定数十百年，往后就又是如此了。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的组织，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。清朝从乾隆以后，也恰好到这时代了。虽然有川楚教匪……乱事，社会的心理，还没有厌乱。借宗教煽诱愚俗，也是历代都有的。从西人东渐以后，黄河、长江两流域，都还没

大受他的影响。独广东和他接触最早，受他的影响最多。兼且上流社会中人，和固有的文化，关系较深，受外教的影响较难，下流社会却较容易。合此种种，就造成了洪杨的乱事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24页）

太平天国的兴亡

洪秀全起事之后，袭据永安，建号为太平天国，自称天王。同起诸人都封王，东王杨秀清，南王冯云山，西王萧朝贵，北王韦昌辉，翼王石达开。清将向荣，把大兵围困他，太平军突围而出，入湖南，出岳州，下武汉，沿江东下，直抵南京，称其地为天京。时在一八五三年。向荣率大兵，随太平军之后，至天京城外孝陵卫扎营，是为“江南大营”。清朝又派琦善一支兵，屯驻防扬州，是为“江北大营”。太平军殊不在意。并派林凤祥、李开芳率兵出安徽北伐，胡以晃、赖文英沿江西上。后来北伐的兵，因势孤，从河南、山西，入直隶，退据山东，给清兵消灭。西上的，却攻下安庆、九江，再取武汉，甚为得势。

太平军之军略失策

太平军在军略上的失策：（一）未能于初起时全军北上，与清人争一旦之命。（二）在南方又未立定规模。（三）初起时藉长江的便利，未久即下天京，后来水师之利反为清人所有。至其军队，初起时确甚优良。广西军人，强悍善战，其纪律颇严，并无奸淫杀掠之事，所以人民颇为欢迎。清张德坚撰《贼情汇纂》称：“贼至则争先迎之，官军至皆罢市。此等情形，比比皆然，而湖北为尤甚。”可见光复军兴时，箪食壶浆的盛况。此时太平军军队未甚多，其首领的骄奢淫佚亦未甚，所破州县，到处都有蓄积，取之已足敷用，人民亦有自动进贡以求免祸的，故其财政宽然有余，无事诛求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219页）

此时清朝绿营、旗兵，都毫无用处，而曾国藩在湖南练成湘军，成为太平军的劲敌。一出来，就攻陷武汉，进陷九江。派兵从水陆两路，进取安徽。先是太平军中又有内讧。杨秀清专权，天王使韦昌辉把他杀掉，旋又使秀清余党，杀掉昌辉。石达开别为一军，剽掠湖南、两广，后来给清军消灭于四川。冯云山、萧朝贵先已战死。天王深居简出，不亲政事，太平天国中，遂现出中枢无主的景象。军纪日坏，将士的暮气亦日深，幸得英王陈玉成，破湘军于三河集，忠王李秀成，派兵分扰赣、浙，击破江南大营，进取苏、松，太平军的气势又一振。然而大厦非一木所能支，清朝以曾国藩督两江，指挥诸将，国藩分兵定赣、浙。又遣李鸿章募淮军，以攻苏、松，湘军以全力下安庆，水陆两军，沿江东下，天京遂于一八六四年失陷。天王先服毒殉国，子福瑱，殉国于江西，余党亦先后败灭。太平天国共计十五年；势力所到之地，达十六省；内地十八省，只有陕、甘两省未到。事虽无成，亦可以算得壮烈了。

太平天国失败原因

太平军初起时，以区区岭南的穷寇，乘间北出，不一年而攻取江宁，震动全国；后来兵锋所至，蹂躏了一十六省（除陕、甘二省）。攻破了六百多城，其中不可谓无才。他初起的时候，发布“奉天讨胡”的檄文，也总应当得几分汉人的同情。又这时候，外人方厌恶满洲政府的顽固，对于太平军，也颇有表同情的。太平军要想成功，实在不是没有机会。但是当时民族的自觉，势力颇小。而君臣之义，却颇有势力。曾国藩生平，带这种色彩，颇为浓厚。大概他们看了这种阶级社会里头的道德，是维持社会所必需。当时的人的思想，自只如此。后来的人，抱民族主义的，说他为什么要做满洲的奴隶？已经可笑了。抱政治思想的，又说他为什么不把满洲政府推翻，好把政治彻底改良？这更陷于时代错误。推翻王室，改良政治，这件事，在大家都抱着君主思想的时代，谈何容易办到。况且曾国藩等，何尝知道彻底改良政治来。以练兵造船为自强，正是这班中兴名将的政策。太平天国的政治，都带有西教的色彩，尤易为一般人所疾视。而且他初起兵

时，军纪严肃，军中的重要人物，也都是朝气。后来始起诸王，互相屠戮。洪秀全也渐渐荒淫。一切军事政事，都出于他的兄弟仁福、仁达之手，日益腐败。奸淫抢掠的事情，也一天天多了，自然人民就反对他。这是太平军所以失败的原因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27页）

太平天国事变的影响

太平天国的兴亡，虽不过十五年间，但其影响却不小。政制社会的改革：太平信奉基督教理，谓人皆上帝子女，故称男皆曰兄弟，女皆曰姊妹，一律平等。改新历，行公田，禁止卖娼蓄妾。排斥释道，废庙宇偶像，重定儒书，此为不能抓住民心之处。上海为外人居留地，上海响应太平时，外人宣言中立，租界行政权渐归外人，为公共租界之起源。经此事变后，满汉畛域消除。汉大臣多任内外大官，得有势力，清室大权，渐渐推移。

北方的捻乱

太平天国同时，北方又有捻党。那是无甚主义的，不过只算是流寇。捻党初横行于河南、山东、安徽三省之间。太平天国既亡，余党和他相合，声势骤盛。清朝派僧格林沁去打他，败死于曹州。乃改派曾国藩，国藩创“长围圈制”之法，于运河、贾鲁河沿岸筑长墙，到底给他突破，分为东、西两股，东捻首领任柱、赖文光入苏、鲁，西捻首领张总愚走陕西。李鸿章代曾国藩，倒守运河，把东捻逼到海边平定。左宗棠剿西捻，西捻回窜直隶，李鸿章和他合力，把捻党包围在黄、运、徒骇河三河之间打平。这事在一八六七年、一八六八两年。

西北西南的回乱

同时西北、西南，又有回乱。云南回民杜文秀，以一八五五年据大理，尽占迤西一带，迤东也有起而创乱的。到一八七二年，才给岑毓英用回将马如龙打平。西北回乱，起于一八六二年，直到捻匪定后，

左宗棠方才回兵剿办，其时陕、甘几全成匪区，天山南北路，亦为浩罕将阿古柏帕夏所据（阿古柏是浩罕的将，浩罕使他随着张格尔的儿子东来的。后来张格尔的儿子，为其所废。此时天山北路，先有回酋妥得璘起兵，进取南路。又有汉人徐学功，起兵自卫，阿古柏和徐学功联合，攻破妥得璘。徐学功亦内附。于是天山南北路为俄所据外，余尽入其手），想在其地建立一个回教国。英、俄、土耳其都和他通使，英人怕俄人南下，危及印度，尤其要扶助他。左宗棠先平定陕、甘，英人仍为阿古柏求封册。朝议因用兵劳费，也有主张封他的，宗棠力持不可，于一八七五年进兵，至一八七八年，把南北路都平定，然伊犁先已为俄人所占，到底酿成重大的交涉。

亚洲西北部的局势

历史上的匈奴、蒙古，都是从亚洲西北部，侵入欧洲的。却从俄罗斯兴起，而亚洲西北部，反受其侵略。历史上的印度，是常受西亚高原侵略的。却从英吉利侵入印度，而西亚高原，亦反受其侵略。而且英人的东侵从海，俄人的东侵从陆，本来是各不相谋的。乃英人从印度西北出，俄人从两海之间东南下，而印度固斯山一带，就做了两国势力的交点。这也可谓极历史上的奇观了。当英人侵入印度，俄人侵入两海之间的时候，也正是清朝平定天山南北路和征服西藏之时。三国的势力，恰成一三角式的样子。乃英俄两国的势力步步扩充。而中国的实力，则实在不能越葱岭一步，就弄成后来日蹙百里的局面了。中国到这时候，也知道西北的形势紧急了。前二八年（一八八四年），就把新疆改为行省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32、34页）

第四十一章

英法联军与中俄交涉

天下事情，本来只有强权，哪里有什么公理？何况平心而论，我们中国弄错的地方也很多，这“糊涂”两个字，我们从政府起到百姓止，实在是辞不掉的。僧格林沁在天津设防，把英、法两国的兵船打坏了，英、法两国的公使，只得退出去逃到上海。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，见打了一个小胜仗，便得意非常，把去年所订的条约废掉了，叫他们另外派人来，到上海重议。这么一来，把有理又变作无理了。《尼布楚条约》，中国看似胜利，然而自此以后，对于东北方，并没有加意经营；而俄人却步步进取，经过一世纪半之后，强弱自然要易位了。所以边疆的不保，是坏在平时边备的废弛，并不能专怪哪一个人。

广东交涉的纠纷

公元一八五八和一八六〇年，南方内乱正炽，北方又有英法联军和中、俄交涉，遂使外力的侵入，更深一层。先是耆英去后，徐广缙为两广总督，叶名琛为巡抚，两个人，都是有些虚㤭之气的。时粤人自办团练，要想抵抗外人。英人要求入城，徐广缙自己到他船上去阻止，英国人想把他扣留起来。团丁同时齐集两岸，呼声震天。英人怕肇大祸，乃将徐广缙放还。并另订广东通商专约，把不入城列入约中。事闻，清朝大加奖励，广东人更形得意。后来徐广缙去职，叶名琛代为总督，对于外人，更持傲慢不理的态度。然实不知外情，亦无实力防备。一八五六年，中国水师，在挂英国旗的亚罗号船上，搜捕海盗。（当时香港政府许华船向其注册，这一只船，实在是注册业已满期的，英人借口中国搜捕海盗之际，侮辱其国旗，向叶名琛索还所拘捕的人，叶名琛即行送还，英人又不受，说要解决入城问题，遂径行进攻省城，以为迫胁）英领事巴夏礼（Harry Parkes），借此启

衅，攻陷省城。然并无本国政府的命令，旋又退出，又因印度士兵起了叛变，而粤人以为英人惧战易与，烧毁各国商馆，反成为巴夏礼请本国政府用兵的口实。

英法联军的东来

此时英想联络法、俄、美一致行动，而美、俄都只愿改订商约；法则因拿破仑第三野心难戢，适逢广西西林县，又杀掉一个法国教士，法国亦想借此示威。于是四国各派使臣，英、法则以军队相随，攻陷广州，把叶名琛虏去，后来死在印度。英、法兵又北上，陷大沽炮台。清朝不得已，派大臣在天津，和英、法、美三国，各订条约，是为一八五八年的《天津条约》。明年，英、法使臣来换约，中国方在大沽口修理防务，命其改走北塘，不听，强行闯入，为中国兵击败，逃到上海。

木必自腐，而后虫生

古人说得好："木必自腐，而后虫生之。"况且天下事情，本来只有强权，哪里有什么公理？何况平心而论，我们中国弄错的地方也很多，这"糊涂"两个字，我们从政府起到百姓止，实在是辞不掉的呢。这一次的条约，言明一年之后到中国的天津来彼此交换。这时候，英国的政府颇有些有意挑衅。咸丰八年（一八五八）五月，到了大沽口，便要硬走白河口到天津。这时候，正值中国的僧格林沁在天津设防，便照会他们改从北塘口，走蓟运河里进去。英、法的使臣不听，带了兵舰硬从白河里闯进来，中国的炮台上便开炮打他，把英、法两国的兵船打坏了四只。两国上岸的兵士，不是打死，便给中国人擒住了，一个也没有回去。英、法两国的公使，只得退出去逃到上海。这一次的事情，本是英、法两国错的。要是当时的政府据着理同他们交涉，英、法两国也未必有什么说。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又是糊涂的，见打了一个小胜仗，便得意非常。下了一道上谕，说什么"英夷狂悖无礼，此次痛加剿杀，应知中国兵威，未可轻犯"的话。把去年所订的条约废掉了，叫他们另外派人来，到上海重议。这么一来，把有理又

变作无理了。（《国耻小史》，中华书局1917年版，第3、29、30、31页）

又明年，英、法兵再至，攻陷大沽，清朝再派亲王讲和。而亲王误信人言，说英人暗藏兵器，要想在会场上“劫我”。军官僧格林沁，竟把巴夏礼捉起，送往北京刑部牢里监禁。英、法兵进攻，清兵大败，文宗逃往热河，英、法兵胁开京城，把圆明园烧毁，才由文宗之弟恭亲王奕 ，和两国另订条约，是为一八六〇年的《北京条约》。

圆明园之毁，无足深惜

圆明园为清世宗在藩邸时赐园。即位后，亦于其中听政。累朝继续经营，法人称其建筑之精，珍奇之富，为欧洲之所无。一旦化为劫灰，实为我国有关文化的建筑古物，遭受损失之始。此后战事之所破坏，古董商人之所贩卖，以及各地愚民因外人收买之所毁损，更不知凡几。此次抗战以来，沦陷区域整批的毁坏、抢劫、盗窃，更其无从说起了。几世几年的菁英，一朝化为乌有，言之岂不可痛？但须知：（一）文化的进退，视乎其社会的情状，是否安和，物质所表现的文明，实在其次。（二）即舍此弗论，以现在文化的状态，虽有宝物，亦必不能终守。此岂独今日为然？亦岂独中国为然？（三）所谓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，一方面固然代表学术技艺，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。后者固绝不足取，即前者，就已往的社会论，并不过一部分人能参与此等工作，大多数人，都是被摈于其外的。今后社会的组织果能改变，合全社会人而从事于此，已往的成绩又何足道？所以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等，能保存固当尽力保存，如其失之，亦无足深惜。敢以此为国民进一解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88页）

天津北京条约

天津、北京两条约，包含（一）赔款（英千二百万两，法六百万两）外，（二）许外国派使驻扎北京，是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外人直接交涉

之始。（三）沿海添开口岸，并及长江。于是内河航行权，就与人共之了。［《天津英约》，沿海开牛庄、登州、台湾、潮州、琼州，沿江自汉口而下，开放三口（后开汉口、九江、镇江）。《法约》多淡水、江宁而无牛庄。《北京英约》又增开天津］（四）领事裁判权。（五）关税协定。（六）传教。前此仅以上谕解禁，许在海口设教堂，至此则明认外人到内地去传教，并可租买土地，建造房屋了。［领事裁判、关税、传教各协议，均在道光江宁、咸丰天津各条约中。道光二十二年（公元一八四二年）《宁约》第十款，议定英货纳税例。咸丰八年（公元一八五八年）《津约》第二十六款，定货物每值百两税五两。又是年《中英通商善后章程》第一项，定税则未载之货，估价值百抽五。以上皆关于关税者也。《津约》第十六款，英人犯事，归英惩办。但道光二十四年《中法条约》第二十七款，业已规定有领事裁判权。此关于法权者也。天津《英约》第八款即为保教。天津《法约》第十款，法人可以购地建礼拜堂、书院、学堂。第十三款，保护天主教士、教民，并在内地传教。此关于传教者也］

中俄划界交涉

自《尼布楚条约》订立以来，俄人对于东方，仍逐渐侵占；中国则以为边荒之地，不甚注意经营；黑龙江以北之地，遂多为俄所据。一八五〇年，俄人要求新疆通商，中国许开伊犁和塔城。一八五七年，又在天津订立条约，许其在海口通商。（当时中国本不许俄国在海口通商。此时想借俄国的力量，牵制英、法，所以许其海口通商，和他订约，反在英、法、美之前）然俄人要求变更《尼布楚条约》，则中国仍加坚拒。一八五八年，俄人乘中国多事，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，订立《瑷珲条约》，尽割黑龙江以北之地，而将乌苏里江以东，作为两国共管。一八六〇年的英、法和议，俄使曾居间调停，事后又借此要功，迫中国再订《北京条约》。将乌苏里江以东，亦作为割让。西北疆界，从沙宾达巴哈以西，都规定大概，订明另行派员会勘。新疆再开喀什噶尔，又许俄人从恰克图经库伦、张家口到京，零星货物亦得发卖。旋又订立《通商章程》，陆路税则，较海口三分减一。两国边

界百里内，都为无税区域。（此条看似彼此一律，但中、俄接界之处，都是中国境内繁盛，而俄国荒凉，所以中国实在是吃亏的。此事可参看拙撰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编下第一章第六节）蒙古设官之处，都准俄人前往贸易。诸约不但东北割地，广大可惊；就蒙古、新疆，也几于藩篱尽撤了。

边备废弛的恶果

凡事不进则退。《尼布楚条约》，中国看似胜利，然而自此以后，对于东北方，并没有加意经营；而俄人却步步进取，经过一世纪半之后，强弱自然要易位了。《瑷珲条约》约成后，侍讲殷兆镛，劾奕山“以黑龙江外之地，拱手让人，寸磔不足蔽辜”。然奕山在当日，亦曾竭力争执。而俄人以开战相胁，这时候的情形，恰和结《尼布楚条约》时相反，傥使开战，中国是万无幸胜之理的，徒然弄得牵涉更广。所以边疆的不保，是坏在平时边备的废弛，并不能专怪哪一个人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65、67页）

中俄伊犁交涉

《北京条约》定后，西北边界，是逐段派员会勘的，又都略有损失，而伊犁将军所属，界约并未及订成而回乱作，伊犁为俄所据。中国向其诘问，俄人说“乱定即还”。及乱定再向追索，则又要求偿还代守的兵费。中国派崇厚往俄，崇厚是不懂事的，仅收回伊犁空城，而丧失的权利，广大无限。中国将崇厚下狱，中、俄几至决裂。后乃彼此让步，派曾纪泽往俄重议，将伊犁南境要隘，多索回了些。原约蒙古、新疆都为无税区域，新约仅新疆暂不纳税。原约许俄人在多处设领，新约仅肃州、土鲁番两处。而将蒙古贸易，扩充至不设官之处。此约定于一八八一年。明年，中国遂改新疆为行省。

第四十二章

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

中国历代，所谓藩属，是外国仰慕中国的文明，自愿来通朝贡；或者君主好大喜功，喜欢招徕外国人来朝贡，以为名高，朝聘往来，向守厚往薄来主义。在国计民生，无甚实益。所以历代的政论家，多以弊中国、事四夷为戒。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，有一藩属，介居其间，则本国的领土不和侵略者直接，形势要缓和许多。所以保护藩属，实在是国防和外交上的要义。然中国之对待藩属，仍系遵循旧法。为中国计，当是时，唯有采用联邦之法，于军事、财政、经济、交通、外交荦荦大端，操诸中央之手，而其余则一听其自由。无如此等新政治，非中国秉政者所知。

越南的衰乱

藩属就是我的属国，而又可以做我的藩篱的意思，藩属沦亡，内地就要危险了。安南旧阮，自给新阮灭掉后，遁居海岛。因法教士的介绍，求援于法；又借助于暹罗，将新阮灭掉。立国顺化，受封于中国，为越南国王。当越南求援于法时，曾和法国立有草约，许事成之后，割化南岛为赂，后来草约没有签字，约中所载的义务，法国亦没有履行；越南亦就没有割地，这自然是不错的。但是与法交涉之间，殊多，南部遂为法国所占，这事还在中国订立《天津条约》之时。后来太平天国灭亡，余党又逃入越南北部，旧阮初兴，对于北部，实力本来顾不到，至此遂更形混乱。

无甚实益的藩属在近代却至为重要

藩就是藩篱的意思。中国历代，所谓藩属，是外国仰慕中国的文明，自愿来通朝贡；或者专制时代，君主好大喜功，喜欢招徕外国人来朝

贡，以为名高，朝聘往来，向守厚往薄来主义。从不干涉人家的内政，或者榨取什么经济上的利益。在国计民生上，是无甚实益的。所以历代的政论家，多以弊中国、事四夷为戒。然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，有一藩属，介居其间，则本国的领土不和侵略者直接，形势要缓和许多。所以当此时代，保护藩属，实在是国防和外交上的要义。然而中国却不能然，藩属逐渐沦亡，本国的边境也就危险了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84页）

中法战争和越南丧失

当云南回乱时，中国曾托法商购运军火，法人因此知航行红河，可通云南，又想侵占越南北部。越人联合太平军余党刘义（后来内附，改名刘永福，所领军号黑旗军），把他打败。中国亦命云南、广西出兵，法人乃设计攻顺化，胁越南立被保护之约。中国提出抗议，法国置诸不理。时中国兵出云南、广西的都不利，乃由李鸿章在天津，与法使订约。中国承认法、越条约，而法允不索兵费，旋因撤兵期误会，两军冲突，法国又要求偿金。中、法遂开战，时在一八八五年。法兵袭击马江，破坏我国的海军，又陷澎湖、基隆，封锁宁波、海口。然我陆军出云南、广西的都胜利，台湾淡水坚守，法军亦不能下。是时法新败于德，元气未复；战既不利，舆论哗然，主战的内阁，因之而倒。傥使我更坚持，或者条件还可有利些，然我国亦未能利用机会，仍放弃越南成和，不过法人没有要索赔款罢了。

缅甸和暹罗的丧失

英国和缅甸，是久有冲突的。一八二六年，就割其阿剌干和地那悉林；一八五一年，又割白古。缅人自此没有南出的海口，屡图恢复，终无成功。法、越交涉紧急之时，法人又诱缅甸立密约，许代监禁其争位的王族，而缅甸人则割地以为报酬。英人大惊，趁中法交战之时，发兵把缅甸灭掉。法人既并越南，借口暹罗湄公河左岸之地，曾属越南，向其索取，暹人不能拒。英人和法协议，以湄公河为两国势

力范围界限，湄南河流域为中立之地。暹罗因两国的均势，得以幸存，然亦不是我的属国了。

疆界的糊涂不清

中国的边界，向来是全不清楚的。当初和英国议界时，曾要求腾越所属汉龙、天马、虎踞、铁壁四关。汉龙、天马，本无问题。虎踞、铁壁，照云南省的地图，亦均在中国界内。英人以为必不致误，遂许照原界分画，后来实行查勘，才知道二关久为缅占（据薛福成原奏，其时英所守界，越虎踞而东，已数十里；越铁壁亦六七十里），英人遂不肯归还。而汉龙、天马，虽许归还，汉龙又不知所在，于此约中订明“由勘界官查勘；若勘得在英国界的，可否归还中国，再行审量”，岂非笑柄？而此约所定之界，于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，又未能分画，订明俟将来再定，遂为后来英人占据片马的根本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下册，第89—90页）

哲孟雄不丹的丧失

西藏南边之国，亦久为英人所觊觎，当公元一八一六年时，廓尔喀因受英国迫胁，曾求救于中国，清仁宗茫然不省。（见《东华录》嘉庆二十一年。廓尔喀言受披楞压迫，披楞即不列颠的异译。仁宗降谕说：“尔国来禀之意，不过要求天朝帮助，天朝于边外部落，彼此相争，从无发兵偏助一国之事。尔国与披楞，或和或战，即或竟投诚披楞，天朝总置不问。但届至贡期，仍当按例进贡。傥至期不来，即当发兵进剿。”真可谓昏愦糊涂，而又颜之厚了）廓尔喀遂兼附于英，不过终清之世，仍守其五年一贡之例而已。哲孟雄则当公元一八三九年时，英人即租得其大吉岭之地，后来又取得其铁路敷设之权；自此西藏的藩篱就渐撤。不丹于公元一八六五年，为英军所败，乞和。到公元一八九〇年，中国和英人订结《藏印条约》，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。公元一九一〇年，不丹亦夷为英的保护国，西南的藩属，就几于全失了。

西南的危机

藩属既已丧失，本国的形势，就渐行赤露。《法越条约》，中国许开边界两处通商，后来广西开了龙州，云南开了蒙自、河口。先是英人要求派员入藏探测，中国不能拒，允许了他，而其所派之员，行至腾冲边界被杀，英人指为大员主使，交涉几至决裂，于是有公元一八七六年的《芝罘条约》。在西江沿岸，开放商埠，并许英人航行西江，而派员入藏一节，仍订入约中。直到公元一八八六年，中国订约，承认缅甸属英，才将他取消。其中缅界约，则直到一八九四年方订立，仍仅规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，自此以北，疆界迄未勘定，遂为英兵侵占片马、江心坡、班洪等地的张本。又此约订明孟连、江洪不得割让，而一八九五年的《商务界务专条》，却把江洪之地，割让了一部分给法国，并许越南铁路，接展至中国。于是英人向我诘责。一八九七年，又立《中缅条约》附款，许缅甸铁路，和云南铁路相接。西南的形势，就更形危急了。

变藩属为联邦

中国历代之征服外国，看似出于君主之野心，实则思患预防之意多，开疆拓土之意少，所谓守在四夷也。历代管理外国，不外（一）就其通路，加以保护，如汉于西域设都护，以护南北两道是也。（二）择其要点，设官驻兵，以诸属部加以管理，使不至渐形桀骜，寖开犯顺之端，又或互相联合，或独立并吞，驯至富强终成坐大。如唐于属地设都护府是也。此皆所以防此等外藩侵犯中国，而非防更有强敌侵犯此等藩属，至近代，则情势迴异矣。然中国之对待藩属，仍系遵循旧法。当是时，欲图改革，亦有难焉者，何也？中国之实力不足，则不能御敌，欲求实力充足，必有所经营布置，而欲有所经营布置，则或非属部所乐，转易引起内讧矣。为中国计，当是时，唯有采用联邦之法，于军事、财政、经济、交通、外交荦荦大端，操诸中央之手，而其余则一听其自由，（一）所求者简，则中央易于为力。（二）变动不大，则藩属不至反对。（三）告以我之措置，又凡事与之和衷协

商，则藩属必欣然从我矣。无如此等新政治，非中国秉政者所知。（《中国近百年史概论》，写于1942至1943年间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246页）

第四十三章

中日战争与外力之压迫

欢迎西学，而畏恶西教；西人挟兵力以求通商，则深闭固拒，以致危辱；到外力的压迫深了，才幡然改图，以求和新世界适应；这是欧人东略以后，东洋诸国所同抱的态度；而日本因缘凑合，变法维新，成功的最快。中、日两国，历史上的关系，极为深切，当西力东侵之际，本有合作御侮的可能。但日人则褊狭性成，专务侵略，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国合作，遂转成为东方的侵掠者。中日战后，中国的积弱，暴露于天下，而外力的压迫，遂纷纷而起。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，变法的动机，就勃发而不可遏了。

朝鲜日本的盛衰

日本千年以来，幕府专权，国土分裂，本在乱极思治的时候，因西洋各国，强迫通商，激起国人"尊王攘夷"之论。幕府倒，封建废，借王权的力量以维新，就是所谓"明治维新"，正当清同治七年，由此而渐进于宪政政制的正轨。

日本因变法而成侵略国

欢迎西学，而畏恶西教；西人挟兵力以求通商，则深闭固拒，以致危辱；到外力的压迫深了，才幡然改图，以求和新世界适应；这是欧人东略以后，东洋诸国所同抱的态度；而日本因缘凑合，变法维新，成功的最快，遂转成为东方的侵掠者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93页）

中日初期的交涉

日本和中国订约，事在一八七一年。当时因我国与西洋各国，都是全国开放的，对于日本则仅限于通商口岸，所以我国和日本所订的约，也和西洋各国有异。（一）领事裁判权，彼此都有。（二）关税都照税则完纳；要税则所无的，才值百抽五。（三）亦无所谓传教。这是日本人很不满意的。这一年有琉球诸人遭风飘到台湾，为生番所杀。琉球是两属于中、日之间的，中国却并不知道，日本向我诘问，我国说："琉球是我藩属，琉球人被杀，与你何涉？"又说："生番是化外之民，不能负责。"日本遂自行发兵到台湾去攻生番。我国亦调兵渡海，日人颇为胆怯，乃由中国给死者家属以抚恤；并偿还其修路、造屋之费而罢。但日人觊觎琉球，有加无已。公元一八七九年，日本就把琉球灭掉。我国和他交涉，始终无效。

日本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

中、日两国，同立国于东方，在历史上的关系，极为深切，当西力东侵之际，本有合作御侮的可能。但这时候，中国人对外情太觉隔阂，一切都不免以猜疑的态度出之，而日人则褊狭性成，专务侵略，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国合作。中、日的订立条约，事在一八七一年。领判权彼此皆有。进口货物，按照海关税则完纳，税则未定的，则直百抽五，亦彼此所同。内地通商，则明定禁止。在中国当日，未始不想借此为基本，树立一改良条约之基，然未能将此意开诚布公，和日本说明。日本则本不想和中国合作，而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，于是心怀不忿。至一八七四年，因台湾生番杀害日本漂流的人民，径自派兵前往攻击。一八七九年，又灭琉球。交涉屡有葛藤，而衰微不振的朝鲜，适为日本踏上大陆的第一步，遂成为中、日两国权利冲突的焦点。一八九四年，日人预备充足，蓄意挑衅，卒至以兵戎相见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539—540页）

日本的窥伺朝鲜

公元一八七六年，日本和朝鲜订约，认朝鲜为自主国，后来清廷发觉，才命朝鲜又和美、英、法、德次第订约，均申明为我属国，然

《日约》未能追改。公元一八八二年，朝鲜国王李熙的本生父是应，和王妃闵氏争权，作乱。中国派兵代为勘定，自此中国兵就留驻朝鲜京城。公元一八八四年，朝鲜党人作乱，又为我国所镇定。明年，日本遣使来，和我订约：彼此都撤兵，如欲派兵，必须互相知照。中、日对朝鲜，就立于同等地位了。

朝鲜人好结党相争

朝鲜李氏的开国，略和明朝同时。攘斥胡元，输入中国的文化，一时国势，颇蒸蒸日上。不幸，朝鲜人虽学到了中国人的好处，也沾染了宋、明时代中国人的习气，士大夫好结党相争；又外戚专权，历时甚久，政治遂大腐败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三册，第106页）

中日战争

一八九四年，朝鲜东南部又有乱事，求救于我，我国派兵前往，未至而乱已平。日本亦派兵云集京畿，我国要求他撤退，日本不听，又击沉我国运兵的轮船，两国遂开战。我国陆军败于平壤，海军败于大东沟，日兵遂渡鸭绿江逼摩天岭，别一军进旅顺，营口、海城亦相继陷落。其海军又北陷威海卫，南陷澎湖，中国不得已派李鸿章到日本议和。

马关条约

和议初开时，日人的要求很为苛酷，旋因李鸿章为刺客所伤，各国舆论哗然，日人才许停战。旋议定条约：（一）中国认朝鲜独立。（二）赔款二万万两。（三）割辽东半岛和台湾、澎湖。（四）照欧、美现行约章，和日人改订商约，这是日本求之多年而不得的。而（五）开放长江上流的沙市、重庆和运河沿岸的苏州、杭州。（六）日人得在通商口岸，从事制造，货品课税及租栈，得享有一切豁免优权。则又是欧美各国，所求之而未能得的了。约既定，俄、德、法劝

告日本，勿割辽东；日人乃增索赔款三千万两，而将辽东还我。台湾人自立民主国，和日本抵抗，到底因势孤援绝，为日人所灭。

中日战后外力的压迫

中日战后，中国的积弱，暴露于天下，而外力的压迫，遂纷纷而起。俄人以干涉还辽之故，于公元一八九六年，诱我与订《密约》，许其筑造东省铁路。次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，迫我订租借九十九年的条约，并得胶济、胶沂济铁路的敷设权，及开采沿铁路线三十里内的矿山。同年俄人又租借旅顺、大连湾，以二十五年为期，并得从东省铁路，添筑一支线，达于旅、大。英国则借口均势，于公元一八九八年，租借威海卫，租期与旅、大相同。又租借九龙半岛，租期和胶州湾相同。同年法国亦租借广州湾，租期和胶州湾相同。而法于两广、云南，日于福建，英于长江流域各省，又都要求我不得割让他国。这就是外人所谓“势力范围”，各于其中，攘夺筑路、开矿的权利；瓜分之论，一时大炽。

美国在中国，是没有什么特殊权利的，其国务卿海约翰（John Hay，或译赫伊），乃照会英、法、德、意、俄、日六国，提出“门户开放，领土保全”主义，这就是所谓“均势”。（照会的条件有三：一、 各国对于中国已得的权利，彼此不相干涉。二、 各国势力范围内各港，对于别国的商品，都遵照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，由中国征收。三、 各国势力范围内各港，对他国船舶，所课入口税，不得较其本国的船舶为高；铁路运费亦然，这是所以保存各国对我国条约上的权利的。要条约有效力，必须领土不变更，所以既谈门户开放，必然连带及于领土保全）从此以后，我国的局势，就随着外人瓜分和均势的议论，而忽松忽紧了。

对外认识一大变

从戊戌以前，中国人对外的认识，可分为四期：

（一）教士的译著书籍，是从明朝就起的。然而除掉天文、算学之外，竟毫不能得中国人的注意。便看见了，也不信他。譬如纪昀修《四库总目》，对于艾儒略的《职方外纪》，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说的假话，世界实在没有这么大。这是毫无认识的时代。

（二）到五口通商之后，而中国人始一警醒。于是有魏源所著的《海国图志》，江上蹇叟所著的《中西纪事》等出来。对于外国的情形，稍稍认识。然而这时代，所抱着的，还是闭关的思想；所讲求的，还是把守口岸，不给洋人攻破等等法子。这是第二个时代。

（三）太平军的平定，在清朝一方面，实在借用一部分的外国兵力的。中兴诸将，亲眼看见过外国兵的，知道中国的兵力，确非其敌。于是乱平之后，就要注意于练兵。设船政局、制造局，开同文馆，广方言馆，选派幼童留学美国，以至兴办铁路、汽船、电报等事，都是如此。这是第三个时代。

（四）这种办法的弱点，经中法之战而暴露出来，中日战后，更其尽情暴露。当时自然有一班比中兴名将时代较后，和外国接触较深，知道他的内情较真实的人，但是这种人，在中国社会上，不易为人所认识。到中日之战，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，而当时主张变法的康有为、梁启超等，又是长于旧学，在中国社会上，比较的容易被人认识的人。变法的动机，就勃发而不可遏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52、53、54页）

第四十四章

维新运动之始末

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，治法无大变更。到清末，已经二千多年了，各方面的积弊，都很深了。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，也是应当改革的。从西力东侵以后，中国人所遭遇到的，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，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。值旷古未有的变局，自必有非常的手段，然后足以应付之，此等手段，其（一）起自中等阶级，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，是为戊戌维新。其（二）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，采取西洋文化，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，则为辛亥革命。然则士大夫阶级的改革路线失败，而起于草野者卒成；从中国的旧观点出发的手段失败，而顺应世界大势者卒成，我们可以说："这可以觇世变了。"

维新的酝酿

维新运动，是适应环境的要求而生的。当鸦片战争时代，举国上下，几于茫然不知世界的情势，一味为盲目的排外，就到英法联军时，也还是如此。中国新机的开发，是从湘、淮军中一班人物起的。他们任事久，经验多了；又目击西人兵力的强盛［当太平军陷苏州时，清朝官吏，避居上海，初募印度人防守，由西人统带；后乃改募华兵，仍由洋将训练统率，是为常胜军。英人戈登（Gordon）率之随淮军作战。所以湘、淮军诸将，实在是和西人共过事的］；知道故步自封，不能自立于今日的世界，才渐次趋向于改革。然他们的改革，直接的是军事；间接的是制造和交通，还不外乎为军事起见。（如改练洋操；购铁甲船；设制造局，造船厂；筑铁路，设电报等）这种改革，自然还是不够应付的，再进一步，就要想把全国的政事，彻底改革一下了。这便是维新运动的动机。

中国近代的改革

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一样，总靠新陈代谢的作用旺盛，才得健康。但是总不能无老废物的堆积。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，治法可以说是无大变更。到清末，已经二千多年了，各方面的积弊，都很深了。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，我们种种治化，也是应当改革的。所以我们近代的改革，必待外力的刺激，做一个诱因。

中国受外力刺激而起反应的第一步，便是盲目的排斥，这可谓自宋以来，尊王攘夷思想的余波。排斥的目的，已经非是，其手段就更可笑了。海通以后，最守旧的人，属于这一派。拳匪乱时，守旧大臣的意见，仍属此派。其第二步，则是中兴时代湘淮军中一派人物。大臣如曾国藩、李鸿章，出于其幕府中的，则如薛福成、黎庶昌之类。此派知道闭关绝市是办不到的。既已入于列国并立之世，则交际之道不可不讲，内政亦不得不为相当的改革。但是他们所想仿效他人的，根本上不离乎兵事。因为要练兵，所以要学他们的技艺；因为要学他们的技艺，所以要学他们的学术；因此而要学他们的语文。如此，所办的新政虽多，总不出乎兵事和制造两类。当这世界更新，一切治法，宜从根本上变革的时候，这种办法，自然是无济于事的。再进一步，便要改革及于政治了。

但是从根本上改革，这句话谈何容易？中日之战，以偌大的中国，而败于向所轻视的日本，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。经这一个打击，中国人的迷梦，该要醒了，于是维新运动以起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05—106页）

咸、同、光的朝局

然而以当时的朝局论，则是很难望其振作的。前清文宗末年，宗室中载垣、端华、肃顺三个人，颇为专权。文宗死于热河，穆宗立，年幼，三人等自称赞襄政务大臣。穆宗生母慈禧太后，和恭亲王奕䜣密谋，于回京之日，把他们三个人杀掉，慈禧太后和文宗的皇后慈安太

后同时垂帘听政；而实权全在慈禧太后（钮钴禄氏，徽号慈安，谥孝贞，当时谓之母后皇太后。叶赫那拉氏，徽号慈禧，谥孝钦，当时谓之圣母皇太后。俗以其所居称钮钴禄氏为东宫皇太后，叶赫那拉氏为西宫皇太后；简称东太后、西太后）。这时候，满人腐败，已达极点，肃顺是主张任用汉人的，慈禧亦能守其政策，所以湘、淮军诸将得以效力于外，把内难削平。然自此以后，慈禧就骄奢起来了，而其性质又甚专权。穆宗死，无子，强立德宗，年方四岁（清朝当高宗时，曾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之例，穆宗无子，本该在其侄辈中选立，而德宗的母亲，是慈禧太后的妹妹，所以慈禧独断立他），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再临朝。慈安死，慈禧更无忌惮。德宗大婚亲政后，依旧事事要干预，德宗是颇有志于改革的，而为其所制，志不得行，就酿成戊戌政变之祸了。

旧手段不足应付新局面

从西力东侵以后，中国人所遭遇到的，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，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。孝钦皇后，自亦有其相当的才具，然她的思想，是很陈旧的。试看她晚年的言论，还时时流露出道、咸时代人的思想来可知。大约她自入宫以后，就和外边隔绝了，时局的真相如何，她是不得而知的。她的思想，比较所谓中兴名臣，还要落后许多。当时应付太平天国，应付捻、回，所用的，都是旧手段，她是足以应付的。内乱既定之后，要进而发愤自强，以御外患，就非她所能及了。不但如此，即当时所谓中兴名臣，要应付这时候的时局，也远觉不够。他们不过任事久了，经验丰富些，知道当时的一种迂阔之论不足用，他们亦觉得中国所遭遇的，非复历史上所有的旧局面，但他们所感觉得的，只是军事。因军事而牵及于制造，因制造而牵及于学术，如此而已。后来的人所说的："西人自有其立国之本，非仅在械器之末。"断非这时候的人所能见得到的，这亦无怪其然。中兴诸将，地丑德齐，他们多数是读书人，既有些顾虑君臣的名义，又有些顾虑到身家、名誉，不敢不急流勇退。士大夫的风气，在清时本是近于阘茸而好利的。湘军的中坚人物，一时曾以坚贞任事的精神为倡。

然少数人的提倡，挽回不过积重的风气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536—537页）

戊戌维新及政变

中日之战，中国以大国而败于小国；而且割地赔款，创巨痛深；于是人心奋发，风气渐变。康有为设强学会于北京，虽然被封禁了，其弟子梁启超，又设《时务报》于上海，鼓吹变法，风行一时。康有为是很早就上书请变法的。其中有一次得达，德宗深以为然。

士大夫的改革终是无成

自西力东侵，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。值旷古未有的变局，自必有非常的手段，然后足以应付之，此等手段，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，然则新机从何处发生呢？其（一）起自中等阶级，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，是为戊戌维新。其（二）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，采取西洋文化，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，则为辛亥革命。戊戌变法，康有为是其原动力。康有为的学问，是承袭清代经学家今文之学的余绪，而又融合佛学及宋、明理学而成的。（康有为）生当清代威力已衰，政令不复有力之时，到处都以讲学为事。他的门下，亦确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。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，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册，第542页）

康、梁、章的学问，都是从士大夫阶级产生的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，则实从太平天国的余波迤演而来，可谓出自平民阶级。康、梁、章的改革手段，都以中国的旧见解为基本的，虽然康长素变法之见，多得之于国外的观感。孙中山的民权、民生两主义，则其见解，都是植基于外国学问上的，虽然到后来亦将其和中国旧说相贯通。然则士大夫阶级的改革路线失败，而起于草野者卒成；从中国的旧观点出发的手段失败，而顺应世界大势者卒成，我们可以说：“这可以觇世变了。”（《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》）

公元一八九八年夏，德宗就擢用有为等，下诏定国是，励行新法。这一年，是戊戌，自四月至八月中，变法之会相继诏示。守旧大臣，群诉于慈禧太后，请其阻止。后乃自颐和园回宫，说康有为等要谋围颐和园，不利于她，复行垂帘听政。康有为、梁启超走海外；有为弟广仁等都被杀，时人谓之“六君子”（六君子，是康广仁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）。德宗自是被幽于南海的瀛台，一切新政，尽行推翻，是为“戊戌政变”。

专制政体的危害

专制政体，把全国的事情，都交给一个人做主。于是这一个人的智愚仁暴，就能使全国的人民，大受其影响。而君位继承之法，又和家族中的承继，并为一谈。于是家庭间的争夺，亦往往影响于国事。这是历代都是如此的，到晚清仍是其适例。专制君主的权力，在法律上是无制限的，在事实上则不尽然。历代有志改革的君主，为旧势力所包围，以致遭废弑幽禁之祸的，正自不乏。这期间，由于意见的不同者半，由于保存权位之私者亦半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78、107页）

政变后的情形

新政虽然推翻，人心却不能复旧了。太后深恶康有为、梁启超，要想拘捕他，而外人以其为国事犯，加以保护。太后要想废掉德宗，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觇人心，而各国公使，表示反对。太后说德宗有病，则海外华侨，和上海新党，都电请圣安，以表示拥戴。太后要拿办他们，又不能得。于是新旧乖迕，内外猜疑，义和团的事变，乘之而起；而立宪革命的气势，亦渐次旺盛了。

第四十五章

八国联军之役

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，种种的吃亏，有些不忿，想要振作图强，原也是人情。然而图强的方法，却就很难说了。“蹈常袭故”之世，“读书明理”的人，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，何况一班毫无知识的人？民本思想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也由来很久。不过在实际上，限制君权以成立宪，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。一旦和西洋人接触，看到他的政治组织，合于中国人固有的理想，自然易于激动。故庚子以后，立宪、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。清朝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，敷衍搪塞，所行的政治，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，庚子以后，更其急转直下，而革命之祸，就因之激起了。

义和团的起源

义和团是八卦教中的一派，和白莲教同源的。自西人东来传教，中国积受欺陵，人心未免忿恨；而教民倚势横行，教士又加以庇护，辞讼不得其平，尤为人民切肤之痛。一般社会心理，以为西洋人所长，唯在枪炮；土著齐心，即可将少数客籍打退；这种观念，亦与日俱深。加以平话、戏剧、荒诞不经的教育，遂有练神拳可御枪炮的怪说。而民间的秘密团体，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，亦就一变而为扶清灭洋了。

义和团兴起的社会心理

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，种种的吃亏，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。有些不忿，想要振作图强，原也是人情。然而图强的方法，却就很难说了。“蹈常袭故”之世，“读书明理”的人，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，何况处前此未有的变局，再加以揎拳勒臂的，又是一班毫无知识

的人？专制之世，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，是不足怪的。却又有一种误解，很以一哄的“群众运动”为可靠。像煞交涉的吃亏，是官吏甘心卖国，有意退让的。傥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，一哄着说：“打打打！”“来来来！”外国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。这种心理，不但下流社会如此，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，也多半如此。（在庚子以前，怕竟是全国大多数的心理）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，外国人怕百姓。这便是相信义和团的根源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55—56页）

义和团的扰乱及联军入京

义和团盛于一九〇〇年，其初起于山东。巡抚袁世凯痛加剿办，其众遂流入直隶。此时中枢大臣，还有极其迂谬，全不晓事的；亲贵中又有想废德宗而立溥儁的人，利于乱中行事（见恽毓鼎《崇陵传信录》，中华书局《中国近百年史资料》本）。慈禧太后因洋人庇护康、梁，亦生仇恨，乃亦加以奖励，其众遂大盛，京、津之间，到处设坛练拳。拆铁路、毁电线；烧教堂，杀教士；甚至见着洋服和用洋货的人，都加以杀戮；秩序大乱。而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都被戕。［德使克林德（Ketteler），日书记官杉山彬。后议和条约中，定派亲王大臣赴德、日，表示惋惜之意］迂谬的亲贵大臣，又令驻京的甘军，合着他去攻公使馆，幸有暗中令甘军缓攻的，使馆才得不破。亲贵又伪造西人的要求条件，激怒太后，对各国同时宣战；而不知英、美、德、法、奥、意、俄、日八国的联军已到，大沽先已失陷了。（与各国宣战的上谕，在庚子五月二十五日，大沽口的失陷，在二十一日）当时的拳民，亦有相当的勇气。［当联军未来之前，英国提督西摩（Seymour）带着各国海军陆战队，进京援救，为义和团所阻。孙中山《三民主义》民权第五讲载西摩的话，说：“当时义和团的勇气，如果他们所用，是新式枪炮，联军一定全军覆没。他们总是用大刀肉体，和联军相搏，虽然伤亡枕藉，还是前仆后继，其勇锐之气，再令人惊奇佩服。”］然既无训练，又专恃血肉之躯，自不足以当大敌。联军一到，就都溃散了。专靠一个聂士成，力战抗敌，到底因众

寡不敌阵亡，联军进逼，德宗及太后走太原，旋又走西安。联军的兵锋，东到山海关，西到保定。

东南的互保和东三省失陷

傥使当时外省的督抚，亦像中央政府一般，轻举妄动，则战祸的蔓延，势必及于全国。幸而东南各督抚，不奉乱命，和各国领事立互保之约。（当时两江总督为刘坤一，两广为李鸿章，湖广为张之洞。三人会商，饬上海道和各国领事立约：租界归各国保护，内地归各督抚保护。闽浙总督许应骙、山东巡抚袁世凯，亦取一致态度）然黑龙江省，遵奉伪谕，攻入俄境，俄人从旅顺和阿穆尔省两路出兵，攻陷三省要地，挟奉天将军，以号令所属，三省遂几同沦陷。

辛丑和约

京城既陷，清朝乃再派李鸿章和各国讲和。各国要挟清朝，惩办排外的亲贵大臣，然后开议，议未竟而李鸿章死，代以王文韶。明年，和约成。其中要点：（一）划定使馆区域专由外人管理，禁止华人居住。（二）拆毁大沽口及从北京到海口路上的炮台。（三）许各国驻兵于一定地点，以保护北京到海口的交通。（四）赔款四万五千万两。年息四厘，分三十九年还清。还要按市价易成金款，于是按其实，就连九万万都不止了。

乱后的形势

和议定后，太后和德宗还京，实权仍在太后之手。排外失败，一变而为媚外，时时和各公使夫人等相联络，那更可笑了。闯下滔天大祸，贻累国民，未免有点说不过去。知道舆论主张维新，乃又伪行新政，以为搪饰之计，又谁不能窥其虚伪？人民到此，对清朝就绝望，而立宪的议论，革命的气势，就要日盛一日了。

立宪与革命思想的更替

民本思想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也由来很久。中国人看着皇帝，本来当他是公仆，好就承认他，不好就可以把他赶掉；这种道理，差不多是人人承认的。不过在实际上，限制君权以成立宪，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罢了。一旦和西洋人接触，看到他的政治组织，合于中国人固有的理想，自然易于激动。因此故，庚子以后，立宪、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。清朝人自然是赞成立宪的，但是其初，还没有爽爽快快就答应人民立宪，直到日俄之战，俄国败了；于是“日以立宪而强，俄以专制而败”的议论大盛，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。以中国人民本思想蓄积之久，一朝觉悟，原不是区区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的。况且清朝也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。（却又不是一味专制，硬和人民反对；不过是毫无实力，既不能强，又不能弱；看舆论倾向在哪一面，就把些不彻底的办法，来敷衍搪塞罢了）而从戊戌以后，所行的政治，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，庚子以后，更其急转直下。一班亲贵愚昧无知，上头不自知其毫无实力，而还想把持朝权。中央一班人，鉴于前清末年，外权颇重，不知道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为，积渐而致的，不是顷刻可变。要想中央集权，却又不知集权之法，误以压制施之人民。而革命之祸，就因之激起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72、73、74页）

第四十六章

日俄战争与东北移民

俄国强占东三省，是各国都不愿意的，而尤其不愿意的是日本。一九〇四年，就和俄国开战。日俄战后，日本将所得东省铁路的支线，改名南满洲铁路；并将所得租借地，改称关东州，为关东都督府。东北的形势变为日南俄北，分划势力范围，不准他国插足了。日俄之战，又有影响于我国之内政者，则立宪之论是也。是役也，日胜而俄败，而日之政体为立宪，俄之政体为专制。我国民方渴望立宪，遂以政体之异，为其致胜负之最大原因。其说确实与否且勿论。而日、俄之战，实与我国主张立宪者以极大之奋兴。公元一九〇七年，中国亦知东三省形势的危急，将其地改建为行省，努力于开荒拓垦事宜。

俄国占据东三省

当各国和约，在京开议时，俄人借口东三省事件有特别关系，要求另议，于是向中国肆行要挟；而各国又警告中国不得和俄国另立密约；中国乃处于左右为难的地位。后来各国和约，大致磋商就绪，俄人迫于公议，乃和中国订约，分三期撤兵。从庚子年九月十五起，每半年为一期，第一期撤盛京以西南的兵，第二期撤奉天省里其余地方和吉林省的兵。第三期撤黑龙江的兵。第一期照办了；第二期就不但未撤，反有增加；第三期更不必说了。

日俄战争

俄国强占东三省，是各国都不愿意的，而尤其不愿意的，自然是日本。日本这时，国力还非俄国之敌。一九〇二年，日、英订结同盟，以共同对敌俄国南侵。然尚未敢贸然和俄国开衅，乃向俄国提

出“满、韩交换”的办法，而俄人对于东三省，丝毫不容日本过问；对于朝鲜，亦不肯放弃。日人迫于无可如何，一九〇四年，就和俄国开战。中国反宣告中立，划辽河以东为战区。日本当宣战之前，业已袭败俄舰于旅顺及仁川。俄舰均蛰伏不能活动，日人遂得纵横海上。于是日人以第一军渡鸭绿江，逼摩天岭。第二军攻金州，第三军攻旅顺。后来又组织第四军，和一、二两军相合，攻下辽阳。俄国精锐的兵，多在西方，运输较难。（因西伯利亚铁路甚长，又系单轨，运输需时日。而海路又因英日同盟关系，俄舰只能绕好望角来，所以迂缓）辽阳陷后，西方的精锐才渐集，反攻不克，而为时已迫冬季，乃彼此休战，而日人于其间，以全力攻下旅顺。明年，日军三十四万，俄军四十三万，大战七日，俄兵败退。日兵陷奉天，北据开原、铁岭。俄人调波罗的海舰队东来，又被日人在对马海峡袭击。乃由美国调停，在该国的朴资茅斯岛议和。

俄败日胜之原因

战之胜败在兵，而其胜败之原因，则不在于兵也。关于此点，当时海内外议论甚多。今归纳之，得如下之三事。（一）日本于此战，迫不得已，俄国则否。（二）则日本之政治，较俄国为整饬。（三）则日本战士之效命，非俄国所及。抗军相加，迫不得已者胜，似矣。然从古亡国败家相随属，当其败亡之时，孰非处于迫不获已之境？为国民者，亦孰愿其国之亡？然而终已不救，则知徒有志愿而无实力，终无济于事也。日人则不然。当封建之时，有所谓武士道者，其为人则重然诺，轻生死，抑强扶弱，忠实奉令。又以立国适值天幸，千余年来，未尝被外敌征服；其皇室亦迄未更易，故其忠君爱国之念极强。夫祸福倚伏，事至难言。日人今后，此等偏狭爱国之心，愚鲁忠君之念，或且为其前途之障碍，亦未可知。然在当日，则固足以一战矣。（《日俄战争》，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，第125、126、127页）

日俄和议

此时日本兵力、财力，都很竭蹶，求和的心，反较俄人为切。所以和约的条件，日本是吃亏的。俄人仅（一）放弃朝鲜；（二）将旅顺、大连湾转租于日本；（三）东省铁路支线，自长春以南，亦割归日本；（四）并割库页岛的南半；而赔款则丝毫未得。当日俄议和时，中国曾声明："关涉中国的条件，不得中国承认，不能有效。"就《日俄条约》，也说（二）（三）两条，要得中国承认的。然而事实上何能不承认？于是由中国和日本订结《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》。除承认（二）（三）两项外；并开放商埠多处（凤凰城、辽阳、新民、铁岭、通江子、法库门、长春、吉林、哈尔滨、宁古塔、三姓、齐齐哈尔、海拉尔、瑷珲、满洲里）；又许日人将军用的安奉铁路，改筑为普通铁路。

日俄战后东北的形势

日、俄战后，日本将所得东省铁路的支线，改名南满洲铁路。并将所得租借地，改称关东州，为关东都督府。中国要借英款建造新法铁路；又想借英、美款项，建造锦爱铁路，都遭日本反对。日本却又获得新奉和吉长线两路的建造权。后来又要求将吉长延长到朝鲜的会宁，称为吉会铁路。吉林延吉厅，有韩人越垦，称其地为间岛。日人即指为韩地，派官驻扎，经再三交涉，然后撤去。美人提议"满洲铁路中立"。其办法：系由各国共同借款与中国，将东三省铁路赎回；在借款未还清时，禁止政治上、军事上的使用。日、俄二国，共同反对。旋订《新协约》，声明"维持满洲现状，现状被迫时，两国得互相商议"。于是变为日南俄北，分划势力范围，不准他国插足的形势了。

日俄战争对内政之影响

日、俄之战，又有影响于我国之内政者，则立宪之论是也。是役也，日胜而俄败，而日之政体为立宪，俄之政体为专制。我国民方渴望立宪，遂以政体之异，为其致胜负之最大原因。其说确实与否且勿论。而日、俄之战，实与我国主张立宪者以极大之奋兴，要求立宪者以有

力之口实，则无疑之事实也。于是清廷不能拒，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，光绪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年）六月。其后遂下诏预备立宪。行之不得其道，卒致酿成革命焉。我国政体之改变，原因虽多，而日、俄战争亦为悬崖转石中，加以助力之一事，则众所公认也。（《日俄战争》，第108页）

中日间岛交涉

中国和朝鲜，是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。二水同发源于长白山，而长白山一带，清人视为发祥之地，加以封锁，遂成为荒凉寂寞之区。隔江的韩人，渐有渡江开垦的。一八八五和一八八七两年，清朝派员和朝鲜会勘边界。在图们江沿岸，设立界碑。将越垦的朝鲜人，编入民籍。并禁此后再行越界。朝鲜亦经承认。然其后仍有越垦的。延吉县东南夹江地方（亦称通江），朝鲜人呼为间岛。朝鲜属日本保护后，日人遂强指延吉一带，均为间岛，派官驻扎其地。交涉再三，乃于一九〇九年，订立《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》。日人认图们江北为中国之地，把派出的理事官撤退。中国则开龙井村、局子街（即延吉县）、头道沟、百草沟（今汪清县）为商埠。许朝鲜人仍在江北耕种。并许吉长铁路，将来展接至朝鲜的会宁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49—50页）

中国的移民

中国亦知东三省形势的危急。公元一九〇七年，将其地改建为行省，努力于开荒拓垦事宜，并开拓到蒙古东部。辽河、洮儿河流域，新设县治不少。吉、黑两省，亦渐见繁盛。据近来的调查：十九世纪末年，东三省只有人口七百万；一九一一年，增至一千八百万；一九三一年，增至三千万。现在东三省的居民，十五个人中，有十四个是汉人。（二十一年国际联盟调查团《报告书》的话）

第四十七章

清代之政治制度与末年之宪政运动

清朝的官制，是大体沿袭明朝，亦以内阁为相职。唯雍正时，因对西北用兵，特设军机处，后来就没有裁撤。重要的奏章，都直达军机处，实际上，是军机处亲而内阁疏了。外官：明时废元行省，改设布政、按察两司，而区域则略沿元代行省之旧。清朝于两司之上设督抚。区域大则行政不易细密；而上级官的威权，自然加增，下级官受其抑压，格外不易展布；这是清代官制极坏之处。学校、科举合一，是明朝的一个特色，而清朝也沿袭他。所考的四书义，体裁是要逐段相对的，"谓之八股"。所考的东西虽多，其实只注重八股。而八股到后来，另成为一种文字，就连"四书"都不懂，也是可以做的。这是从前科举之士，学识浅陋的原因。

清代之官制

清朝的官制，是大体沿袭明朝，而又加以改变的。明太祖废宰相，天子自领六部，后世殿、阁学士，遂渐握宰相的实权，谓之内阁，清朝亦以内阁为相职。唯雍正时，因对西北用兵，特设军机处，后来就没有裁撤。重要的奏章，都直达军机处，廷寄亦由军机处发出；事后才知照内阁，在实际上，是军机处亲而内阁疏了。六部之外，清朝又有理藩院，以管理蒙、回、藏的事情，名为院，设官亦与六部相同。六部长官，都满、汉并置。咸丰末年，因天津、北京两条约，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委派王大臣任其职。前代的御史台，明代称为都察院，有左、右都、副御史，和监察御史，又有巡按御史，代天子巡守。清朝设有巡按御史，右都、副御史，为总督、巡抚的兼衔。

外官：明时废元行省，改设布政、按察两司，而区域则略沿元代行省之旧。清朝于两司之上设督抚。两司的官，分驻在外面的，就是所谓道，又若自成为一级，于是（一）督抚，（二）司，（三）道，（四）府，（五）县，几乎成为五级了。（中国官治的最下一级唤作县，从秦朝到现在没有改。县以上的一级唤郡，郡以上的一级唤作州，隋唐时把州郡并为一级，唐于州郡之上设道。宋改道为路，又把大郡升为府，府州之名，遂相错杂。元于行省之下置路府军州。明清于道之下，只有府州，州分两级，领县的为直隶州，与府同级。不领县的为散州，与县同级。同知、通判，另有驻地的，清朝谓之厅，亦有散厅和直隶厅的区别。直隶厅除四川叙永厅外，没有领县的）区域大则行政不易细密；而上级官的威权，自然加增，下级官受其抑压，格外不易展布；这是清代官制极坏之处。奉天省，清朝视为陪京，于其地设府尹及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五部。还有锦州一府，是沿袭未废的。此外就只有将军、副都统等治兵之官了。蒙、回、藏之地，也只以将军、副都统、办事大臣等驻防的官驻扎。（中法战后，曾改台湾为行省。后来失掉，新疆、关东，后来亦都改省制。唯蒙、藏、青海始终没有改省）

官俸至近代而大薄

官俸，历代虽厚薄不同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。古代大夫以上，各有封地。家之贫富，视其封地之大小、善恶，与官职的高下无关。无封地的，给之禄以代耕，是即所谓官俸。古代官俸，多用谷物，货币盛行以后，则钱谷并给。又有实物之给，又有给以公田的。明初尚有此制，不知何时废坠，专以银为官俸。而银价折合甚高。清朝又沿袭其制。于是官吏多苦贫穷。内官如部曹等，靠印结等费以自活，外官则靠火耗及陋规。上级官不亲民的，则诛求于下属。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。总而言之，都是非法。然以近代官俸之薄，非此断无以自给的。而有等机关，收取此等非法的款项，实亦以其一部分支给行政费用，并非全入私囊。所以官俸的问题，极为复杂。清世宗时，曾因官

俸之薄，加给养廉银，然仍不足支持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118—119页）

清朝的科举

学校、科举合一，是明朝的一个特色，而清朝也沿袭他。明制：各府、县都设学，京城则设国子监。府、县学生，升入国子监的，谓之监生。监生和府、县学生，都可以应科举。科举隔三年一开，先在本省考试，中式的谓之举人。进京，由礼部考试，中式的再加殿试，谓之进士。监生，除应科举中式外，亦可有入仕之途，不过差一些，府、县学生却没有；而非学生也不能应科举。所以《明史》说：明制是“学校储才，以待科举”的。清朝的制度，和明朝大致相同。

明清科举之弊

明清的科举制度，有可评论者两端。其（一）学校科目，历代都是两件事。明朝令应科目的必由学校，原是看重学校的意思。然其结果，反弄得入学校的，都以应科举为目的，学校变成科举的附属品。入学校的目的，既然专在应科举，而应科举的本事，又不必定要在学校里学；则学校当然可以不入。到后来，学校遂成虚设。生员并不真正入学，教官也无事可做。其（二）唐宋时代的科举，设科很多。应这时代的科举，一人懂得一件事就行了。这是可能的事情。从王荆公变法之后，罢“诸科”而独存“进士”，强天下的人而出于一途，已经不合理了。然而这时候，进士所试的只是经义、论、策。经义所试的，是本经、兼经。一人不过要通得一两经，比较上还是可能的事情。到明清两朝，则应科举的人：（一）于经之中，既须兼通“四书”“五经”。（二）明朝要试论、判、诏、诰、表，清朝要试试帖诗，这是唐宋时“制科”和“诗赋进士科”所试的事情，一人又要兼通。（三）三场的策，前代也有个范围的（大抵时务策居多）。明清两朝，则又加之以经子，更其要无所不通。这种科举，就不是人所能应的了。法律是不能违反自然的。强人家做不能做的事情，其结果，就连能做的，人家也索性不做。所以明清两朝的科举，其结果，变成只看几篇“四

书”文，其余的都一概不管；就“四书”文也变成另外一种东西，会做“四书”文的人，连“四书”也不必懂得的。于是应科举的人，就都变作一物不知的。人才败坏，达于极点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85—86页）

所考的四书义，体裁是要逐段相对的，“谓之八股”。［不是一句句对，而是一段段对的。最正规的格式，是分作八段四对（但其前后仍有不对的起结），所以谓之八股］其体式，为明太祖和刘基所创。五经义，和策、论等，都不重视，只要没有违犯格式的地方就算了。所考的东西虽多，其实只注重八股。而八股到后来，另成为一种文字，就连“四书”都不懂，也是可以做的。这是从前科举之士，学识浅陋的原因。（戊戌维新时，曾废八股，改试论、策、经义。政变后复旧，辛丑回銮后又改。后遂废科举，专行学校教育）

“八股”的由来

这种奇怪的文体，也有个发生的原故。因为考试时候，务求动试官之目。然应考的人多，取录的人少。出了题目，限定体裁，无论怎样高才博学的人，也不敢说我这一篇文章，一定比人家做得好。而又定要动试官之目，就只有两种法子：（一）是把文章做得奇奇怪怪，叫试官看了，吃其一吓，不敢不取。（二）是把文章做得很长，也是吓一吓试官的意思。这两种毛病，是宋朝以来就极盛的。要限制这种弊病，就于文章的格式上，硬想出种种法子：第一种办法，就是所以预防（一）的弊病。第二种办法，则是所以预防（二）的弊病的。因为要代古人说话，就是限定了，只准说某时代某一个人的话。其所说的话，就有了一定范围。自然不能十分奇怪，散文可以任意拉长（所谓“汗漫难知”），骈文却不容易。然而文体却弄得奇怪不堪了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84—85页）

清朝的兵制

清朝的兵制，入关以前有八旗（初止正黄，正白，正红，正蓝。后有镶黄，镶白，镶红，镶蓝，共八旗。这时候，汉人、蒙古人，都和满人合在一块编制。后来分出，称为蒙古八旗，汉军八旗，合满洲八旗，实在有二十四旗了），入关以后，收编的汉兵，谓之绿营。乾隆以前，大概出征用八旗，平内乱用绿营。嘉庆以后，八旗、绿营，都不足用，于是有勇营（湘、淮军亦称勇营）。咸同以后，才有改练洋操的。末年又要实行征兵制度，就各州县挑选有身家的壮丁，入伍训练，为常备兵。三年退为续备，又三年退为后备，共九年，而脱军籍。现在的一师，当时谓之一镇，想练陆军三十六镇，没有练成，就灭亡了。水军：本有内河、外海两种。承平既久，都有名无实。曾国藩练长江水师，和太平军角逐，当时称为精锐。然讲到新式的战争，还是无用的。咸同以后，乃购买铁甲船，又设造船厂、水师学堂，创造新式海军。法、日战争，两次丧败；港湾又都给外国租借去；就几于不能成军了。

清朝之兵力

以兵力论，则中国承平时代，只可谓之无兵，何者？凡事必有用，人乃能聚精会神以赴之。若其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时，未有不以怠玩出之，而寖至于腐败者也。此为心理作用，受时势之支配，无可如何之事。历代注重军政，若宋、明之世者，其兵力虽云腐败，兵额尚能勉强维持。清代则文恬武嬉，兵额多缺，而为武员侵蚀其饷。存者亦不操练，一以武员之怠荒，一以兵饷太薄，为兵者不得不兼营他业以自治，更无操练之余暇也。近代火器发明，实非人力所能敌，亦为兵事上一大变。兵事如此，边防自更废弛，对于藩属之控制，亦自更粗疏矣。又中国近代，富力与西洋各国相差太远，社会经济落伍，赋税之瘠薄随之。清代经常收入，恒不过四千数百万，即其末造，亦不过七八千万，尚安能有所举措耶？（《中国近百年史概说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236页）

清朝的刑法

中国历代的法律，都是大体相沿的，已见本书第二十章。法律仅规定大概，实用之时，不能不参考判例，这个历代都是如此。清朝将两者合编一处称为《律例》。（例是随时修纂的，把新的添进去，旧的删除）刑法亦历代相沿，唯明朝有所谓充军，系将犯罪的人，勒令当兵，实为最不合理的制度。清朝既不靠这法子取兵，却也沿袭其制（清朝的充军，实际上是较重的流刑）， 那就更为荒谬了。通商以后，外人借口中国法律不完备，刑罚残酷，于是有领事裁判权。清末，想将此权收回，仍将刑法加以修改（笞、杖改为罚金，徒、流改为工作）。预备立宪时，又改大理寺为大理院，以为最高审判机关，其下分设高等、地方、初等三级审判厅，检察厅，亦未能实行。

法律太简的弊端

中国历代的所谓法典，只有行政法、刑法两种。而这两种法典，只有唐、明、清三代编纂的较为整齐。法律要随时势为变迁。中国历代，变更法律的手续太难；又当其编纂之始，沿袭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，以致和事实不大适合，于是不得不补之以例。到后来，则又有所谓案。法学家的议论大抵谓“律主于简，例求其繁”，“非简不足以统宗，非繁不足资援引”，“律以定法，例以准情”。这也是无可如何之势。但是例太多了，有时“主者不能遍览”，人民更不能通晓，而幕友吏胥等，遂至因之以作弊。这正和汉朝时候，法文太简，什么“比”同“注释”等，都当作法律适用，弊窦相同。都由法律的分类，太觉简单，不曾分化得精密的原故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89—90页）

清朝的赋税

明初，定“黄册”“鱼鳞册”之法。黄册载各户人口及当差丁数，所有田地之数，据之以定赋役。鱼鳞册记土田字号、地形、地昧，及其属于何人，以便田地有所稽考，其法颇为精详。但到后来，两种册子，都失实了。人户丁口，及其所有田地之数，都不能得实，赋役就不能平均。历代的田赋，征收是有定额的。（加赋还是有定限的。浮收是事

实问题）派人民当差，或折收实物、货币，则系量出为入，征收的数目和次数，都没有一定。所以役的病民，更甚于赋。役的负担，是兼论人丁和资产的。人的贫富不均，以丁的多少，定负担的轻重，本非公平之法。况且调查不易得实，资产除田地外，亦是不易调查的。于是征收之法，渐变为计算一年需用之数，并作一次征收，谓之“一条鞭”。负担之法，名为专论丁粮，实则不查其丁，但就有粮的人，硬派他负担丁税，谓之“丁随粮行”。（丁税既不按人丁征收，所以各地方略有定额，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的，清朝的免收新生人丁丁税，实在是落得慷慨。许多无识的人，相信他真是仁政，那就上他的当了）实际上，变为加田税而免其役了。所以到公元一七一二年时，清圣祖便下诏说：此后新生人丁，不再收赋，丁赋之数，即以该年为准。如此，新丁不收赋，旧丁是要死亡的，现有的丁税，不久就要无法征收了。所以世宗以后，就将丁银摊入地粮，加田赋而免丁税，是赋税上自然的趋势，历代都是照此方向进行的，至此而达于成功。

“永不加赋”的真相

（明）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，按阖境的丁粮均摊。自此以外，不得再有征收。而其所谓丁者，并非实际的丁口，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，摊派之于有田之家，谓之“丁随粮行”。明朝五年一均役，清朝三年一编审，后亦改为五年，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。质而言之，乃因每隔几年，贫富的情形变换了，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，和调查丁口，全不相干。役法变迁至此，可谓已行免役之法，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。加赋偏于田亩，是不合理的。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。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，较之唐宋后之役法，犹为此善于彼。因为役事无法分割，负担难得公平，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，就不然了。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，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，将向来有丁的负担，转移于有粮之家，也是比较合理的。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。

一条鞭之法，起源于江西，后渐遍行于全国，其事在明神宗之世。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，约历八百年左右，亦可谓之长久了。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，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。职是故，从前每州县的丁额，略有定数，不会增加。因为增丁就是增赋，当时推行，已觉困难；后来征收，更觉麻烦；做州县官的人，何苦无事讨事做？清圣祖明知其然，所以落得慷慨，下诏说；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，永不加赋。到雍正时，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。这是事势的自然，不论什么人，生在这时候，都会做的，并算不得什么仁政。从前的人，却一味歌功颂德。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，民国时代，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，也还是这样，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，就是别有用心了。（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上册，第154—155页）

“地丁”是全国农民的负担。此外江、浙、两湖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山东八省，又有“漕粮”。初征本色，后来亦改征折色。地丁、漕粮而外，重要的，要算关、盐两税。关分新、旧。旧关是明朝因为收为亩钞而设的，后来就没有撤废，所以又称“钞关”。新关是和外国通商之后，设立于水陆各口的。盐法，由有引的盐商承销（盐多引少，临时招商承销的，谓之“票盐”），各有一定区域，谓之“引地”。引地是看水陆运道，计营销之便而定的，每一区域中所销的盐数，则视其地的人口多少而定，两者都不能没有变更，而引地引额，却不能随之而变，于是官盐贵而私销盛了。“厘金”起于太平军兴以后，设卡多而征收的方法不一律，更为恶税。（厘金是钦差帮办军务雷以諴在江北创行的。沿途设卡，凡商人货物过境的，照物价抽收几厘，故名厘金。嗣后各省仿行，至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始行裁撤）

清末的宪政运动

清朝的政治制度，大体都是沿袭前代的，只好处闭关独立之世，不足以应付新局面。至于实际的政治，则当咸、同之间，清朝实已不能自立，全靠一班汉人，帮他的忙，才能削平内乱，号称“中兴”。这一班中兴将帅，本也是应付旧局面则有余，应付新局面则不足的；而清朝

的中央政府，又极腐败；如此，国事自然要日趋于败坏了。戊戌维新，是清朝一个振兴的机会，不但未能有成，反因此而引起义和团之乱，人民对清政府就绝望，而立宪、革命的运动就日盛。立宪之论，起于拳乱以后。到日、俄战争，日以立宪政体而胜，俄以专制政体而败，就更替主张立宪的人，增加了一种口实。清朝鉴于民气之盛，也就假意敷衍。于公元一九〇六年，下预备立宪之诏。公元一九〇八年，又定以九年，为实行之期。这一年冬天，德宗和孝钦后，先后死了，溥仪继立。其父载沣摄政。一班亲贵握权，朝政更形腐败，人民多请愿即行立宪。清朝勉强许将预备期限，缩短三年。再有请愿的，就都遭驱逐。又因铁路国有之事，和人民大起冲突，革命军乘机而起，清朝就要入于末运了。

第四十八章

清代之文化与社会状况

明末学术，有两方面：一是经世致用，一是读书考古。清朝处于异族专制之下，有许多社会上、政治上的问题，都不敢谈；士大夫也有些动极思静了；于是经世致用之学，渐即销沉，而专发达了读书考古的一派。清朝所谓考据之学。古代不明白的事，经他们考据明白的很多。他们要求正确的古书，所以尽力于辨伪，尽力于校勘，尽力于辑佚，业经亡失、错误、窜乱的古书，经他们整理好的亦不少。清代是一个动极思静的时代，所以其风气，是比较沉闷的。到后来，所以始终没有慷慨激昂，以国事为己任的人，以致建立不出一个中坚社会来，实由于此。总而言之，近代的读书人，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。所以海通以来，处从古未有的变局，而这一个阶级反应的力量并不大，若在宋明之世，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，则处士横议，早已风起云涌了。此等风气，实在到现在，还是受其弊的。

学风的转变

明末诸儒的学术，本有两方面：一是经世致用，一是读书考古。清朝处于异族专制之下，有许多社会上、政治上的问题，都不敢谈；而且从宋到明，士大夫喜欢闹意气，争党见，这时候，也有些动极思静了；于是经世致用之学，渐即销沉，而专发达了读书考古的一派。

清朝的士风

士人本有领导他阶级的责任，中国士人最能尽此责任的，要算理学昌明时代，因为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，而他们所谓治天下，并不是专做政治上的事情，改良社会，在他们看得是很要紧的。他们在乡里之间，往往能提倡兴修水利，举办社仓等公益事业。又或能改良冠婚丧

祭之礼，行之于家，以为民模范。做官的，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养之政。他们所提倡的，为非为是，姑置勿论，要之不是与社会绝缘的。入清代以后，理学衰落，全国高才的人，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据。考据之学，是与社会无关系的。次之，则有少数真通古典主义文学的人，其为数较多的，则有略知文字，会做几篇文章，几首诗，写几个字，画几笔画的人。其和社会无关系，亦与科举之士相等。总而言之，近代的读书人，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。所以海通以来，处从古未有的变局，而这一个阶级反应的力量并不大，若在宋明之世，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，则处士横议，早已风起云涌了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57—158页）

清代的考据学

清朝所谓考据之学，是以经学为中心的。因为要读经，所以要留意古代的训诂名物、典章制度。古代不明白的事，经他们考据明白的很多。他们要求正确的古书，所以尽力于辨伪，尽力于校勘，尽力于辑佚，业经亡失、错误、窜乱的古书，经他们整理好的亦不少。他们的大本营虽在经，然用这一种精密的手段，应用于子、史等书，成绩也是很好的。清朝对于经学，是宗汉而祧宋的，所以其学亦称为“汉学”。但是汉学之中，仍有区别。清初如顾炎武等，还是兼采汉、宋，择善而从的，不过偏重于汉罢了。专以发挥汉人之说为主的，在乾、嘉两朝，实为汉学极盛时代。惠栋、戴震、钱大昕，为此时巨子。嘉庆年间，开始有人从汉学中，分别“今文”“古文”之说，道、咸以后，主张今文，排斥古文的风气渐盛。汉朝的今文家，本是主张经世致用的，所以清学到末期，经世致用的精神，也就有些复活了。

史事何以要考证?

大抵原始的史料，总是从见闻而来的，传闻的不足信，人人能言之，其实亲见者亦何尝可信？人的观察本来容易错误的。即使不误，而所见的事情稍纵即逝，到记载的时候，总是根据记忆写出来的，而记忆的易误，又是显而易见的。况且所看见的，总是许多断片，其能成为

一件事情，总是以意联属起来的，这已经掺入很大的主观的成分。何况还有没看见或忘掉的地方，不免以意补缀呢？这还是得之于见的，其得之于闻的，则传述者又把这些错误一一加入。传述多一次，则其错误增加一次。事情经过多次传述，就无意间把不近情理的情节删除或改动，而把有趣味的情节扩大起来。看似愈传述愈详尽，愈精彩，实则其不可信的成分愈多。这还是无意的，还有有意的作伪。那便是：（一）伪造假的事实，（二）抹杀真的事实，（三）无所为而出于游戏性质的。以上所述，实在还都是粗浅的，若论其精微的，则凭你一意求真，还是不能免于不确实，虽然你已小心到十二分。因为人的心理，总有一个方向，总不能接受和这方向相反的事情。所以又有许多真确而有价值的事情，为你所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了。心理上这种细微的偏见，是没有彻底免除的可能的；就要洗伐到相当的程度，也很不容易。史事的不足信如此，无怪史学家说“历史只是大家同意的故事”了。史学家为求真起见，在这上面，就得费掉很大的工夫。（《历史研究法》，第56—57页）

清代的义理辞章之学

宋学在清代，也仍保守其相当的分野。人们对于讲考据的人，而称其学为义理之学；至于做文章的人，则称为辞章之学；俨然成为学术界上的三大派别。义理和辞章之学，声光都远不如考据之盛，这是风气使然。以古文著名的桐城派，创于方苞，成于姚鼐，都是安徽桐城县人。主张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者不可缺一，立论颇为持平。以他自己的立场论，则在汉、宋之间，是偏于宋的；而其所长，则尤在辞章。在宋时，浙东一派学术，本是注重史学的。此风经明、清两代，还能保存。会稽章学诚，史学上的见解，尤称卓绝，和现代的新史学，相通之处颇多。清代的学术界，可以说是理性发达，感情沉寂的时代，所以其文艺，和历代比较起来，无甚特色。桐城派号称古文正宗，不过是学的唐、宋人，此外也不过或学周、秦，或学汉、魏；诗亦是如此，非学唐，即学宋。词则中叶的常州派，嫌元、明的轻佻成薄，而

要学唐、五代、宋；书法则邓完白、包世臣嫌历代相传的帖，渐渐失真，而要取法北碑；都有复古的倾向；然亦不过摹仿古人罢了。

清代的社会状况

因为清代是一个动极思静的时代，所以其风气，是比较沉闷的。清朝的管彤曾说："明之时，大臣专权；今则阁、部、督、抚，率不过奉行诏命。明之时，言官争竞；今则给事，御史，皆不得大有论列。明之时，士多讲学；今则聚徒结社者，渺焉无闻。明之时，士持清议；今则一使事科举，而场屋策士之文，及时政者皆不录。"（见管彤撰《拟言风俗书》）把明、清风气，两两比较，可谓穷形尽相了。清朝到后来，所以始终没有慷慨激昂，以国事为己任的人，以致建立不出一个中坚社会来，实由于此。此等风气，实在到现在，还是受其弊的。以上是指士大夫说。至于人民，则历朝开国之初，大抵当大乱之后，风气总要勤俭朴实些。一再传后，生活渐觉宽裕，贫富的不均，亦即随之而甚。明清时代，各省还有"贱民"，在最低阶级，为"良民"所不齿的。如山西的"乐籍"，广东的"蜑户"，浙江的"丐户"，清朝曾免去乐籍、丐户，使为良民。但如蜑户等，虽经解放，仍旧守其故俗。

传统政治与社会的特点

（一）当时中国的政治，是消极性的，在闭关时代，可以苟安，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。（二）当时中国的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是疏阔的，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，所以中国人民无其爱国观念，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时，才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。（三）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，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，入近世期以后，生活情形变，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。但中国疆域广大，各地方的生活，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，所以其变的迟速，亦不能一致，而积习既深，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61页）

第四十九章

清代之经济状况

中国的经济状况，清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。鸦片战争以前，中国实在还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。此时的农人，是各安耕耨。工业大都是家庭副业。商人亦不过较之农工，赢利略多，生活略见宽裕而已。到五口通商以后，情形就大变了，外国的货物，源源输入，家庭工业和手工业，逐渐为其所破坏，又收买我国的原料而去。我国对于新式事业，虽亦略有兴办。亦因资本微末，技术幼稚，不能和外厂竞争，遏止外货的输入。中国财政，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；所以进款虽少，收支是足以相抵的。即当叔季之世，横征暴敛则有之，却无所谓借债。其恃借债以救急，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。

闭关时代之经济状况

中国的经济状况，清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。鸦片战争以前，外人虽已来华通商，然输出入的数目并不大；输入的也不是什么必需品；所以当这时代，中国实在还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。此时的农人，是各安耕耨。他们的收入并不大，然而他们的支出，也是很节省的。工业：除较困难的，要从师学习，独立而成为一艺外，其余大都是家庭副业。出品并不甚多，营销的区域，也不很远。天产品亦系如此。所以当时的商人，除盐商由国家保护其专利，获利最厚外，只有典当、钱庄、票号等，资本较大，获利较丰。此外，亦不过较之农工，赢利略多，生活略见宽裕而已，并没有什么可以致大富的人。总之，生产方法不改变，社会的经济情形，是不会大变的。

传统社会的农工商

中国的人民，百分之八十是农民，农民的知识，大概是从经验得来的。其种植的方法，颇有足称。但各地方的情形，亦不一律，这是因地利之不同，历史之有异，如遭兵荒而技术因之退步等，所以其情形如此。但以大体论，中国的农民是困苦的。这因（一）水利的不修，森林的滥伐，时而不免于天灾。（二）因田主及高利贷的剥削，商人的操纵。（三）沃土的人口，易于增加。所种的田，因分析而面积变小。所以农民的生活，大多数在困苦之中。设遇天灾人祸，即遭流离死亡之惨，抑或成为乱源。工业：大抵是手工。有极精巧的，然真正全国闻名的工业品并不多。即使有，其销场实亦仍限于一区域中。流行全国的，数实有限。此因制造的规模不大，产量不多，又运输费贵，受购买力的限制之故。普通用品，大抵各有营销的区域。工人无甚智识，一切都照老样子做，所以改良进步颇迟；而各地方的出品，形式亦不一律。商人在闭关时代，可谓最活跃的阶级，这因为社会的经济，既进于分工合作，即非交换不能生存。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，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，商人居其间，却尽可找有利的条件买进，又可尽找有利的条件卖出。他买进的条件，是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。卖出的条件，是只要消费者能勉力买，所以他给予生产者的，在原则上，只有最低限度。取诸消费者的，在原则上，却达于最高限度。又且他们手中，握有较多的流动资本。所以商人与非商人的交易，商人总是处于有利地位的。中国的商业，虽有相当的发达，但受交通及货币、度量衡等制度发达不甚完美的影响，所以国内商业，还饶有发展的余地。商人经营的天才，亦有足称。但欲以之与现代资本雄厚、组织精密的外国商人为敌，自然是不够的。加以他们（一）向来是习于国内商业的，对于国外商业的经营，不甚习熟。（二）资本又不够雄厚。（三）外国机器制品输入，在中国饶有展拓之地，即居间亦有厚利可图。所以海通以来，遂发达而成为买办阶级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55—157页）

五口通商后的经济状况

到五口通商以后，情形就大变了，外国的货物，源源输入，家庭工业和手工业，逐渐为其所破坏，又收买我国的原料而去。于是中国的农人，也有为外国的制造家而生产的，经济上彼此的联结，就渐渐密切了。资本主义，是除掉低廉的原料以外，还要求低廉的劳力的；而劳力也总是向工资高的地方而移动。于是华工纷纷出洋谋生，遂成为外国的资本和商品输入，而中国的劳力输出的现象，其初是很受外国欢迎的，后来又为其工人所妒，到处遭遇禁阻，于是中国人谋生的路更窄了。（排斥华工，起于美国，其事在一八七九年，后来南洋亦有继起的）

清末的经济状况

资本主义，发达到一定的地步，是要将资本输出的。既要将资本输出，就要谋其所输出的资本的安全；就不免要干涉后进国的政治。于是资本主义，和传统的武力主义相结合，而成为帝国主义了。我国一通商，而沿海和内河的航权，即随之而俱去。（一）航业遂成为外人投资的中心。（二）又外国的银行，分设于通商口岸，亦能操纵我的金融。（《天津条约》定时，实际上，外船早在沿海自由航行了）至中日战后，则（三）通商口岸，既得设厂；（四）又得投资于我国的路矿；（五）而各种借款，又多含有政治意味。于是我国的轻工业、重工业，都受到外力的压迫；就是政治，也不免要受其牵制了。

我国对于新式事业，虽亦略有兴办。然如制造局和船政局，只是为军事起见。开平煤矿，大权旁落于英人。汉冶萍煤铁矿厂，因欠外债而深受日人的束缚。一个招商局，既不足和外轮竞争，铁路又多借外债。官私所办的纺织事业，亦因资本微末，技术幼稚，不能和外厂竞争，遏止外货的输入。再加以屡次战败，赔款之额，超过全年收入数倍（清朝光绪年间，全国的岁入，是七千万两。所以中、日之战的赔款，是当时岁入的三倍。庚子赔款四万五千万两，易成金款，实际上要加倍，那就十倍不止了。中国的借外债，是起于左宗棠征新疆时的。然自中日之战以前，所借甚少，且都随即还清），非借外债，无

以资挹注；而借外债则既要负担利息、折扣，还要负担镑亏。国际收支，遂日趋于逆势，除掉华侨汇归的款项外，非靠外人投资，不能弥补；而外国资本，就竟以我国为尾闾了。

清末的借款

中国财政，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；所以进款虽少，收支是足以相抵的。即当叔季之世，横征暴敛则有之，却无所谓借债。预借租调等，还只算是征敛。其恃借债以救急，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。然而这不过济一时之急；在大原则上，收支还是相合的。其负担实在超出于财政能力之上，而靠借款以为弥缝，则从甲午、庚子两战役后起。然仍是为应付赔款起见，在内政上，仍持量入为出主义。至一变而为量出为入主义，而又不能整顿收入，乃靠借债以举办内政，则从胜清末叶的办新政起。这时候的危险，在于借口借债以兴利，其实所借的债，能否应付所兴的利的本息，茫无把握。傥使借债甚多，而所兴的利，毫无成效，便要一旦陷于破产的悲境了。至于一国的大柄，倒持在特权阶级手里。他要花钱，便不得不花。而国家的大局如何，前途如何，再无一人肯加以考虑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128页）

第五十章

本期结论

从清室灭亡之日，追溯西人东来之初，为时约四百年，是中国历史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。这四百年中的变动，比上一期的二千年，还要来得厉害；而尤以五口通商后的七十年为剧烈。这七十年之中，向来以天朝自居的，至此不得不纡尊降贵，和外国讲平等的交际。向来以为中国的学问，是尽善尽美的，至此而有许多地方，不能应付。总而言之：是环境变动剧烈，而我们的见解，一时来不及转变。见解的转变，本来要有相当的时间，七十年的时间不算长；以中国之大，旧文化根底的深厚，受了几十年的刺激，居然能有维新运动，立宪运动，甚至于革命运动，去求适应，也并不能算慢。不过方面太多了，不容易对付，所以到如今，还在艰难困苦之中奋斗。

环境的变动

本期是中国历史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。从清室灭亡之日，追溯西人东来之初，为时约四百年。这四百年中的变动，比上一期的二千年，还要来得厉害；而尤以五口通商后的七十年为剧烈。在这七十年以前，内而政治、风俗，外而对外的方针和手段，都还是前一期的旧观。到这七十年之中，就大变了，向来以天朝自居的，至此不得不纡尊降贵，和外国讲平等的交际。向来以为中国的学问，是尽善尽美的，至此而有许多地方，不能应付。对外则屡战屡败，而莫知其由。看了外国人所制的东西，只是觉得奇巧，而也莫名其妙。当鸦片战争之后，外力初突破闭关的局面时，真有这种惶惑无主之概。

中国文化的三大期

中国的文化，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：即（一）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。（二）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。（三）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。近几百年来，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，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。其结果，连社会的组织，亦受其影响，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。其影响亦及于中国。中国在受印度影响的时代，因其影响专于学术思想方面，和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，没有什么直接的紧迫的关系。到现在，就大不相同了。交通是无法可以阻止的。既和异国异族相交通，决没有法子使环境不改变，环境既改变，非改变控制的方法，断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。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，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。而我国在受着此新影响之后，亦时时在改变之中，迄于今而犹未已。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见《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46、147页）

适应的困难

所以这七十年中的失败，总而言之，可以说是环境骤变，而我国民族，还未能与之适应。譬如对外，中国向来是以不勤远略为宗旨的，因为从前既无殖民政策，除攻势的防御外，勤远略确是劳民伤财。然而外力侵削之秋，还牢守这种主义，藩属就要丧失，边疆也要危险了。又如经济，中国向来是以节俭为训条，安贫为美德的。在机械没有发明，生产能力有个定限的时代，自然也只得如此。然当外国货物源源输入，人民贪其“价廉物美”不得不买的时候，就非此等空言，所能抵拒外货，遏止“入超”了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总而言之：是环境变动剧烈，而我们的见解，一时来不及转变。见解的转变，本来要有相当的时间，七十年的时间不算长；以中国之大，旧文化根底的深厚，受了几十年的刺激，居然能有维新运动，立宪运动，甚至于革命运动，去求适应，也并不能算慢。不过方面太多了，不容易对付，所以到如今，还在艰难困苦之中奋斗。

社会改革之难

世界所以有大事，正和我们的屋子，住了一年要大扫除一次一样。灰尘垃圾，都是平时堆积下来的。堆积了一年，扫除自然费力了。谁能使他不堆积起来呢？天天扫除，使其绝不堆积，或者也并非办法，谁能按着堆积的情形，决定扫除的次数，并把他排列在适当的日期，使扫除亦成为生活的节奏呢？屋子住了一年要扫除，是没人反对的，而且大多数人认为必要。社会上堆积着千万年的灰尘垃圾，却赞成扫除的人少，反对扫除的人多，甚而至于把灰尘垃圾，视为宝物，死命的加以保存。世界之所以多事，岂不以此？（《两年诗话》，原刊《文艺春秋丛刊》之一《两年》，1944年10月10日出版）

社会是时时需要改革的，然其改革却极不易。所希望的目的，未曾达到，因改革而来的苦痛，倒不知凡几了，人们当此之际，就要嚣然不宁。苦于社会的体段太大了，其利害复杂而难明。还有一班私利害和公利害相违反的人，不惜创为歪曲之论。于是手段和目的，牵混为一。目的本来好的，因其手段的不好，而连带被攻击；替目的辩护的人，明知其手段的不好，亦必一并加以辩护；遂至是非淆乱，越说越不清楚了。（《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》）

第四编

现代史

第五十一章

孙中山先生与革命运动

凡事积之久则不能无弊。这个积弊，好像人身上的老废物一样，非把他排除掉，则不得健康。人类觉悟了，用合理的方法，把旧时的积弊，摧陷廓清，以期达于理想的境界，这个就唤作革命。但是因为地大人多，一时没有实现的方法。每到政治不良，人民困苦的时候，虽然大家也能起来把旧政府推翻，然而乱事粗定之后，就只得仍照老样子，把事权都交给一个人。于是因专制而来的弊害，一次次地复演着，而政治遂成为一进一退之局。这种因政体而来的祸害，我们在从前，虽然大家都认为无可如何之事，然而从海通以来，得外国的政体，以资观摩，少数才智之士，自然就要起疑问了。当戊戌变法时，国人所希望者，为以专制君主之力，变法图强。庚子后，国人对清廷之希望渐薄，民族、民权思想亦渐昌明。

革命的酝酿

中国革命的酝酿，潜藏得是很久的。清朝入关以后，汉人看似为其所压伏，实则革命的种子迄未尝绝。从西人东来以后，国人懔于民族的危机，愈见深切，因而发生许多反清的举动；至于“民贵君轻”之论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之说（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见《孟子·尽心下篇》。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见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孔孟早发之于二千年以前，所以西洋的民主政体、社会学说，我们均极易契合。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主义，在人人心坎中，久已潜伏着了。不过没有适宜的环境，不能发荣滋长出来；没有领袖的指导，其运动也不易入于正轨罢了。

革命思想勃兴之原因

当戊戌变法时，国人所希望者，为以专制君主之力，变法图强。庚子后，国人对清廷之希望渐薄。民族、民权思想亦渐昌明。激烈者主张革命，缓和者遂主张君主立宪。清廷迫于舆论，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。然清廷实无立宪诚意，加以溥仪幼稚，摄政昏庸，皇族专权，朝政益紊。反欲压制舆论，妄图集权。革命之势，遂日益蓬勃。革命思想之勃兴原因：（一）由民族主义。北族入主中国，虽其治法大体沿中国之旧，然于民族主义，终欠光晶；而欧人东侵，又有以激起中国人之民族思想。（二）由民权主义。民视民听，本已郁积于数千年之前；明末，得黄梨洲等为之提倡；加以欧西现代政治之观感。（三）由民生主义。因欧人之经济侵略，逐渐加紧，人民感于生计之困苦，渐觉有改革之必要。凡此皆时势所迫，勃兴之原因。（《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》，第167、168页）

孙中山先生

孙中山先生，广东香山县人（现在改为中山县，就是因纪念孙先生改名的），名文，字逸仙，中山是他的自号。他生于公元一八六六年，就是前清同治五年。他少有大志，怀抱民族、民权思想。公元一八八五年，中法战事起，先生鉴于政府的腐败，就决定颠覆清廷，创建民国的宗旨。公元一八九二年，在澳门创立兴中会，由少数的同志，联结会党，运动当地防营，以为革命的准备。会党虽以反清为宗旨，团结实甚散漫，当地驻军的思想更是腐旧不堪，所以成效很少。公元一八九五年，先生在广州谋起义，因运输军火事泄，不克。先生乃经檀香山赴美洲，和其地的会党连络（太平天国灭亡后，余党逃亡海外的很多，檀香山、美洲一带更盛），又赴欧洲。此时清朝已知先生为革命首领，其驻英公使，把先生计诱到使馆里，拘禁起来，想解送回国；先生感动了使馆里的侍役，把消息泄漏出去，英国舆论大哗，先生乃得释放。此即所谓伦敦蒙难。先生在欧洲数年，考察其国势民情，觉得单讲民族、民权，还不能“进世界于大同，畀斯民以乐利”，乃重加民生主义一说。合民族、民权、民生而完成其三民主义。

同盟会成立

义和团乱起，先生分遣同志，谋袭广州、惠州，都不克。此时风气渐开，出洋留学的人渐多，尤群聚于日本；其中也颇有怀抱革命思想的。一九〇五年，先生乃亲赴日本，改兴中会为同盟会。入会的人，很为踊跃。革命团体，到此才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。有了这辈人参加，则可以文字运动；主义的传布，更易迅速而普遍；而且指挥组织，也都有人才了。所以先生说："到这时候，我才相信革命事业，可以及身看见其成功。"

革命的心理动机

"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""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，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"在纪元前四世纪时，就有人说过了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篇》和《尽心下篇》）但是因为地大人多，一时没有实现的方法。每到政治不良，人民困苦的时候，虽然大家也能起来把旧政府推翻，然而乱事粗定之后，就只得仍照老样子，把事权都交给一个人。于是因专制而来的弊害，一次次地复演着，而政治遂成为一进一退之局。这种因政体而来的祸害，我们在从前，虽然大家都认为无可如何之事，然而从海通以来，得外国的政体，以资观摩，少数才智之士，自然就要起疑问了。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动机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50—151页）

当时海内外的情势

先是康有为从出亡后，就在海外组织保皇党，以推翻慈禧太后，使德宗重揽大权为目的。此时乃改而主张君主立宪，和同盟会为对立的机关。海内的立宪运动，见本书第四十七章。然革命运动，气势亦颇盛；其以笔舌鼓吹的，则有章炳麟著《訄书》，邹容著《革命军》，都因此下狱，邹容竟死在狱中。谋以实力解决的，则有刘道一等的起事于萍、醴（刘道一亦是同盟会会员，但这一次举义，却不是同盟会

发动的），清朝调苏、赣、湘、鄂四省的兵，才把他打平；又有安徽候补道徐锡麟枪杀巡抚恩铭，据军械局谋起事，事虽无成，清朝已为之胆落了。

同盟会的革命运动

同盟会的革命运动，最壮烈的，要算一九〇八年的河口之役，和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之役。前一役初起事于钦州，因军械不足，退入越边，再从越边进兵，大败清军于河口，直迫蒙自，因无援而退。后一役则运动广东的新军，谋在广州起事，而党人组织敢死队，以为之领导。因事机泄漏，未能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。党人攻督署，事后觅得尸体，丛葬于黄花岗的七十二人，海内外闻讯震动。这时候，各地方的人心，日益倾向革命，新军也多有受运动的。清室越发濒于危亡。

何谓革命

凡事积之久则不能无弊。这个积弊，好像人身上的老废物一样，非把他排除掉，则不得健康。人类觉悟了，用合理的方法，把旧时的积弊，摧陷廓清，以期达于理想的境界，这个就唤作革命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49页）历代之革命，有自外而入者，有即行之于内者。行之于内者，又可分为二：（一）本系在内之权臣，如王莽是。（二）则在外之强臣或军人，入据中央政府，如曹操、刘裕是。大抵内重之世，革易多在中朝。外重或内外俱轻之世，则或起于外而倾覆旧政府；或先入据旧政府，造成内重之局，而后行革易之事焉。以王步虽改，朝市不惊论，则起于内者为优。然以除旧布新论，则起于外者，为力较大也。（《中国社会史》，第328页）

第五十二章

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之成立

中国国土大，边陲的举动，不容易影响全局。要能够振动全国，必得举事于腹心之地。但是登高一呼，亦必得四山响应，而其声势方壮。此种情势，亦是逐渐造成的。革命党的运动，固然是最大的原因。党人乃于十九日，即阳历的十月十日，起义于武昌。革命军既起，清朝的官吏，都逃走。（一九一一年）阳历十二月，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国。二十九日，十七省代表，公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通电改用阳历，以其后三日，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。清朝乃授权袁世凯，和民国议定皇室和满、蒙、回、藏优待条件，于二月十二日退位。从一六二二年明桂王被弑，清朝占据中国，共二百五十年而灭亡。

清末的形势

清朝从德宗和慈禧太后死后，格外失其重心。一九一一年，说是预备立宪组织责任内阁，而阁员十三人（当时内阁总、协理外，有外务、民政、陆军、海军、度支、学法、农工商、邮传、理藩十部，及军咨府。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，是清末宗室中久握政权的），满族居其九；九人之中，皇族又居其五。人民称为“御用内阁”，不合立宪精神，请愿改组，遭清廷拒。又以铁路国有之事，与人民大起争执。其时国民鉴于外人攘夺我国的路权，实寓有瓜分危机，群谋收回自办。川汉、粤汉，都组有公司。（粤汉铁路，清末本借美国合兴公司的款项建筑，因该公司逾期未曾兴工，乃废约收回自办）而清廷忽将铁路干线，都收归国有。人民起而争执，川省尤烈。清朝的四川总督，一味用高压手段，将代表拘押，群众驱逐。省城人民，聚众请求释放；

外县人民，亦有续至的；彼竟纵兵残杀。清朝还要派满员端方，带兵入川查办，人心大愤。

革命的导火线

中国国土大，边陲的举动，不容易影响全局。要能够振动全国，必得举事于腹心之地。但是登高一呼，亦必得四山响应，而其声势方壮。此种情势，亦是逐渐造成的。革命党的运动，固然是最大的原因，而清廷的失政，亦有以自促其灭亡。清廷到末造，是无甚真知灼见的，只是随着情势为转移。当时的舆论，颇有主张中央集权的。政府亦颇想设法挽回。但不知道集权要能办事，其举动依然是凌乱无序，不切实际，而反以压制之力，施之于爱国的人民，就激成川、鄂诸省的事变，而成为革命的导火线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57—158页）

革命军的起事

此时革命党人，鉴于屡次起事，都在边陲之地，不能震动全局，乃谋易地起义，武汉的新军，业已运动成熟，定于是年旧历中秋起事，旋改迟十日，未及期而事泄，清廷的湖广总督瑞澂，大肆搜杀。党人乃于十九日，即阳历的十月十日，起义于武昌。革命军既起，清朝的官吏，都逃走。革命军推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，收复汉口、汉阳。照会各国领事，各国都认我为交战团体。［按国际公法，列国承认一国革命军，既为“交战团体”（Belligerency），即为尔后承认为合法的革命政府之先声，关系甚重］清廷闻变大震，即派陆军大臣荫昌，率近畿陆军南下。这“近畿陆军”，原来是袁世凯在直隶时所练。（辛丑和议定后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，练新兵，共成六镇，后来第一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六四镇，改归陆军部直辖，称为近畿陆军。世凯后入军机，溥仪立后，罢居彰德）荫昌无威望，不能指挥。清廷不得已，起用袁世凯督军。攻陷汉口、汉阳，然各省次第反正；停泊九江、镇江的海军亦响应。清廷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，载沣旋罢摄政职，大权全入世凯之手。乃由英领事斡旋，两军停战，在上海议和。

中华民国成立

是年阳历十二月，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国。二十九日，十七省代表（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直隶、奉天），公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通电改用阳历，以其后三日，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，中山先生，即于是日在南京就职。中华民国于是成立。

清朝的灭亡

先是上海和议，议决开国民会议，解决国体问题。至是，清朝的代表，以和议失败，电清政府辞职。和议由袁世凯和中华民国的代表，直接电商。孙中山先生提出“如袁世凯赞成共和，则自己辞职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”的条件。袁世凯也接受了。其时清朝以吴禄贞为山西巡抚。禄贞屯兵石家庄，截留清朝运赴前敌的军火，虽然给清朝遣人暗杀，然满人中最持排汉主义的良弼，也给革命党人炸死。滦州的军队，既表示赞成共和；前敌将领，又有要带队回京，向亲贵剖陈利害的。清朝乃授权袁世凯，和民国议定皇室和满、蒙、回、藏优待条件，于二月十二日退位。从一六二二年明桂王被弑，清朝占据中国，共二百五十年而灭亡。

清室之优待条件

清室之退位也，民国与订《优待条件》。其中第一款，许其存尊号，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。第二款，与以岁费四百万。第三款，许其暂居宫禁，日后移居颐和园。第四款，许其奉祀宗庙陵寝，民国为之保护。第五款，民国许代完德宗崇陵工程。第六款，宫内执事人员，许其留用。唯以后不得再阉人。第七款，民国许保护清室私产。于清皇族，亦许仍其世爵，公私权同于民国国民，而不服兵役，且保护其私产。于旗民，许为代筹生计。未筹定前，八旗兵弁俸饷，照旧发给。亦可谓仁至义尽矣。乃清室仍居宫禁，迄不迁移。违背条件之事，尤不一而足。民国六年，又有复辟之役。京师既复，民国本应加

以彻究。徒以是时执政柄者，为清室旧臣，自谓不忍于故君，遂忘服官民国应尽之责任。多数议员，醉心禄利，纵横捭阖，日争政权，但图苟全一己生命财产，不复计纲纪顺逆，无能督责政府者。（《中国社会史》，第343—344页）

临时政府北迁

即1913年。下文各处的“×年”，均为民国纪年，不再一一注明。

清朝既亡，孙中山先生即向参议院辞职，并推荐袁世凯。参议院即举袁为临时大总统，派人欢迎其南下就职。袁氏不欲南来，故意暗唆兵变，不能离开，乃许临时政府移设北京。参议院亦随之而北迁。当民军起义之后，各省都督府，曾派出代表，组织联合会议，议决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。参议院即是据此而设立的。至此，乃由参议院将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修改为《临时约法》，并制定《国会组织法》《参众两院选举法》，据以选举、召集，于二年[注]四月八日开会。

都邑选择当首重社会风纪

都邑的选择，我是以为人事的关系，重于地理的。古人有治，首重风化。以今语言之，即国家之所注重者，不徒在政治、军事，而尤重视社会风纪，人民道德，此义论政之家，久已视为迂腐，然在今日国家职权扩大之时，似亦不可不加考虑。欲善风俗，必有其示范之地，以理以势言之，自以首都为最便，故京师昔称首善之区。自教化二字，国家全不负责以来，人口愈殷繁，财力愈雄厚之地，即其道德风纪愈坏，京师几成为首恶之地。人总是要受社会影响的，居淫靡之地，精神何能振作？所耗费既多，操守安得廉洁？吏治之不饬，道德和风纪之败坏，实为之厉阶。值此官僚政治为举世所诟病之秋，安可不为改弦更张之计？然欲图更化，旧都邑实不易着手，则首都所在，似以改营新都为宜。昔时论建都者，多注重于政治军事，而罕注重于化民成俗，有之者，则唯汉之翼奉，唐之朱朴，宋之陈亮。翼奉当汉元帝时，他对元帝说：文帝称为汉之贤君，亦以其时长安的规模，尚未奢

广，故能成节俭之治，若在今日，亦“必不能成功名”，他主张迁都成周，复位制度，“与天下更始”。朱朴，当唐末亦说“文物资货，奢侈僭伪已极”，非迁都不可。陈亮当宋高宗时，上书说：“钱塘终始五代，被兵最少，二百年之间，人物繁盛，固已甲于东南，而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，以讲礼乐于其中，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，以乐其生；干戈之余，而钱塘遂为乐国矣。”窥其意，宴安鸩毒，实为不能恢复的大原因。三家之言，皆可谓深切著明，而陈亮之言，实尤为沉痛。（《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》，原刊1946年5月5日《正言报》）

第五十三章

民国初年之外交

讲起民国初年的外交来，是很可痛心的，那便是俄蒙、英藏交涉，和大借款的成立。当前清末年，中国曾向英、美、法、德“四国银行团”，订借改革币制和东三省兴业借款。这是因为日、俄两国，在东北的势力，太膨胀了，所以想引进别国的经济，去抵制他们的。四国怕排除日、俄不妥，而“六国银行团”遂以成立。提出的借款条件，极为苛酷，颇有干涉我国财政之嫌，美国政府令该国的银行退出，六国团又变为五国。二次革命将起，袁世凯急于需款，遂向“五国银行团”借得英金二千五百万镑，是为“善后大借款”。本来兴业的借款，变为政治借款；本来想借英、美、法、德抵制日、俄的，变为五国联合以对我了。

俄蒙外交

讲起民国初年的外交来，是很可痛心的，那便是俄蒙、英藏交涉，和大借款的成立。当民国纪元之前两年，日、俄订立新协约。据说别有密约，俄国承认日本并吞韩国，日本承认俄国在蒙、新方面的举动。果然，韩国于这一年为日本所并；而俄国于明年，亦就对清朝提出蒙、新方面的要求，并以最后通牒相胁迫。约未及订，而革命军起，清朝就更无暇及此了。清朝对于藩属，向来是取放任主义的，其末年，忽要试行干涉，而行之不得其法，遂至激起藩属的反对。因俄国的怂恿，遂乘辛亥革命的时候，公然宣告独立，驱逐驻蒙大臣，称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。俄人和他订约许代他保守自治，而别订《商务专条》，攫取农工商业，和交通、通信上广大的权利。民国成立，舆论颇有主张征蒙的，这自然是空话，如何办得到？仍由政府以外交方式，和俄人磋商，到二年，才订成所谓《声明文件》。俄国承认中国

对外蒙古的宗主权，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。所谓自治，就是中国不设官、不驻兵、不殖民。其范围，则以前清库伦办事大臣、乌里雅苏台将军、科布多参赞大臣的辖境为限。四年，根据此旨，订成《中俄蒙条约》。其呼伦贝尔，亦因俄人的要求，改为特别区域。（中、俄订有条件：呼伦贝尔的收入，全作地方经费。军队只能以本地人组织；如有变乱，中国派兵代定，须知照俄国；并须事定即撤。中国人在呼伦贝尔仅有借地权）

英藏交涉

中国的开放西藏，起于公元一八九〇年的《藏印条约》。是约把当印藏交通要冲的哲孟雄认为英的保护国。三年后（公元一八九三年）又订《藏印续约》，强辟亚东关为商埠。而藏人不肯实行，俄人乘机染指，藏俄日亲。会日俄战起，英遂于一九〇四年进兵侵入拉萨。达赖喇嘛逃奔库伦，英人迫班禅立约：（一）开放江孜、噶大克。（二）非经英国许可，不得许他国派官和驻兵。（三）土地、道路，及其余财产，不得让与及抵押于外国或外国人。中英交涉再三，终因俄、德、美、意四国反对，于公元一九〇六年，再缔《修订藏印条约》，承认前《藏印条约》为附约。只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。其时清廷因驻藏大臣为藏人所戕害，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，将川边土司改流。又派联豫为驻藏大臣。联豫和达赖不协，电调川兵入藏。达赖逃奔印度，自此，反和英国人一起了。革命军起，藏人驱逐华兵。达赖回藏，宣告独立，藏番并进攻川边，川、滇出兵恢复，英人又提出抗议。中国不得已，停止进兵。三年，中、英、藏三方代表，会议于印度的西摩拉，订成草约：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，中国承认外藏的自治权。所谓内外藏的界限，则将红蓝线画于所附的地图上，中国对此项界线，不肯承认，此问题遂至今为悬案。

西藏本无内外之分

如今的海藏高原，在地文地理上，可以分做四个区域。（一）后藏湖水区域。其地高而且平。（二）前藏川边倾斜地。雅鲁藏布江以东，

巴颜哈喇山脉以南，大庆河以西，诸大川上游的纵谷。兼包四川、云南的一部。（三）黄河上游及青海流域。（四）雅鲁藏布江流域。喜马拉雅冈底斯两山脉之间。（二）（三）都是羌族栖息之地。（四）是吐蕃发祥之地。（一）就是藏族的居地了。原来康之与藏，本不能并为一谈。旧界系以江达以东为康，以西为藏。所以雍正四年会勘画界案内，于江达特置汉藏两官。清末改康为川边。其境域，亦系东起打箭炉，西至江达。然则姑无论西藏本无内外；即欲强分为内外，而所谓内外藏者，亦应统限于江达之西。乃英国人之所谓藏者，几于包括川边，分割青海；还要在其中画分内外，把外藏的范围，扩充得极大。陈贻范屡次交涉无效，只得就英使原提出的草案所附地图的红蓝线，略加伸缩，竟于草约签字。（《白话本国史》第二册，第26—27页；第四册，第31页）

善后大借款

当前清末年，中国曾向英、美、法、德“四国银行团”，订借改革币制和东三省兴业借款，以各省新课盐税，和东三省烟酒生产、消费税为抵押。这是因为日、俄两国，在东北的势力，太膨胀了，所以想引进别国的经济，去抵制他们的。因革命军兴，其约遂未成立。民国既成，四国怕排除日、俄，毕竟不妥，又劝诱他们加入。日、俄提出借款不得用之满、蒙的条件，四国银行不许，交涉几次，乃决定将此问题，改由外交解决。而“六国银行团”遂以成立。对我提出的借款条件，极为苛酷，颇有干涉我国财政之嫌。美国政府不以为然，令该国的银行退出，于是六国团又变为五国。民国二年，二次革命将起，袁世凯急于需款，遂以关、盐余的全数为抵押，向“五国银行团”借得英金二千五百万镑。以四十七年为期，于北京盐务署设稽核所，用洋人为会办；各产盐地方设稽核分所，用洋人为协理。盐款非经总会办会同签字，不得提用。其用途则于审计处设外债稽核室，以司稽核。是为“善后大借款”。本来兴业的借款，变为政治借款；本来想借英、美、法、德抵制日、俄的，变为五国联合以对我了。

满蒙五路建筑权问题

民国初年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交涉，那就是所谓满、蒙五路的建筑权。当民国成立以后，国人颇关心于承认问题。外国中有好几国，是在正式国会成立之后承认的。有许多国，则在正式大总统选出之后承认。而日、英、俄三国，都附有条件。俄国要求外蒙古自治。英国要求外藏自治。日本则提出所谓开海、四洮、洮热、长洮、海吉五路的建筑权。这要求的提出，还和二次革命时张勋兵入南京，杀害日本人三名有关，但其提出恰在选举正式总统之前一日。中国政府也承认了。日本自此觊觎蒙古之心就更切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73页）

第五十四章

军阀政治与内战

革命是要把一切旧势力，从根本上打倒，这是谈何容易的事？辛亥革命，不过四个月就告成功，自然不是真正的成功。但是政治既未上轨道，则藉为政争武器的，自然不是议会中的议席，而是实力。以实力论，自然北政府为强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国内到处充满着旧势力。于是孙中山先生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，以达到民权、民生主义，扫除专制政治，建设真正民国为目的。袁世凯本不是真心赞成共和的，所以推翻清室，无非想帝制自为，所以才被举为总统，而反动的迹象，就逐渐显著。凡事总免不了有反动的。中国行君主制度二千余年，突然改为共和，自不免有帝制的回光反照，然不过八十三日而取消，这也可见民意所在了。

二次革命

袁世凯本不是真心赞成共和的，所以推翻清室，无非想帝制自为，所以才被举为总统，而反动的迹象，就逐渐显著。孙中山先生知道政治一时不会上轨道，主张革命党人，都退居在野的地位，而当时的党人，不能服从首领的命令。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，由秘密的革命团体，变为公开的政党；和接近政府的进步党对峙。因组织内阁及外交问题，和政府屡有龃龉。二年，国民党理事前农林总长宋教仁，在上海车站遇刺。搜查证据，和国务院秘书有关。民党益愤激。时安徽、江西、广东三省的都督，尚系民党，袁世凯乃将其免职。于是民党起讨袁军于湖口，安徽、湖南、福建、广东、上海、南京，先后响应，袁世凯早有布置，民党不久即失败。是为二次革命，亦称赣宁之役。

革命尚未成功

革命是要把一切旧势力，从根本上打倒的，这是谈何容易的事？辛亥革命，不过四个月就告成功，自然不是真正的成功了。但是政治既未上轨道，则藉为政争武器的，自然还不是议会中的议席，而是实力。以实力论，自然北政府为强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国内到处充满着旧势力。于是孙中山先生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，以三年七月八日成立于日本的东京。以达到民权、民生主义，扫除专制政治，建设真正民国为目的。时因清朝政府，业已推翻，故未提民族主义。其实行的方法，仍和从前所定相同。如分军法、约法、宪法三时期等。因鉴于前此党员多有自由行动的，党的纪律未免松弛，所以此次组织，以服从党魁命令为重要条件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63、165、167页）

帝制运动和护国军

照《临时约法》规定，宪法由国会制定，大总统选举法，系宪法的一部分。二次革命之后，国会议先选总统，后制宪法。乃将大总统选举法提出，先行制定，据以选举。袁世凯遂被举为大总统。袁世凯被举之后，即解散国民党，取消国民党议员和候补人的资格。国会因之不足法定人数，袁世凯遂将其解散。并解散省议会，停办地方自治。旋开约法会议，将《临时约法》修改为《中华民国约法》（众称此为《新约法》，而《临时约法》为《旧约法》），将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。又设参政院，命其代行立法院职权。四年，北京有人发起筹安会，说是从学理上研究君主、民主，孰为适宜。通电各省军民长官，派员参与。旋有自称公民团的，请愿于参政院，要求变更国体。参政院建议，开国民会议解决。其结果，全体赞成君主立宪；并委托参政院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。袁世凯即下令允许。而前云南都督蔡锷，起护国军于云南，通电宣布袁世凯政府伪造民意证据，率兵入四川。袁世凯派兵拒战，不利。贵州、两广、浙江、四川、湖南，先后响应。山东、陕西亦有反对帝制的兵。袁世凯不得已，于五年三月，下令将帝制取消。要求护国军停战。护国军要求袁世凯退位；并通电，恭承

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。彼此相持不决。六月，袁世凯病殁，一场帝制风波，才算了结。

有权位者难以觉悟

凡事总免不了有反动的。中国行君主制度二千余年，突然改为共和，自不免有帝制的回光反照，然不过八十三日而取消，这也可见民意所在了。一场帝制的风波，表面上总算过去了。然而暗中隐患，还潜伏着。原来天下大事，都生于人心。当袁氏帝制自为时，虽然怫逆民心，而中外有权力的人，却多持着观望的态度。所以护国军初起时，通电各省说："麾下若忍于旁观，尧等亦何能相强？然长此相持，稍亘岁月，则鹬蚌之利，真归渔人，萁豆相煎，空悲铄釜。言念及此，痛哭何云。而尧等与民国共存亡，麾下为独夫作鹰犬，科其罪责，必有攸归矣。"这真可谓语长心重了。然而谁肯觉悟？谈何容易觉悟？而其余各方面的人，也无甚觉悟。就近之酿成复辟之役，和护法之战，远之则伏下军阀混战的祸根了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76、177—178页）

复辟之变

袁世凯既病殁，黎元洪入京继任，恢复《临时约法》和国会，国会再开。六年春，欧战已历三载。德国因形势不利，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。我国提出抗议，不听，遂与德交。更谋对德宣战。国务总理段祺瑞，主持甚力；而黎总统怀疑。《对德宣战案》，提出于众议院，有自称公民团的，包围议院，要求必须通过；阁员又有辞职的。众议院说："阁员零落不全，宣战案应俟政府改组后再议。"时段祺瑞召集各督军、都统，在京开军事会议。各督军、都统，分呈总统、总理：指摘议员所定《宪法草案》不合，要求不能改正，即行解散。旋赴徐州开会。黎总统下令免段祺瑞职。各省纷纷，多和中央脱离关系。黎总统令安徽督军张勋入京，共商国是。张勋带兵到天津，要求黎总统解散国会，然后入京，七月一日，突拥废帝溥仪复辟。黎总统避入日本

使馆，下令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职务，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。段祺瑞誓师马厂，以十二日克复京城。

护法之役

京城既复，黎总统通电辞职。冯副总统入京，代行职务。当时国会解散时，广东、广西即宣告军民政务，暂行自主；重大政务，径行秉承元首；不受非法内阁干涉。及复辟之变既平，北方又有人主张："民国业经中断，当仿元年之例，召集参议院。"不肯恢复国会。于是两广、云、贵，和海军第一舰队，宣言拥护《约法》。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。议决《军政府组织大纲》："在《临时约法》未恢复以前，以大元帅任行政权。"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。至七年，复将《组织大纲》修改："设政务总裁。组织政务会议；以各部长为政务员，组织政务院，赞襄政务会议，行使军政府的行政权。"举孙中山先生等七人为总裁，推岑春煊为主席。北方则召集参议院，修改《大总统选举法》，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，于七年七月十日就职。先是南北两军，尝冲突于湖南之境，及徐世昌就职后，下令停战议和，在上海开和平会议。至八年五月而决裂。

北方的混战

九年，北方驻防衡阳的第三师长吴佩孚，撤防北上。先是北政府于六年八月，布告对德、奥宣战，以段祺瑞为参战督办，编练"参战军"。欧战停后改为"边防军"，仍以段祺瑞为督办。至是，段祺瑞改边防军为"定国军"。两军冲突于近畿。定国军败。段祺瑞辞职。是为皖直之战。皖直战后，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，吴佩孚为副使。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，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，兼蒙疆经略使，节制热、察、绥边区。十年，湖南的兵攻入湖北，吴佩孚将其打退，因代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。十一年奉军驻关内的，和直军冲突，奉军败退出关。是为直奉之战。直奉战后，东三省宣布独立，徐世昌辞职，曹锟等请黎元洪复位，取消六年解散国会之令，国会在北京再开。十二年，北京军警，包围总统府索饷，黎元洪走天津。十月，曹锟当选为总统。

唯山西最安稳

民国成立以后，内争之祸，也可谓很厉害了。最安稳的，要算山西。他从民国十四年以前，简直没有参加过战争。阎锡山提倡用民政治，定出六政、三事，以为施政的第一步。六政，谓：（一）水利，（二）蚕桑，（三）种树，（四）禁烟，（五）天足，（六）剪发。三事，谓：（一）造林，（二）种棉，（三）牧畜。教育、实业，都定有逐年进行的计划。又竭力提倡村自治。在当时，亦颇有相当的成绩。惜乎到后来，牵入战争漩涡，以前些微的成绩，也就不可得见了。次之，倒还是新疆。从民国十七年杨增新被杀以前，大体也还算安稳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200页）

陈炯明的叛变

先是陈炯明以粤军驻扎于福建的漳、泉。九年，军政府主席总裁及广东督军，通电取消军政府及自主。时中山先生在上海，通电否认。命炯明率军回粤，中山先生亦赴广州，重开国会。十年，国会议决《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》，选举中山先生为总统。于五月五日就职。这一年，粤军平定广西。中山先生设大本营于桂林，筹备北伐。明年，大本营移设韶关。因陈炯明怀异心，不接济军用，免陈官职。炯明走惠州，使其部下包围总统府，实行叛变。中山先生避难军舰，旋复到上海，陈炯明再入广州。这一年冬天，在广西的滇军和桂军讨陈，粤军亦有响应的。陈炯明再走惠州。明年，中山先生回粤，以大元帅名义，主持军政事务。

第五十五章

欧战后之外交

当欧战之初，我国宣告中立。日本则借口与英同盟，派军攻陷青岛。事后竟对我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，并以最后通牒相胁迫。八年一月，开和会于巴黎。山东问题，在和会中，交由英、法、美专门委员核议。卒因英法的袒日，依照日本的意思，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，让与日本。消息传到我国，舆情大为激昂。于是有所谓“五四运动”。五四运动的价值，倒不在于政治上，而在于文化上。到这时候，才专提出这两种主义来。因为认识了科学的价值，所以肯埋头研究学问的人渐多，不再抱浅薄的应用主义。因为尊重科学的方法，所以有许多旧材料，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。因为认识了民治的价值，而国家社会诸问题，亦非复少数人的专业。

二十一条的要求

欧战起于民国三年，至八年而告终。当欧战之初，我国宣告中立。日本则借口与英同盟，派军攻陷青岛。日军的攻青岛，是从龙口上陆的。我国不得已，划龙口和胶州湾接近的一带为战区。日军又越出范围，占据胶济铁路全线；并据青岛海关。事后我国要求撤去，日本竟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，对我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，并以最后通牒相胁迫。我国不得已，于五月九日，覆牒承认，旋订约二十五条。然日兵在胶济路的，仍未撤退。六年，又在青岛设行政署，并在济南、潍县设分署。七年，我国驻日公使，和日本订立《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》，附以照会，许胶济路所属确定后，由中日合办。日本乃允将胶济路军队，除留一部分于济南外，余均撤至青岛，并允将所设行政署撤废，我国覆文中，有“欣然同意”字样，遂为巴黎和会失败的一大原因。

二十一条的内容

二十一条的要求，分为五号。第一号：（一）承认日后日、德政府协定德国在山东权利、利益让与的处分。（二）山东并其沿海土地及各岛屿，不得租借割让。（三）许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的铁路。（四）自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。应开地方，另行协定。第二号：（一）旅顺、大连湾、南满、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，均展至九十九年。（二）日人在南满，得商租需用地亩，以三十年为限。（三）日人得在南满居住、往来、经营工商业。（四）日人得在南满开矿。（五）南满、东蒙许他国人建造铁路，或向他国人借款建造铁路，及以各项课税，向他国人抵借款项，均须先得日本同意。（六）南满、东蒙聘用政治、财政、军事、警察各顾问、教习，必须先向日政府商议。（七）从速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。第三号：（一）汉冶萍公司附近矿山，未经该公司同意，不得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。第四号：（一）中国沿岸沿港湾及岛屿，概不得租借割让。第五号：（一）中国政府，聘用日本人为政治、财政、军事顾问。（二）日人在内地设立病院、寺院、学校，许其有土地所有权。（三）必要地方的警察，作为中、日合办，或聘用多数日本人。（四）由日本采办所需半数以上的军械，或在中国设合办的军械厂，聘用日本技师，并采买日本材料。（五）接连武昌与九江、南昌的铁路，及南昌、杭州间，南昌、潮州间铁路的建造权，许与日本。（六）福建筹办路矿，整理海口（船厂在内），如需用外资，先向日本商议。（七）允许日人在中国传教。其最后通牒，将第五号中，除关于福建业行协定外，余撤回，俟后日再行协议。

巴黎和会

八年一月，欧战各国，开和会于巴黎。当我国参加欧战时，日本怕中国因参战而与协约国亲切，不利于彼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之故，所以和英、法、俄、意订密约，以四国承认上项权利，为日本许中国参战的交换条件。至此，我国要求胶州湾由德国直接交还，日本则主张

由德国交给他，再由他还我。因英、法已受密约拘束；我国的主张，遂至失败。消息传至北京，人心大愤，于是有“五四运动”。［五号二十一条要求，系由陆征祥、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磋商；后由陆征祥与日使订立条约；“欣然同意”的覆文，则由驻日公使章宗祥送交，故当时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罢课，要求罢免曹、陆、章三人（曹、章及前驻日公使陆宗舆）。他处学校继之，商店亦罢市，政府乃于六月十日，将三人免职。时曹为交通部长，章为驻日公使，陆为造币厂总裁。］

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

当时山东问题，在和会中，交由英、法、美专门委员核议。卒因英、法的袒日，依照日本的意思，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，让与日本。时中国代表，亦提出一让步案。“德人在山东权利，移让英、美、法、意、日；由英、美、法、意、日交还中国。中国偿日攻青岛兵费。其额，由英、美、法、意议定。”因英、法袒日，未能有效。唯美国委员，另递一节略于威尔逊，说：“实行《中日条约》；或照《中德条约》，将德国所享权利，移转于日本；均不甚妥。不如照中国所提让步案。”但亦未能生效。中国代表提出保留案。声明中国可以在《和约》上签字，但关于山东条项，须保留另题——始而要求于《和约》内山东条项之下，声明保留，不许。继而要求于《和约》全文之后，声明保留，不许。改为《和约》之外，声明保留，不许。再改为不用保留字样，但声明而止，不许。最后要求临时分函声明，不能因签字有妨将来的提请重议，不许。代表电告政府，说：“不料大会专横至此，若再隐忍签字，我国将更无外交之可言。”二十八日，《和约》签字，我国代表就没有出席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91页）

五四运动及其价值

关于山东问题，我国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，而日本则主张德国无条件让与日本，相持不决。到四月二十四日，最高会议开会，招我国代表

出席。威尔逊朗诵英、法两国和日本的《秘密换文》。又诵《中日条约》和《换文》的大要。问为什么有这条约？我国代表说：“是出于强迫。”威尔逊又问：“七年九月，欧战将停，日本决不能再压迫中国，为什么还有欣然同意的换文？”这消息传到我国，舆情大为激昂。于是有五月四日，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停课，要求惩办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之举。风声所播，到处学校罢课，商店罢市，又有铁路工人将联合罢工之说。是之谓“五四运动”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90页）

五四运动的价值，倒不在于政治上，而在于文化上。西洋近世的富强，看似由于工业的发达，军备的扩张，其实真正的根源，还在科学发达上。因科学发达，所以对于天然的认识真确，而其利用天然之力，亦即随之而加强。推科学的方法而施诸人事，对于社会的认识，也就真确；应付各种问题，自然也有计划、有条理、有组织、有效率了。至于社会的风习，中西固各有所长，而现在相形见绌的，则是他们为民治的，而我们非民治的。因为是民治的，所以人人能够自动，而其思想也极自由。民气自然发扬，民力自然充实。非民治的，就适与相反了。中国的改革，始而注重于制造、军事，既而注重于政治，可说是都没搔着痒处。到这时候，才专提出这两种主义来，而中国的文化，就要焕然改观了。因为认识了科学的价值，所以肯埋头研究学问的人渐多，不再抱浅薄的应用主义。因为尊重科学的方法，所以有许多旧材料，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。因为认识了民治的价值，所以学艺要求其普及于大众，于是提倡新文学，提倡语体文；又由教育部制定注音符号颁行；近来又颁布简体字；以求工具的简易。而国家社会诸问题，亦非复少数人的专业，要用宣传方法，“大吹大擂的，抬到众人面前”了（梁启超的话）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95页）

我国要求对《和约》中山东条件，加以保留，不许；要求不因签字故，妨害将来的提请重议，不许。我国遂未签字于《对德和约》。后来由大总统以命令布告对德战争终止。对于《奥约》，则仍签字的。

当议和之初，美国总统威尔逊氏（Woodrow Wilson），曾提出和平条件十四条，各国都认为议和的基本条件，其中有组织国际联合会一条。后来《国际联合会规约》，经各国同意，插入《和约》中，作为《和约》的一部，我国曾对《奥约》签字，故仍为国际联合会的一员。

华盛顿会议

十年，美国召集会议于华盛顿。与会的有中、英、法、意、荷、比、葡、日等国。会中所议，一为远东问题，一为限制军备问题。远东问题，成立《九国公约》，承认罗德氏四原则。时我国代表，提出大纲十条，美代表罗德氏（Elihu Root）综括为此四原则。又订《九国间中国关税条约》，许开关税会议（会议后由段政府召集，见第五十七章）。我国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，各国亦许派员调查（会议后由段政府召集，见第五十七章）。又要求收回租借地，则英于威海卫，法于广州湾，均声明愿交还；唯英于九龙，日于旅顺、大连湾则均不肯放弃；《五号二十一条案》，亦经我国提出，日本准备取消第五号，并允交还青岛，由中国赎回胶济铁路。

限制军备问题为成立《海军协议》，限制英、美、日的主力舰，为五∶五∶三比率，其满期，在一九三六年底。又由英、美、日、法四国订一协约，互认四国在太平洋所占岛屿、领土、属地之地位。英日同盟，即因此约而取消。

太平洋的新格局

欧战以前，日、俄、英、美、德、法，在太平洋上，本来都有势力的。欧战以后，德国在海外的属地，业已丧失净尽。俄国承大革命扰攘之余，法虽战胜而疲乏已极，亦都无力对外。在欧洲方面，只有英国向来是称霸海上的，而和东方的关系最为密切，所以虽当大战之后，对于太平洋的权利，还是不肯放弃。美国和日本，则是大战期

间，都得有相当利益的。所以这时候，太平洋上，遂成为此三国争霸的世界。

讲起地位来，则日本是立国于太平洋之中的。自中日、日俄两战后，南割台湾，北有旅、大租借地和南满、安奉等铁路。又承俄国革命之时，加以侵略。而德属太平洋中赤道以北的岛屿，战后议和，又委任他统治。其在西太平洋的势力，可谓继长增高。所以这时候，美国要召集这个会，主要的意思，就是对付他。

民国十二年，英、美、法、意、日五国，又有《海军协定》。十九年，又有《海军公约》。规定英、美、日三国海军的比例为五∶五∶三。虽然如此，日本在太平洋中形势，还较英、美为优胜。《海军协定》和《公约》的期限，都到一九三六年为止，所以大家都说：一九三六年是世界的危机，然而苟非中国强盛，谁能保证太平洋上风云的稳定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194—195、197页）

山东问题的解决

当《巴黎和约》签字后，日本认为胶州湾问题，业经解决，即照会我国，要求办理交收事宜。我国舆论，主张提出国际联合会。政府遂拒日人，未与直接交涉。华盛顿会议既开，乃由英、美调停，在会外交涉。英、美都派员旁听，其结果：胶济路由我发国库券赎回，以十五年为期。胶州湾由我国宣告开放。至二十一条问题，则由两院通过无效案。十二年，由政府照会日本，声明废弃。

德奥俄三国新约

欧战以后，我国对德、奥、俄三国所订条约，都是平等的。但俄约的权利，我国仍未能享受。德约在十年，奥约在十一年，都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等不平等的条文取消，俄约则最迟延。先是俄国自六年革命以后，为各国所封锁，深愿得一国与之亲交，曾于八年九年，两次宣

言，愿放弃旧俄政府，用侵略手段，在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权利。中国因与协约国取一致态度，未能与俄进行交涉。外蒙从欧战以后，即失所倚赖；俄国革命以后，更备受骚扰。八年，乃吁请取消自治。呼伦贝尔的特别区域，亦随之而取消。九年十一月，白俄军陷库伦，我国未能收复。至十一年，乃为赤俄所陷。外蒙先已在恰克图设有政府，至此，遂移于库伦，推活佛为皇帝。后来活佛死，外蒙就不再立君了。其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》，则直到十三年才成立。协定：（一）俄国放弃帝俄时代所得的特许和特权。（二）取消领事裁判权。（三）和关税协定。（四）东省铁路许我赎回。（五）承认外蒙古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。协定签字后一个月，开会解决赎回东省铁路，外蒙撤兵问题。然此会迟至十四年八月始开，又因东三省独立，一切事无从议起。俄人乃别和奉天订成《奉俄协定》，而中央对俄的交涉，始终未有结果。

第五十六章

国民革命之经过

二次革命失败后，孙中山先生又组织中华革命党，后决定“以国民造党，以党建国，以党治国，然后还之国民”之义，乃将国民党改组。（国民党）以党治国之事，在中国可行与否，尚属疑问。盖中国之政治，必加督责、考核，定其功罪，明其赏罚而后可。由是政治之系统，自必当清楚。党之为物，不过用以发动社会之力量而已，行政大纲，则固有正式机关在也。党之根本存在之需要与否，则尚待问题解决后决定；苟认为无益，则可取消之，而代以严肃之官僚政治。

国民党的改组

二次革命失败后，孙中山先生又组织中华革命党，以三年七月成立。其本部设于日本的东京，以扫除专制政治，建设真正民国为目的。袁世凯死后，本部移于上海。八年，改为中国国民党。十二年，中山先生决定“以国民造党，以党建国，以党治国，然后还之国民”之义，乃将国民党改组。十三年一月，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发表《宣言书》及《建国大纲》。会中推中山先生为总理。并议决将大元帅府，改组为国民政府。

以党治国，是否可行?

（国民党）以党治国之事，在中国可行与否，尚属疑问。盖中国之政治，必加督责、考核，定其功罪，明其赏罚而后可。由是政治之系统，自必当清楚。党之为物，不过用以发动社会之力量而已，行政大纲，则固有正式机关在也。国民党初起时，纲纪颇佳，然于北伐后遂渐坏，其职权与行政机关相混淆，或且掣肘；社会视之，亦无异于一类行政机关之组织。至真为党效忠者已寡，因党而起之兵争，亦不过

为地盘势力而已。苟于实力问题解决后，此等党之纷争，可无问题。而党之根本存在之需要与否，则尚待问题解决后决定；苟认为无益，则可取消之，而代以严肃之官僚政治。（《本国史（元至民国）》，第105页）

江浙直奉之战及段政府

是年九月，江浙、直奉战争复起，南方亦出兵北伐。孙传芳自闽入浙，浙军败退，而冯玉祥、胡景翼、孙岳在北方组织国民军，入北京。吴佩孚自海道南下，经长江至湖北，入豫南。奉军入关，并南据江苏。冯玉祥、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。段祺瑞邀孙中山先生北上，共商大计。中山先生主开国民会议，解决时局。议未能行。（当时段执政亦拟先召集善后会议，以解决时局纠纷；次召集国民代表会议，以解决根本问题。孙中山以其两会议，人民团体，无一得与，故不赞成。中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，系现代实业团体、商会、教育会、大学、各省学生联合会、工会、农会、政党及反对曹、吴各军组成）十四年三月十二日，中山先生卒于北京。段执政以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，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。后又以冯玉祥督甘肃。直隶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的督理（当时裁督军，管理各省军务的，都称"督理某省军务善后事宜"），亦均奉军中人。是年十月，孙传芳自浙江入江苏。江苏、安徽的奉军均退走，吴佩孚亦起兵于湖北，攻奉军于山东。冯玉祥与奉军战于直隶。驻关内的奉军郭松龄，又回军出关，因中途受阻碍败死于巨流河。直隶的奉军走山东，和山东的奉军，合组为直鲁联军。吴佩孚旋与奉军合攻冯玉祥。十五年三月，冯军退出北京，段执政走天津，直、奉二军，又合攻冯军于南口。冯军退向西北。

废督裁兵与联省自治

因为一切纷争，都起于军队太多和军人拥兵自重、争夺权利之故，于是有废督裁兵的呼声，并有联省自治的议论。联省自治之说，其由来也颇早。原来行省的区划，还沿自元朝。明、清两代的省区，虽然逐

渐缩小，然而其区域，还是很大，犹足以当联邦国的一邦而有余。而自清末以来，已渐成外重之局。辛亥革命，亦是由各省响应的。民国成立以来，中央事权，迄未能真正统一。而以中国疆域的广大、交通的不便、政务的丛脞，一个中央政府，指挥统驭，也颇觉得为难。于是有创联省自治之议，希望各省各自整理其内部的。当民国八、九年间，也颇成为一部分有力的舆论。于是有起而实行的，省各自制宪法。其中以浙江省成立为最早，于十年九月九日公布。湖南省制宪最早，而公布较迟，事在十一年一月一日。既已公布省宪，自然用不着什么督军。于是浙江于布宪之日，即同时宣布废督。即未制省宪的省份，也有宣布废督的，如云南省是。事在九年六月一日。然而名为废督，而军队仍未能裁，即督军之实，亦仍旧存在，不过换一个总司令或督办善后军务等等的名目罢了。所以还是无济于事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200—201页）

国民革命军的北伐

国民政府以十四年讨平东江，又平定广东全省，广西亦来归附。乃组国民革命军，十五年，以蒋中正为总司令，出兵北伐。时湖南军队，有归附国民政府的，亦有仍附北政府的。国民革命军先入湖南，击走其地的北军，遂入湖北，败北军于汀泗桥，克武、汉。左军下荆、沙。右军入江西。至十一月而江西毕定。留守东江的兵，亦定福建。国民革命军乃以湖南、湖北的兵入河南；命福建的兵入浙江；在江西的兵，分为江左、江右两军，沿江东下。十六年二月，江左、江右两军，和入浙江的军，会于南京。时冯玉祥亦自甘肃经陕西出潼关。五月，与入河南的兵，会于开封。这时候，国民革命军的兵势，已极顺利，而清党事起，北伐因之停顿。直军曾以其间，攻占扬州、浦口，并渡江据龙潭，为国民革命军所击退。十七年一月，蒋中正再起为北伐军总司令。四月，连下兖州、泰安，五月一日，入济南，三日，惨案作，日军据济南（日人于十六年，即以保侨为名，运兵到山东，后因北伐停顿撤退，此时又调兵到济南。五月三日，和我无端开衅，将我徒手军民杀死无数，并闯交涉公署，杀死交涉员蔡公时，我军为避

免枝节起见，大部退出济南，只留一团驻守，日兵又用大炮攻城。初十日，我军奉命退出。十一日，日兵遂入城占据。并将津浦路截断。胶济路沿线二十里内的行政机关，亦均被占据。直至十八年三月间，才定议撤兵，至六月间，才实行撤退）。我军乃绕道德县北伐。六月三日，张作霖出关，四日，至皇姑屯遇炸，至十二月而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，北伐之事，至此告成。

第五十七章

国民政府成立后之内政与外交

中国的自治制度，看似颓废，其实人民自治的能力，是最强的。不论什么事情，总是自己解决，倚赖官府的地方很少。这实在是社会改进唯一的道路。《建国大纲》以县为自治单位。一县自治完成时，人民即得行使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复决四权，选举县长。一省的县都自治时，在该省即为宪政开始，省长亦由民选。全国过半数的省开始宪政时，就召开国民大会，制定宪法，选举政府，由国民政府将治权交还。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，即发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。中国自海通以来，和外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，可谓极多，而其最甚的，则无过于关税税率的协定。关税自主，本系国家应有的权利，而一经丧失，更图恢复，其难如此。此可见外交之不可不慎，而民国创业的艰难，后人也不可不深念了。

训政的工作和宪政的预备

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，系军政、训政、宪政三时期。军政时期，由党取得政权。训政时期，代国民行使政权。宪政时期，则还政权于国民。在训政时期中，代人民行使政权的为国民党；行使治权的，为国民政府。国民政府，以十四年在广东组织成立。十六年四月，迁都南京。先是国民党改组时，共产党员曾申明以个人资格加入。然其后仍图在国民党中，扩充其党势，于是南京政府有清党之举。宁、汉之间，遂呈分裂之势。至是年七月中，武汉方面亦清党，才再合一。北伐于十七年完成。然十八、十九两年，两湖、两广，和河南、山东，仍有战事；党务亦有纠纷；幸皆渐告平定。

《国民政府组织法》，系十七年制定。五院的组织，逐渐告成。二十年，又制定《训政时期约法》。依《建国大纲》所定的程序，是要县的自治完成，省的宪政才开始，全国中有过半数的省，开始自治时，才得召集国民大会，议决宪法选举政府。然近年亦有主张提早召集国民大会的。二十四年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："国民大会，尽二十五年年内召集。"旋经第五届第一次中央全体委员会议决："《宪法草案》，于是年五月五日公布，国民大会，于十一月十二日开会。"

《建国大纲》中的自治制度

中国的自治制度，看似颓废，其实人民自治的能力，是最强的。不论什么事情，总是自己解决，倚赖官府的地方很少。这实在是社会改进唯一的道路。孙中山先生有鉴于此，所以也定以自治制度为政治的基础。《建国大纲》，本以县为自治单位。现行的制度：县以下分区，区以下分乡、镇，乡镇以下为闾、邻。（乡指村庄，镇指街市，大略在百户以上，不得超过千户。邻五家，闾二十五家）乡镇和区，各设公所，其长，均以人民自选为原则（未实行自治前，区长得由民政厅就考试合格人员中委任。乡、镇长由人民加倍选出，县长择一委任）；闾、邻长则纯由民选。一县自治完成时，人民即得行使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复决四权，选举县长。一省的县都自治时，在该省即为宪政开始，省长亦由民选。全国有过半数的省开始宪政时，就要召开国民大会，制定宪法，选举政府，由国民政府将治权交还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99—100页）

条约的改订

废除不平等条约，为国民党重要的政纲。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，即发出此项宣言。十七年，又照会各国，拟定改订的办法三条（旧约期满的，当然废除重订。未满期的，以相当手续，解除重订。已满期而未订新约的，另定临时办法）。嗣后改订的，已有许多国。至于公约，我国参加的亦很多，尤以十七年所签订的《非战公约》为重要。此约初发起于美、法二国间，后来扩大之而及于全世界，约中订明各缔约

国所起纠纷，不问其原因及性质如何，概不得用和平以外的方法解决，批准的共有五十余国，日本亦是其中之一。

关税自主的交涉

我国关税改革之议，起于《辛丑和约》后和英、美、日、葡等国所订的商约。因赔款太重之故，许我于裁厘后，加抽入口税至百分之一二.五，出口税百分之七.五；并得加收出产、消场、出厂三税，以为裁厘的抵补。后来裁厘延未实行，加税亦遂成空话。华盛顿会议，我国提出关税自主案。然《九国间中国关税条约》，仍只许开一会议，筹划实行《中英商约》而已；其后此会由段政府于十四年召集。我国又提出关税自主。各国承认其原则，许我国定税率，于十八年一月一日施行，而我国政府宣告于同日裁厘。国民政府首与美国订立《关税条约》，申明前此各约中，关涉关税的条文作废，应用自主的原则，后来德、挪、荷、英、瑞、法六国的关税条约，先后订成。比、意、丹、葡、西五国的商约，亦有相同的规定。政府乃于十八年二月，将段政府所定七级税则，实际得各国承认的，先行公布。二十年一月，裁厘告成，乃废七级税，另行制定税则。关税自主，在形式上就算完全实现了。但是实际运用的毫无障碍，还是要看外交上全局的形势啊！（我国初废七级税时，所订税则，最得保护本国产业之意。其时唯中日间有关税协议，日货进口，课税有极轻的。二十二年五月，因关税协定，业经期满，乃加以订正。然二十三年七月间所颁布的新税则，反失掉保护之意，这就是受外交别一方面的牵掣呀）

外交事务不可不慎

中国自海通以来，和外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，可谓极多，而其最甚的，则无过于关税税率的协定。现在世界上，经济竞争，日烈一日。贸易上的自由主义，久成过去，各国都高筑关税壁垒，以保护本国的产业。独税率受限制的国，则不能然。所以旧式和新兴幼稚的产业，日受外力的侵略压迫，而无以自存。中国所以沦入次殖民地的地位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。关税自主，本系国家应有的权利，而一经丧

失，更图恢复，其难如此。此可见外交之不可不慎，而民国创业的艰难，后人也不可不深念了。（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》下册，第217、221页）

撤消领判权的交涉

撤消领判权的交涉，亦是起于辛丑后的商约的，外人许俟我法律和司法制度改良后实行。华盛顿会议，我国将此案提出，各国允派员调查后再议。其后此会亦由段政府于十五年召集。调查的结果，仍以缓议为言。国民政府所订条约，意、丹、葡、西均定十九年一月一日放弃，比约规定另订详细办法。各详细办法，尚未订定，而各国有过半数放弃，则比亦照办。五约均附有（一）内地杂居，和（二）彼此侨民捐税，不得有异于他国的条件。此案因东北事变，迄今未能施行。唯墨西哥于十八年十一月，自动申明将领判权放弃。二十六年，开第六届三中全会，中委张继、覃振等提议，谈判撤废领判权，已由国府饬主管机关照议进行。

租借地和租界的收回

租借地在华会中，英于威海卫，法于广州湾，均声明放弃，后来威海卫于十九年四月间交还，广州湾则法人尚在观望。租界：德、奥、俄在天津、汉口的租界，业因条约改订而收回。当十四年五月间，上海日人所设棉织厂停工，工人要求复工，日人遽开枪将工人枪杀，学生因此游行演讲，为公共租界捕房所拘捕；群众要求释放，捕房又开枪轰击，死伤多人。此即所谓“五卅惨案”。并延及汉口、重庆，及广州的沙基等处。民气大为激昂。国民军到达长江流域，英人乃将九江、汉口租界交还，后来比于天津，英于镇江、厦门，亦自动将租界放弃。

东北的事变

外交中最可痛心的，为东北的事变。十八年七月，我国因撤换东省铁路职员，和俄国起有纠纷，俄军侵犯吉、黑，旋将东路回复旧状，而两国的邦交，则至二十一年十二月才恢复。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，日兵占据东三省，二十一年一月，又和我国在上海开衅，至五月间，才成立《停战协议》。明年三月，日军陷热河，侵犯长城一带，亦到五月末，成立《塘沽协议》，战事才终止。二十三年三月，日人遂拥立溥仪于长春。此项交涉，直到现在还未了结。

第五十八章

最近之文化经济与社会状况

现代国家的盛衰强弱，是以经济为其根本的。我国因生产方法落后，以致备受帝国主义的剥削。近二十余年，因为内战不息，以致一切实业都走不上振兴的路；而旧有的反更遭破坏。一国的命脉是经济，而经济的荣枯，往往表现于财政上。民国的财政，惊心动魄。革命军兴，财政的系统，一时破坏，现出艰窘的样子。经过两三年的整顿，渐渐上轨道了。不意帝制运动发生，中央威信坠地，各省应解的款项，多数都被截留。一九三一年，政府提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，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。各省设分会，研究救济农村，发达商工，改良物产。实行兴水利，开公路，整理棉业茶业，建筑谷仓，已有成效。

最近的经济状况

谁都知道：现代国家的盛衰强弱，是以经济为其根本的。我国最近的经济，却是怎样呢？我国因生产方法落后，以致备受帝国主义的剥削，这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了。可是到近二十余年来，而此等情势，更为恶劣。近二十余年，因为内战不息，以致一切实业都走不上振兴的路；而旧有的反更遭破坏。欧战时代，日本、美国，都因此大获其利，我国则仍未能挽回入超的颓势。

民国以后的财政状况

一国最重要的命脉是经济，而经济的荣枯，往往表现于财政上。民国以来的财政，却是很惊心动魄的。革命军兴，财政的系统，一时破坏，自然要现出艰窘的样子。经过两三年的整顿，渐渐的有些上轨道了。不意帝制运动发生，中央威信坠地，各省应解的款项，多数都被截留。中央除关、盐余外（付给所担保的赔款、外债的余额），乃专

靠借债以自活。除大借款外，还有许多较小的借款。欧战期间，则专借日本债。欧战既停，并日本债而不能得，则又专借内债。这是北京政府的情形。国民政府成立后，所借内债亦不少。现在中央政府的收入，以关、盐、烟酒、印花，统税为大宗。（《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》第四册，第96—97页）

欧战以后，反而备受各国倾销之害；而尤以一九二九年世界大恐慌爆发后为甚。农业：因兵燹的破坏；水旱的频仍；租税的苛重；出口的农产品，既因世界恐慌而减少；外国的农产品，反要侵夺我们的市场；遂至全国的农村，都沦于破产的景象。工业：旧有的既遭破坏，新兴的，必备受外国及外人在我国境内所经营的工业压迫，不论轻工业、重工业，都陷于困苦挣扎之中。（我国现在的轻工业：纺织事业，受日本的倾挤最甚；卷烟制造，受英国英美烟公司的倾挤最甚。煤，日本人所开抚顺煤矿，名为合办而实在是日人所独占。英国人所开开滦煤矿营销最畅，也是大权属于英人。我国人自开的煤矿，反不容易和他们竞争。生铁的出产，像大冶铁矿等差不多全和日资有关系；而且我国铁的储量，有百分之七十五在辽宁，又有百分之九在察哈尔，这是我国前途最严重的问题呀）沿海航业，外国船舶，有百分之九十强；长江中亦超过百分之六十。铁路既多欠外债，航空亦系和外国合办（中国航空公司，是中、德合办，德资居三分之一），凡外力所及的通商口岸都有较便利的交通连结着，而内地则直到最近，才开辟公路，而国货亦渐次兴起。并且国民政府，于十八年，自动取消厘金，收回关税自主权，是对外亦有进步了。

最近的经济政策

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，是包含平均地权、节制资本两大中心问题。而节制资本之中，又包含节制私人资本，和发展国家资本两义。平均地权一项，近来政府对土地有强制征收，或实行征收地价，也算一端。对于佃农，定了二五减租之法。（此案系十五年国民党所提出。原意谓减百分之二十五。其后各地解释，颇有歧异。有地方，先将农产物

减去百分之二十五，再将所余的七十五，由业主佃户平分。有地方，先将收获量平分，即业主佃户各得百分之五十，再从业主所得的五十分中，减去其二十五。浙江是照前法行的。其余各地方减租之事，实在并没有普遍实行）近来又设立农民银行，提倡合作事业，希冀农困的渐舒。节制资本，一时也谈不到，因为现在正是苦于无资本呢！不过全国劳动大会，十一年在广州业已召开，后来又开过两次。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，达到长江流域时，各地方的工会，风起云涌，组织最盛。后来因其不能尽上轨道，又逐渐加以整理。关于劳动的法规，亦已颁布多种。（其重要的，为工会、工厂、工厂检查、 劳资争议处理、团结协约等法）

政府并提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，于二十年，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。各省设分会，研究救济农村，发达商工，改良物产。实行兴水利，开公路，整理棉业茶业，建筑谷仓，已有成效。又于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，颁布法币政策，现银集中，专用纸币，不但货币数量的伸缩可以自由，币价易于稳定；而且外汇专由国家所指定的银行办理，则某种货物，我们要限制其进口的，就可以限制商人购买外汇，入超就可减少；而国币价值，不至较外币为高，输出又可以增加了。至于利用外资，一时也还不易着手。但是二十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以来，业经国际联合会行政院，许我技术合作，连年委派专家来华，业已帮助我们不少。世界各国，在这不景气的局面下，其困苦都是和我们一样的；而我国疆域的广大，天产的丰富，人口的众多，国民性质的勤俭，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；而又值各国经济，既经发达之后，可以利用其最新的技术，防止其已有的流弊；一时虽然困苦，将来实在是有很大的希望的啊！

第五十九章

本期结论

从西力东侵以来，中国人早已处于另一个世界中了，然中国人迄未觉悟。中国人感觉到遭逢旷古未有的变局，实自鸦片战争以来。其中又当分为两期：自五口通商以来，为我国饱受外国压迫的时代。从革命运动发生以来，则为我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的时代。历来议论的人，不论是中国人、外国人，大多数都说中国人进步迟缓，这是蔑视了历史上社会进化的规律，其实以中国之大，文化根柢的深厚，内地偏僻之处和现代的新文化接触的少，仅仅一百年，而能有如此的成绩，也不算坏了。至于其效迄今似尚未能见，则因大器晚成之故。

现代史的性质

自西力东侵以来，中国历史，就发生一个大变局，这是谁都知道的了。可是其中又当分为两期：自五口通商以来，为我国饱受外国压迫的时代。从革命运动发生以来，则为我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的时代。我们革命的成绩，是怎样呢？我们试自己检查检查看。

现代史是由外力压迫到起而反应的时代

自五口通商以来，可以说是我民族受外力压迫的时代。自戊戌变法以至于今，可以说是我民族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的时代。前此固非全不认识西洋人的长处。买枪炮、买兵轮，进而至于自己立船厂，设制造局……也算觉得西洋人的长处了。然而总以为西洋人的长处，不过如此。此等一枝一节之事，民族间互相仿效，是常有的事（中国最切于生活之物，如木棉的栽种、纺织，来自南洋；蔗糖的煎熬，出自摩揭陀国。见《唐书》本传），算不得文化的大变动；所以也算不得我们民族的有觉悟。到中日之战以后，就不然了。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

强，并不在于这些械器之末，而另有其根本的。于是始而想变法维新，仿效其政治。继而拟议及于政体。再后来，就知不仅是政治、军事一部分的关系，实在整个社会，都是有关系的。于是所拟议的，遂及于社会组织、学术思想……根本的问题。到这时代，我们可谓承认我们的文化，有改造的必要了。我们也可以说：业经走上改造的路了。我们的觉悟，并不算迟；我们所走的路线，也并没有错；至于一时未能见效，则事情的体段大了，原非旦夕所能奏功，这并不算无成效。我们不必因此灰心，反当益励其勇气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第190—191页）

民族主义的成绩

从近代以来，中国的民族主义，受着两重的压迫：一是清朝的专制，一是列强的侵略。从辛亥革命以来，专制的压迫，可算是摆脱掉了。至于列强的压迫，则现今仍在挣扎苦斗之中。从前清末年，我们就是靠着列强的均势以偷安的。民国初年，还是这个趋势。可是四国团变为五国团，已经有些协以谋我的现象了。欧战以后，更并这最小限度的均势，而亦不能维持。于是有“五九”的国耻。一时外交上的形势，紧张到极度。华盛顿会议时代，似乎要宽弛些。从世界大恐慌爆发以来，列强都无暇他顾，而最近形势的严重，又远过于“五九”时代了。民族的危机，是没有人能够援助我们的，只有靠我们自己奋斗呀！

民权主义的成绩

中国行专制政体数千年，辛亥革命，几于兵不血刃，不过百日，就给我们推翻；以后虽有帝制、复辟等反动，亦都不崇朝而败。军阀的混战，凡不得民心的，亦无不以失败终；这真是民意的发挥，算得世界革命史上的奇迹了。但是我国的民权，在消极方面，虽已能充分发挥，在积极方面，即进而运用四权，参与国事，则还正在训练期中，凡我国民，都不可以不勉。

官僚阶级是民权主义的大敌

官僚阶级，乃合下列几种人而组织成功的，即：（一）做官的人。（二）辅助官的人。其中又分（甲）高级、参与谋议的，或有专门技术的，即幕僚。（乙）办例行公事的，即胥吏。（丙）供奔走使令的，即差役。（三）与官相结托的人，即士绅。这三种中，固然都不乏好人。然虽有好人，改变不了阶级的性质。以阶级的性质论，总是要求自利的。自利的方法，从理论上言，是权威力求其大，收入力求其多，办事力求其少。在上级监督，社会制裁的力量所不及之处，便要尽力行之。社会的文化，因得官力的辅助而发展是例外，事业遭其压迫，财力被其榨取，人才被其吸收，以致萎缩，倒是通常的现象。所以官僚阶级，实在是社会文化发展向上的大敌。欲救此弊，唯有发展地方自治，其根本又在增加人民的知识能力。中国向来，亦未尝不看重地方自治，但治者阶级的理论，根本有一个偏蔽之处，以为天生人而有智愚，愚者必不能自谋，非靠智者为之代谋不可。其实国家的事务，有些复杂的、艰难的，非有特殊的才能，不易应付，若社会的事务，则根本不离乎日常生活，人民有何不能办？而且向来也总是人民自行联合，自行办理，自行立法，自行制裁，何尝真靠官家的力量来？所以提高人民的知识能力而扩大其自治权限，乃是民权主义的真谛。对于官僚阶级，其效用不过如此的，却深寄其希望。这便是民权主义的大敌，把这种思想打倒，民权主义的前途，就现出光明来了。（《中国现阶段文化的特征》，原刊1940年4月5日《中美日报》）

民生主义的成绩

民生主义，在将来是可以发生惊人的成绩的。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长处，而避掉他的短处了。可是现在，我们还正在艰苦奋斗之中。我们当这内忧外患交迫，天灾人祸迭乘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够很坚苦的维持其生活，我们的一切事业，实际仍在进行。对外的不平等条约，当以关税协定为最甚，我们在短时间内，居然将其解除。技术合作，也已在开始。我们看似困苦，实已走上光明的路了。

成绩的总批评

我国的全面积，大于欧洲；我国的人口，居世界四分之一；愈是进化的社会，其内部的情形，就愈复杂，短时间如何整理得来？古语说的好：“大器晚成。”正唯晚成，才成其为大器。况且区区二十余年的时间，在历史上论起来，算得什么？我们回顾已往的成绩，我们要自壮，不要自馁。

中华民族大器晚成

从西力东侵以来，中国人早已处于另一个世界中了，然中国人迄未觉悟。中国人感觉到遭逢旷古未有的变局，实自鸦片战争以来。此战爆发于民国纪元前七十二年（一八四〇年），距今恰足一百年。此一百年之中，中国的变化比之以前任何一个时期，都要来得大，来得快。历来议论的人，不论是中国人、外国人，大多数都说中国人进步迟缓，这是蔑视了历史上社会进化的规律，其实以中国之大，文化根柢的深厚，内地偏僻之处和现代的新文化接触的少，仅仅一百年，而能有如此的成绩，也不算坏了。至于其效迄今似尚未能见，则因大器晚成之故。制造一种器具，必须将各部分合拢起来，装置成功，然后其用乃见。社会的进化，亦系如此。各方面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所做的工作，不到合拢的时候，其功是不见的。而今则正是一种合拢的工作，所以近百年来的历史，在现今看来，固然只觉得其黑暗，然到将来看起来，则一定觉得其光明，因为它是光明的前驱。所以中国的历史，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历史，不论在哪一方面，都有追溯和检讨的价值。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，其发展的情形自然更值得追溯和检讨。（《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》）

第五编

综论

第六十章

历史与人类生活之关系

历史是记载社会进化现象的。所以社会进化，为历史的重心；有进步的国民，才能使社会进化。人类的进步，为什么如此迟缓，而在进化的中间，还要生出许多纷扰来，以致阻碍进化呢？其最大的毛病，就在无所用其心，而凡事只会照老样做。古人称君为元首，就是头脑的意思。一身的指导者是头脑，一群亦不可以无头脑，这意思是对的。惜乎局面广大，情势复杂，更无人能当此重任了。人类的举动，所以不能合理，而往往闯下大祸，就是由于或无足称为首脑部的一群人，或则虽有之，而其行动先自误谬，导其众以入于盲人瞎马，夜半深池之境。

历史与人类生活

历史是记载社会进化现象的，而社会的进化，不外乎人类生活的转变。所以孙中山先生说："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，社会进化，为历史的重心。"

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

人类从用石进化到用铜、用铁，从采拾食物，进化到渔猎、畜牧、农耕，再从农耕进化到工商时代。人类由家族而成民族，由部落而成国家，种种组织，都离不开社会。一言以蔽之：是人类要求生存，才有种种进化，而且离开社会，就不能够生存。

社会进化是历史的重心

封建时代，列国分立，秦始皇把他统一。汉武帝更开拓疆土，东南到海，西过葱岭，北过大漠。唐初武功，称雄东亚。明朝派三保太监郑和遍历南洋、印度洋，直到非洲东岸。中国声名从此很远。但须知那时的中国社会，大有进步，才能在历史上显著光荣。所以社会进化，为历史的重心；有进步的国民，才能使社会进化。

人类的进步为什么迟缓

人类的进步，为什么如此迟缓，而在进化的中间，还要生出许多纷扰来，以致阻碍进化呢？其最大的毛病，就在无所用其心，而凡事只会照老样做。

人类的行动，不容盲目。而在一群之中，总有较为聪明的人，大家的行动，都受这种人的指导，是合宜的，其结果必然有益。在古代小国寡民的社会中，此等需要，易于察知；而其功绩亦易于见得；所以才智出众的人，易于受人的推戴。古代的民主政治，所以能著成效者以此。到后世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国大民众，利害关系复杂，断非一人或少数人所能尽知。而我们还只会用老法子，希望有一个人或少数人，出而当指导之任，而我们大家都跟着他走。所以凡百事情，利弊都很难明了，兴利除弊，更不必说了。古人称君为元首，就是头脑的意思。一身的指导者是头脑，一群亦不可以无头脑，这意思是对的。惜乎局面广大，情势复杂，更无人能当此重任了。然而没有一个能做首脑的人，却不能说一群之中，不能有一个首脑部，现在人类的举动，所以不能合理，而往往闯下大祸，就是由于或无足称为首脑部的一群人，或则虽有之，而其行动先自误谬，导其众以入于盲人瞎马，夜半深池之境。前者一切衰微之国都属之，后者好侵略以致陷入泥淖，不能自拔者，便是个好例。（《塞翁与管仲》，原刊1940年5月24日《中美日报》）

从怎样生活的到该怎样生活

从前的人，以为历史不过记载伟人的事迹，与大多数国民无干。殊不知有怎样的社会，才能有怎样的人物。孔子若非生于周代文化最盛之时，岂能成为博学的大圣人，为儒教之祖。如来若不生于印度，或者那时印度文化不发达，岂能创立一种伟大的宗教，传布到中国来？所以伟人只是时代的产物。固然，伟人的能力，超过常人数十百倍，不是社会进化，已经达到一定的阶段，伟人亦是无可成其伟的。伟人只是时代的结晶。了解了该时代的社会，就什么都了解了。旧见解的纰缪，在于不知道古今社会的变迁。他们总以为古今的社会，是一样的；一切不同的事，只是几个特殊的人做出来，倒像不同的人，在同一舞台上做不同的戏一般。如此，就要摹仿古人，演成时代的错误。从西力东侵以来，我们这种错误，不知道闹过多少次。你们试想想看：从你们有知识以来，社会上的现象，有什么改变没有？你们或者年纪小；或者生在偏僻地方，觉不着什么；试问问年纪大的人，据他们的经验，社会上的现象，有什么改变没有？吃的东西，价格腾贵么？衣服的式样变换么？住的房子怎样？交通的器具和路线怎样？人情风俗又怎样？这许多，固然是一事一物之微；一个人所看见的，也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；然而社会全体的变动，就是一事一物之积；就部分，就可以推想出全体来。社会是变了。社会是时时刻刻在变的，拘守老法子，是不对的。该走什么路呢？社会为什么要变，必有其所以然之故。看清这所以然之故，应付的方法，就出来了。所以然之故，是要从事实上看出来的，所以史学是社会学的根柢。

社会科学是人人必须的知识

我们所以要研究社会学，乃因现在的社会，不可以不革命。唯有社会学，能昭示我们以（一）革命的理由，（二）革命的可能，（三）革命的途径。我们现在所奉为革命的方针的，是三民主义。然三民主义，乃是一种主义。若不求其了解，而只责以诵读，则是宣传而非教育。专靠宣传，是最危险的事。

不但如此，就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，对于社会学，亦不可以不知道。我国向来重视社会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，这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，而轻视人与物的关系。近几世纪来，因为靠自然科学之力，使世界焕然改观，大家视我国人的旧观念为陈腐，甚至视为背谬了。其实这个旧观念，是没有错的。物的道理，在未曾发明以前，我们固无如物何。然既经发明之后，亦断不会更有什么为难的问题，断不会根据业经有效的方法，装置电灯，而电灯忽然开不亮；制造火车，而火车忽然开不动。人和人的关系则不然。可以对付这个人的方法，未必能对付那个人。可以治理这个时代，这个地方的方法，未必可以治理那个时代，那个地方。然则从实用方法说起来，社会科学上智识，较诸自然科学上智识，获得确更艰难，价值确更宝贵。而且从应用方面说，自然科学实不必人人皆通，社会科学则不然。因为以一个人兼通各种学问，事实上决无此理，总不过享受他人所发明的成果。自然科学，是全不懂得这种学问，亦可以应用的。譬如全不懂电学的人，亦可以点电灯，打电话。电车不会开，则可以靠他人开。人与人的关系则不然。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的交际，不能说我不会应付了，而请懂得伦理学的人代为应付。然则人与人的关系，确是人人所必须的知识，而人与物的关系则不然。所以我们的旧观念，重视人与人的关系，视为首要，轻视人与物的关系，视为次要，实在并没有错。即谓二者的重要当相等，而人与人的关系的教育，当较人与物的关系的教育，更为普遍，总是一个不磨的道理。而在现代一切人与人关系的科学，都须明白了社会学，才能够认识其原理，而批判其是非。更显豁言之，则相传的道德、伦理、哲学、宗教等等，均须根据于现在的社会学，而重新估定其价值。（《为什么成人的指导不为青年所接受》，原刊《青年（上海）》1940年第6、7、8期）

第六十一章

中华民族之逐渐形成与前途

天下本无不变的事物，民族亦何独不然。民族，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。文化，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。生活的方式变，即文化变；而人所遭遇的环境变，即其生活方式，不得不因之而变。凡事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所以民族本来是要求其能变的。唯能变才有生机。唯一种文化，发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就要发生均衡的现象。此时非加之以外力，则不能大变。自西力东侵以来，中国遇着一旷古未有的变局。前此所遇的异族，至多武力为我所不逮；到现代，便文化的优劣，也发生问题了。所以近世和欧洲趋向相异的文化接触，实给我们民族以甚大的进展的机会。一个民族的文化，当其发生剧变之时，总不免相当的牺牲和苦痛。当这时代，对于新文化，深闭固拒愈甚，则其所受的牺牲和苦痛愈深。

中华民族的形成

中华民族，是怎样形成的？我们试追溯到历史上。我们最初，只是黄河流域的一个民族。我们进而将其他民族同化。我们再进而开拓长江流域，我们再进而开拓辽、热、察、绥，我们再进而开拓粤江流域。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规模，就于此确立。自此以后，为我所同化的：北有匈奴、鲜卑、突厥；东北有女真、蒙古；西北有深目高鼻的西胡；西南有氐、羌、苗、猺、猓猡等高地民族。每经一次同化作用，我们的疆域就扩张一步。我们的文化，亦时时兼收异族之长。我们吃西方来的瓜，我们着南方来的棉。我们会坐胡床，我们会玩胡琴和羌笛。我们也崇拜从西方来的胡天。我们吸收、融化了这些，而仍不失其为我。天下只有能兼容并蓄，是伟大的；只有能兼容并包，而仍不丧失其自己的，是伟大的。诚然，中华民族是伟大的。

民族唯能变才有生机

天下本无不变的事物，民族亦何独不然。民族是怎样变化的呢？民族的成因，总说起来，可以说是原于文化。一民族，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。文化的差异不消灭，民族的差异，也终不能消灭。而文化之为物，并不是不变的。文化，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。生活的方式变，即文化变；而人所遭遇的环境变，即其生活方式，不得不因之而变。环境是无时无小变的，所以人类社会，也不绝的在渐变。到环境生大变化时，人类要求适应他，乃罄其潜力（即平时储蓄之力以应之），就发生所谓突变了。凡事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所以民族本来是要求其能变的。唯能变才有生机。唯一种文化，发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就要发生均衡的现象。此时非加之以外力，则不能大变。但微细的渐变，仍是有的。因和异民族交通，而效法其所为，这亦可以说是一种环境的改变。民族之互相冲突亦然。所以异民族之相接触，于民族亦是有利的，因为这亦是一种文化的刺激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第10—11页）

中华民族前途的希望

中华民族，已往的事迹，留于历史上的，已显著光荣。但在将来，更有很大的希望。为什么呢？凡是一国的兴亡，全视国民的强弱，国民能振奋则强，倘堕落就弱。像古代的罗马大帝国，强盛的时候，全部欧洲，和非洲北部，亚洲西部，都在其统辖之下。只因罗马人民，因强盛而奢侈、放纵，贪佚乐，怕当兵，养成懒惰的社会，外族交侵，罗马大帝国从此瓦解而灭亡。自古以来，文化最早曾经强盛的民族，因国民堕落而衰亡的，不知其数。我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，国民向以勤俭耐劳著称，又有孔子诸圣贤著书立说，劝导国民，力戒贪乐懒惰，要奋发有为，崇道德，求知识。如此则国民元气常新，已往历史上的强盛，可以复见了。

打破文化的平衡

自西力东侵以来，中国遇着一旷古未有的变局。前此所遇的异族，至多武力为我所不逮；到现代，便文化的优劣，也发生问题了。民族既以文化为特征，与优等的异民族相遇，自然我们的民族，也感受着重大的威胁。文化进展到一定的程度，便要发生平衡的现象。所谓平衡，便是乐于保守，惮于改革；非加之以外力，则不能大变。中国文化，在东亚的一个区域中，其发展，可说是已达于高度。向来同我们接触的民族，其文化程度，都较我们为低。其文化的趋向，与我相异，而足给我们以一种刺激的，只有印度。但是印度的佛教，自汉代输入中国以来，经过魏晋、南北朝、隋唐时代的摄取，再加以宋、明时代（理学时代）的改造，业已与我国的文化融合为一；又成平衡的现象了。当此情势之下，非环境大变，我们的文化是不会有急剧的改进的。所以近世世界大通，和欧洲趋向相异的文化接触，实给我们民族以甚大的进展的机会。一个民族的文化，当其发生剧变之时，总不免相当的牺牲和苦痛。当这时代，对于新文化，深闭固拒愈甚，则其所受的牺牲和苦痛愈深。中国民族，是以“易”为其哲学思想，以“中庸”为其践履的标准的。所以对于新文化，最能欢迎和吸受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第167—168页）

第六十二章

中国文化之演进及其未来

古语说：殷忧所以启圣，多难所以兴邦。国家如此，民族亦然。复兴民族，不是虚㤭之气所能济事的。我们既要复兴民族，就得深切认识：现在民族的病根在哪里？我们不该自讳，中国所最缺乏的是科学。在中国人的意思，或者以为人和人的关系，弄明白了，对于物的措置，自然不成问题。而不知受了物质方面的牵制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也是不能尽善的。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然生产之法不精，防患之法不周，不能战胜天然的灾害，何法使之仓廪实、衣食足呢？所以中国今日，对于西洋人的科学方法，是应该无条件接受，迎头赶上去的。

中国文化的演进

中国的文化，是怎样演进的呢？中国古代的文化，是以农业社会的文化，为其根柢的。其对内对外，都极和平。这就是孔子所谓大同世界。同时，我们因立国大陆，对四围民族的斗争，极其剧烈，所以我民族又发达了武德，看古人多少慷慨激昂的举动，就可以知道。同时，我国因所处环境的优良，和我国民族天才的卓越，又发达了高深的学术。至周秦之际，诸子百家，争奇竞秀，而达于极点。这是我国固有的文化。秦汉以后，我国和异族接触更多。异族的文化有能够裨益我们的，我们也都把他吸收着。其中关系最大的，尤其要推印度，从南北朝到隋唐，正是我国努力吸收印度文化的时代。到宋朝以后，我国的旧文化，就要和印度输入的文化相调和，而别生一种新文化了。宋学的精微奥妙之处，确能吸收佛学之长，而其切于民生日用，则仍不失我国固有文化的特色。

中西文化的比较

我国现在的文化，比起西洋来，似乎自愧弗如了。然而西洋文化之所长，只是自然科学的发达；他们现在的社会科学，固然也极精深，然而都是自然科学发达了，借用其研究方法的。所以说到根本，西洋近来的发达，还是受科学之赐。而自然科学的发达，乃是特殊的环境使然，并不是在先天上，他们有什么特长。这话怎说呢？科学在粗浅之处，是世界上任何民族，都懂得的；所争的，只是发达与不发达。欧洲的海岸线，是很曲折的，因此他们长于航海，海外的贸易就兴盛。输出之物，求过于供，就不得不想到用机器代人力。机器的使用广了，自然研究的人多，研究的人多，发明就多了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似乎比西洋人落后了许多，而推其相异之由，实在只差得初的一步。迎头赶上，决不是难事。

中国最缺乏的是科学

古语说：殷忧所以启圣，多难所以兴邦。国家如此，民族亦然。历史上的事实，证明我们着着成功。短时间的挫折怕什么？我们便该鼓起民族复兴的勇气。

但是复兴民族，不是虚㤭之气所能济事的。我们既要复兴民族，就得深切认识：现在民族的病根在哪里？是怎样的病情？病状既明，然后从根本上施以救治。

民族的特征，既是文化；那我们的文化，自然总有缺点的。我们不该自讳。然则中国文化的劣点，到底在哪里呢？中国人是注重于人与人的关系的。所以自古以来，所苦心研究的，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。其于实际的应付，则注重于治人。西洋人所注重的，是人与物的关系。苦心研究，专想阐明事物的真相，求得其不变的法则。因此上发明了科学，及其实际的应付，则注重于治法。人是较为活动的，物是较为呆板的。中国人以为呆板之物，生不出什么问题来，不肯用心去研究，所以不会发明科学。西方人则习惯于研究“物”。其治

社会科学，分明所研究的对象是人；是人所做出来的事情；然而亦想以研究“物”的方法行之，于纷纭蕃变的人事中，求得其不易的定则。二者可谓各有所偏。物，诚然是呆板的，不会有意与人为难。然而对于物的性质不明白，因而驾驭物的方法不尽善，则这呆板之物，已尽足做人类发展的障碍了。在中国人的意思，或者以为人和人的关系，弄明白了，对于物的措置，自然不成问题。而不知受了物质方面的牵制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也是不能尽善的。譬如老话说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然生产之法不精，防患之法不周，不能战胜天然的灾害，何法使之仓廪实、衣食足呢?

如此，中国民族和西洋各民族的异同优劣，就可以了然；而中国民族复兴所应取的途径，也就可以不烦言而解了。中国所最缺乏的是科学。唯其有科学，对付起“物”来，事前才算得定；而办理的手续，也可以一无错误；工力才可简省；而任何浩大的工程，亦都可以举办。人类制伏自然，利用自然之力才强。制伏自然、利用自然之力强了，供给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，才无所欠缺。所以中国今日，对于西洋人的科学方法，是应该无条件接受，迎头赶上去的。（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第185—189页）

第六十三章

国际现势下吾国之地位与复兴运动

西力的东侵，是从海陆两路来的。从海路来的，是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国；从陆路来的是俄国。十九世纪之末，日本新兴，其势力亦及于大陆。在我国，遂成为三方交迫的局势。我国本是东亚的主人翁，可是因国势陵夷，全立于被动的地位。要想自立自强，必先振起民族的精神。所以我国现在的复兴运动，像新生活运动、识字运动、去毒运动、卫生运动，全要有学问有能力的学生去担任。青年学生不可以身家衣食为志，多思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。今之时事艰难，有大志者，理宜风起云涌，而顾寂然，是则士之耻也。

国际的现势

从西力东侵以后，我国就从闭关独立的局势，进而为国际的一员。国际的情势，是时有变迁的，现在却是怎样？西力的东侵，是从海陆两路来的。从海路来的，是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国；从陆路来的是俄国。十九世纪之末，日本新兴，其势力亦及于大陆。在我国，遂成为三方交迫的局势。古人说：远交近攻，那自然愈切近之国，其关系愈深了。欧战以前，英、美、德、俄、日在东洋都是有势力的。欧战以后，德国海外的属地，丧失净尽，在东洋可说已无关系。法国和东洋的关系，比较也是浅的。现在尽力对付欧陆诸问题，也无暇过问东洋了。只有英国，本是掌握世界海权的；在中国的权利亦较多，所以不肯放手；美国滨临太平洋；日本立国东方；俄国虽本国在欧洲，而在亚洲的属地，亦极广大，所以在东方，遂成为这四国争霸之局。

吾国的地位

我国本是东亚的主人翁，可是因国势陵夷，全立于被动的地位，而有时，尤不免有左右做人难之苦。在现今的国际情势之下，说是哪一国真得了哪一国的扶助，是不会有这事情的。不论讲均势，说瓜分，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。国际间的正义公道，虽不能说全然没有，可是没有实力的制裁，也就等于一句空话。何况瓜分固然危险，恃均势以自存，也不是立国之道；何况瓜分还可以变为独占呢？

复兴运动

但是要想自立自强，必先振起民族的精神。所以我国现在的复兴运动，正是切要之图。像新生活运动，政府正竭力推行，人民也踊跃从事。他若识字运动，是望全国人民，都受教育，增高道德和知识。去毒运动，是望人民勿再嗜好毒品，将百余年有害身体和精神的烟毒，永远禁。卫生运动，是望人民注意清洁预防疾疫。至于在学校中的学生，尤当晓得如何修养本身及服务社会的意义，因为教育之目的，在造就有实学有实用之人才，养成劳动服务之精神，与实际工作之能力。在校能勉力及此，他日出校，服务工作，必更有非常之成就。所以建设国家与复兴民族之大业，全要有学问有能力的学生去担任了。

青年学生不可以身家衣食为志

自吾有知识以来，五十年矣。小时所遇之读书人，其识见容或迂陋可笑，然其志则颇大，多思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，若以身家之计为言，则人皆笑之矣。今也不然。读书者几皆以得一职求衣食为当然，一若人之所求，更无出于此之外者。人诚不能无衣食，然谓所求仅仅在此可乎？人之所求，仅在衣食，是率天下皆自私自利之徒也，聚自私自利之人，而欲为利国利民之事，不亦蒸沙而欲成饭乎？

社会科学其本在识。当识人事之万象纷纭，而能明其理，知其所以然之故，然后知所以治之之方，而识之本，尤在于志，必有己饥己溺之怀，然后知世有饥溺之事，不然饥溺者踵接于前，彼视之若无所见

也。张横渠见饿莩辄咨嗟，对案不食者竟日。嗟乎，见此饿殍者，独横渠也哉?

人之志量，固有大小，然未尝不可以学而扩充之。日与第一流人相接，熏其德而善良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与之俱化，未有志徒在乎身家衣食者。第一流人或不易遇，尚友古之人，则其道也。今之时事艰难极矣，有大志者，理宜风起云涌，而顾寂然，是则士之耻也。（《吕诚之先生讲经世》）

（全文完）